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

宋素红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SBN 7-81085-781-9



ISBN 7-81085-781-9/K·781

定 价: 28.00元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

宋素红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宋素红著 .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7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ISBN 7 - 81085 - 781 - 9

Ⅰ. 女…　Ⅱ. 宋…　Ⅲ. 女性 - 报刊 - 研究 - 中国 - 1897～1949

Ⅳ. ①D442.9 ②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720 号

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

作　　者：宋素红
责任编辑：陈友军
责任印制：曹　辉
封面设计：源大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65450532 或 65450528　　传真：010 - 65779405
网　　址：http：//www.cuc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1085 - 781 - 9/K·781　　定价：28.00 元



作 者 简 介

宋素红 1973年出生于河南，先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文学学士、历史学硕士和新闻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

第一辑

文明传播的秩序
——中国人的智慧　　毛　峰　著

传媒市场化的陷阱　　禹建强　著

中国广播产业制度创新　　刘　斌　著

第二辑

多维视野中的DV影像传播　　王长潇 李法宝　著

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　　于翠玲　著

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　　宋素红　著

出 版 人　蔡　翔
总 监 制　闵惠泉
责任编辑　陈友军
装帧设计　源大设计工作室

前　言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半边天”，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都是中国新闻史领域值得着力研究的地方。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不够。作为一名研究新闻史的学者，笔者抱着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使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能够成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

在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新闻事业一直是男性的天下。中国女性与新闻事业无缘，新闻事业里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报刊。从 1897 年开始，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一片空白的状况开始改变。1897 年 2 月 22 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在华南的宣传阵地，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任该报日文翻译，成为我国第一个参加新闻工作的女性；1898 年，主张维新的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他的侄女裘毓芳参加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为笔名，在该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1898 年 7 月 24 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在上海创刊，该报以提倡男女平等、兴女学为宣传内容。以此为开端，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逐渐增多，她们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地位日益重要。

20 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莫过于女性的崛起。“让沉默者说话，为无言者立言”成为女性研究的主题之一。一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

的研究呈现出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局面，女子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等领域都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但关于女性报刊的研究却呈现出与此不适应的局面。“近代史上女子报刊为数众多，对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影响极大，但迄今研究得远远不够，蕴藏其中的丰富史料也未充分利用。”①

从 1897 到 1949 年，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怎样？她们有哪些值得当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借鉴之处？她们有哪些优良的特色和传统？她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廓清这些疑问，对于今天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不无裨益。

因此，无论从女性研究角度，新闻史研究角度，还是从有益于当今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发展的角度，关于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

妇女报刊，是以研究、探讨人文科学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反映、指导妇女生活与斗争为内容的报刊。而以反映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意义上的妇女问题（如《北平益世报》于 1947 年开设产科医学专刊《产妇之友》）为内容的刊物、或者是具有“妇女”名目而实际上是学术探讨性的刊物（如《女师大学术季刊》）不在妇女报刊范围之内。妇女报刊的类型除了妇女报纸、期刊之外，还有报纸的妇女副刊，期刊的妇女专栏、专号，以及专门出版物（如类似《中国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汇刊》一类不累计出版的刊物)②。本文重点研究妇女报纸、期刊，兼顾报纸的妇女副刊，期刊的妇女专栏；期刊的妇女专号以及专门出版物不是本文的重点研究对象。

---

①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397－398 页，上海书店 2000 年 4 月版。

② 姜纬堂、刘宁元主编：《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第 3－5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 9 月版。

新闻工作者泛指新闻行业中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刷、发行、广告、通联、后勤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有时只将从事外勤采写的记者和内勤工作的编辑称为新闻工作者①。女新闻工作者即在上述各个环节中工作的女性。本文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侧重于研究新闻采写、编辑和管理领域的女性。

目前，学术界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宣传性强、新闻业务性弱的特点：首先，一些在中国革命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研究相对较多，如秋瑾及其创办的《中国女报》；而一些在中国新闻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如《妇女杂志》和汤修慧等，则研究不充分，这不利于全面认识中国新闻史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就研究的时间段来说，大部分研究侧重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其次，就现有的研究而言，重复率较高。由于秋瑾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对她的研究比较充分。但大多数研究都是高度评价她的革命活动和《中国女报》的宣传内容，很少进一步探讨她当时办报的艰辛及其原因。再次，现有的研究比较零碎。要么是单个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要么是侧重某一历史阶段的研究，缺乏完整系统性。

三

本书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以下几方面试图做了一些尝试：力图显现结构的整体系统性，力图实现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

第一，在整体结构方面。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横向剖析，纵向拉纲。既有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典型分析，又有整体上的综合。在分析具体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以及

①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第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归纳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发展阶段的过程中，本书做了一些创新。例如，经过重新考证，本书认为我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不是裘毓芳，而是康同薇；经详细论证，本书认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期。

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不仅运用个案分析法来研究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作品，还用比较法来研究女新闻工作者，力图得到全方位、立体的认识。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为补充现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可能条件。

第三，在资料应用方面。尽量使用第一手资料是本书的原则。笔者查阅了大量原始报刊，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料。对妇女报刊在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出来，以便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在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只有参考第二手资料。但在参考第二手资料时，尽量集思广益，不偏信一家之言。

四

学术研究方法一般取决于两点：一是研究对象的特征，即研究方法必须结合所研究对象的特点；二是研究者所要达到的目标。鉴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故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一）系统科学的方法。近现代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历程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波澜起伏、风雷激荡的 50 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反映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与当时社会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子教育的进步，都与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密切相关。不对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生存的特定历史环境作一番考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当时的妇女报刊。这就离不开系统科学的方法，以整体的观点和方式把握研究对象，始终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看待，力求系统把握、重点分析，真实而正确地再现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之

路。

（二）一般分析和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为数众多，全面撒网式、面面俱到的研究方法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一般分析和典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有一般综述，展示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发展的大致历程，又有对具体的、典型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

（三）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妇女报刊的研究，采取纵向对比的方法，以体现妇女报刊的发展；对女新闻工作者的研究，采取对比的方法，体现女新闻工作者的个性，以探索女新闻工作者的进步与变化。

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这一研究课题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极其庞杂。除了能找到的资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相关资料躺在历史的深处，等待挖掘。因此，本书只能是笔者奉献给对该研究有同样兴趣的读者的一个阶段性作品。由于研究能力的限制，所以，本书仅仅是对50余年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发展历程的简单梳理和大致扫描，而且这种梳理和扫描一定会有不少不当之处。笔者相信，随着第一手资料的挖掘、发现，该研究还有继续深入下去的必要。因此，笔者期待着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以便使该研究继续深入下去。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与妇女报刊的滥觞

从唐代至今，有史可考的中国新闻事业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在这千余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新闻事业主要是男性的事业，没有女性的声音，也没有女性的身影。这种状况到了19世纪末戊戌维新时期才开始改变。

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诞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领袖的妇女解放思想有密切关系，是戊戌维新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是1897年参与澳门《知新报》翻译工作的康同薇，稍后有1898年参与创办《无锡白话报》的裘毓芳。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妇女报刊是1898年创办于上海的《女学报》。诞生于维新变法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表现了鲜明的女性特色和关心国事的优良传统。以此为基础，伴随着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队伍逐步发展壮大。

第一节　中国近代女新闻工作者的诞生背景

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潮流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她们纷纷参加革命，在革命中提出自己的权利，并通过创办妇女报刊为自己的权利呐喊，妇女解放运动开始形成一种时代潮流。这是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诞生的国际背景。随着明朝后期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思想初露端倪，早期启蒙思想家对传统的封建妇女观念提出了质疑。同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介绍了西方妇女解放的

情况。资产阶级维新派借鉴了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西方传教士的妇女解放思想，直接推动了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的诞生。

一、18－19世纪世界范围内妇女的觉醒

（一）中世纪西欧国家妇女地位

中世纪西欧天主教国家里的妇女地位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法兰克早期，妇女的地位并不低。公元5世纪，法兰克酋长克洛维接受罗马基督教的洗礼，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禁欲、苦行的教义，法兰克妇女也深受影响。天主教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两性关系的罪恶，保持贞操是妇女最崇高的德行，赞扬专心过宗教生活的法兰克妇女。但是，妇女执掌王权参与政事的史迹并不罕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农业生产和管理的权利，尊重妇女的生活风尚蔓延于宫廷和民间。

公元843年，法兰克帝国分崩离析，形成了今天欧洲法、德、意的雏形，教会的说教同时遍及西欧诸国，它所宣扬的“女人是祸水”和“禁欲主义”教条严重影响妇女的精神和生活。封建法律规定，妻子应受丈夫的严密控制，丈夫有权处理妻子的财产；社会依然认为妇女是引诱男人犯罪的“邪恶之源”，带有侮辱女性人格的所谓“贞洁带”广泛使用于欧洲已婚妇女之间。

16－17世纪中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不仅是文化的黎明，而且也是妇女史上的黎明”①。宗教改革第一次将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加以对待。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明确提出新的婚姻观念——男女结合是理所当然的正当事，夫妻应互相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对方；托马斯·闵采尔则以实际行动向禁欲主义宣战，反对传统的婚姻观；日内瓦宗教改革领袖加尔文认为，应该尊重妇女和重视爱情生活。西欧新兴的女市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很活跃，许多手工工场里有大量的女性参加劳动；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批杰出女性，如意大利名重一时的文艺女杰安德烈尼·伊莎贝拉（1562－

---

① ［美］坦娜希尔：《历史中的性》第299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604)，杰出的风格主义女画家拉维尼娅·方塔娜（1552－1614)，法国文坛上的璀璨女星，有女诗人拉贝·路易斯（1524－1566)，女文学家斯居戴尼小姐（1607－1701）等。

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不断冲击西欧国家传统的社会观念，女性逐步挣脱自身的枷锁，为提高自己的地位、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为百年以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二）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妇女报刊的产生

妇女报刊是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产物。18－19世纪，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巨大浪潮的推动，女权运动兴起，妇女报刊应运而生。

1. 法国妇女的觉醒与妇女报刊的产生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已经有了促使女子觉醒的思想启蒙。1622年法国女权运动家玛丽·德·古尔内在《论男女平等》中提出法国的女权问题，并强调教育在填补男女之间差异的作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至理名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唤起了女性的权利意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傅立叶首次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人民是否彻底解放的准绳，这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观点之一。圣西门认为，如果社会不关心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的安全，那么，社会应该感到羞耻。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已有精神准备的法国妇女就开始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1789年，当巴黎的妇女与男子一样拿着武器攻入巴士底狱之时，世界妇女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1791年法国妇女奥林珀·德·古热以法国大革命中颁布的享誉世界的《人权宣言》为蓝本，写下了献给法国王后的《妇女和女公民权利宣言》（简称《女权宣言》)，系统地阐述了妇女权益，反映了广大妇女的革命要求。

创办报刊是法国妇女争取权利的重要途径之一。1832年圣西门的女信徒、主张男女两性完全平等的克莱尔·德玛尔出版了《妇女论坛》。女编辑们表示：“决心献身于改善妇女命运的事业”，同时指出：“妇女自由的根本出路在于谋经济独立，和男子一样受普通教育和职

业培训，同工同酬。"[1] 这份有战斗力的妇女杂志在1834年被当局取消，但它显示了法国妇女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愿望。

1848年欧洲革命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女权主义者雅娜·德洛皮要求政府给予选举权方面的男女平等，取消性别特权，并主编《妇女舆论》杂志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同时，出版的妇女杂志还有《妇女之声》和《妇女权利报》等。此后，法国激进的女权运动者继续出版报刊为女性的权利呐喊。如1881年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贝尔蒂娜·奥克莱创办的法国第一家妇女参政报纸《女公民报》；1897年女记者玛格丽特·迪朗独资创办、自己写稿、编辑、印刷的《投石党报》。

2．美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报刊

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妇女与男子一道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在此过程中提出妇女的权利要求。但《1787年宪法》并没有承认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9世纪30、40年代，"废奴运动"在美国兴起，妇女趁势将争取女权与废奴运动结合起来。1848年莫特夫人和斯坦顿夫人在纽约召开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通过了主张"男女生而平等"的《女性独立宣言》，提出了妇女在参政、教育、就业等方面与男子平等的机会与权利，这是"美国妇女争取男女平等道路上的里程碑"[2]。1851年，美国第一次女权运动全国代表大会由著名的女权运动宣传家露西·斯通发起。会议决定创立"全美妇女选举协会"会刊《妇女日报》。1868年斯坦顿夫人创办了《革命》周刊。翌年，美国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成立了"全国妇女选举协会"，通过《革命》周刊传播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和全面改良的主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女权主义阵营争取妇女的选举权和经济独立[3]。同时期的另一批女权主义者以露西·斯通等人为首，组织"美国妇女参政协会"，创办《妇女杂志》，争取地方各州修改宪法，然后用超过多数的办法迫使国家修

---

① 孙晓梅：《国际妇女运动概况》第12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孙晓梅：《国际妇女运动概况》第74－75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

③ 王政：《女性的崛起》第1－2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版。

改联邦宪法，使妇女获得选举权①。

19世纪中叶以来，许多美国妇女被聘为漫谈专栏的作者和妇女版的编辑，有时也会被聘为流动通讯员。但很少妇女会被雇用做一个一般新闻报道的长期记者，但伊丽莎白·西蒙在这一防线上有所突破。她曾经在《纽约世界报》工作过。像当时众多女记者一样，她为自己取了个笔名："奈里·布莱"。经过不断向编辑们提出要求，她开始得到采访任务。她长于揭露腐败和剥削，经常有来自第一线的报道，内容真实生动，报道突出。编辑们不得不采用她的稿件。她曾经乔装精神病人在一个疯人院里呆过一星期，以便了解那里的情况；在一个工厂里，她做了很多收集意见箱来了解工人们的待遇；她曾经让自己被捕以便了解城市监狱的情况；她甚至扮成一个高级妓女，以揭露城市里的好色之徒。1889年，布莱完成了她最著名的壮举：她用72天时间环绕了全球，从而证明了一个妇女能用比科幻小说人物菲里斯·福格所花的80天还要少的时间完成环球旅行②。

3. 英国的妇女运动与妇女报刊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改变了妇女被封闭于家庭的境遇，机器大生产使大多数妇女有了参与产业劳动的机会，一些有文化的中产阶级女性首先觉悟，她们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展开了争取政治权利的运动。1797年，英国女权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玛丽·华尔史东出版的《女权拥护论》是早期女权运动的经典之作。它认为：男女之间根本没有区别，妇女之所以弱于男性，完全是由环境和教育造成的；男女彼此相依，任何一方的低落，都足以阻碍其他方面的进步。因此，男女应受平等的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女性的知识水平，在职业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进一步取得参政权。同期的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泰尔出版了辩论性的小册子——《致女士们的严肃建议》，认为男女同样是理性的动物，女性应该从自我束缚中解脱出来，脱离男性的保护，接受教育、充实自己、完善自身。进入19世纪，

---

① 李平：《世界妇女史》第503－504页，海南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② ［美］洛伊斯·班纳著：《现代美国妇女》第29－30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英国妇女参政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832 年英国制定“选举大修正法”时，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进入准备阶段。是时，英国妇女开始有组织地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以玛丽·史密斯为代表的早期女权运动者向议会上书，要求女子在法律上有与男子平等的发言权，但上书未能生效。19 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进入请愿阶段，中产阶级妇女以请愿、宣传、组织团体等手段，向议会施加压力。1855 年，史密斯女士组织了以“改正法律为中心”的请愿活动。1858 年，《英国妇女杂志》发刊，一方面宣传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妇女的事迹，一方面阐明妇女有能力和男子共同承担各种社会工作，指出妇女要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必须首先获得参政权。同时，一批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女出版商、女作家、女诗人也积极参与舆论宣传工作。如女权运动积极分子艾米莉·费思富尔于 1860 年创办维多利亚印刷所，并出版《维多利亚杂志》及其副刊《妇女工作》。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请愿阶段到 20 世纪初以暴力阶段的到来而结束。

综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妇女报刊，它们无一不是以资产阶级革命为契机而诞生，无一不是为妇女自身的权利而呼吁和斗争。

二、明朝后期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反映女性不幸，同情女性遭遇的文学作品古已有之。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萌芽，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大胆否定封建传统观念的倾向。表现在妇女问题上，就是对封建礼教压迫、摧残女性的谴责，对古代杰出女性的歌颂，对片面贞操观的批判，对婚姻自主的提倡。

在抨击男尊女卑方面。明代进步的思想家李贽在《焚书》卷二《答以女人道为短见书》中反对“妇人短见，不堪学道”的论调，指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认为这种提法本身是荒唐的。同时，他还大力赞扬古代杰出妇女。与李贽同时代的徐渭创作《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皇得凤》等杂剧，歌颂女子的文治武功。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则借百花仙子谪凡的神话传说，刻画了众多女子的卓越才能与高尚情操。这些对杰出女子的赞扬本身就是对

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否定。在批判片面的贞操观方面，李贽反对要求妇女守节的吃人礼教，主张寡妇再嫁。清代的张履祥（1610－1674）主张“寡妇再嫁可也”，钱大昕（1728－1804）、钱泳（1759－1844）、臧庸（1767－1811）等都主张不禁再嫁。在谴责摧残女性方面，主要是声讨缠足恶习。清初的毛萫著《禁女子缠足表》，呼吁禁止这种陋习。此后，批判缠足者甚众。在清初盛行土葬，视火化为大逆不道时，袁枚指出缠足是“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骨骸，以求福利”，言之痛切。龚自珍则作诗“侯王京庙求元妃，徽音岂在纤厥趾?”“娶妻幸得阴山种，玉颜大脚其仙乎”，非缠足美大脚。在讴歌婚姻自主方面，李贽认为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完全正确，“与其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并歌颂他们的结合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①。这些进步思想家或文学家所发出的主张男女平等的呼声，对近代妇女解放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近代以前，封闭而保守的中国对西方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一无所知。近代以来，外国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西学东渐中起到了桥梁沟通的作用。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到中国的“福音”，包含有西方先进的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主、文明结婚等思想内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与外人打交道的中国人。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介绍各国妇女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他主编的《万国公报》发表《中国女学》、《戒缠足》等文，述说中国兴女学的好处，认为缠足是极不文明之事。19世纪70年代早期改良派代表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在揭露封建政治的腐败、介绍西方议会政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妇女问题，提出过禁缠足和发展女子教育问题。

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借鉴了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改良派的妇女解放思想。他们让自己家中的女性成为妇女解放的直接受益者，这成为推动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产生

① 参考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第一章第二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的直接原因。

三、近代中国女性开眼看世界

近代以来，初步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了开明的上层人士，他们抛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狭隘偏见，让女子接受教育，培养女性的才能。甲午战争前，有4位平民女性开始出国学习。1881年，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宁波金雅妹由美国传教士带到纽约医院女子附属医院学习医学；1884年，福州柯金英由福州教会医院资助到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学习医学；1892年江西康爱德和湖北石美玉被传教士带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医。她们成为我国女性留学的先驱。19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个别妇女开始接触世界。但当时中国上流社会男女界限森严，大多数富家小姐深锁闺中，尚未觉醒。

1899年，单士厘跟随作驻外大使的丈夫钱恂游历了亚欧数国。她写的反映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思想、非常有价值的作品《癸卯游记·归潜记》被喻为“启蒙时期的中国女子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察”①。她是我国最早走出闺门、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妇女之一。

单士厘于1856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县一个富于文化教养的家庭，其外祖父官至礼部尚书。单士厘自幼丧母，在外祖父家长大，很早便与舅父玩味文词，研讨子史。单士厘天资聪颖，读书精博，积累了丰富的文史知识，造就了犀利的目光，为她以后走出国门深刻洞察、详细记述外洋情形奠定了基础。她的丈夫钱恂是颇为开明、很有学识的外交官，青年时代即随薛福成出使欧洲。海外数国的游历使他具备很强的时代感，这直接影响了单士厘。1899年她随丈夫自日本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至欧俄，沿途的旅行经历、观察与感受，形成了她的《癸卯游记·归潜记》，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部女子出国旅行记。

《癸卯游记·归潜记》记录作者两万余里行程的所见所闻，其内容涉及日本和俄罗斯等国情况。她从中日对比的角度谈日本，如参观大

---

① 见钱单士厘《癸卯游记·归潜记》一书的封面，该书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阪博览会教育馆，感到日本重视教育国乃强，触景生情联想到中国的前途。“日本之所以立于今日世界，由免亡而跻于列强者，惟有教育故。……要之教育之意，乃是为本国培育国民。……无国民安得有人才？无国民且不成一社会！中国前途，晨鸡未唱，观彼教育馆，不胜感慨”，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跃然纸上。她看到日本东京所售“西物”中，图书为优，而中国上海的“洋行”里尽是钟表、戒指之类的物质享乐用品，中国人和日本人务实精神之高下顿然分明。至于俄罗斯，她主要是介绍俄罗斯文化。她较有见地地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小说，认为它之所以遭俄政府严禁，是因为其“所著小说，多曲肖各种社会情状，最足开启民智”。文学史家阿英曾经引用这段话，并称单士厘是我国“最早赞扬托尔斯泰的女性”。该旅行记中的《彼得寺》、《新释宫》、《章华庭四室》和《育新》等文章则详细介绍了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和罗马有关史事、神话故事。这些文章，既有故事的叙说，又从学术源流上对之进行考究，体现了单士厘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史学功底。

该书还表达了作者对沙俄侵略中国的愤慨。作者沿途经中国东北到俄国，对沙俄侵略我国国土和残害国人的暴行多有所记。她看到俄国经营的中亚和中东铁路犹如巨蟹双螯牢牢钳制我国北部，并就该问题与中国驻海参崴商务委员李兰舟进行讨论。对于俄警野蛮殴打中国官员的马车夫和杀害解饷华官之仆二事，单士厘气愤地写到：“俄人肆虐杀淫掠于东三省，自以海兰泡之杀我男妇老幼三千余人于一日，为最著称。……辛、壬以来，被杀一、二命，见公牍于三交涉局者以百数，不见公牍者不知数。至于毁居屋，掠牲畜，夺种植，更‘小事’矣。”① 她一方面谴责沙俄侵略中国的罪行，另一方面暗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外交软弱。

该旅行记没有过多批评清政府，而是通过对俄罗斯封建专制主义的谴责来表达对制造愚昧和迷信的专制政治的不满，其中记载的关于俄罗斯、希腊、罗马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孕育着单士厘思想启蒙、开

---

① 钱单士厘：《癸卯游记·归潜记》第 63－64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第 1 版。

启民智、传播新风的特色，体现出作者鲜明的观点立场，从中可以体会到这位新女性启蒙者的良苦用心与爱国深情。

单士厘是我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女性之一。幼年时所受严格的家庭教育是她工于文章的基础，年轻时所接触的敢于突破封建藩篱的新思想是她写出该书的重要条件。

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妇女开始走向世界并接触西方社会文化。尽管是少数，却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第二节　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

在中国女新闻工作者出现 20 余年前，中国土地上已经有了外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活动。1874 年，与教会有关的两名外籍妇女普洛姆夫人和胡巴尔夫人在福州创办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小孩月刊》；1876 年，外籍妇女培荪小姐主编的《福音新报》在福州创刊。20 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产生。1897 年 2 月 22 日，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作为在华南的宣传阵地，从第 30 期起，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在该报任日文翻译，成为我国参加新闻工作的第一个女性；1898 年，裘毓芳在江苏无锡协助叔父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成为我国第一个参与创办报纸的女性。这在当时的新闻界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虽然比中国境内的外国女报人晚了 20 年。但毕竟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中国新闻事业里开始有了她们的身影。

一、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考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末维新派办的报刊，维新报刊为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最初的活动舞台。那么，在中国新闻史上，谁是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呢？

戈公振认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毓芳）女士为第一人

矣"①。裘毓芳，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江苏无锡人，是戊戌时期名才女之一。她最早的办报活动是 1898 年 5 月 11 日协助其叔父裘廷梁创办《无锡白话报》，担任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为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戈公振的观点成了以后比较普遍的看法，后来诸多妇女运动史、新闻事业史在谈到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的时候，均以戈公振的看法为准。有以下为例：

> "《无锡白话报》的问世，使裘毓芳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报人。"②
>
> "裘毓芳是我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开我国妇女办报活动的先声，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③
>
> "1898 年 5 月 11 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无锡白话报》在无锡创刊。裘廷梁的侄女裘毓芳参加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的笔名，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第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④

可以看出：裘毓芳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但据笔者考察，在裘毓芳从事新闻活动的前一年即 1897 年，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已经在澳门《知新报》从事新闻活动。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闻活动的女性。

康同薇（1879—1974），字文僴，号薇君，广东南海人，著名维新变法运动领袖康有为的长女。受其父的影响，自幼不缠足，不穿耳，姐妹、族人多效之，为女界先锋。康同薇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学强记，精通国学和英语、日语。她 15 岁时即根据《二十四史》编纂《风俗制度考》，后翻译大量日文书籍，协助其父编

---

①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第 130 页，三联书店 1955 年 3 月版。
② 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第 286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③ 刘巨才编著：《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 109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④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 129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

纂《日本政变考》和《日本书目志》。1897年，她参与澳门《知新报》的译报工作。1898年夏，康同薇与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等在上海创办《女学报》，并任编辑。这是中国最早由妇女创办、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妇女报刊。戊戌政变后，康同薇逃至澳门。1899年，康同薇与康有为大弟子麦孟华的二弟麦仲华结婚，后一直居留海外，直到1974年病逝。

1897年2月22日，维新派在华南的宣传阵地《知新报》在澳门创办。该报创刊不久，康同薇就担任该报的日文翻译并参与撰稿。《知新报》第32册的《本馆告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向读者告知近几期《知新报》的日文翻译由康同薇担任，"近刊之日本报大半为南海先生之女公子康同薇（原名薇君）所译，揭之于此以免掠美"[1]。这篇告白没有声明康同薇是该报正式的日文翻译，到了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康同薇就开始完全接替《知新报》原日文翻译山本正义，"本馆去年所聘之日文翻译山本正义、英文翻译陈君焯如皆已因故自行辞去。嗣后所译日文拟请南海康文僩女史任之，其英文翻译则添聘香山容君廉臣与旧聘之新会周君灵生总其事。此布。"[2] 据统计，在《知新报》工作期间，康同薇翻译的日文报纸主要有以下几种：日本《内阁官报》、《东京日日新闻》、《长崎新报》、《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时事新闻报》、《东京时事西文报》、日本《时事新报》、日本《太阳报》、日本《新闻报》等。

除了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外，康同薇还是该报的撰稿人之一。她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分别发表于《知新报》第32、52期期首。这些文章用一气呵成的排比句式、古今中外纵横对比的写作手法表达了她要求变法以"振士气"、兴女学以强国的强烈愿望，观点明确，有理有据，显示了较深的文字功底与深厚的知识积累，与当时《知新报》其他男性撰稿人的水平不分上下。

由上可知：康同薇至少在1897年9月26日已经参与《知新报》

---

① 《知新报》第32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1897年9月26日。

② 《知新报》第43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年2月11日。

的工作，到 1898 年 2 月 11 日开始成为该报的正式人员，这些新闻活动均早于裘毓芳在 1898 年 5 月 11 日开始《无锡白话报》的活动。因此，康同薇应该是我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

二、康同薇的变法思想

康同薇在《知新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①、《女学利弊说》②。这两篇文章可以代表她的变法维新与兴女学主张。

（一）“士”是振兴中国的基础

康同薇身出名门，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不仅精通数种外语，而且文史功底深厚。她的文章立意高远，气势恢弘，语言流畅，论证严密。《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是表达康同薇维新思想的重要篇章。该文由流畅的排比句开篇，一语点中“士”的重要性，一气呵成，给人以持久的震撼力，接着又以三重排比句式总结了近世“士”的蜕变，指出真正的“士”应该“仰观造化，俯查宗教，纵览今古，横审中外，以圣人之学，治天生之民”。历史上朝代的兴衰均与“士”之气有关，所以，“士者，国之基也；士者，才之宅也。士盛则其国强，士寡则其国殃。”

日本也曾有过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但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了强国之路。甲午之战，泱泱中国败于日本撮尔小国，国人的心理受到重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索其中的原因。康同薇认为，这是中国“士”气不振的结果。日本的“士”或著述立说，倡尊王之义，激励人心；或译西书，或发表演说，劝化黎民；或面斥权贵，刺主和之臣。而中国的“士”要么贞逸自高，要么独善其身，要么风流自命，要么皓首词章，民生之疾苦，国家之利病，种族之存亡，宗教之兴替与其无关。即使一二有志之士，怀满腔热血，合大群，倡实学，攘除国耻，整理天下，但事未成而谣诼旋加，横遭猜忌，“锐气而前，无聊而返”，重振士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时候。康同薇认为，“公车上

---

① 《知新报》第 32 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一日。

② 《知新报》第 52 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书”后，全国激动，学会纷立，天下士气为之一振，是振兴全国士气的大好时机。“合天下之士气，乃心王事，日美之所以兴隆也；士与国离，自私自利，波斯土耳其印度之所以衰颓也”，中国已经到了亟宜合士气之时。

康同薇所主张的“士”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开放的知识分子形象；她要求的“士”不仅要有知识有学问，更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她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深谙传统经学兼通务实西学、具有国家观念和开放情怀。同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还吸收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他们主张维新变法，却又是在不触动君主制度的前提之下进行。康同薇所主张的“士”恰恰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形象概括，她从根本上肯定了维新派在救国于危难、挽民于涂炭之时的地位，无疑是一封维新派知识分子向世人宣告自身时代使命的宣言书，而这宣言书出自一介女子康同薇之手。不仅如此，康同薇还以借助《时务报》表达了自己同男子一样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振兴士气的强烈愿望，“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

历史上，“男主内，女主外”、“女子唯酒食是议”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成为一条束缚妇女安于家庭、脱离社会的无形链条，妇女的受教育权被剥夺，即使少数上层妇女能受到教育，其内容也仅仅是怎样做贤妻良母，与国家社会毫无关联。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维新运动前后，国家的外忧内患空前严重，一部分有识之士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女性的教育逐步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模式，开始注入时代内容。康同薇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良好的家教、家庭出身是她的言论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兴女学是实现国家强盛、保障变法维新顺利的基本前提

发表于《知新报》第52册的《女学利弊说》是最能阐释康同薇妇女解放思想的文章。该文以“男女形质不同，而为人之道则一”开篇，将兴女学提升到与兴男学同样重要的地位。康同薇曾经有过轻视女子、怨天尤人的思想，但通过对比印度“耻其国有女也，不敢以示人”和美国“见其女之多也，群喜而贺之”对待女子的不同态度，康同薇认识到自己的看法“大谬不然”，“男女之轩轻良有所因，而国家

之盛衰亦非无故也”。

美国兴女学导致国家空前强盛，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其女学之制，约分十三科，……其所以异于男学者，不过数事。盖德足以自辅，才足以自养，相砺以廉节，相信以德义，而不为严密之防，不兴猜疑之心。内顾既寡，而工业得力，既无坐食蠹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此西方之所以致富强，而王道之成，治外必先乎内也”。借美国和日本兴女学而国强，康同薇指出中国兴女学之急不可待。

康同薇批判封建妇德对妇女的摧残。她认为，女子是孩童的启蒙老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贻害无数女子，不讲女学而欲使女子成为贤妻良母，犹如“止沸而加薪，南辕而北辙矣”。所以，“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而“唯酒食是议”的行为规范将全国女子变成了一个个不知痛痒的废物，让外国“嗤为半教，视为野蛮”。号称文明之邦的中国，不设女学，却让西人在我境内设女学，“我之子民，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泽及林木，仁被禽兽，而教不逮于妇女”，这是中国的怪现象，更是中国的悲哀。

女子缺乏教育导致女界风气不开，直接影响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例如，以扫荡旧俗为目的的“不缠足会”创办后，“开会者不过通商数区，入会者不过通人数辈”，原因是“知此理者尚少也”。欲使女子有助于变法，“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兴女学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康同薇提出了自己的办女学主张，“遍立小学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仪，略通书礼，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特立大学于会城，群其聪明智慧，广其材艺心思，务平其权，无枉其力，则规模大立，而才德之女彬彬矣。起二万万沈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昌我圣道，复我大同”。

维新变法是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但国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和国人素质的提高，发展教育，提高国人素质只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而决非全部。康同薇在论证女子教育的时候，过分强调女子教育在维新变法中的作用，有点不切合实际。但是，康同薇考察了中外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论证了兴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维新时期的兴女学提供了

舆论支持。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没有囿于狭隘的个人立场，而是从国家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意识和大局意识，这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典范。

第三节　裘毓芳与《无锡白话报》

裘毓芳是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她自幼受叔父裘廷梁的教育，她的新闻活动也和她的叔父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裘毓芳的启蒙老师——裘廷梁

主张维新、倡导白话的裘廷梁是裘毓芳从事报刊工作的启蒙老师。

裘廷梁（1857—1943），字葆良，江苏无锡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移居上海。裘廷梁出身封建仕宦家庭，幼年随父亲宦居开封，祖母周太夫人贤而知书，督教甚严。稍长，他又在侯蓉庄、秦来卿、龚书度等名流指导下，"为经术性理考据之学"，对古文辞、周秦诸子、《史》、《汉》所述尤为精究。但裘廷梁在科举之路上并不顺利。1892年曾中乡试，此后两试不中，遂绝意仕途，转而致力教育。他与梁启超、严复熟识，是位鼓吹新学的维新派人士。他极力主张兴办学校，写白话文，办白话报，认为白话是维新之本。他认为，中国教育不普及，与中国文字太深有很大关系。他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诗词歌赋之类，喜用汉文，译报纯用和文，泰西农工商矿诸学之书，日本译印略备。其书愈切于民用者，和文愈多，汉文愈少，务令易晓而已。是以变法不数载，民智大开，未始非和文盛行之效"①。因此，他主张文字改革，办法之一是"设法浅之"，即变文言为白话。此时，正值

① 见《无锡白话报》序，转引自《吴稚晖与裘可桴》，载于朱传誉著《报人·报史·报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朝野人士深受刺激之时，进步知识分子大多以开民智为己任，并认为其途径在于兴学和办报。裘廷梁将提倡白话和办报结合在一起，“欲民智大开，必自广学校始，不得已而求其次，必自日报始，报安能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始”①。

1897年裘廷梁到上海，建议汪康年“增设浅报”，但忙于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事冗不遑”，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不久，他回到家乡，先教其侄女裘毓芳把《格致启蒙》一书译成白话，各方面反映极佳。投石问路的成功增加了他办白话报刊的信心。于是，裘廷梁着手筹备《无锡白话报》。虽然当时许多进步学者也认识到白话作为普及教育之利器的价值，但在著书立说时仍然使用文言文，对白话文依然心存鄙视。裘廷梁不但主张白话，而且在办报中身体力行之。为了推广白话，他曾经和他的好友邓似周（与裘廷梁同为梁溪七子，其余五人为华若汀、秦潜叔、秦湘丞、杨范甫、杨仁。上述七人在当时均负盛名）展开舌战，成为中国最早的“文白之争”。

裘毓芳11岁时就住在叔父裘廷梁家，由叔父教读。裘廷梁主张维新、提倡白话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裘毓芳，这在《无锡白话报》上有明显的体现。

二、裘毓芳与《无锡白话报》

裘毓芳，字梅侣，笔名梅侣女史，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早的女性报刊宣传家之一。她于1871年生于江苏无锡城内沙巷，卒于1902年5月，是戊戌时期著名的才女之一。裘毓芳的父亲裘蕴山，官居四品黄堂，出仕浙江乍浦海防。有兄弟姐妹6人。裘毓芳自幼颖悟，5岁即能背诵数百首唐诗，7岁时和兄裘昌年一起受业于秦老夫子，9岁和弟弟裘二乐入塾读书。至11岁时，她的父母认为男女有别，即令出塾，住在叔父裘廷梁家，由其叔教读②。

在叔父裘廷梁的悉心培育下，青年时代的裘毓芳以深厚的文史与

---

① 《吴稚晖与裘可桴》，载于朱传誉著《报人·报史·报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② 浦耀煌：《裘毓芳——我国最早的女报人》，《江苏报业史志》1991年第1期。

国学根底蜚声于时，精通英文，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故有才女之称。她不仅熟知中外历史与现状，善于汲取一切新鲜思想的养料，而且立志办通俗报刊，主张以通俗的白话来推广新文化、新知识，以开通民智，宣传变法维新。

1897年7月，裘廷梁到上海，建议《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增办一白话报，因汪康年无暇顾及，未果。于是，裘廷梁独自为之，先请侄女裘毓芳用白话演义《格致启蒙》一文，印刷成册，分赠读者，征求意见，作为办白话报的先导。此书的出版，显示了裘毓芳的才华，顿使裘毓芳蜚声于时。

1898年5月11日，裘廷梁与同乡顾述之、吴荫阶、汪赞卿、丁仲屿等共同创办《无锡白话报》，五日刊，每册十余页不等，木活字，毛边纸印刷，线装本。第一期在无锡城内沙巷9号裘家出版。这份刊物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成为戊戌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较有影响的白话报纸之一。后来裘廷梁担心读者误会该报是用无锡方言编写的，"谨遵良友箴言"，从第五期起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由27岁的裘毓芳主持编务，面向全国发行，每半月出版一次。"每报一纸，不必子目悉备，取满幅而止。惟末附货殖必逐日登载。间述市面情形，以便理民用。酒谈茗话，亦偶载焉。汰芜秽存精英，以话代文，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为广开民智之助。"[①] 1898年9月26日，因维新变法失败，报纸出版26期而告终。

《无锡白话报》以新闻和译文为主，主要栏目有《上谕恭录》、《五大洲邮电杂闻》、《中外纪闻》、《无锡新闻》、《孟子年谱》、《养民新法》、《海国奇闻》、《海国妙喻》、《洋报药言》等。27岁的裘毓芳实际主持该报编辑工作，并发挥了自己的写作与翻译才能。几乎每期《无锡白话报》上都有她编译的作品，有时多至三四篇，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或间接呼吁变法维新的文章，表现出了鲜明的政治主张。她在报纸上译介李提摩太的《俄皇彼得变法记》，向读者译介了《哥伦布

① 转引自朱传誉著《报人·报史·报学》第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探新洲纪略》、《麦哲伦探地》、《蒙哥巴克探地》、《富兰克令探北极》等科学小故事和《嫩脸狗》、《贪嘴苍蝇》等生动有趣、富含哲理的西方寓言。她还撰写了《日本变法记》、《印度记》、《化学启蒙》、《孟子年谱》、《女诫注释》等论文。署名为“金匮裘毓芳演”的《孟子年谱卷一》从全新的角度，把孟子的母亲刻画成为具有高度男女平等思想的女性[①]。这种笔法，类似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体现的微言大义，将古代人物戴上一个拥护维新的光环，以便使自己的宣传更易于为时人接受。署名为“金匮梅侣女史演”的《海国妙喻》系列文章，以寓言体裁，借动物之口，用轻盈的笔调，滑稽的语言讽刺学无以用、无识无胆、睚眦必报的不良社会现象[②]。尤为可贵的是，裘毓芳将“文字交给大众”，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来演义，真正将传播的触角伸向大众，易于为多数受众接受，有效地宣传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有利于扩大报纸的影响。

裘廷梁在发刊词《无锡白话报》中介绍说：“报分三大类：一演古，曰经、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三曰演报，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谈新述古，务撷其精；间涉诙谐，以博其趣。”[③]《无锡白话报》三“演”并存。演古有如《孟子年谱》等，演今有如李提摩太的《俄皇彼得变法记》，演报有如“中外纪闻”、“五大洲邮电杂闻”等栏目内发表的大量国内外新闻。

为了推广白话，裘毓芳还与叔父裘廷梁一起，以《无锡白话报》为发起单位，于1898年8月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白话学会”，主张官府文书应用白话文，学校应推行白话文。在《无锡白话报》第19、20期合刊上，刊登了《开办白话学会简明章程》，并准备开办白话书局，广译中西有用之书，以飨读者。

同年夏，裘毓芳还担任上海《官话女学报》（旬刊）的主笔之一，

---

① 《无锡白话报》第1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② 《无锡白话报》第1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

③ 转引自金惠凤《白话文报的先驱》，《新闻通讯》1994年第4期。

并在该报上发表《论女学堂与洋学堂》等文，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

《无锡白话报》成为维新时期影响最大的白话报刊，裘毓芳功不可没。她和叔父裘廷梁一道主持《无锡白话报》的编辑工作，并以梅侣女史的笔名，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我国近代第一位参与报纸编辑工作的女性。在该报的影响下，白话报刊风行，如《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京话报》等相继创刊。

《无锡白话报》停刊后，裘毓芳随丈夫到安徽。1902年5月，裘毓芳病逝。天津《大公报》刊发了这一消息。7月27日，一位署名为"菡初"的读者在《大公报》上发表自己对于裘毓芳的钦佩与怀念："余往读裘女史所著白话丛书，敬慕其人不已。近阅天津《大公报》，始知女史已于五月中病逝。适其时，太后阅京话报知女史所著书，命内监访购于书肆中未得。此事为中国兴起女学之动机，不胜为二百兆女子幸而愈惜裘女史遽逝也。"这位读者还赋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并高度评价了裘毓芳作为女性开创白话报刊的功劳："当代江南一女宗，班昭而后继高风。热心讲演开民智，著述新翻白话丛。欲拜宣文仰德仪，素心常向锡山驰。怆怀津报传消息，乍陨彤徽五月时。近闻母后访遗编，启发慈衷籍女权。日本俄国兴国记，凭伊文字好回天。近时女校启新规，遗训堪为后学师。我祝兰闺都向学，家家先绣女相如。"①

这一时期的女报人还有参与创办《女报》的陈撷芬。

陈撷芬是《苏报》馆主陈范的长女，笔名楚南女子，祖籍湖南衡山，1883年出生于江苏阳湖（今常州市）。陈范原是一个落职的山西铅山县知县，有一点维新思想。由于陈撷芬的推动，他才大胆接近革命，聘请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为其撰述，章士钊为《苏报》主编。1899年冬，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创办《女报》，并担任主笔。该报不久即告停刊。1902年续出《女报》月刊，仍由陈撷芬担任主编。1903年，《女报》改名《女学报》继续出版，由苏报馆发行。该报鼓吹女

---

① 菡初：《吊裘梅侣女史》，《大公报（附张）》，光绪28年7月27日。

权运动，反对外国侵略。同时，陈撷芬参与《苏报》的编辑，并担任上海爱国女校的校长。1903年，“《苏报》案”发生，陈撷芬随父避居日本，在东京续出《女学报》第4期，由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行。

在日本，陈撷芬一边在横滨基督教公立女学校学习，一边出版《女报》，同时还参加反清秘密革命组织三合会。她和秋瑾一道重组留日女学生组织共爱会，被推选为共爱会会长。后与四川人杨隽结婚，夫妻同赴美国留学。为了资助《国民日日报》的出版，她曾典卖首饰。“应该承认，在我国近代报业草创时期，她是一位踏实工作的女英雄”①。

康同薇、裘毓芳和陈撷芬作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早的女报人，她们诞生于维新派办的报纸中，吸收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她们参与报刊活动，表达了变法图存的愿望和妇女解放的声音。同时，她们在办报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养成了基本的新闻工作技能，为后来从事妇女报刊活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康同薇、裘毓芳和陈撷芬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活动，可以看作是中国女报人的滥觞，“是中国报刊人才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她们人数不多，影响有限，但它标志着被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观念压抑了几千年的中国妇女终于开始觉醒，她们破天荒第一次出现在报人队伍中，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②

第四节　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天赋人权”、“历史进化观”为思想武器，把妇女解放和挽救国家危亡、变法维新相结合，提出了初步反映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特殊状况的妇女解放主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妇

① 徐铸成：《报人六十年》第98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② 曲长缨：《论中国名记者产生的内外背景》，人大新闻系1987年本科毕业论文，藏于人大新闻系资料室。

女解放的思想，是《女学报》诞生的思想基础。

一、维新派的妇女解放思想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里历数封建社会剥夺妇女政治、经济、文化、权利的罪行，指出妇女“婚姻不自由”、“为奴”、“为囚”、“为玩”并被迫“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公民，不得预议会，甚至不得事学问，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等等社会限制[①]，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是“一家之中妻之于夫，比如一国之中臣之于君，以为纲，以为统”[②]。在总结了封建社会妇女悲惨处境之后，康有为打算为“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为“女子拯沉溺之苦”[③]。他认为男女同为天民，男尊女卑有悖于天赋人权的原理，也不符合实际。他说，“至于人，则有男女，此固天理之必至，而物形所不可少者也。既得为人，其聪明睿哲同，其性情气质同，其德义嗜欲同……其能执事穷理同。女子未有异于男子也，男子未有异于女子也”，从理论上指出男女平等的合理性。康有为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是一个“男女平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的理想社会。

1890年，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继承康有为“男女平等”思想的基础上，他第一次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妇女问题，提出了兴女学主张。《论女学》一文指出，“凡一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所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之比例。何以故，无业之人，必待养于有业之人，不养则无业者殆，养之则有业者殆。斯义也，西人译者谓之生利分利。”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少，国家即强；反之则弱。梁启超认为，“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而这种由一人须养数人、妇人

---

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223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 康有为：《大同书》第236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③ 康有为：《大同书》第193页，中华书局1936年版。

嗷嗷待哺于男子的局面是由"妇人无业"造成的。"盖天下任取一业，则必有此业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当行之事，非经学问不能达也"，妇女之无业是由于传统社会歧视妇女，"以妇人为不足轻重，而不复教之。既不教矣，其无从执业，有固然也"。他认为女子经济不独立的原因是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缺乏从事职业的本领。生利之人少而分利之人多，所以待养于男子，造成妇女地位低下，国家穷困。"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必自妇人不学始"①。这种观点直接把妇女解放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并突出论述了发展女子教育以提高妇女素质的问题。梁启超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论，此外还从母教和胎教出发，认为兴女学于国于家均有利。1897 年 11 月 - 12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刊登《倡设女学堂启》，提出兴女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首倡以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女子教育。

1898 年 5 月，经梁启超和民族资本家经元善酝酿，由经元善筹办的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办，招收 8 - 15 岁的女生。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女学堂设立后，国内外报刊争相报道，女学堂声誉鹊起。

中国第一份女报、中国女学会和女学堂的机关报——《女学报》是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影响下诞生的，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妇女解放思想则是《女学报》诞生的思想基础。

二、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的创办

中国第一份女报在维新时期国人办报的高潮中诞生，这就是 1898 年 7 月 24 日创刊于上海的《女学报》。停刊时间不详。旬刊，每期 1 单张 4 版。现见到 1 至 7 期，每期第一页上方印有 CHINESE GIRL'S PROGRESS，第 7 期是 1898 年 9 月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承印。有四个代售处。从第 10 期开始改为 5 日刊，续出至 1898 年 10 月 29 日第 12 期。前 3 期免费赠送，从第 4 期起"每张暂取纸料钱三文"。

---

① 《时务报》第 23 册，1897 年 4 月 12 日。

受维新派变法主张的影响，戊戌时期已有少数知识妇女提出了自身解放的要求。早在中国女学堂成立之前的1897年夏秋，为了讨论创办女学堂有关事情，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妇女，如谭嗣同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创立了中国女学会。1898年5月下旬，中国女学会在《知新报》上刊登《中国女学拟增设报馆告白》，宣布拟在上海出版的《官话女子白话报》及其办报宗旨："中国女学不讲已二千余年矣。同人以生才之本在斯，于是倡立女学堂，……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①

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在上海创刊，"本馆设在高昌乡，经家路桂墅里女公学书塾内，……本报由塾中华洋教习主持笔政，西文总教习美国林梅蕊小姐主译报事"②。同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禁于瀛台，康、梁逃亡海外。《女学报》第8期刊登了光绪帝的上谕，并且出现了三处与政变有关的变化：一是主笔姓名栏内少了康同薇、李蕙仙、廖佩琼、睢念劬、丁素清、周远香等6人的名字；二是取消了坭城桥不缠足会代售处（大概是因为该会主持人康广仁被害的缘故）。9月份出版的第10期上，增加了一个美国主笔林玛莱。这个外国人名字的出现，显系政变缘故，请洋人为《女学报》做挡箭牌，以免政府查抄；三是从第8期开始，发表了《修婚礼以端正风华说》、《四德颂》等内容明显倒退的文章③。《女学报》希望通过这些策略性的变化来保全自己。

《女学报》是中国女学会的机关报，又是女学堂的校刊。这是中国第一份由女子主办、面向女性的报纸。据《女学报》第2期报道，该报的主笔有以下诸位，她们是：晋安薛绍徽女史、金匮裘梅侣女史、番禺蒋畹芳女史、武进刘可青女史、诸暨丁素清女史、皖江章畹香女史、京兆龚慧苹女史、江右文静芳女史、南海康文僩女史、贵筑

---

① 《知新报》第55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② 《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第1期，1898年7月。

③ 刘巨才主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110－111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7月版。

李端惠女史、临桂廖元华女史、邗江睢念劬女史、梁溪沈静英女史、梁溪沈翠英女史、古吴朱莳兰女史、上海潘仰兰女史。

《女学报》每期设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栏目，并附女学会所办女学堂事数例，其内容包括女学、修身、教育、家事、体操、官话、汉文、洋文、史学、地理、算学、格致、习字、绘画、裁缝、音乐等。

就兴女学而言，该报主张教育上男女平等，如金匮女士裘毓芳撰的《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①]；赞扬历史上做出成绩的女性，证明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如晋安女士薛绍徽撰的《女教与治道相关说》[②]；主张女子在入学资格上不问贵贱，不问贫富，一律教育，中西并习，如上虞女士蒋畹芳撰的《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③]；兴女学于国于家均有利，如古高城女士刘纫兰、淑惠谨撰的《劝兴女学启》[④]。

就该报与女学堂、女学会的关系而论，《女学报》的首要任务是：1. 报道女学会与女学堂的消息，"那女学会内的消息，女学堂内的章程，与关系女学会、女学堂的一切情形，有了《女学报》，可以淋淋漓漓地写在那里，像绿的叶，红的花，人见了不悦目，不爽心的吗?"。2. 协助女学会、女学堂的工作。"有了这报，知道会中一切情事，省了会内司笔许多信札笔墨"。该报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方便阅读，主笔之一潘璇认为使用白话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得懂。"我们这报，不致文义太深，看了不懂。字句皆雅俗共赏，所论多女子实学，……本报无论哪一条，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⑤]。

但这时兴办女学的依据是御定的《内则衍义》。女学堂创始人之一经元善认为，该规定"圣谟洋洋，典垂万世，实为塾中必不可少之书，俾天下亿兆妇女，有所遵守，则感发性情，渐摩礼仪，所以阐扬

① 《女学报》第7期，1898年9月。

② 《女学报》第3、4期，1898年8月15、20日。

③ 《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

④ 《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⑤ 上海女史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女学报》第2期，1898年8月3日。

圣教，仰体圣天子法祖牖民之义，正非浅鲜”①。《女学报》所宣传的女学以此为纲，一方面是因为初创的中国女学堂处于无纲可依的困境所致，同时也表明它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兴女学原则是有进步意义的。这就是：教育上男女平等的原则，如《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女学报》第7期，1898年9月）；关于女子入学资格不分贫富无论贵贱，一视同仁的教育平等原则，如《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女学报》第9期，1898年10月）；历史上作出成绩的女子大有人在，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如《女教与治道相关说》（《女学报》第3、4期，1898年8月15、20日）；兴女学与国与家均有利，如《劝兴女学启》（《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女学报》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报道女界新闻。1898年8月3日，《女学报》第2期报道了华洋官绅夫人曾于1897年12月6日在上海“张氏味莼园”设宴畅叙、杯酒联欢的盛况。整个新闻报道共224字，全文如下：

裙钗大会

上海女学堂之设，创议于电报局总办经莲珊太守，而严筱舫观察、陈敬如军门、施子英太守等从而助之。既大会宾客，互相讨论，妥定章程矣，又以事关坤教，非大启巾帼之会，不足以广集益之思，爰于去冬十一月十三日，假座张氏味莼园之安垲第，设宴畅叙。

是日到者，华官以蔡和甫观察夫人为主，而沪上各官绅瀛眷从之；西国各领事及各专使之夫人并教会中妇女，罔不簪环毕集，杯酒联欢。共计到者一百二十有二人，而西女居其大半。是诚我华二千年来绝无仅有之盛会也，何幸于今日见之！

---

① 《女学堂禀南洋大臣刘稿》，《女学报》第4期，1898年8月20日。

如果以今天我们对新闻的要求来看，这篇报道也许有诸多不足：时效性不足、整个文章头重脚轻。从报道的内容上看，这篇会议报道没有给我们提供会议议论的主题，仅仅是会议盛况的描述，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会议花絮。

但是，我们不能苛求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女报。与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近代化报纸——1833 年 8 月在广州创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新闻大多译自外报相比，《女学报》的新闻则出自该报的工作人员之手；与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1873 年艾小梅创办于汉口的、内容“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以营利为目的《昭文新报》相比，《女学报》的内容以新闻和论说为主，以提倡女子教育和男女平等为目的，更具备报纸的特点。从写法上看，该文已经初具新闻写作的模式，而且在文末来一句点睛之笔，不仅有实际情况的描述，还有主观感情的流露。今天的新闻写作观依然认为：新闻要用事实说话，但也不排除必要的点睛之笔。

第三，主张男女平等。王春林的《男女平等论》[①] 认为，“人有男女，无不各具阴阳之理，即无不有相资相济之道也”，而且古圣所做的六经中并没有歧视女性的倾向，男尊女卑完全是后来的世人怀私智所造成的；揭露封建的道德法律对妇女的歧视与摧残，诉说女子被迫“凿其耳，削其足，粉黛其面首，以悦男子之目；供养服役，以适男子之意。一以为花鸟，一以为犬马”，而男子对女子的态度是“怒则加之箠楚，喜则视若优伶”，于是“古今女子之由是而郁郁以死者，盖不知几千万矣”。而女子无学更加重这种遭遇，“女子生而不学，不复知敌体同尊卑之义，及长而视为当然，但使无詈骂棒笞之加，则亦安之若素。又且不使之治生，不使之预事，更不得不一览其夫，而听之惟命”，妇女的依赖性变得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于是，通过兴女学来实现男女平等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女学报》在维新时期是颇有影响的。据该报第 8 期《本报告白》说：“本报价廉物美，每期一出海内称赏，远近来购者云集。每印数

---

① 《女学报》第 5 期，1898 年 8 月 27 日。

千，一瞬而完。”它的读者主要是上层妇女，“本报现今销路，以宦绅公馆居多。致市商零卖，除上海外，外岸尚无定处”。《女学报》曾打算重印数千张，并想在外埠设立寄售处，以便扩大发行。1898 年底，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被迫停刊[①]。

《女学报》不仅在内容上为妇女的权利鼓与呼，还勇于向歧视妇女的传统习惯挑战。它的编辑写作人员全部为女性，在报头印上女主笔的姓名和籍贯。《女学报》（第 2 期）介绍了该报的女性撰稿人，并广揽女性投稿者，以丰富报纸内容。

作为中国女学会机关报和女学堂校刊的《女学报》，以讨论女子教育问题和其他有关女子权利问题为宗旨，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是中国妇女利用报刊宣传妇女解放的最初尝试。该报虽然只存在了几个月，但它的创办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开了中国近代妇女报刊的先河，它所体现的反封建与爱国思想对于以后的中国妇女报刊有深远影响。

康同薇和裘毓芳以及在《女学报》里工作的女性主笔是我国早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她们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和妇女报刊所继承，构成了妇女报刊历史发展的基础，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所体现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关心国家命运和呼吁自身解放相结合。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女学利弊说》在论证了兴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并没有囿于狭隘的个人立场，而是从国家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表现出一定的时代意识和大局意识；不仅如此，康同薇还借助《知新报》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这些为以后的女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典范。此后，绝大多数女新闻工作者在进行妇女解放的报刊宣传时，均从这一立场出发。

---

①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小史（1898－1918）》，《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5 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辑，1986 年 9 月。

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明显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女学报》的女报人明显受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关于妇女解放观点的影响。早期女报人的思想养分来源于康、梁等维新派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是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者，而且中国最早的女报人就诞生于维新派的报刊中。维新派报刊为女报人的思想形成准备了土壤，为她们提供了新闻实践的机会。

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所表现出的白话特点为以后的妇女报刊所继承，构成中国妇女报刊的白话特色。这种特色有助于实现裘毓芳所主张的将“文字交给大众”的宣传目的，真正将传播的触角伸向大众，易于为多数人接受，有利于扩大报纸的影响。这种特色是中国绝大多数女子知识水平相对低下的客观情况的反映，是向占国民总数一半的妇女进行宣传、教育和交流的需要，也顺应了中国报刊发展的历史潮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更没有公开发表自己言论的园地，妇女的活动很少见于历史，中国女性一直处于“失语”状态。戊戌维新时期，不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而且中国妇女开始为自己的姐妹们办报。中国妇女第一次有了发表自己言论的园地和传播工具，她们可以从自身的感受来表达要求自身解放的愿望，从自身的角度与立场表达妇女的苦衷、呼声、愿望、意见，从而打破了以往男性报刊一统天下的局面。此前，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有一些反映女子悲惨遭遇的报道，例如《申报》上有反对歧视妇女、反对虐待婢女以及主张兴女学的报道，但这只是零星的报道与主张，没有形成规模，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运动。

第二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第一次发展高潮

经过戊戌时期的酝酿，辛亥时期[①]的中国妇女报刊，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报刊的发展高潮提供了条件。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为妇女报刊在下一时期的转型孕育着条件。妇女报刊在动员妇女参加辛亥革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杰出的女报人秋瑾成为这一时期女新闻工作者的代表。

第一节　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

就整个中国妇女运动史来看，维新时期以不缠足、兴女学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仅仅是一个启蒙阶段。这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是少数男性维新派领袖，觉醒者也仅仅是与这些维新派领袖有密切关系的个别女性，尚未达到广大妇女自己起来求解放的阶段。但是，这些启蒙宣传孕育着冲破封建罗网、要求妇女解放的革命种子，成为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历史基因。

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与“爱自由者金一”所著的《女界钟》的震撼密不可分。1903年由上海爱国女学发行的《女界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妇女问

① 这一时期，包括从维新变法失败到五四运动之前这段时间。

题的纲领性阐述。该书不仅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习，提倡女子教育，还大胆地提出了对女权的呼吁。

金一，又名金天翮，1874年生于江苏吴江，中国教育会会员，1947年去世。他在《女界钟》“小引”中认为，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不自由勿宁死”等自由民主学说如“一线之阳光入牖”射进了古老黑暗的中国，“独我二百兆同胞姐妹，……绝不知文明国自由民，有所谓男女平权，女子参与政治之说也。……吾是以三熏三沐，缥笔礼天，渡苦海以慈航，照漆室之一灯，婆心说法，苦口陈辞而著此《女界钟》。”在《女界钟》里，金一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缠足等恶习，鼓励妇女走向社会。他认为中国女子是奴隶的奴隶，处于万重压制之下，养成了奴隶的根性，而解救奴隶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兴教育。他将男女比做人身体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他还反对“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主张教育女子的目标是使女子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人。为此，他提出了八条内容作为女子教育的目的：“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

他认为，要达到上述目的，“须绞尽脑汁，摇唇鼓舌，飞笔疾书，如果脑涸舌焦笔秃的话，就大声哀哭，泪流尽了就涌出鲜血，血流完了就拿起剑，剑用钝了就用炸弹和毒枪。这已经是破坏之事了。女子们不要吃惊，这就是我们同胞争权夺利要自由的誓言”。

他认为女权与国家兴亡休戚相关，“大抵女权不昌之国，其邻于亡也近”，号召妇女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他提出“思想自由、议论自由、出版自由三者，个人权利也。而集会自由，则一群之权利也”，这是他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言禁的勇敢挑战。金一尤其提到女子的政治权利，并用一节的内容来阐述它。他一一批驳反对妇女参政的谬论，总结了女子适合参政的优点，它们是“女性者，文学之优美，哲理之深秘，技术之高尚，宗教

之翕合，姿势之纤美，语言之柔和，疾病之阴郁，恋爱之附著，皆是也。……女子感化力之大，则异日女子，必立于显著之地位，盖无可疑也。女子而参与政治乎，是可决矣。吾祝吾女子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也。”这无疑是对中国女子空前的盛赞，也是对中国女子前途美好而大胆的设想[①]。

《女界钟》为在数千年黑暗中昏睡的中国女子敲响了革命与自由之钟，为广大女子的奋斗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大大激起当时女学生们的共鸣。日本实践女校留学生林宗素，超越这个号召，写了《女界钟序》，促使女学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起："金君的确是我们中国的卢梭，可是争取权利这件事，是绝不能让给男子的，现在若让金君为我们女子辩护，替我们谋求权利的获得，就和不流血、不擒颠覆，期待着政府和平地立宪是一样的。"[②]

与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主张的废缠足、兴女学主张相比，金天翮的主张带有妇女解放纲领性的意义，对辛亥时期妇女运动有深远影响。

同时，辛亥时期妇女运动的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的妇女解放思想分不开。孙中山领导创建的同盟会，在 1906 年《军政府宣言》中明确表示："我汉人同为轩辕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③]孙中山注意吸收妇女参加同盟会，他说："只要志愿参加同盟会，不论厨子、丫环、老妈，我们一律接收。"[④]在他的领导下，出现了大量从事革命活动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加各种革命团体，从事起义活动，组织赤十字会，投身辛亥革命洪流的骨干积

---

① 上述引文均来自《女界钟》，《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 178－186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② 《江苏》，第 5 期。

③ 《孙中山全集》第 298 页，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④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文史资料纪念专辑》第 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极分子（如各种妇女团体、军事组织的发起人，报刊的负责人，争取参政的带头人），有姓名可查的 380 多人，其中参加同盟会的 54 人，比较著名的有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①。

孙中山对参加辛亥革命的妇女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后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②

二、近代化妇女知识分子的出现

（一）女子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 教会女子学校；2. 国人所办女学；3. 女子出国留学。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由外国人设的教会女学开先河。1844 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进会会员、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和刺绣，这是近代外国人在华最早设立的一所教会女学。据不完全统计，到 1876 年为止，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女子教育机构有：女日校 82 所，女寄宿学校 39 所，学生共计 2000 多人。1878 - 1879 年间，仅江南一带就有天主会办的女校 213 所，学生达 2791 人，而当时中国人自己还没有创办任何女子教育机构③。

教会女校学生人数较国人自办学堂女生人数所占比例大得多，而且其中等和高等女子教育的产生，均早于中国人自办的女子中学和大学。教会女校给中国教育观带来了变革。出于宗教的男女观，它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纳妾、缠足，鼓励妇女走出闺房，和男子一道进学校读书。教育内容与中国传统教育也有所不同，除了一些浅

---

① 参见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3 年 6 月第 1 版。

② 《孙中山全集》（卷 2）第 52 - 53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王心田：《中国近代女学发展概况》，《镇江师专学报》1990 年第 4 期；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史学月刊》1988 年第 2 期。

近的自然科学课程外，还有一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的科目。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与启迪。它培养了我国最早的知识女性和职业妇女。教会女学培养的女知识分子，为数之多，专业之广泛，是其他各类女校难以相提并论的①。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国人兴女学开始的。我国近代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学是1898年在上海创立的经正女学。20世纪初年，在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女学校立矣，女学会开矣，女报馆设矣，女子游学之风行矣”②。为了加强管理和控制，清政府于1907年出台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规定：女子小学堂分初、高两等，学制各四年，凡女子小学堂学生，一律禁止缠足。女子师范学堂每州、县必设一所，允许民办，学制亦为四年。女子小学与师范比男子小学和师范各少一年。这种两性双轨的教育体制，虽然无论从受教育的时间、层次还是教学内容来说，男女都是极不平等的，但却使中国新式女子教育合法化③。

辛亥时期的女学大多集中在江苏、上海等地区。1906年中国人自办女校内的学生数为306名；1907年为1853名，1908年为2679名，至1909年一跃而为12164名，1915年为180949名。从全国范围看女子初等教育，1907年全国共有女学生11936人，占学生总数的2%，1918－1919年，全国初等小学女生达190882人，占初等小学生总数的4.3%④。此外，还有革命党人所办的学校。1902年至辛亥革命，约有38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女校问世⑤。这些女校在许多方面都渗入了民族意识和女权意识。

---

① 李兰萍：《近代女子教育与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② 《大公报》，1904年6月13日。

③ 李兰萍：《近代女子教育与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④ 韩志俊等：《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妇女文化教育运动探讨》，《唐都学刊》，1989年第3期。

⑤ 沈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知识分子》，《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4期。

在清政府正式派遣女子留学之前，中国女子留学已经在江浙一带兴起。她们往往跟随父亲、兄长或丈夫去日本留学，如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日本留学，陈撷芬与父亲陈范一起到日本。当时日本的东西女学附设中国女子留学速成师范学堂，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主办的实践女校也设中国女子留学师范工艺速成科。东西女学本科修业二年，并有修业六月的音乐专修科和游戏体操专修科，实践女校本科一年，工艺科六个月。当时去日本的女生大多在此补习。1905 年，湖南派 20 名女子赴日学习速成师范，奉天派熊希龄去日本考察教育，并与下田歌子特约每年派 15 名女生至该校学习师范，这是女子官费留日之始。1907 年官费女子留学美国开始。尽管女子留学的数量很少，仅及男生数量的十分之一，但毕竟标志着中国女子留学教育的开始①。

20 世纪初的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海外活动基地之一，中国留日女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深受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她们通过参加政治团体或创办报刊来从事革命活动，或从日本归国后，直接参加辛亥革命。

教会女学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女知识分子，国人自办女学和女子留学则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女知识分子群体。据《女子世界》1905 年驻日本东京调查员称："据最近调查，中国女子在东京者百人许，而其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几何代数学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② 她们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极为愤慨，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极为不满，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也极为迫切，成为当时社会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她们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投身妇女报刊事业，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妇女报刊发展的骨干力量。

---

① 此段文字参考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 129 - 132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 年 4 月影印本。

② 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女子世界》1905 年第 3 期。

（二）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同情与赞助

《辛丑条约》签定以后，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主革命思潮正在蓬勃发展。为了满足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抵制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浪潮，清政府不得不于 1901 年宣布实行“新政”。“新政”在主观上是为了延续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它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兴学堂、奖励游学是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之后，中国迅速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这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李泽厚在《20 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一文中指出“经由庚子之后大批留日学生的出现，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层在开始向近代行进和转化，不仅在思想上、认识上，而且也开始在情感上和心态上”。①

受到维新变法失败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这批近代化的男性知识分子很快摆脱维新思想而趋向革命化，或对妇女解放持同情和赞助态度，或者亲自参与创办妇女报刊。如曾经留学日本、五四时期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协助妻子曾兰于 1912 年创办《女界报》，由曾兰撰写，吴虞修改、录正的《女界报缘起》一文充满了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精神。1907 年 6 月，留日学生何震、刘师培（1884－1919）夫妇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妇女报纸。该报由女留学生何震主编，以“破坏固有的社会，实现人类平等为宗旨提倡女界革命”，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对妇女的压迫，抵抗男性对女性的统治，鼓吹对男子复仇，所不足的是，面对妇女解放的现实和具体问题，该杂志却显得比较冷淡。

辛亥时期著名的商办妇女期刊《妇女时报》撰稿人主要是赞成妇女解放的男性知识分子。主编包天笑切身体会到，由于当时女子读书识字的较少，能写旧式诗词的女子稍微多些，“此辈女子，大都渊源于家学。故投稿中的写诗词者颇多。”《妇女时报》虽然有诗词一栏，但杂志的宗旨并不以发表诗词为主，而是开发女子的新知识，激励新学问。“当时女学界有几位卓越的人物，可以握管写稿外，便不

①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 211 页，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

能不以男子充数了。”在清末，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妇女解放问题上都表现出相当的自觉。“此忧时之士，所以不惜精力，不避劳瘁，欲使天下女子皆晓畅时务，勉为通才也。于是时也，有《妇女时报》之出版，抉国势于累卵，醒同胞于罪梦，张女权，增民智，其益岂浅鲜哉。”①

留日女学生深受明治遗风的刺激，迫切要求把资本主义的新风气移植到中国，上海和长江一带女学发达区域的女性也行动起来。她们开始筹办报章杂志，倡导妇女解放，也有一些赞成妇女解放的男性投身妇女报刊活动。1902 年留日女学生陈撷芬在上海主办《女苏报》(1903 年转到日本出版)，1904 年潘朴在东京创办《女子魂》，秋瑾在东京创办《白话》月刊，1906 年燕斌在东京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 年何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1911 年唐群英在东京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在国内，1903 年冯活泉在广州创办《岭南女学新报》，丁初我、曾孟朴于 1904 年在上海创办《女子世界》，1905 年张筠卿、张展云在北京创办《北京女报》，1905 年袁书鼎在江苏阜宁创办《妇孺易知白话报》，1906 年陈以益在上海创办《新女子世界》，1907 年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等。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参与妇女解放，创办或主编妇女报刊，为妇女解放献计献策，使妇女运动呈现出部分“男性特色”。

第二节　妇女报刊的第一次创办高潮

一、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第一次创办高潮

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的发展，女子教育的振兴以及知识女性群体的出现和男性知识分子对妇女报刊的支持为妇女报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妇女报刊随革命形势的高涨而大量增加，女子教育的振

①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第 151 页，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第 1 版。

兴提高了女性（包括读者和办报人）知识素质，也扩大了妇女报刊的读者群体。辛亥时期出现了妇女报刊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一）刊物总体概况

据不完全统计，辛亥时期全国各地的主要妇女报刊大约有70多种。具体情况见下表：

报刊名称	地点	时间	主持人	刊期
女报	上海	1902	陈撷芬	月刊
女报	东京	1903	陈撷芬	月刊
岭南女学新报	广州	1903	冯活泉	月刊
新女界	东京	1903	月刊（仅见于《神州日报》）	
女学生	上海	1903	上海城东女学社校长杨白民	年刊
女子世界	上海	1904	丁初我、曾孟朴	月刊
女子魂	东京	1904	潘朴（抱真女士）	
白话	东京	1904	秋瑾	月刊
妇孺报	广州	1904	广州蒙学书局编辑	月刊
北京女报	北京	1905	杜筠芗、张展云母子主办	日刊
妇孺易知白话报	江苏	1905	袁书鼎	
不缠足会报	武昌	1905		
女界灯学报	广东	1905	何志新、李颖圆等	月刊
女镜报	广西	1905	郭用逮、容巧倩、黄绛霄编辑	月刊
新女子世界	上海	1906	陈以益	
今日新女界		1906	主编燕斌	
中国新女界杂志	东京	1907	总编辑燕斌	月刊
中国女报	上海	1907	秋瑾、陈伯平主编	月刊
神州女报	上海	1907	主撰陈伯平	

报刊名称	地点	时间	主持人	刊期
天足会报	上海	1907	沈仲礼、管西圆	季刊→月刊
天义报	东京	1907	发起人何震、刘师培	半月刊
中国妇人会小杂志	北京	1907	慈善组织“中国妇人会”机关刊，廖太夫人主持	半月刊
中国妇女会报	北京	1907	慈善组织“中国妇女会”机关报	
女子世界	上海	1907	陈勤	月刊
女学报	北京	1907	善保（佑臣）	
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	东京	1907	恨海（田桐）	月刊
星期女报	北京	1907	王淑媛	周刊
妇女会报	北京	1907	杜药洲（德舆）主持	
湖北女学日报	湖北	1908	冯德生等	日刊
惠兴女学报	杭州	1908		月刊
妇孺日报	广州	1908	陈诚	日刊
天足会报	上海	1908	中国天足会发行	年刊
女报	上海	1909	陈以益主办	月刊
女学生	上海	1910	尹锐志	年刊
女界星期录	香港	1910	洪舜英、洪美英主编	周刊
中国妇女改良会会报	天津	1910	英淑仲主编	
妇女时报	上海	1911	包天笑、陈冷血	月刊
女界杂志	上海	1911		
妇女日报	上海	1911		
留日女学会杂志	东京	1911	编辑兼发行人唐群英	季刊
妇女杂志	北京	1911		月刊

报刊名称	地点	时间	主持人	刊期
女界报	成都	1912	吴曾兰	
大汉报	苏州	1912	张昭汉、陈鸿璧	
民国女报	上海	1912	刘舜英	
女子国学报	天津	1912	潘连璧、伍崇敏、郑毓芳	半月刊
北京女学日报	北京	1912	沈佩贞	日刊
女铎报	上海	1912	林贯虹主编，主笔为南京汇文女子大学堂堂长美国亮乐月女士	月刊
女子共和日报	上海	1912	上海神州女界共和协进社创办	日报
扬州女子公学女子月报	扬州	1912	扬州女子公学校长郭坚忍发起	月报
女子白话报	北京	1912	创办人兼经理唐群英	旬刊
中华女报	上海	1912	汤云秋	周刊
女权报	上海	1912	张亚昭创办	
神州女报	上海	1912	张昭汉、杨季威、谈社英	十日刊
女权月报	上海	1912	文典、乐勤、滋生、冷亚	月刊
女学日报	武汉	1912	湖北女子参政同盟会	日刊
女权日报	长沙	1913	唐群英、张汉英创办	
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	上海	1913	上海中华女子参政会主编，经理兼编辑主任张汉英	旬刊
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		1913	上海中华实业报社主编	月刊
妇女鉴	成都	1914	佘余涛发起集股创办，成都妇女鉴社编辑	
香艳杂志	上海	1914	王文濡主编	
眉语	上海	1914	许啸天夫人高剑华	

报刊名称	地点	时间	主持人	刊期
女子世界	上海	1914	天虚我生陈蝶仙编辑	月刊
女子杂志	上海	1915	女子杂志社编辑	
中华妇女界	上海	1915	中华妇女界社编辑发行	
家庭	成都	1915	家庭杂志编辑部编	
家庭杂志	上海	1915	编辑主任唐真如	月刊
妇女杂志	上海	1915	王蕴章、胡彬夏编辑，商务印书馆发行	月刊
青年女报	上海	1916	上海基督教妇女青年总会所	季刊
妇女旬刊	杭州	1917	杭州中华妇女学社编辑发行	

资料来源：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载于《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王会林、朱汉国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发行，1936年6月版。曹正文、张国瀛著：《漫谈上海近代妇女报刊》第24－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四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

这些妇女报刊绝大多数在日本东京和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出版，主编大多是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新型知识妇女和留学生。

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以讨论妇女问题、鼓吹革命与妇女解放为主流。从内容上看，这些妇女报刊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单纯的“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尊重女权”和反对缠足为主旨，着重于对妇女进行启蒙教育，虽然也鼓励女子成为“社会女子”，但并不急于要她们参加政治活动。这类刊物以《北京女报》、《妇女日报》、《女镜报》、《女界灯学报》为代表，政治上倾向改良。另一类妇女报刊也提倡女学和女权，但它把这方面的宣传和民族民主

革命的宣传密切结合起来，鼓励妇女既做女权运动的先锋，又做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同时，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这类刊物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中国新女界杂志》、《神州女报》、《女报》等为代表，政治上倾向革命。[①]

这一时期，参与办报的女性还有汪康年夫人汪禾青。著名报人汪康年和夫人汪禾青于1907年3月28日在北京创办《京报》，并自任编辑。社址在宣武门外五道庙，文实权任采访主任，日出对开2张，“附上谕条一纸”，“网罗既富，印刷亦精”[②]。“以政闻为主体，言论超重监督政府，与上海新闻报相呼应。以故在北京报界颇负敢言之名。”[③]

（二）主要刊物介绍

1.《北京女报》

1905年8月20日出版的、倾向改良的《北京女报》是我国第一份妇女日报[④]。该报由杜筠芗主编，其母张展云为报馆馆主，满族女知识分子、肃亲王之郡主葆淑舫任名誉主笔。该报以“开女智”、“开民风”为宗旨，主要内容有激励妇女爱国，提倡男女平权，宣传妇女自主，提倡女子教育，推动移风易俗，白话文字，通俗易懂。经营则取价甚廉，是当时国内空前独有的一张妇女日报。

2.《妇女日报》

1911年5月创刊。该报简章明确说明：“本报以发挥妇女固有之道德，增进妇女普通之知识，使人人先知修身齐家之必要，以为合群爱国之始基，兼为我女界交通声气，发表意见之机关，冀由组织善良之家庭，渐推而成善良之社会，上为国家树极巩固之基础，下为国民立最正淑之母仪，是为本报惟一宗旨。”[⑤] 温和改良、指导生活的色彩

---

①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56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第42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 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载于《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状况》第404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④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第3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妇女日报社简章》，《民立报》1911年5月23日。

非常明显。

3. 陈撷芬主编的《女报·女学报》

1899年，年仅16岁的陈撷芬在上海编辑《女报》，随《苏报》附送，被称为《苏报》女性版。送了6期，不久停刊。1902年5月改名为《女学报》独立出版，是资产阶级革命女性创办的、宣传女界革命的第一份妇女报刊。陈撷芬自任主笔，撰稿最多。她在《独立篇》中明确了女子独立，通过自己兴办女学，自主地争取女权、成为革命主体的观点。冯自由称她“开吾国革命教育宣传事业之先河”[①]。

该刊内容分论说、演说、新闻、女界近史、同声集、谐译、词翰、最新眉语等栏目。在新闻栏目里，《女学报》十分重视鼓吹女权、提倡女学的新闻。如鼓吹和报道妇女自由、独立的新闻有《平等阁笔记》、《俄妇革命》、《女权日盛》、《女工独盛》等；报道女子教育的新闻有《女学生赴日本》、《爱国女学校》等。在翻译和文艺方面，《女报·女学报》也很有特色。它主要介绍西方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如《女子教育论》、《泰西妇女近世史》，以及外国女名人传记、演说等。“词翰”栏，政治色彩浓厚，如《沈荩死》、《章邹囚》，都有鲜明的反清革命色彩。该报还发表红灯照的故事和历代才女传，鼓励妇女起来斗争。[②]该刊是革命女性派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

1903年6月，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在华势力逮捕革命派章炳麟，查封《苏报》，陈撷芬与父亲陈范避往日本。在那里，她秘密参加三合会，重组留日女生组织实行共爱会，担任会长。陈撷芬以小小年纪任报纸编辑，同时还积极参与几方面的政治活动，确实难能可贵。

除了主编《女报·女学报》之外，陈撷芬还全力资助《国民日日报》的创刊。在繁忙的办报活动中，她对报刊的内容宣传形成了一定的认识。“要叫别人看得喜欢，劝人的话要劝得使人相信，他才肯改。激励人的话要激励出人的精神兴致，他才肯出来做事。痛切的话，要说得人悲愤填胸，他才能立定宗旨。骂人的话，要骂得刺心钻骨，他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8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小史（1898－1918）》，《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86年9月编辑。

才肯改过”，否则，“虽说得热闹，也没有人相信它。”[①] 这些话至今仍然有借鉴作用。

4．《女子世界》[②]

《女子世界》，1904 年 1 月创办于上海，1906 年停刊，共出版 17 期。1907 年 2 月陈以益又续办一期，总计出版 18 期。这是辛亥革命前夕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妇女刊物。刊物内容分社说、演坛、科学、实业、教育、史传、译林、专件、记事、文艺等栏目。该刊创办初期，由丁初我、曾孟朴任主编，第二年第六期起，由陈以益（志群）主编。他们都是当时的政治活跃分子，丁初我是中国教育会会员，陈以益和当时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有密切来往，并引秋瑾为“同志”，与她保持密切联系。编辑和主要撰稿者有柳亚子、徐觉我、沈同午、蒋维乔、丁慕卢等人。在他们的主持下，使得《女子世界》成为《中国女报》创刊以前的一段时期中，“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③]

《女子世界》的办刊宗旨在于“改铸女魂”。“欲拯今日之危亡，必先解脱女子之羁勒，俾立于平等地位，而聪其听焉！明其视焉！鼓吹其精神而感刺其脑筋焉！是不可无物以司其运动之机，此本志发行之目的也。”[④]

刊物内容定位于爱国、革命，通过政治革命实现妇女解放。该刊指出，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继绝的危急关头，并告诉当时的女性：俄罗斯、英国、德国都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女性要“断绝其劣根性，而后恢复其固有根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呼吁女性担负起国民责任。对于当时进行的反美拒约爱国运动，《女子世界》大力报道妇女拒约活动的

---

① 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 101 页，新华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版。

② 参见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小史（1898－1918）》，《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5 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1986 年 9 月编辑。

③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 562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女子世界调查缘起》，《浙江潮》第 10 期。

情况，号召妇女抵制美货[1]。它还提出了“女子家庭革命”的口号，主张把政治革命与女子家庭革命结合起来进行，并认为“论男女革命之轻重，则女实急于男子万倍!”[2]《女子世界》还提倡女子教育，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女权，养成女国民资格等，并且把这一切都与爱国救亡运动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它号召妇女“要握定一个坚贞激烈的宗旨，做他日女军人的预备工夫。”它大声疾呼妇女觉醒，“摆脱贤妻良母的依赖性，靠自己一个人去做那惊天动地的事业”，“教那什么伯伦知理们，反对女权的一班陈死鬼，就冢中枯骨，也要受到刺激。”[3]

秋瑾对这个刊物十分赞赏，她曾经写信给该刊记者陈以益，称之为妇女报刊中的“巨擘”。

此外，还有民初女子参政运动领袖唐群英1911年4月在日本创办《留日女学生杂志》并任主编，燕斌于1907年在日本任《中国新女界杂志》主编，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参与了1906年12月创刊的《豫报》月刊的撰稿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是秋瑾，她于1904年8月在东京创办《白话》杂志，鼓吹反清救国，提倡男女平等。1906年春回国后，在准备武装起义的同时，于1907年1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宣传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批判毒害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她以革命与办报为职志，呕心沥血，最终以身殉报。

辛亥时期的大部分妇女报刊痛陈女子之苦，鼓励妇女觉醒，赞成革命，把妇女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结合起来。这种宣传鼓动深受社会欢迎，《神州女报》的销售量就曾高达五千份。

妇女报刊的宣传对于长期禁锢在封建礼教下的中国妇女来说，起了极大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激励她们冲破封建束缚，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江苏无锡女子杨寿梅，在妇女报刊的影响下，走出封建家庭，“孑身独行，附汽船至上海，入天足会女学堂

---

① 觉佛：《狮子吼》，《女子世界》第6期。

② 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第4期。

③ 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47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肄业”①。

妇女报刊对于动员女子参加辛亥革命，促进推翻封建王朝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此，孙中山评价说：“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同仇北伐，后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②

辛亥时期鼓吹改良的女子报刊，在移风易俗、改良女子生活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天足会报》是以劝导妇女不缠足和为妇女谋利益的专门性报刊，专以发动妇女参加天足会及其附设的女学堂为目的。经过该报的广泛宣传，仅上海一地参加天足会的妇女就约五万人，全国各地的分会也有许多妇女参加③。它对于改变缠足恶俗，改良社会风俗，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其力足以提挈群黎，鼓吹社会也”④。

二、民国初年的妇女报刊活动

（一）总体概况

1. 民初妇女报刊短暂勃兴

武昌起义后，伴随着政治革命的大风暴，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有湖南的唐群英、丁佩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锐志，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她们组织妇女军事团体、救护团体和筹饷团体，掀起了女子从军运动。1912 年 1 月南北议和后，临时政府陆军部下令解散女子军队，妇女的热情转向参政运动，女子军事团体纷纷改组为参政团体，她们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在议会和政府部门力争女子名额，要学校规定男女同

① 志群：《纪杨寿眉女士》，上海《女子世界》第 2 年第 6 期。转引自李又宁、张玉法主编的《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料》第 1313 页，台北传记文学社 1975 年版。

② 《孙中山全集》（卷 2）第 52－53 页，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③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小史（1898－1918）》，《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5 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1986 年 9 月编辑。

④ 管鹤：《天足会缘起并开会两事始末纪要》，《天足会报》光绪丁未年第 1 期第 27 页。

校，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并创办报刊作为参政的舆论工具。

女子参政团体或个人创办的一系列报刊，以开通女界、提倡女学、扶植女权、养成女子参与政治之知识为宗旨。这类刊物以上海最多。1912 年在上海创办的女报有：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刘舜英主办的《民国女报》，汤云秋主办的《中华女报》，张昭汉、杨季威、谈社英主编的"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机关刊物《神州女报》，张亚昭主编的以"破除依赖性，提倡独立精神，使男女受同等教育同等幸福"为宗旨的《女权报》，社会党党员文典、乐勤、滋生、冷亚等人发起的、以争取妇女权利为目的的《女权月报》。1913 年创刊的上海《万国女子参政会月刊》（一个月后改为旬刊）。此外，还有 1912 年在北京由女子参政同盟会主办的《女子白话旬报》，在天津有潘连璧、伍崇敏、郑毓秀等发起的《女子国学报》于 1912 年 4 月 1 日创刊，湖北武汉有女子参政同盟会发起创办的《女学日报》，成都有以曾兰为主笔的《女界报》。湖南有丁云龙丁步兰夫妇发起、唐群英张汉英参与的长沙《女权日报》，是湖南地区第一份提倡女权的报纸。

在民国初年的一个短暂时期内，女记者的采访活动空间也相对宽松。即使在独立最晚，由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控制的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所颁布的《独立协定》中，也规定"巡警不得干预报馆"。四川都督府政务处每次开会时，为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特在旁听席上为女记者用红布围了一个女记者室①。"那时公认报界势力和优待报界，这两件事情②，可以说是算得报界的黄金时代。就是女界，也由报界的势力，发展出些新天地来。"③

---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第 1013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② 另一件事情是：民初，成都各官厅都允许新闻记者列席，并允许报上的论说、新闻，能够准人尽情吐出。

③ 孙少荆：《成都报界回想录》，《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版。

2. 北洋政府初期的妇女报刊：复古性妇女刊物与商业性妇女刊物并存

袁世凯上台后，开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妇女运动遭受极力压制，妇女报刊发展势头遭到遏止。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7年，仅有14种妇女报刊创刊，其中还包括3份女子学校的刊物。这14份妇女报刊是：《女子世界》（1914）、《妇女鉴》（1914）、《香艳杂志》（1914）、《眉语》（1914）、《妇女杂志》（1915）、《家庭》（1915）、《女子杂志》（1915）、《中华妇女界》（1915）、《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刊》（1915）、《家庭杂志》（1915）、《直隶第一女师范校友会杂志》（1916）、《青年女报》（1916）、《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7）、《妇女旬刊》（1917）。[①]

1914年，袁世凯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尊孔读经复古逆流，大肆表彰贞妇、烈女、节妇，一时间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妇女贞节、为封建精神摇旗呐喊、主张"消闲"的妇女报刊应运而生。1914年由佘余涛发起了《妇女鉴》，该报因反对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受到封建官僚和卫道士的欢迎。1914年12月，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创办，刊物设有图画、文选、译著、谭丛、笔记、诗话、说部、家庭、美术等栏目。该杂志标榜以"为阴教发凡"为宗旨，几乎全部用文言表达，复古色彩浓厚，极力与妇女运动唱反调，主张妇女要为男子守贞、守节，甚至极力鼓吹夫死妻殉，未婚夫死，未婚妻要守贞至老甚至从死地下。

主张"消闲"、侧重为妇女增加知识的妇女刊物有《中华妇女界》。1915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妇女界》标榜"贤母良妻淑女之主义"[②]。"仿东西洋家庭杂志、妇女杂志办法，为女学生徒，家庭妇女增加知识，培养灵性。凡昔贤学说，女界美德，无不殚述而表彰之。而立身处事之道，裁缝烹饪之法，教养儿童之方，以及中外妇女之技术，职业情形，悉为搜集，以资模范，而供研究"[③]。

---

① 刘巨才主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388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7月版。

② 《中华妇女界祝辞》，《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期。

③ 《中华妇女界》第1卷第1期。

此外，商办妇女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1911 年 6 月 11 日上海《时报》馆增办《妇女时报》，开创了商办妇女刊物的先河。[①] 该报的发刊辞称："籍以唤醒同胞，同人等于是谋为月刊，谓吾于女界中发其光芒，亦绍介所得以贡献于国民，则本志尽之职务也。"该刊以灌输新知识，改良恶风俗，发扬旧道德为宗旨，内容有论说、游记、文艺、医学知识、家庭游戏、各国妇女生活、小说、短评、读者俱乐部、妇女谈话会、各地风俗调查等，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该报印刷非常精美，文字以白话和浅显的文言文为主，文苑栏刊登旧体的诗词。

从刊出内容来考察，《妇女时报》与以前出版的妇女报刊有显著的不同。《女学报》开创了妇女报刊的先河，它所提倡的开办女塾、出国游学、反对缠足等主张，具有浓厚的进步色彩。《女子世界》提出了女子家庭革命、男女平等、文明婚姻和女子参加华工禁约运动等，也已开始刊出育儿法、料理新法等。"秋瑾案"以后的女子报刊多借该案攻击清廷罪恶，而《妇女时报》则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偶尔刊登一些关于妇女参政与职业问题的文字，同时介绍一些海外妇女生活情况，软性内容较多，如莳花、剪裁、妇女卫生、妇女心理等，基本不涉及国内政治，但它提出的《论娼妓之有百害而无一利》、《论贵族妇女有革除妆饰奢侈之责》之类的社会问题，受到中上层家庭妇女的欢迎。

《妇女时报》的内容表现了商办妇女报刊的特点。由于不涉及时政，该刊的寿命延续了七八年，而且引出了一大批竞争者。如中华图书馆的《香艳杂志》（1914）、《女子世界》（1914）、广益书局的《女子杂志》（1915）、中华书局的《中华妇女界》（1915）、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1915）。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吸收了《妇女时报》的经营特色，而且在内容上逐步改良，竟然连续出版了 17 卷，到 1931 年"一·二八"事变时才停刊，成为中国妇女报刊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②]

---

①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 382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②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 382－383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二）主要刊物介绍

1．《神州女报》[①]

《神州女报》是“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机关报，1912年11月创刊于上海。初为旬刊，1913年3月改为月刊，卷期另起。“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是民国元年以来的妇女参政团体之一，主要领导人有张昭汉、姚景苏、汤国黎、杨季威等。《神州女报之宣言书》写道：“其宗旨则发挥共和真旨，代表社会言论，导启女界政治及实业思想，鼓吹国民道德及尚武精神。”[②] 刊物设有社论、国政及要闻、女界要事、本社纪事、学术、传记、小说、文苑、杂俎、时评等栏目。

《神州女报》的内容，主要反映民初妇女争取参政权的斗争。它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共和国女子享有权利的情况，认为女子应该有参政权。“方今世界日进文明，男女平权，尤资实际，泰西先进诸国，国会虽无女子列席之例，而区选举有调查女子之条，是女子参政之动机，英美已开先导，吾共和告成，即应提此事。”它还认为，女子心细坚韧，忍劳而勤敏，知廉耻而重视名誉，完全有能力掌好权。因此，号召女子积极争取参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否决了女子有参政权，引起了革命妇女的义愤。该报连续发表文章，指其乖谬，“今日者，共和开幕，五族同仁，而独屏我女子于种种权利之外，此可忍孰不可忍？”女子参政被否决后，《神州女报》提出，第一，妇女当前应当积极创造参政条件，学习政法、财政、国际法的知识，“苟能致力于此数者，则举凡政治之措施，男子所为者，吾女子且优为之”。否则，即使参政，也只能作为“傀儡”，装点门面而已。第二，妇女应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承袭遗产问题为女界人人所应争者，女子同为人类，何能独自放弃。论男女平等亦当争之，论人权天赋亦当争之。”[③]

---

① 参考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小史（1898－1918）》，载于《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1986年9月编辑。

② 转引自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85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9月版。

③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第407－40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女权月报》

1912年12月1日创刊于上海，发起人为社会党成员文典、乐勤、滋生、冷亚等，赞成人有孙中山、黄兴、张昭汉、辛素贞、武问梅等。刊物设有图画、论说、记事、小说、传记、文艺、科学问答、杂录等12个栏目，其宗旨为发扬女子固有本能，恢复女子固有权利。发刊缘起说："今种族政治革命告终，社会革命方兴。而其不平之最，实为男女，同是天赋，焉可歧视。今则习惯已成，非即为是，无正大光明之报以鼓吹学识，造成舆论，俾女同胞得自立，得自由，恢复其天赋之权，断难以达平等之目的也。"①

三、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特色

(一) 数量众多　分布面广

戊戌时期是妇女解放的启蒙阶段，妇女报刊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的上海。近代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中西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上海的新闻事业在全国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妇女报刊这方面也不例外。同时，上海也是近代中国典型的华洋杂处之地，是一个多元统治的地区，启蒙思想的传播与交流相对容易和活跃，这都有利于妇女解放思想的产生发展，也有利于妇女报刊的产生。于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就诞生在上海。

戊戌变法失败，血的教训惊醒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改良之梦，使他们自觉接受革命思想的洗染。辛丑条约的签定，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反动妥协本质，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挽救国家危亡，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掀起革命的浪潮。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在几个大城市迅速传播，妇女报刊在革命思想活跃的地方迅速发展。辛亥时期妇女报刊的数量达到几十种，范围从上海一地发展到广州、北京、苏州、武汉等几个大城市。从创刊的地点看，以上海为最多，东京、北京次之，其余的分散在全国各地。

1901年，清政府宣布"变法"，在几年内推行了一系列"新政"。

---

① 转引自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92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9月版。

“新政”的措施之一是派遣留学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日本改革成功的经验深受国人重视。于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就成了国内学子的主要留学之地。辛亥时期的女子到海外留学最初是在父兄或友人的带领下完成的，这在江浙等沿海一带表现尤为明显，例如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日本留学，陈撷芬则与父陈范一起到日本。留日女学生在东京出版了许多刊物宣传妇女解放，这在上述表格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二）大多由近代女性知识分子主办

戊戌维新时期是妇女运动的启蒙时期，这表现在妇女运动的倡导者还主要是几位男性维新领袖，尚未达到妇女自己求解放的阶段。与此相适应，戊戌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包括上海《女学报》的编辑和主笔们，主要是一些家庭条件优越的上层妇女，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谭嗣同的夫人李闰等。她们的觉醒并不是受近代教育的影响，而主要受传统家庭教育或私塾教育，在男性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影响下觉醒的。例如，李蕙仙深受自己的堂兄、清末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影响。李端棻受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倾向于中国政治制度的改良，大力支持维新变法和中国近代教育变革，并用进步思想影响李蕙仙。李蕙仙，“累代清门，家学劭茂”[①]，生活条件优裕，勤奋好学，自幼熟读诗书。在堂兄的影响下，李蕙仙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最早的妇女报刊的编辑之一。由于不是女性的主动觉醒，《女学报》对妇女解放的宣传是不彻底的。例如，《女学报》除了主张女子学习基本知识之外，还强调女子在体操、修身、家事、绘画、裁缝等方面的训练。这是维新派遵从“保国保种”的愿望对女子的要求，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这种教育观逐步沦落为阻碍妇女解放的绊脚石。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的编辑或主笔大多受过近代化教育，接触过近代的科学和文明，她们结合时代和自身的要求提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妇女解放的主张，所办报刊带有很大主动性和自觉性，并将所

---

① 吴荔明著：《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第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办的报刊视为一种事业。为此，她们不惧怕清政府的威胁和迫害。1899年创办、1902年复出的《女报》（1903年改名《女学报》）由《苏报》馆主人陈范之女陈撷芬创办，该报随《苏报》发行，故有《女苏报》之称。1903年"苏报案"发生，陈撷芬避居日本，在东京继续出版《女学报》，由上海民国日报代为发行。该报以倡女学兴女权为宗旨，反映了一部分先进女性反对封建压迫，奋起挽救国家危亡和女子独立的要求。主笔陈撷芬的《独立篇》①思想深刻，议论大胆泼辣，在当时颇有影响。该报的出版成为辛亥时期妇女报刊发展的前奏。1906年燕斌在东京创办《新女界杂志》，以"发明新理，提倡精神，联络感情"为宗旨。其办报方针有五大主义，即"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②。丁初我、曾孟朴创办的《女子世界》明确提出女子的责任，"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③一种主动承担责任、树立女国民精神的态度逐渐凸现，女子不再是匍匐于封建专制制度、俯首于男权社会的奴隶。而秋瑾的《中国女报》则飞扬着中国女子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它提倡女权、女学，鼓吹革命救国的宗旨十分明确。该报虽然只出了两期，但它犹如一面旗帜，召唤着中国"二万万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④

辛亥时期女知识分子自觉的办报意识与解放自身的观念，是戊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与女子教育的进展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三）宣传内容相对广泛深刻

戊戌时期的《女学报》既是上海女学会的机关报，又是女学堂的校刊。由于对妇女问题认识的不足，《女学报》的宣传内容集中在兴

---

① 《女学报》第2年第1期，1903年2月27日。

②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4页，文心出版社1936年9月初版。

③ 《发刊词》，《女子世界》第1期，1904年1月17日。

④ 《发刊词》，《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14日。

女学以实现男女平等方面。它大力赞扬在历史上作出成绩的女性，证明女子的能力不在男子之下；极力主张教育上男女平等，所有女子在入学资格上一律平等。

辛亥时期的女报揭露清朝反动统治，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种种束缚禁锢，谴责“三从四德”，争取更广泛意义上的女权，包括人格独立、家庭革命、男女平等和婚姻革命甚至废除奴婢和娼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向社会抗争的勇气。燕斌1906年在东京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批判封建妇德、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占大多数，如《女德论》(巾侠，第1期)、《女界与国家之关系》(炼石，第2期)、《中国婚俗五大弊说》(炼石，第3期)、《女子无才便是德驳》(赵之耀，第3期)等。宣传男女平等的文章，如《男女平等的真理》(珮公，第1期)、《男女平等的必要》(珮公，第2期)、《男女并尊论》(第4期)。尤其是“巾侠”的《女德论》，为加在女子头上的诸如“妒”、“媚”、“阴”、“懦”等“不德”罪名辩护。该文认为，“妒”起于不平等，“媚”起于不独立，“阴”起于不履外，“懦”起于不阅事，这些完全是女子在封建社会和旧家庭中所处的地位造成的。

辛亥时期的女报以反封建为基调来提倡男女平权。著名的反封建斗士秋瑾在《勉女权》一诗中说：“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①

在一些女报停留在宣传女学、女权、反对妇女缠足等活动时，秋瑾的《中国女报》则明确地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和当时的反清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署名“黄公”的《大魂篇》说：“吾之所祝于同胞姊妹者，为我女子辟大世界，为我祖国发大光明，为我女界编大历史，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不亦我女子之天职乎，尽我天职，以效祖国。”②

辛亥时期的妇女报刊以妇女解放为宗旨，“其着眼点在将盘根错

---

① 秋瑾：《中国女报》1907年第2期，转引自《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史料》(上册)第44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② 《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14日。

节之复什事汇，皆加以彻底之判断，如国家政治、家族制度、婚姻、迷信等等思想上之问题，举数千百年来之积习而推翻之，诚我国思想界之一大变迁也。"①

但是，中国的女子并没有随着清王朝被推翻而获得解放，1912 年 3 月 11 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没有规定女子参政权，女界团体稍后进行的女子参政运动亦归于失败。对此，民国时期《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的作者陈东原认为："民国初年女权运动的失败，并非败在女子军队之未正式成立，也不失败在参政权之没有获得。乃失败在徒警声势，没有彻底的见解，失败在没有减轻男子玩视的心理"②，而"民国元年的参议院袭击，正暴露了维新十几年来女权运动的短处——浅薄，无实力，不彻底"③。虽然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使世人知道中国女子不像从前那样驯服了，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但中国妇女还没有寻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正确解放道路，这个任务在五四时期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中逐渐得到解决。

第三节 秋瑾：女界先驱 报人楷模

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报刊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上都有一个不朽的名字，这就是秋瑾；在她为革命献身后，以报刊评论、文学、历史、电影、剧本、传记、回忆录等形式加以纪念的，还是秋瑾；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被纪念与赞扬的，依然是秋瑾。秋瑾，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以其勇于冲破封建束缚的勇气、甘心为国献身的豪气、呕心沥血的办报精神、奋不顾身争取自身解放的执著，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秋瑾，是中国妇

---

① 戈公振：《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转引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 357－358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1 月初版。

③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 361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1 月初版。

女报刊史上第一个为妇女解放、艰苦办报而牺牲的女性。

一、秋瑾的革命与报刊活动

(一) 秋瑾的革命活动

秋瑾（1875－1907），① 原名闺瑾，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出生于福建，时其父在闽任官，1884 年 7 月由福建迁回浙江绍兴。秋瑾自幼“天资颖慧，过目成诵，为先君所钟爱。教以吟咏，偶成小诗，清丽可颂”②。1892 年，她随母亲由浙江前往湖南，1895 年许婚于湘潭富户之子王廷钧。1902 年，王廷钧捐官任户部主事，秋瑾携子随夫到北京。在北京，秋瑾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是她结识了北京女界名流——工书法、善诗文、思想倾向维新的吴芝瑛（上海开明书局的创办者、当时在户部任职的廉泉的夫人，清末知名学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侄女），并由吴芝瑛介绍认识了在华的日本女子服部繁子（1904 年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随服部繁子到日本留学）。二是阅读了大量的新书新报，其中有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思想的作品。这使秋瑾开阔了视野，其思想也日趋先进。在目睹了庚子事变国难后，秋瑾萌生了救国之心，“女士居京师有年，痛愤庚子之变，以提倡女学为己任。凡新书新报，靡不批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③

1904 年 5 月，秋瑾冲破家庭的束缚，变卖首饰等物，自费到日本留学。到东京后，先入中国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同年秋，经冯自由之妻李自平介绍，加入以“推翻满清、恢复中华”为宗旨的“三合会”，并被封为“白扇”（俗称“军师”）；同期，她又与留日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著文称赞演说的好处，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便适用的形式向群众宣传。秋瑾有善于演说的口才，据吴

---

① 据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 1 页，中华书局 1983 年 7 月版。

② 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第 115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③ 吴芝瑛：《秋女士传》，《秋瑾研究资料》第 68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芝瑛回忆："生平豪纵尚气，有口辩，每稠坐议论风发，不可一世。"①同年10月，她与留日女生陈撷芬等在留学生馆召开大会，重组"共爱会"，改名为"实行共爱会"，宗旨是"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主张女子从军，救护受伤战士，一面通信国内女学，要求推广"，②陈撷芬任会长，秋瑾任招待，负责联络工作。1905年二三月间，秋瑾归国探亲，经徐锡麟介绍于6月上旬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纲领。8月14日，秋瑾加入同盟会，任评议员、浙江分会主盟人，成为浙江入同盟会的第一位女性。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清国入学之公私学校章程》（即《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留日学生异常愤怒，陈天华愤而蹈海自杀，秋瑾则与一部分留学生主张回国，以示抗议。

秋瑾的日本之行，提高了她的认识水平，坚定了她的革命意志，她已经从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女性，发展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并立志为革命献身。"吾归国后，亦当尽力筹划，以期光复旧物，与君相见于中原。成败虽未可知，然苟留此未死之余生，则吾志不敢一日息也。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且光复之事，而男子之死于光复者，则自唐才常以后，若沈荩、史坚如、吴樾诸君子，不乏其人，而女子则无闻焉，亦女界之羞也。"③

1905年12月初，秋瑾回国后，在浙江湖州浔溪女学任日文、理科、卫生课程的教员，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对学生进行革命熏陶和精神感化。1906年夏，她到上海、湖州等地进行革命活动，联络会党，试制炸药，作起义准备。10月上旬，徐锡麟因授安徽候补道员离开杭州，秋瑾成为光复会浙江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发展会员，宣传鼓动。1907年正月，秋瑾正式主持大通学堂。她以该校为据点，以办学为名义，在上海、杭州之间的军界和学界发展会员，并于3月组织光

① 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45页，中华书局1983年7月版。

② 陈象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第46页，中华书局1983年7月版。

③ 秋瑾：《致王时泽书》，《秋瑾集》第45页，中华书局1960年7月版。

复军以统一浙江的秘密军事组织。她四处筹饷，购置武器，准备与徐锡麟相约，浙皖呼应，两军会师于南京，以响应同盟会组织的黄冈、惠州等地的武装暴动。但因保密不严，浙江武义革命党人、金华革命党人于5月22、23、24日相继死难，被搜出的数本党人名册牵连出大通学堂及秋瑾诸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秋瑾决定挺身暴露自己。她在《致徐小淑绝命词》中表达了为革命献身的决心，“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①] 6月4日，秋瑾被捕，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壮之言，带着对国家的无限忧思血洒绍兴古轩亭口，遗著有《秋瑾集》。

（二）秋瑾的办报活动

秋瑾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杰出的女革命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妇女报刊宣传活动家。难能可贵的是，她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办报宣传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1904年她在日本参与《白话》的创办活动，归国后于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宣传革命与妇女解放思想。

1. 创办《白话》杂志

秋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是鼓吹反清救国，提倡男女平等的《白话》（月刊）杂志。1904年秋，秋瑾与留日革命同志在位于日本东京市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演说练习会”，成员有秋瑾、刘道一、朱俊、宋教仁等。他们主张通过演说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有关革命的宣传。秋瑾参与该会机关报《白话》的创办工作，并担任主编。秋瑾认为：“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故创办此杂志[②]。

1904年中秋，由演说练习会编辑发行的《白话》第一期问世，月出一册，先后出版出六期。[③] “封面为署名旭窗者所制，绘一中年人，蓄小髭，着西装，高擎《白话报》一本；其下四人，三男而一女，伫

---

① 参见郭延礼著《秋瑾年谱》第112页，齐鲁书社1983年9月版。

②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第45页，齐鲁书社1983年9月版。

③ 见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第56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立凝视，渴望甚殷”[①]，可见该报的宣传对象不仅仅是男性。内容以鼓吹民主革命为主，兼及妇女解放。在目前仅见的三期上，秋瑾撰写的文章有《演说的好处》（第一期）、《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二期）、《警告我同胞》的前半部分（第三期）[②]。她的文章提倡以演说方式宣传革命，批判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摧残，主张妇女自立以求解放；她目睹日本重视军人的社会风气，批判中国传统的轻视兵勇、以兵为贱的错误观点。秋瑾撰写的《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被称为“妇女运动的檄文”[③]。文章用简明通俗的白话文字、浅显易懂的内容，以确凿的事实，讲述妇女缠足、包办婚姻的痛苦。文中渗透着血泪，引起了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

文章开头就哀叹中国女性生为女儿身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

接着又说到缠足和包办婚姻的痛苦，“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这还不说，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

秋瑾还批判不许女子再嫁的封建婚姻双重道德标准，“还有一桩不公的事，男子死了，女子就要带三年孝，不许二嫁。女子死了，男子只带几根蓝辫线，有嫌难看的，连带也不带；人死还没三天，就出去偷鸡摸狗；七还未尽，新娘子早已进门了。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样不公道

---

①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第 54 页，齐鲁书社 1983 年 9 月版。

② 参见《秋瑾研究资料》第 692－695 页，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③ 《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第 489 页，载于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981 年 8 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呢？那些男子，天天说‘心是公的，待人是要和平的’，又为什么把女子当作非洲的黑奴一样看待，不公不平到这步田地呢？”

女子为什么听任这种状况呢？秋瑾分析，这是没有知识，不做事，靠男人吃白饭的结果。“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样样事体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做奴隶也不问了。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至于不叫我们读书、习字，这更是求之不得的，有什么不赞成呢？诸位想想，天下有享现成福的吗？自然是有学问、有见识、出力做事的男人得了权利，我们做他的奴隶了。既做了他的奴隶，怎么不压制呢？自作自受，又怎么怨得人呢？”

“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岂容袖手观”[①]。最后，秋瑾呼吁广大女子奋起，“我还望我们姐妹们，把从前事情，一概搁开，把以后事情，尽力去做，譬如从前死了，现在又转世为人了。……诸位晓得国是要亡得了，男人自己也不保，我们还想靠他什么？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②]

《白话》是一个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刊物，“其内容则抨击清廷极烈，多言人之不敢言者”，[③] 这与秋瑾的主持不无关系。在《白话》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大多不署真实姓名，但秋瑾则直书其名，毫不隐讳，表现出敢作敢当的勇气。

2. 创办《中国女报》

秋瑾创办的第二份报纸是《中国女报》。

1906年冬，秋瑾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号蠡城学社租赁房屋，筹办《中国女报》，并在上海《中外日报》上刊登自己撰写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说明办报目的是：“开通

---

① 《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秋瑾集》第85页，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警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白话》第2期，1904年10月。

③ 赵而昌：《纪鉴湖女侠秋瑾》，《风雨谈》1944年第9期，转引自《秋瑾研究资料》第104－10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版。

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会之基础为宗旨”，①并把广告送到各女子学校，欲招募股金，呼吁捐款，但响应者寥寥，入股者四五人，仅筹到几百元，最后由徐双韵姐妹捐款一千五百元才勉强开印。1907 年 1 月 4 日《中国女报》（月刊）创刊，留日学生陈伯平为总编辑，徐双韵任校对，秋瑾负责发行及总务工作。

该报设有图画、社说、演坛、译编、传记、文苑、新闻、调查等栏目。第一期上有秋瑾的《发刊辞》、《警告姊妹们》和她编译的《看护学教程》。其中，《警告姊妹们》一文，用通俗易懂而且相当巧妙的语言诉说女性的悲苦，在当时是很新鲜的文章。“唉！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她将女子所受的束缚、女子对男子的依赖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很能激起身处此境女子的共鸣。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能作这样透彻的呼吁妇女解放的文字，不能不算杰出。没有觉悟的女子是说不出这话的。

最为人称道的是秋瑾写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篇章的《中国女报发刊词》最能代表秋瑾因忧国忧民奋然而起、心系女界而奔走呼号的办报宗旨，“……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姊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在发刊词中，秋瑾以她那

① 《秋瑾集》第 10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富有鼓动性而且酣畅淋漓的语言来表达《中国女报》所要达到的高远目标，“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气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① 处于旧中国“弱女”地位的秋瑾，能发出这样的高论，与她的胆量与自信、远见与学识不无关系，而写该文所用的锦词绣句则表现了秋瑾良好的文学素养。

秋瑾在创办《中国女报》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女子世界》的出版，为之撰稿，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有较大影响力。

生命短暂的《中国女报》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与秋瑾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黄金意气铁肝肠，革命运中最擅场”，柳亚子对秋瑾的怀念用于《中国女报》的革命宣传上也很适宜。

二、呕心沥血 艰难办报

《中国女报》一共出了两期，第三期已经编好，但由于秋瑾被捕而成遗物。仅存两期的报纸凝聚着秋瑾的无数艰辛，也反映出辛亥时期中国妇女报刊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严重困难。

（一）宏大的办报目标和严峻的现实经济之间的矛盾

从筹办《中国女报》的经费上看，秋瑾可谓费尽心思。据秋瑾的好友徐双韵回忆，1906年秋瑾就在上海准备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尽管积极征求，入股的仅有寥寥四五人，筹到的股款仅有数百元，同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最后由徐双韵姐妹捐助一千五百元才勉强开办。在发刊词中，秋瑾向读者透露了报纸经费紧张的苦衷，“惟凡是办一个报，如经费多的，自然是好办；如没有钱，未免就有种种为难。所以，前头想集万金股本（二十元作一股），租座房子，置个机器，印报编书，请撰述、编辑、执事各员，像像样样、长长久久的办一报，也不枉是《中国女

---

① 《发刊词》，《中国女报》第1期，1907年1月14日。

报》为二万万同胞生一生色；也算我们不落人后，自己也能立个基础，后来诸事要便利得多呢。”秋瑾希望《中国女报》能得到读者的同情与帮助，但应者依然寥寥。由于经费紧张，第一期就仓促出版，创刊号用纸质最劣的普通纸印刷，装帧与印刷都不理想，销路也不广。第二期改用纸质较好的道林纸印刷，又扩充了篇幅，印刷成本大为增加，经济更为紧张。后来实在无奈，秋瑾的嫂嫂张顺以家藏的《又补斋画册》交付秋瑾去典押，第二期才勉强出刊。现实中经费异常紧张与编者对报纸的宏远目标产生矛盾，《中国女报》出版两期即告停刊。

报人的主观热情与读者的冷淡反映令秋瑾心痛，但并未使她灰心。秋瑾曾将《中国女报》的章程登在《中外日报》，并将另印的章程，分送各女学堂，希望读者予以力所能及的资助，但多天之后连问的人都没有。经费短绌，未能按预定计划筹到万金股本，“想起来实在痛心的呢！”但又不忍使“我最亲爱的姊妹，长埋在这地狱中，只得勉强凑点经费，和血和泪的做点报出来，供诸姊妹的赏阅。”“和血和泪”道出秋瑾主持《中国女报》举步维艰的处境，该报原定每月出版一期，第一期于1907年1月14日出版，但第二期也没有按时出版，而是于同年3月4日出版。勉强撑了两期，《中国女报》遂告停刊。

女性对妇女报刊的冷淡并非她们对自己的解放漠不关心，而是广大妇女还处于不觉醒的状态。刚刚发端的中国女子教育还没有为妇女报刊培养出有一定认识水平的读者群体，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从思想上对妇女解放进行足够的思想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先驱对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妇女的知识水平和觉悟水平都有了提高，上述状况逐步得到改变。

（二）孤独的呐喊者与寥寥的响应者之间的矛盾

秋瑾对《中国女报》抱有远大的理想。她在《发刊词》中说明创办目的是“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秋瑾曾经将《中国女报》的创办章程刊登在上海《中外日报》，并分送各女学堂，期望能得到同志，但应者寥寥。通过这件事，秋瑾越发感到通过办报开中国女智的重要性，“潜移默化，则女

报之创为不可缓"[1]。于是，《中国女报》就在惨淡中开始经营了。这样一份为全体女子谋利益的报纸理应受到妇女的支持。但事与愿违，无论她怎样勉力而为，还是臂助无人，只出了两期便告停刊。

秋瑾是孤独的呐喊者，她尽心尽力为广大女子谋利益的《中国女报》没有得到应有的响应。除了几位好朋友帮忙外，秋瑾还是该报的独立支撑者。"报既印行，集编辑、校对、发行之责于一身，不辞劳怨。除躬身撰述外，旌德吕碧城女士之文、石门徐寄尘女士之诗、会稽挽澜女士之小说，均有投寄。"[2]《中国女报》的来稿大部分集中于几个人，如秋瑾、黄公、会稽挽澜女士，此外还有徐双韵、燕斌女士，其他人的来稿很少，还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办报环境。这与当时绝大多数女子的知识水平有关。即使接受了教育，当时的大多数女性也顶多能写一些文学作品，有思想有见识的文章还有待于她们对妇女问题理解的深化。

尽管秋瑾的愿望由于时代的局限没有实现，但她的远大办报理想为中国妇女报刊树立了典范。对于秋瑾的远大办报目标来说，《中国女报》是抱憾而终的，但这种无奈在当时是无法超越的。

（三）主张妇女报刊以白话进行宣传

秋瑾主张报刊宣传要用白话，尤其是对于读者大多是知识水平不高的妇女报刊更应该这样。她批评《女子世界》"文法太深"，考虑到"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之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有鉴于此，《中国女报》"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3]。

秋瑾重视并且擅长演说，她的文章更是通俗易懂，可以看作是演说的文本形式。她认为演说可以开化人的知识，感动人的心思，而且具有方便（可随地进行）、免费（可招来听众）、易懂（可适应妇孺等不识字者）、只需动口而没什么花费等种种益处。她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演讲家，据徐自华回忆，秋瑾"性慷慨，工词令，善辩高谈，听

---

① 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② 秋宗章：《六六私乘》，《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③ 秋瑾：《中国女报发刊词》，《秋瑾集》第 15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 7 月版。

之忘倦，登台演说，舌灿莲花”。秋瑾1904年8月13日参加东京中国留学生举行的“戊戌六君子”殉难纪念会，秋瑾“演说之沉痛，闻者皆泣下，其爱国爱同胞之热忱，溢于言表。虽俄之苏非亚，法之玛利亚，有过之无不及”[①]。曾与秋瑾相处甚密的湖南善化（今长沙县）留日学生王时泽回忆，秋瑾每遇留学生大会及湘、浙同乡会，“烈士必到，常登坛讲演革命救国及男女平权问题，慷慨激昂，闻者无不为之动容”[②]。既然如此，她的文章能打动人心就不足为奇了。

1904年9月24日创办的《白话报》，顾名思义就是用白话进行宣传的刊物。该刊“内容抨击清廷极烈，多言人之不敢言者”[③]。秋瑾在《白话报》第二期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第三期发表《敬告我同胞》一文，均用白话来唤醒群众，唤醒妇女。

《中国女报》上大多是秋瑾的文章。在目前可以见到的两期《中国女报》目录上，第一期上秋瑾的文章有：社说栏的《发刊词》，演坛栏的《敬告姊妹们》，译编栏的《看护学教程》。第二期上秋瑾的文章有：《补登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译编《看护学教程》诗歌三首。除了她那脍炙人口的《中国女报发刊词》和《敬告姊妹们》外，秋瑾翻译的《看护学教程》认为女子本性“绵密周致”，最适宜看护之职。她批判了社会上视看护为贱业的错误观点，肯定了看护工作的光荣与重要。这是妇女报刊上较早对妇女职业的提倡。

秋瑾是白话文的实践者。她的文章语言生动，浅显易懂。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用通俗巧妙的语言述说女性的悲惨遭遇，写得感情真挚，明白流畅。提倡白话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中国妇女报刊创刊伊始就主张使用白话文，这是由于妇女报刊的宣传对象大多是识字不深的妇女。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报刊必须使更多的受众接受其宣传内容，才能达到其传播目的，而这是文法

---

① 徐自华：《秋女士历史》，《秋瑾研究资料》第6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版。

② 王时泽：《秋女烈士瑾略传》，《秋瑾研究资料》第60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版。

③ 《秋瑾研究资料》第10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版。

艰深的文言文所不能达到的。重视白话成为妇女报刊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代表了报刊发展的方向。

为了革命和妇女解放，秋瑾身死而精神未亡。她牺牲后5个月，《中国女报》和《女子世界》合并出版，改名为《神州女报》，刊出专刊纪念秋瑾，继续进行妇女解放和革命宣传。

秋瑾生命短暂，但精神永存。

秋瑾牺牲一个月后，何震在日本出版《天义》报，提出“女子复仇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北伐队的宣言即以安慰秋瑾的在天之灵为目标之一；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在上海创建竞雄女校，纪念秋瑾在革命和妇女运动方面的功绩。[①]辛亥时期女记者汪韫玉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的《吊秋女士》一诗，代表了时人对秋瑾的怀念之情。“西山日暮景萧条，屠伯从容独鼓刀。锻炼词成莫须有，皖江潮接浙江潮。药云弹雨一天愁，杯影蛇弓到女流。制就虚无新活剧，无教红粉占千秋。泉江水碧浙山青，夜半时闻环佩声。云诉上仓终得直，就中煽起自由魂。”[②]

秋瑾牺牲后，每到她的牺牲纪念日，都会有相关的文章来纪念她。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许多妇女刊物都对秋瑾做了特别的纪念，这是因为，在抗日救亡的形势下，需要更多像秋瑾那样敢于献身于救国和妇女解放的女性。“她的工作范围较宽，影响较大，她对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文字的宣传到实际的行动，她都参加。她有见事之明，杀身之勇，正合现时的要求。”[③]

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何在？“求得应分的知识与技能以谋生活的独立，在社会的总解放中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在社会的总解放中担负妇女应负的任务；为完成这些任务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做牺牲——这便是正确的答案。这答案，易卜生自己并不曾写出的，但秋瑾是用自

---

① 《秋瑾与清末妇女运动》，载于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981年8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146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③ 碧遥：《秋瑾的事迹与作品》，《上海妇女》1卷4期，1938年6月5日。

己的生命来替他写出了。”[1]

秋瑾难能可贵的是，她集革命家与报人的身份于一身，不仅是革命的鼓吹者，还是革命的实践者；不仅是妇女解放理论的鼓吹者，还是妇女解放的实行者。秋瑾的《中国女报》虽然只发行了两期，存在时间很短，但是，她所体现出的不屈办报精神，她所鼓吹的激烈的革命言论，她所主张的彻底的妇女解放，都成为后来女新闻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秋瑾办报时间虽短，但她的精神是永恒的，她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也正体现在这里。

辛亥时期由于妇女解放思想的进一步深入和近代妇女知识分子的出现，为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不仅视男女平权为民权主义的一部分，而且注意把妇女吸引到革命洪流中，把妇女解放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妇女刊物在这一时期大有发展。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宣传内容深刻，而且大多由近代女知识分子主办。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不少妇女新闻工作者，秋瑾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她的办报精神成为我国女新闻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四节　刘青霞：散尽千金　支持办报

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入，不但有秋瑾这样舍弃家庭办女报的报人，还有散尽家资资助革命报刊的女性，她就是刘青霞。她先是出资出版了同盟会河南分会宣传革命思想的机关刊物《河南》杂志，后是资助了难以为继的《中国新女界》杂志继续发行，接着于民国初年捐资创办《自由报》。

---

[1] 郭沫若：《〈娜拉〉的答案》，《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第33期，1942年7月19日。

一、刘青霞简介

刘青霞，原名马青霞，1877年生于河南安阳，卒于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1]。父亲马丕瑶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先后任山西牧令、贵州臬司、广西潘司、广西巡抚、广东巡抚。光绪帝评价他"性情纯良，才能称职"[2]。大兄长马吉森对人和蔼，无一般显贵子弟的恃傲之气，热心地方公益，如设车马局以轻徭役、创立西山书院以培士子等。他思想开明，醉心近代实业，曾集资在安阳设立广益纱厂，聘技师开采煤矿，是当地创办近代实业的开拓者。二兄长马吉樟1883年中进士，为官后行事多有父风，先后筹集赈款，赈济1890年畿辅大灾和1899年河南黄河以北的旱灾。马氏父兄开明通达、热心任事、扶危济困的善举对刘青霞良好品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青霞18岁时嫁给开封尉氏县刘煦德为妻，改姓刘。刘煦德是有名的富户，有刘半县之称。1901年，刘煦德去世，刘青霞继承了偌大的产业。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后，河南京官捐款成立京师豫学堂，以便随任子弟求学。刘青霞在哥哥马吉樟的动员下，捐款三万两。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豫报》报道了刘青霞的义举[3]。随着《豫报》的发行，刘青霞捐资兴学之事被广泛传播。捐助豫学堂虽然是在哥哥的动员下参与的，但却成为她融入时代的开始。

1907年，刘青霞随同在翰林院任职的哥哥一起赴日考察。在日本，她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融入匡救祖国危亡的大潮中。

---

① 参见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② 《光绪帝谕赐祭文》，转引自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③ 古中原裔：《捐巨资兴学之可嘉》，《豫报》第1号。

二、刘青霞的捐资办报活动

(一) 出资创办《河南》杂志

《河南》杂志是清末河南留日学生创办的综合性月刊，在同盟会的支持下于1907年12月在东京出版，经理张钟瑞，总编辑刘积学。

20世纪初的日本是中国同盟会的大本营。河南留日学生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以张钟瑞为首的激进派决定创办自己的喉舌——《河南》。虽多方筹集资金，但仍然杯水车薪。刘青霞的二哥马吉樟与张钟瑞是莫逆之交。马氏兄妹到日本考察时，造访张钟瑞，使张钟瑞结识了刘青霞。刘青霞钦佩张钟瑞的举动，当即捐洋一万六千元，[①]使《河南》杂志于1907年12月20日创刊。该杂志在《本刊二十大特色》一文中写到："炊而无米则巧妇束手，战而乏饷则名将灰心，本刊经刘氏（青霞）出资巨万……有一日千里之势。"[②]

《河南》面世使河南同盟会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鸿文伟论足以与《民报》相伯仲。时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湖南游学译编等月刊停刊已久，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是报实为首屈一指。"[③]《河南》每期销售数千份，"输入本省者占半数，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此杂志之力为多。"[④]1908年12月20日《河南》第9期出版，第10期在印刷中被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于1909年初查封。[⑤]《河南》能够成功创办，并且办成革命刊物中的佼佼者，刘清霞资助之功不可没。

(二) 资助《中国新女界》杂志继续发行

在日本考察期间，刘青霞还资助了《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出版。该刊物于1906年12月30日在东京创刊，以宣传妇女解放为主。中国

---

① 《尉氏文史资料》（第二集）第59页，尉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编印。转引自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② 转引自常艳春、石繁亮《巨富大仁的刘青霞》，《炎黄春秋》2001年第5期。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72－2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⑤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第30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同盟会首批会员、同盟会河南支部的负责人朱炳麟任总经理，留日女学生燕斌（炼石女士）任主编发行人。该杂志开留学女界创办女报之先河。[①]

该杂志创刊后颇受欢迎，销售一度达5000册。当出版至第4期时，因经费问题未能按期出版。刘青霞得知后，多方筹集资金，本人捐洋6600元，使得杂志继续出版，并“准于西历八九月内，定将五、六、七、八四期杂志相继发行”[②]。

（三）捐资创办《自由报》

民国初建，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努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新闻出版方面的言论自由政策。1912年6月30日，河南同盟会成员曾昭文、刘基炎等在开封创办《自由报》，以“监督政治之改良，增进国民之知识，发挥自由之真髓”为宗旨。《自由报》创办之初，刘青霞捐洋2000元。[③]

辛亥革命在武昌取得胜利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而被袁世凯控制的河南奉袁旨意，宣布共和而不独立。1912年9月1日，同盟会河南支部改为国民党河南支部，《自由报》转为国民党河南支部机关报，然而，仅出版半年，即被河南总督张镇芳封禁。

从千金小姐、孀居富妇到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志士，刘青霞捐助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公益活动受到时人赞誉，也受到刘氏家族保守势力的攻击和诽谤。面对族人不间断的财产纠纷和争讼，刘青霞有时候甚觉短气灰心，但由于内心坚定而高尚的信念支撑，她对于报刊

---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转引自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③ 《尉氏文史资料（第二集）》第60页，尉氏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7年编印。转引自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业不忍放弃，“宁节己襄助，未当做守财之奴”[①]。

第五节 民初女报人唐群英、张汉英

一、唐群英的报刊活动

唐群英，名恭懿，号希陶，1871年出生于湖南衡山一个湘军将领家庭，1937年病逝。她是民初著名女报人，一生参与创办多种报纸。她去世后，时人哀挽：“心存忧乐关天下，论功应与补天同。”评价虽过了点，但是唐群英在民初报坛确实是一位活跃的女性。

唐群英10岁时，因做《清流依村图》一诗而名噪一时。“清流依村曲，绿树接丹崖。邻烟连雾起，山鸟唤晴来”[②]。其诗“清逸潇洒，意气磅礴”，被诗家誉为“女中奇才”。唐群英后来嫁给同县曾传钢，不久即青年守寡。1904年，唐群英脱离曾家只身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开始为宁调元主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撰稿，1910年秘密回国参加革命宣传活动，1911年在南京组织女子北伐队，任队长。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唐群英上书参议院，反对三纲五常，要求男女有平等的选举权利。《临时约法》公布后，唐群英以其中缺少说明男女平等的条款，曾联名上书孙中山，表示不满。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风暴，全国某些地方出现了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有湖南的唐群英和丁步兰、王昌国，浙江的沈佩贞、尹锐志，江西的吴木兰，广东的徐宗汉等一道，或组织“女子北伐队”，或组织“女子救护队”，准备开往战地服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出现了女子参政会，要求男女平权，在议会和政府部门中力争女

---

① 转引自汪维真《刘青霞慨捐救国事实及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

② 转引自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252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子名额，学校要规定男女同校，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剪发、放足等。她们抛头露面，出入官衙，开会演说，印发传单，无人敢加以非难，甚至大总统、大都督之流还得礼聘为顾问、参议，以示尊重女权。[1]

1912年10月，唐群英在北京组织全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任会长，并创办《女子白话报》作为该报的宣传机关，自称“以至诚之言，引伸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目的为宗旨”，并以编辑名义在该报发表《女子参政同盟始末记》、《女子参政之先声》等。同年12月，唐群英返回湖南，在长沙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1913年初，唐群英与张汉英、丁步兰合作，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作为该会的言论机关。该报社址在长沙南门上墙湾，日出两大张，内容也相当完整。可惜出版仅两个月就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刊。

唐群英青年守寡，毅然积极参加报刊和女权活动，这在当时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并因此和《长沙日报》引发一场名誉权官司。1913年2月16日，长沙的国民党系统报纸《长沙日报》上发表了浙江无赖郑师道捏造的《唐群英、郑师道结婚启事》，这种损毁名誉的广告引起了唐群英的极度愤怒。这天下午3点及晚8点，唐群英两次率众捣毁该报馆。第一次，“打碎玻璃窗、茶碗、椅子等件”。第二次，“将门窗招牌取去，直入排字房，将已排成之版，及一切架上铅字、铅料、铅件、盆灯、玻璃窗等，尽行捣毁。”《长沙日报》从该日起被迫暂时停刊。捣毁报馆后，唐群英在《申报》（同年2月26日）发表通电如下：

> 《长沙日报》阳历二月十六日广告栏内登载唐群英与郑师道同婚一则，此事实系一面捏诬。查郑师道为浙江极无赖之人，昨称调查盐务来湘，屡来群英处求见未遂。遂捏造同婚，往该馆登载，为污蔑计。未付印时，适张汉英先生往该馆，闻之斥其谬误，乃该报不问事实，竟行刊登，此其受贿营私，损失名誉，毫无道德，不顾公理，不畏法律，已达极点。《长沙日报》本系公资开办，如此荒谬，实与社会人心

①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7-8页，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

有大障碍。除由群英将该馆诘责外，一面呈请湘都督将郑拿办，并将该报取消，另行组织，以为不法者戒。诚恐各界误听，特此通告。唐群英谨叩。[①]

唐群英捣毁《长沙日报》事件发生后，双方互控于长沙地方检查厅，一方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一方要求赔偿报馆损失。2月18日，该厅举行预审，唐群英未到庭。同日，她主办的《女权日报》开始连日对《长沙日报》发起攻击，《长沙日报》则以号外的方式为自己申辩。第二次预审于2月25日进行，唐群英由丁宝龙代表出庭，《长沙日报》由文斐代表出庭。经调解，最后双方不再涉讼。《长沙日报》的损失，由湘督谭延闿拨公款2000元以为补偿了事。[②]

后来查明郑师道是个亢进性精神病患者，这条广告是他自己上门刊登的。他追求唐群英未果，便要此无赖，想弄假成真，不料弄巧成拙。《长沙日报》未尽审查义务，刊登虚假广告，侵害了唐群英的名誉权，有错在先。唐群英通过捣毁《长沙日报》来泄愤，手段有失妥当。《女权日报》和《长沙日报》对垒攻击，也非明智之举。

二、张汉英的报刊活动

张汉英（1872－1915），湖南澧陵人，早年肄业于长沙女校，1905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09年后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汉英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后援会，在妇女界中募集捐款，支持各地民军的武装斗争。1912年联络各女子团体聚集南京，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被选为总务部负责人。该会本部迁到北京后，张汉英改任南京支部长。1913年张汉英离开上海返回湖南，与唐群英一起建立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分会，一起创办《女权日报》，宣传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1913年4月，

---

① 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第680－68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第680－68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张汉英到上海，继续从事女权活动，并以“增进女子常识，阐明天赋人权，为将来女子参政之准备”为宗旨，创办《万国女子参政会旬刊》，大量刊载反对袁世凯的文章。“二次革命”后被迫停刊，但张汉英继续从事反袁活动。1914 年张汉英回到湖南，1915 年病故，是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妇女报刊工作者之一。[①]

第六节　其他女报人的报刊活动

除了秋瑾和刘青霞、唐群英和张汉英之外，辛亥时期还有大量知识女性参加报刊活动。

林宗素就是一例。她是福建闽侯人。胞兄林白水是清末民初著名报人，叔叔林履中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扬威舰管带。1898 年前后，林宗素随哥哥林白水到杭州，参加了浙江教育会的活动，结识了秋瑾。1902 年，林宗素到上海爱国女校学习，同时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的各项活动。1903 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经常在留日学生的革命集会上发表演讲，并参加了革命妇女团体“共爱会”，和秋瑾一道练习过制造炸药的技术。1904 年春，林宗素到上海，开始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报刊活动，先是为林白水主办的《中国白话报》写了大量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继而担任在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的编辑。《警钟日报》停刊后，她继续报刊活动，开始为《妇女时报》撰稿。[②]

辛亥时期在大型摄影画报《世界画报》从事编辑工作的女编辑是姚蕙，她是中国最早从事摄影刊物编辑工作的女性。姚蕙为清学使姚菊仁之女。她于 1907 年起从事摄影刊物《世界画报》的编辑工作。《世界画报》（季刊）1907 年创刊于巴黎，是一份用中文编印的大型摄影画报。目前仅见两本，9×12 寸开本，铜版纸印刷，制作精美，以旅法华侨和海外华人为主要对象，并通过设在上海的发行所在国内销

① 《中国新闻年鉴（1992 年）》第 54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② 《中国新闻年鉴（1987 年）》第 46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

售，栏目有“世界各殊之景物”、“世界真理之科学”、“世界最近之现象”、“世界纪念之历史”和“世界进化之略迹”等，依次刊登照片和图画，解说用三号字铅字印刷，十分醒目。每期刊用各类图片三四百幅，半数以上为世界各地的风光名胜、科学技术、文化生活作品和时事照片。取材着眼于全球，国内情况偶有报道。[1]姚蕙在这个刊物上编发了许多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照片。其中“女子天足会”、“淮北饥荒”等图片以及“广东运动会”等照片，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女编辑刘博鸿任广东《东莞旬报》(1908年7月3日创刊)编辑。

清末湖北第一位留日女学生王莲协助丈夫王璟芳创办《湖北学生界》，并任该刊撰稿人之一。她1902年随丈夫到日本留学，1904年回国，1940年在北京去世，终年64岁。

湖南女子陈超是辛亥革命报刊《女学报》的一名女记者。她在《呈梦坡先生亦示撷芬吾友》一文中，这样表达自己的从业理念：“为念国势弱，皆因女教失。二万万裙钗，未能食其力。贵者习骄奢，贱者等奴仆。教子与相夫，几人能杰出。于是创女报，纤手羊毫握。拔簪供报资，挑灯亲著述。奉劝同志人，人人习四术（注：女学会号召女子习中文、西文、医学、女红四种课程)。算法与舆图，致知在格物。男子之能事，女子岂可忽。齐家平天下，共挽斯危局。勿使中华人，一半居桎梏。”[2]

江苏兴化女子刘韵琴任民初上海《中华新报》女记者。她用笔告诉读者：“那独夫（袁世凯）一天不死，一天不退位，著者这支笔也是一天不能停下，必要把它种种奸谋揭了出来，在报上宣布，以尽我笔诛的天职!”《中华新报》一读者陈荣广为刘韵琴的《韵琴杂著》(刘韵琴收集的自己在报章上发表的作品）作序说：“吾国女界能以文字托业于新闻，影响政局，启迪人群者，当推刘女士韵琴也。”1945年，刘韵琴去世，时年61岁。她自制墓联云：仗剑走天涯，寻求真

---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一）第1004－100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

② 转引自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100－101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理酬壮志；买舟归故土，声讨袁贼惊国人。[①]

民初《女子世界》杂志的女记者吕清扬、丁志隽善用诗词为宣传手段。吕清扬的《古剑行》抒发了自己的革命豪情。“宝剑切石如切水，风沙一震天容北。斩虏建勋血点殷，滴作胭脂塞花紫。壮士由来重报恩，黄金台上酬知己。而今边靖楼兰斩，更无人佩谁磨洗。愿挂徐君墓树表高谊，羞藏玉匣金函里。”丁志隽的诗则多以忧国忧民之章而饮誉于时。她的《癸丑感时》正是这样：“党派纷争忘国计，谁为独鹤立鸡群？漫言事不关巾帼，漆室哀吟大有人。”[②]

《留美学生年报》编辑胡彬夏。1911年7月，《留美学生年报》在上海创刊。上海留美学生会主办，年刊，胡彬夏编辑，所载分美国留学界情形、美国之政治风俗、时事感言、新思想等。1914年起改名《留美学生季刊》继续出版。

张昭汉，辛亥革命时期女记者、上海《时报》妇女周刊编辑。张昭汉是湖南湘乡人，与父亲张伯莼同时加入同盟会，同为反清革命组织南社社员。辛亥前张昭汉在苏州创办《大汉报》，宣传民族革命，后倡妇女解放，曾经赴欧美考察并著述介绍女子教育，回国后在上海《时报》妇女周刊任编辑。1964年去世，年82岁。张昭汉工诗文，有诗悼念宋教仁先生：“衮衮时贤竟厌贫，本来面目独斯人。争传渔父终兴汉，忍说桃源可避秦。养虎而今贻祸患，伤麟千古共辛酸。碑前泪迹红如血，遗爱从知在国民。”[③]

辛亥革命时期女记者徐自华。徐自华字寄尘，号忏慧词人，浙江石门人，工诗词，驰名于清末民初，早年与秋瑾结为姐妹，共同任教于南浔女校。秋瑾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后，徐自华在上海襄助报事。徐自华后来先后担任《神州女报》、《妇女杂志》、《女子杂志》等报刊主撰，民国时期主持两湖秋瑾纪念馆，1935年去世，时年63岁。

---

① 转引自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62－63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② 转引自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1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③ 转引自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第128－129页，新华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第三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转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激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这一时期，[①] 新与旧、专制与民主、保守与开放、科学与愚昧展开了激烈的交锋，马克思主义此时开始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随后成立，工农妇女运动随之兴起。这是一个新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旧观念逐步退出阵地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新的革命力量逐渐融合旧革命力量的历史时期。妇女报刊在诸多思想的交锋中得到了洗礼，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革，并开始转型。同时，女新闻工作者也开始转型，工作类别多样化，出现了著名的妇女报业经营家。

第一节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

一、民初妇女报刊的短暂回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旋即归于失败。1912 年 9 月 4 日，袁世凯公然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为男子独享，沉重打击了民初资产阶级上

---

① 注：关于“五四时期”的分期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该时期即 1919 年 5 月 4 日当天发生的学生运动后的几个月，有时指几年；另一种看法是指 1915 或 1916 年到 1923 年的那段时期，还有些作者把这个时期延伸到 1925 年“五卅运动”时，他们认为该事件及其结果带有五四运动的标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美］周策纵著，周子平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 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本文认为这一时期还可以延伸到救亡运动前的 1930 年。

层妇女的参政热情。1914年创刊的《妇女鉴》因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而受到封建官僚、道学先生以及女界卫道者的欢迎和赞扬，天虚我生陈蝶仙主编的《女子世界》和《香艳杂志》也与其臭味相投。1914年中华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在《政府公报》第662号中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褒扬条例》，公开鼓吹"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内务总长据其事状分别等差，经由国务总理呈请大总统给予匾额题字并金质或银质褒章。"1917年的《修正褒扬条例》所提倡的愚昧的封建节烈观与1914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思想界一些关心妇女解放者的义愤，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对此进行口诛笔伐。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强化专制，取缔群众团体，妇女团体更是荡然无存，造成了"妇女刊物亦俱停顿，一时几无妇运之痕迹"① 的局面，妇女报刊的发展遇到了短暂的回落，同时，统治者还在思想界掀起一股封建复古逆流。据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8年，仅有14种妇女报刊创办，仅比1912年一年创办的妇女报刊多两种，其中不少是提倡封建妇女道德、鼓吹妇女贞节的妇女刊物。

二、《新青年》及其他进步报刊对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

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报刊经过短暂的回落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其中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推动作用。1915年，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次批判千百年来压迫与摧残妇女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妇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将妇女问题纳入反封建压迫求民主科学，反奴隶羁绊求独立自由的主题范围内，集中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压制与摧残，恢复妇女独立自由的人格，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里所宣称的"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理论的建构主要表现在《新青年》对妇女解放

---

①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93页，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

问题的探讨上。《新青年》讨论妇女问题的角度是新颖的，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并最终指出了妇女解放的途径。

1915年《新青年》上刊发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译介方面，“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①]。《新青年》以西方妇女为镜鉴，宣传她们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杰出贡献，以此启发人们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心。例如陈独秀在《欧洲七女杰》中指出：“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藉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藉口于人民程度之不足，此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其本质于何证之，欧洲记载所传女流之事业，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②]。初创的《新青年》重在译介，所以没有实际涉及中国的妇女问题。但译介本身也是一种立场，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妇女社团遭到摧残，妇女刊物遇到挫折的情况下，《新青年》关注妇女问题，为处于迷茫中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1916年《新青年》揭开了关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一页。除了继续刊登关于妇女问题的译作外，更重要的是开始面对中国妇女问题，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李平的《新青年之家庭》涉及女子权利及解放问题，力主男女平等，提出“子女必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不置妾，女子不畜婢”的主张。[③] 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中，以思想家的深邃和敏锐指出，孔教不适合现代文明的生活。在批判孔学之际，他以较大的篇幅谈论孔教名节对中国妇女的摧残，进而倡言应以“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打破以夫为妇纲”的局面，以经济上的独立争取妇女的个性解放。他赞扬道：“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④]

从1915年对妇女问题的译介到1916年直面中国的妇女问题，《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引起了进步知识

---

① 《社告》，《青年杂志》，《新青年》1卷1号。

② 《青年杂志》1卷3号。

③ 李平：《新青年之家庭》，《新青年》2卷2号。

④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2卷4号。

分子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并热心投入这场宣传运动。此后，《新青年》加大了对妇女问题关注的力度。1917年《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一时期，除总论妇女问题外，对妇女解放的具体途径如女子教育、妇女经济独立、妇女参政、婚姻与家庭等也进行了专门探讨。这些言论在当时的舆论界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它指引着时人对妇女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甚至成了妇女解放的"议题设置者"。《新青年》从2卷6号起专辟《女子问题》专栏，这是五四时期最早设立妇女专栏的期刊之一，也是《新青年》探讨妇女问题的一个重要论坛。栏目虽小，却标志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无疑为同时期的报刊讨论妇女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形式。栏目为一些知识女性提供了舆论园地，吸引女性诉说自身苦衷，控诉封建礼教，讨论妇女问题，宣传妇女解放。著名女报人曾兰在上面发表《女权平议》，从欧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谈起，在欧美"妇女起而同男子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尤卓著于世界"的感慨中，自然过渡到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礼教的批判。[①]但《女子问题》专栏并没有囊括《新青年》上所有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该栏目停刊后，妇女问题仍然是《新青年》的主要论题之一。

由日本与谢野晶子著、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引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将对封建的片面贞操观的批判。胡适的《贞操问题》指出："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②] 鲁迅以唐俟为笔名发表在《新青年》第5卷第2号的《我之节烈观》，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出发，猛烈地抨击了北洋政府的褒扬条例，指出节烈是强加在妇女头上的"畸形道德"，必须摈弃。《新青年》以对"贞操问题"的讨论对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进行了全面清算。

《新青年》第4卷第6号出"易卜生号"专刊后，伴随着《娜拉》(《玩偶之家》)的发表，人们开始对妇女解放与经济自立问题进行思考，那就是妇女解放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便是一句空话。1919年后

---

① 《女权平议》，《新青年》3卷4号。

② 胡适：《贞操问题》，《新青年》5卷1号。

的《新青年》继续倡导妇女解放，清算封建礼教，同时，还重视社会调查。通过调查中国妇女的生活现状，将研究视角伸向现实，这是探讨妇女解放具体途径的必由之路，也是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妇女问题。这些调查关注底层受压迫女性的生活，直面她们的痛苦，调查的对象也从农村摧残妇女的鄙俗到在资本家压榨下的女工。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由陈独秀撰写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社会调查报告表现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半边天——女工的关心，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则表明《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翻译与介绍社会主义劳动妇女的业绩是《新青年》的一个特征，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①

从内容上而言，《新青年》的创刊冲破了袁世凯政治独裁和复古逆流局面，重新提出妇女解放问题，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讨论了妇女问题，并首创使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妇女问题，将妇女解放置于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条件下，使妇女解放有了坚实的根基，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健康发展。

从形式上而言，《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有以下创新：在版面安排上，设立《女子问题》专栏，从不同侧面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女性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园地；在文体运用上，运用社会调查这种文体，使妇女问题的研究从理论走向实际，为进一步深刻、准确地研究妇女问题打下基础。

关于《新青年》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中国妇女生活史》一书的作者陈东原回忆道："民国五年，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沉痛地向青年喊道'自居征服地位，勿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才对于三纲五常的旧说，开始炸毁。在那篇文章以后，《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许多为女子呼不平的鸣声，也有些建议的议论。等到'五四'一起，这些理论被青年所尝试，妇女的生活才真正改了个局

---

① 杨荣、张强：《论〈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及贡献》，《民国档案》1994（3）。

面。”①

在妇女解放运动再度高涨的历史时刻，《新青年》对妇女问题的探讨起到了指导性作用，它提倡的独立人格是指导中国妇女发展的瑰宝之一，它开辟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在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的宣传起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除了《新青年》之外，五四时期的其他进步刊物也对妇女问题进行了大量探讨。1919 年 1 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杂志也以论说、译著、小说、人物传记等形式讨论了妇女问题。从 1919 - 1920 年，《新潮》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叶绍钧的探讨女子独立人格丧失原因的《女子人格问题》（《新潮》1 卷 2 期，1919 年 2 月 1 日），以小说形式塑造不幸女子遭遇的《这也是一个人!》（《新潮》1 卷 3 期，1919 年 3 月）；有罗家伦探讨妇女解放原因、步骤和途径的《妇女解放》（《新潮》2 卷 1 期，1919 年 10 月）；有李大钊探讨物质变动、精神变动和妇女解放关系的《物质变动与精神变动》（《新潮》2 卷 2 期，1919 年 12 月）。胡适的《李超传》纪念为争取妇女经济权而自杀的李超（《新潮》2 卷 2 期，1919 年 12 月），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则论说了旧家庭的名份与伦理对妇女身体和精神的摧残（《新潮》2 卷 4 期，1920 年 5 月），朱洪的《女权与法律》则探讨了妇女解放的障碍和妇女在新世界应享的权利（《新潮》2 卷 3 期，1920 年 2 月）。

妇女运动是什么呢？五四以后有人这样定义：“妇女对于宗法社会、封建思想、传统观念及一切恶势力加以攻击的革命运动，……妇女运动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缚，把她们从贤妻良母的梦中，唤醒转来，把片面独断的男性社会取消。妇女运动的第一信念，就是男女绝对平等，所谓智力的差别、体力的差别、技能的差别，女子是绝对不承认的。”② 五四时期进步刊物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在当时的社会中形成一股合力，引起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也为妇女报刊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自序》，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② 吕云章：《妇女问题论文集》第 7 页，上海女子书店 1933 年版。

第二节　个性鲜明的五四妇女报刊

一、数量众多 形式各异

(一) 妇女报刊的繁荣

五四时期，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种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妇女解放思潮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此外，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报刊的繁荣提供了较为广泛的读者群与作者群。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统计，1909 年女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0.7%，1912 年民国成立，女学生人数较 1909 年比例激增，比率上升至 4.81%，呈现蓬勃的成长。这种趋势不断增强，据该社 1923 年 4 月的报告，女学生在学生总数所占比率，1912 - 1917 年约在 4 - 5%之间，1922 年则上升至 6.32%，人数则增加了三倍[①]。更重要的是，在高等教育方面，1920 年成立了唯一国立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2 - 1923 年的全国大学生调查统计表明，女大学生占学生总体的 2.54%，此时大学开女禁刚刚三年[②]。

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成为五四时期许多刊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在“通讯”专栏中，几乎讨论了五四时期男女青年最关心的一切问题，包括婚姻、恋爱、求学等；《星期评论》进行了“妇女解放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使妇女问题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问题，与此相适应，妇女报刊的发展呈现出雨后春笋般的繁荣景象，妇女报刊数量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仅 1915 年到 1920 年创刊的妇女刊物就有 33 种。此外，当时各个女子学校，几乎都办有刊物，宣传妇女解放。

---

① 朱经农：《教育大辞典》第 1052 页，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5 月。

② 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载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 368 - 370 页，台北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10 月。

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大致情况，见下表：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时间	主持人/主办单位
妇女杂志(月刊)	上海	1915	商务印书馆
女子杂志(月刊)	上海	1915	广益书局发行
家庭杂志(月刊)	上海	1915	唐真如
家庭	成都	1915	家庭杂志编辑部
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半年刊)	苏州	1915	江苏二女师校友会
青年女报(季刊)	上海	1916	上海基督教妇女青年会
女铎报	重庆	1916	程悲娲
直隶第一女师范学校友会会报	天津	1916	白眉初
女青年月刊(月刊)	上海	1917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主办，蔡希珍等主编
妇女旬刊	杭州	1917	杭州中华妇女学社办，张俪娟主编
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	南京	1917	该校校友会学艺部
女鉴日报	成都	1918	余一钧
女子爱国日报	上海	1919	
女界联合旬刊	上海	1919	上海女界联合社
妇女(周刊)	北京	1919	北京妇女青年社
女高师文艺会刊(年刊)	北京	1919	北京女高师
醒世周刊	天津	1919	天津直隶省立女师
平民(半月刊)	天津	1919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天津学生联合会
女界钟(周刊)	长沙	1919	长沙周南女校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时间	主持人/主办单位
励进会旬刊	长沙	1919	湖南省立女师
省女师学生期刊	广东	1919	广东省立女师
解放画报(月刊)	上海	1920	周剑云主编,上海新民图书馆主办
妇女画报	上海	1920	
新芬	上海	1920	
新妇女	上海	1920	上海务本女校五位教师
女界铎	上海	1920	同上
现代妇女评论集	上海	1920	上海世界书局
北京女高师半月刊	北京	1920	北京女高师学生自治会
妇女评论(初为半月刊,第 2 卷改为月刊)	苏州	1920	
真光青年	广州	1920	广州真光中学女青年会
进修团月刊	浙江	1920	浙江省立女师
吴兴女学界	浙江	1920	浙江湖州湖群女校
女权	河南	1920	开封女子同志会
妇女评论(周刊)	上海	1921	上海民国日报编
劳动与妇女(周刊)	广东	1921	广州劳动与妇女社编
北京女学界联合会汇刊	北京	1922	北京女学界联合会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学生会杂志	北京	1922	校学生会主办
辟才(不定期刊)(北京)	北京	1922	北京女高师附中校友会
现代妇女(旬刊)	上海	1922	上海时事新报馆编
女青年(月刊)	上海	1922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
新妇女(月刊)	广州	1922	广州新妇女杂志社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时间	主持人/主办单位
现代妇女(月刊)	上海	1923	曹孟君主编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	北京	1923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妇女周报(《民国日报》副刊之一)	上海	1923	向警予主编
女星	天津	1923	新民意报馆编
妇女日报	天津	1924	经理刘清扬，主编邓颖超
妇人周报	上海	1925	上海中国文学会编辑
中国妇女(旬刊)	上海	1925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编辑
光明(月刊)	广州	1925	王一知主编
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会刊	广州	1925	广州妇女解放协会编辑
现代妇女	广西	1925	南宁广西妇联
广东妇女	广州	1926	广州女权运动大同盟总会编辑
湖北妇女(旬刊)	武汉	1925	亢文卿、袁浦之先后任主编
女子日报	上海	1925	经理梁孟，主笔秦蕴儒
妇女旬刊汇编	浙江	1925	浙江妇女学社主编
新女性	上海	1926	妇女问题研究会
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月刊	北京	1926	京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校
妇女之友(半月刊)	北京	1926	张挹兰主编
妇女之声	江苏	1926	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编
妇女铎	北京	1927	
觉(半月刊)	北京	1927	北京女师大觉社创办，李岫琛主编
妇女运动旬刊	上海	1927	上海妇女运动旬刊社编辑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时间	主持人/主办单位
浙江妇女	浙江	1927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妇女部编
女一中季刊	北京	1928	女一中出版委员会编辑
革命的妇女	上海	1928	上海革命的妇女报社编
妇女战线	上海	1928	上海妇女战线杂志社编
今代妇女	上海	1928	上海今代妇女社编辑
妇女周刊	江苏	1928	江苏妇女周刊社编
女军	江苏	1928	南京女军社编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半年刊)	南京	1928	金陵女子大学校刊编辑部
翊教月刊	北京	1929	翊教女子中学学生会主办
妇女月刊	北京	1929	北平特别市女协会宣传股编辑
妇女旬刊	上海	1929	中华妇女学社主编
妇女共鸣(月刊)	重庆	1929	重庆妇女共鸣社编
女师大学术季刊	北京	1930	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出版委员会编辑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季刊	天津	1930年6月停刊。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中部学生自治会编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周刊	天津,1930年－1937年6月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编辑
金陵女子神学年刊	南京	1930	金陵女子神学院编辑
振华生活(不定期)	南京	1930	振华女学校主办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会务鸟瞰(月刊)	南京	1930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
妇女周刊	重庆	1930	重庆市妇女协会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时间	主持人/主办单位
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学校旬刊	保定	1930或1931	河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院学校编

资料来源：《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印，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发行，1936年6月版；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115-116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刘巨才主编：《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第481-482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7月版；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9年6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这些妇女刊物中有一部分是在五四运动高潮中由女学生创办的，如天津《醒世周刊》由女师学生许广平、蒋云主编，先是油印刊物，后改为铅印刊物。该报在报道国内外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及反压迫斗争，传播新思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后因经济困难停刊。长沙周南女校的《女界钟》也是当时有影响的刊物，主编为学生会会长周敦祥，该刊主旨是倡导妇女解放，曾大力宣传了本地的“赵五贞自杀事件”，推动了反封建的妇女解放宣传。

（二）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种类多样

五四时期，除了出现一些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妇女刊物之外，一些非妇女报刊上也辟有妇女专刊、专栏或专号，探讨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等问题，介绍新思想新学说，注重关于妇女问题的调查，使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五四时期，辟有女性专栏专刊的非妇女报刊很多，如北京《晨报》第七版的“妇女与家庭问题”专栏（1919年5月4日设），《京报》的《妇女周刊》（1924年12月10日设），天津《益世报》北京版的《女子周刊》（1920年10月30日设），天津《新民意报》的《女星》副刊（1923年4月25日设），上海《时报》的《妇女周刊》（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1921年8月3日设）。

辟妇女专号最著名的当属1918年《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在该号中，胡适论述了易卜生主义，并与罗家伦合译《娜拉》（A Doll's House），这引起了时人对妇女解放之路的热烈探讨。接着，《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1919年10月）的“妇女问题号”，刊出田汉的《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李大钊的《妇女解放与Democracy》、黄如葵的《何故不许女子平等?》、王会吾的《中国妇女问题—圈套—解放》、周炳琳的《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等文章，从理论层次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少年世界》1920年7月1卷7期的“妇女号”调查国内女子学校，报道国内外女学生动态，刊登妇女解放的专论，武汉《星期评论》于1922年6月的“妇女运动号”刊登了李汉俊、陈潭秋的文章。

二、议题深刻　主题鲜明

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妇女解放运动暂时处于沉寂阶段。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视妇女解放为冲决旧道德、争取个性解放的必要内容，这是五四时期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发端。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先彻底打破封建枷锁。《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以妇女的封建枷锁为攻击目标，为妇女解放大声呐喊，给当时社会以震古烁今之感，成为在新形势下探讨妇女问题的嚆矢，促使一批人参与或投入妇女解放运动。从翻译《妇人观》，到介绍欧洲七女杰，从撰写《一九一六年》，再到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陈独秀逐步强化中国妇女解放的意识，对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认识的一致使他对套在中国妇女头上的封建枷锁孔教发起了猛烈攻击，两者的契合便使他成为当时关心中国妇女解放最著名的人物，而他高扬的大旗则吸引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健将，包括胡适、吴虞、鲁迅等人深情地投入。五四时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进步刊物对妇女问题的探讨为妇女报刊的发展起到了引导的作用。一些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对新文化运动的无限热情，从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角度出发，对封建的妇女道德与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成为妇女报刊提倡妇女新道德与新观念的思想基础。

有“破”才有“立”。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封建妇女伦理道

德的批判，五四时期妇女报刊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集中在赋予男女平等以新的涵义。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即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维新时期的妇女解放侧重于废缠足和兴女学方面，初步提出了妇女在形体和精神上的解放；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已经出现像秋瑾那样自觉求解放的代表性人物，也出现了“从军的踊跃和参政运动之激烈，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女权运动光荣的一页”，但由于西方真正的妇女解放观还没有传入中国，这一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不过静久思动，一种时势使然”，所以只是妇女解放的“新潮之蠢动时代”。[①]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以人的个性解放为价值取向，赋予男女平等以新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男女交际公开、男女教育平等、男女经济平等。

（一）男女交际公开

封建社会以各种清规戒律将妇女禁锢于深闺之中，使妇女与社会严重隔绝。封建卫道士认为“男子弃其治外之天职，而国事废；女子荒其治内之天职，而家道废。刚柔失德而人道乖，内外易位而礼仪坏”，[②] 对妇女的社会活动表现出极度的恐惧。但随着妇女与男子一样走进工厂，走向社会，传统的腐朽观念受到了致命冲击。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大造男女平等的舆论，认为“把男女的界限渐渐的化除，各尽各的责任，那就是我国的进步。”[③] 这引起了社会上进步舆论的支持。

五四时期著名的妇女刊物《妇女杂志》的主要撰稿人雁冰从经济角度看待男女社交公开，“男女社交不公开……背后藏的，便是经济的知识的道德的不平等”，他还从男女都是“人”这个角度来分析男女社交公开，“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同做人类的事。男人们可以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我们主张男女社交公开的人，见女人不知其为女人，只觉得伊是和我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只觉得那些服式和我

---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②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 345 页，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③ 《申报》1919 年 10 月 14 日。

们不同的姊姊妹妹们，是和我们共同撑起一个社会的，犹如一车之两轮"[1]。此外，李大钊在《新潮》第2卷第2号探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认为现代大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封建小农经济，又为妇女就业提供了机会，女子和男子共同参加社会生产，对女子的道德要求"就由绝对的变成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男女社交公开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李汉俊和雁冰均认为，男女社交公开的前提是男子在观念上破除对女子的偏见，亦即提倡对女子的新道德，在观念上"破除轻视女子和专在性上认识女子的心理"，"创造合理的新道德"。[2] 雁冰认为这种"男子对于女子心理的改变"的新道德是男女社交公开的前提。

五四时期关于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引起了部分青年对该问题的初步实践，长沙新民学会和天津觉悟社最具代表性。新民学会实行男女社交公开，会员入会不分男女，最后入会的女子有蔡畅、向警予、周敦祥、劳君展等19人。天津觉悟社成立时通过女会员的提议，发展社员时男女各一，干部选举上也采取男女对等的原则，而且用抽签法确定每个人对外的姓名，如邓颖超抽到一号，取名"逸豪"，李毅韬抽到四十三号，由此而来的"峙山"便成为她长期使用的名字，她在《女星》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给读者的回信均用此名。

（二）男女教育平等

五四时期对男女教育平等的讨论以王卓民在《妇女杂志》上发表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与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的《读王卓民君论吾国大学不宜男女同校商兑》的争论为代表。

《妇女杂志》1918年4卷5期发表了王卓民的《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文章，认为女子的社会职能是"贤妻良母"，女子只可从事一些轻便的手工活动，不需要有高深的学问；他还从"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教条反对男女教育平等，如果同上大学，男女之间"必有往来，投绢赠紵，必有多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偶或不慎，指摘随之，伤风败俗之事起，道德之破坏无余地矣"。此文一发表立即

① 雁冰：《男女社交公开问题之管见》，《妇女杂志》6卷2号，1920年2月。
② 李汉俊：《男女社交应该怎样解决》，《妇女评论》第7期，1921年9月。

遭到了康白情的反驳，他列举中国女子远征欧美、留学日本以及国内个别女学生要求进入北大学习的事实，说明男女同校必会“蔚为欧美学府之盛观者”，“贤妻良母”的陈词滥调必将被世界汹涌澎湃的潮流所激荡。传统的女学带有浓厚的家塾味道，只有男女同校才能提高女学生的水平。[①]王卓民又写了题为《论吾国大学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兑之驳议》，从“大学男女同校可以弃妇离夫”、“大学男女同校其收效必微之又微，盖教育之根本不在此而重在中小学校也”、“大学男女同校者多以先进国为例，而不知今之先进国如美国者，大学犹未尽男女同校也”[②] 三方面列举男女同校的危害与时机的不成熟。这种封建保守的观点，引起了康白情再次与他辩驳。

《妇女杂志》的读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通讯”栏中署名“瞿宣颖”的《共同教育论之辩护》，对“男女同校导致抉破礼防发生不道德”和“中国此时无女子受大学教育之必要”进行驳斥，指出男女之间有礼防并不一定有道德，封建的男女礼防不仅戕伤人道，绝害天理，而且男子“内则淫于妾，外则淫于妓，秽形昭彰，公言不讳”。中国古时重视礼防，其结果并不道德，而“男女平等之社交，女子易保持其贞洁，而交际昌明之社会，亦足使暧昧之举动难于发生。……欲期社会道德之发达，惟有令社交公开，男女平等”。作者还从世界潮流的发展角度指出中国此时女子受大学教育正是“因应时宜”。[③]

这种讨论使男女同校观念深入人心，直接推动了男女同校的发展。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20 年，9 名女生进入北大学习，成为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批女大学生。

（三）男女经济平等

维新时期的梁启超指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女子没有受教育权而导致经济上对男子的依赖。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启发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角度去考察社会问题。李达认为“女子的地位，常随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

---

① 《妇女杂志》4 卷 11 期。
② 《妇女杂志》5 卷 1 期。
③ 《妇女杂志》5 卷 1 期。

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女子"果能如此有经济独立的能力，……男女间一切不平等的道德与条件，也可以无形消灭了。"①

五四时期的妇女刊物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实现妇女经济独立问题。1920 年 1 月 1 日创刊于苏州的《妇女评论》发表关于女子经济独立的先决条件的几种观点：有人认为女子经济不独立主要是子女的拖累，家庭的束缚。因此，要实现女子解放，非实行"儿童公育"不可②；有人认为，女子经济独立，非先谋职业上的生活不可。一边做工一边读书的"工读主义"可使妇女"由职业上的发展，而达到经济独立的地步"③。《妇女评论》则更进一步指出女子经济独立的前提是有和男子同样的劳动权。它在创刊宣言中指出，"我们认为现社会的一切问题有一个总归结；这总归结就是'胃的问题'，就是'食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这经济问题就是人人有劳动权，人人有生存权。……我们虽不鼓吹任何女子皆当谋生计的独立（因为这与全社会的经济组织相关很切，在现社会的经济组织下，断不能立时这样办到，而且办到也是无益的），但我们却极端主张女子应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④。而 1921 年 2 月 13 日创刊、由广州群报社发行的《劳动与妇女》则指出，"在阶级制度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的压迫"，"所以打破阶级和改造经济制度，……妇人和农夫，工人当一致努力"，"根本解决办法有二：（一）把各种产业完全收归公有。（二）把国家政权由工人收回执掌。"⑤ 这种观点表明妇女刊物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开始抛弃点滴改良的方法，也突破男女平等是单纯的男女两性之间问题的界限，开始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革入手。

---

① 《解放与改造》，1 卷 3 号，1919 年 10 月。

② 《儿童公育与妇女劳动》，《妇女评论》1 卷 2 期。

③ 《妇女解放的先决问题——要谋"经济独立"》，《妇女评论》2 卷 1 期。

④ 《妇女评论宣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 552－553 页，三联书店 1959 年 4 月版。

⑤ 《劳动与妇女》，《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 81 页，三联书店 1959 年 4 月版。

这已初步具备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本观点，为中共成立后妇女运动与劳动运动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五四时期妇女报刊改革的代表——《妇女杂志》

《妇女杂志》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妇女刊物。1915 年 1 月 5 日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2 年 1 月因商务印书馆毁于“一·二八”日军的炮火而不幸停刊。杂志连续出版 17 年，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

《妇女杂志》在形式上明显模仿了 1911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杂志规模的妇女期刊《妇女时报》。初创的《妇女杂志》是一个宣扬封建节烈、贤妻良母等保守思想的刊物。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激荡，1919 年 12 月《妇女杂志》进行改组，内容逐渐改良，形式更加美观，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一个妇女期刊。

一、初创的《妇女杂志》在形式与内容上对《妇女时报》的模仿与超越

（一）首份商办妇女刊物——《妇女时报》的特色

《妇女时报》，1911 年 6 月 11 日在上海创刊，上海时报馆妇女时报社主编，有正书局发行，狄葆贤主办。现见到 21 期，第 21 期于 1917 年 5 月出版。前后历时达 6 年之久，在辛亥前后创刊的妇女期刊中，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刊物是少有的。《妇女时报》是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杂志规模的妇女期刊，它的创刊开中国商办妇女刊物的先河①。

作为第一份商办妇女刊物，《妇女时报》印刷非常精美。彩色封面，并借鉴西方妇女刊物注重图画以增进读者的兴趣，唤起读者的美

---

①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 382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术精神之特点，十分注重搜罗图画，并用铜版印刷。每期有数十种彩色插画，主要是人物画，尤其是表现女性装饰打扮的照片以及一些男着西装、女着婚纱的新式结婚小照。《妇女时报》中还有不少闺秀的照片，有的是编辑写信征求得来的，有的是读者自动寄来的。还有一些文物古迹照片和女界新奇之事，如“月蕙王宫女子舞蹈戏”、“破天荒中国女子之凌空”等画面，而且每篇文章都配有插图。注重生活性与消遣性的图画，表现出《妇女时报》商办妇女刊物的休闲娱乐特点。

《妇女时报》初创时的栏目主要有“论说”、介绍中西妇女生活教育状况的“妇女之种种”、“童话”、“上海妇女之新装束”等等。但该刊栏目不断更新，内容日益丰富。第二期增辟“读者俱乐部”，以与读者相互切磋，交换知识，推广见闻；第十期辟“卫生问答”栏，特请医学大师做顾问，详细答复读者提出的问题；第十八期辟“妇女谈话会”，专供女性读者投稿，“无论长篇巨制、隽语名言，皆可归纳其中。或论时事，或述闻见，或谈经验，或记游戏，俱悉任投稿者之自由”[①]；第十九期辟“弹词”栏目，“以词句宜清新，宗旨贵正大”为准，邀请女子发表文学作品，以供一般妇孺之浏览[②]。此外，还有专门刊登读者小影的“相片”、“小说”、“短评”、“各地风俗调查”等栏目。从栏目不断丰富的变化中可以透视到《妇女时报》通过关心读者来促进刊物发展的良苦用心。

《妇女时报》不仅形式美观，而且内容通俗，可读性强。该刊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为办刊宗旨，关注家庭建设和与妇女有关的社会问题如娼妓问题、女子教育问题与女子职业问题等。在家庭建设方面，该刊从住宅位置、房间分配及装饰、衣服与食物、儿童教育、家庭娱乐、家庭经济预算等方面谈论改良旧家庭，创造温馨舒适的新家庭。该刊还为解决娼妓问题出谋划策，主张广兴女学使妇女珍视其权利，厉行法律以禁绝娼妓，而以筹划女子职业为第一要务。该刊同时主张“贤妻良母”式的女子教育，如果女子专事学问而

---

① 《编辑室之谈话》，《妇女时报》第 18 期。

② 《编辑室之谈话》，《妇女时报》第 18 期。

置儿童之教育、家庭之布置、收支之平衡于不顾，则为舍本逐末之行为，这是该刊主张"新知识，旧道德"的表现之一。关于女子职业，该刊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而是介绍了西方女子职业状况，如女军人、女律师、女陪审员等，并在文中刊登她们的照片。中国女子职业状况侧重在现状调查方面，如发表在《妇女时报》第18期、署名"晚秀"的《上海贫女生活之调查》对上海各业女工的调查。但其调查的目的是"辅助学术，供人消遣，略表同情"，并没有脱离《妇女时报》以消遣为主旨的范畴，这与新文化运动后期妇女刊物注重调查以寻求解决妇女问题的目的不同。

《妇女时报》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兼及若干社会问题，有关国内政治的内容不多。在当时，这种作法避免了以纯粹政治宣传为宗旨的妇女期刊难以长期出版的命运，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出版不久，便有订户六七千户，这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数目，《妇女时报》则连续出版了七八年。

《妇女时报》印刷精美、内容通俗、栏目不断丰富以吸引读者等商办刊物特点，直接影响到初创时期的《妇女杂志》。

（二）《妇女杂志》的前身与后续

1.《东方杂志》重视妇女问题

《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宣传是《妇女杂志》创刊的前奏。《东方杂志》自创刊时起就关心妇女问题。据统计，自创刊到终刊，44卷《东方杂志》月刊上直接讨论妇女问题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近500篇，平均每一期上就有一篇关于妇女的文章，这种努力在当时的期刊中是少见的。

《东方杂志》在1932年10月16日设立"妇女与家庭"栏目之前，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主要分布在"教育"、"实业"、"时评"、"内务"、"社说"、"杂俎"、"内外时报"、"谈屑"、"世界新潮"、"读者论坛"、"杂评"、"女权运动"、"新语林"以及"现代史料"等十余个小栏目中。

早期的《东方杂志》仿效日本《太阳报》和英、美等国的文摘报的做法，除了本社自撰的"社论"一篇和"广辑新闻"外，主要是选

录各报的名论要件，性质类似于“选报”[1]。与此编辑方针相适应，散布于《东方杂志》中各个专栏中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绝大部分摘自当时其他报纸，属于本刊自撰的稿件很少。如刊于《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1904年7月8日）“教育”栏的《论提倡女学之宗旨》节录自“四月初六日大公报的吕兰清女士来稿”；刊于《东方杂志》第1卷第8期（1904年10月4日）“实业”栏的《论女工》节录自“甲辰第二十一期商务报”；刊于《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1906年7月16日）“教育”栏的《论女学应注重德育》节录自“丙午第十三期北洋学报”；刊于《东方杂志》第5卷第11期（1908年12月18日）“杂俎”栏的《婚姻沿革谈》译自“日本法学新报”。自创刊到1911年3月大改良前，共出版六卷的《东方杂志》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中，只有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卷第13期的《兴女学议》是本社撰稿，其他全部是摘录或节译。同时，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所讨论的妇女问题主要以兴女学为主，内容比较单一，所以重点较为突出。

自从1911年进行大改良后，《东方杂志》改变了“选报”性质，朝着综合性学术期刊方向发展，其所涉及的各个学术领域不少是“延请名家写的”，妇女问题除了在“内外时报”栏的个别文章是节录其他报的内容外，其他栏目中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均是署名的论文。经常发表妇女问题方面论文的男性作者有：《东方杂志》的编辑、后来任《妇女杂志》主编的章锡琛，《东方杂志》的编辑钱智修，后来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东方杂志》的编辑俞颂华，曾主编《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目的金仲华，中共党员恽代英，当时就学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马星野，科学家竺可桢等。女性作者主要有：妇女运动领导人罗琼，刘王立明，《大公报》女记者陈学昭，出版《上海报纸改良论》一书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郭箴一女士。作者队伍比较庞杂，决定了其研究妇女问题文章内容的多面性。

《东方杂志》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从稿件的多源性到作者队伍

---

① 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历史地位》，《东方》2000年第11期。

的广泛性，《东方杂志》的“杂志中的杂志”特征有了鲜明的体现。

2.《妇女杂志》的出版与内容演变

《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5日创刊，1931年12月因商务印书馆毁于“一·二八”日军的炮火而不幸停刊。《妇女杂志》连续出版17年，是中国妇女期刊史上第一份历史悠久的大型刊物。在其存在的17年间，它由一个一般影响的妇女期刊，经编者的努力和读者的爱护而发展成为中国最有实力的妇女期刊。

《妇女杂志》还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专号。在这些专号中，有关于离婚问题、娼妓问题、妇女运动、职业问题、家事研究、妇女生活、妇女与政治、妇女与文学等，此外还有产儿限制号、美术专号、爱之专号、男女理解号、婚姻号等。在妇女读物并不是很多的时代，这种专号对妇女而言是很有益处的。

3.《妇女杂志》的停刊与《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的设立

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一·二八”日军的炮火摧毁，《妇女杂志》被迫停刊。几年后，商务复业，但《妇女杂志》没有继续出版，而是在《东方杂志》中设立“妇女与家庭”栏目，来代替《妇女杂志》。该栏目由金仲华主编。

该栏目结合抗战实际，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战时妇女儿童保育问题、妇女抗战与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等文章，婚姻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儿童教育问题也是该栏目所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半个多世纪前的“妇女与家庭”栏就已经很重视对儿童的性教育问题，如刊于《东方杂志》第30卷第15期（1933年8月1日）的《儿童性教育问答》，刊于《东方杂志》第33卷第9期（1936年5月1日）的《实施儿童性教育之理论与方法》。此外，还有关于国外妇女儿童尤其是美国、苏联妇女儿童状况的介绍，而且从题目中可以看出编辑所持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急转直下的美国男女问题》（《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美国妇女的失业》（《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苏联建设中的妇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9期），《不景气的美国流浪儿童》（《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苏联妇女儿童保护的理论》（《东方杂志》第30卷第9期），《美国妇女的职业斗争》（《东方杂志》第32卷第3期），《美国产业法规下的妇女雇佣问题》（《东方杂

志》第31卷第23期），《苏联妇女职业之进展》（《东方杂志》第32卷第9期），对美苏妇女状况的贬褒抑扬尽见于文章标题中。

总的来说，“妇女与家庭”栏目一方面体现了《东方杂志》“杂”的特点，内容涉及妇女儿童问题、婚姻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妇女生理卫生、妇女装饰美容、两性问题、妇女教育、妇女职业、生育节制、娼妓问题等，雅俗共赏，兼顾多阶层妇女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栏目还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如金仲华的《中国妇女往何处去》（《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刘王立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新阵线》（《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期），孟如的《从职业回到家庭去吗》（《东方杂志》第30卷第23期）等。

（三）《妇女杂志》初创时的形式与内容

1915－1919年是《妇女杂志》的初创阶段，其内容和形式与《妇女时报》极其相似。由思想较为保守的王蕴章任主编。王蕴章，江苏无锡人，别号西神残客，清光绪壬寅科副榜举人，民国旧派人物，鸳鸯蝴蝶派小说家。

从形式上看，《妇女杂志》的彩色封面、诸多插图、铜版印刷等特点堪与《妇女时报》相媲美，版面设置、字号大小也相差无几。《妇女杂志》每期设有十余个栏目，它们是“图画”、“论说”、“学艺”、“家政”、“名著”、“小说”、“译海”、“文苑”、“美术”、“杂俎”、“传记”、“记载”、“余兴”等，内容涉及女子教育、家庭管理、科学常识等方面，杂志的知识性、趣味性与消遣性强于思想性，思想倾向于保守，与消闲读物差不多。论说没有指导性，有些文章的观点明显与时相悖，或者显得过于谨小慎微，前者如第1卷第7号的“传记”栏目宣扬封建节烈，专门为封建伦理道德的牺牲品烈妇立传，后者如第2卷第5号的“社说”——《论夫妻平等无碍于三纲》。

《妇女杂志》创刊初期也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其发刊词之一认为，“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由贤妻良母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也”，“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妇女杂志》的发刊就是为了“遵此职志，为国中造多数之贤妻

良母耶。"[①]该杂志还从男女身体构造的不同分析贤妻良母主义的必然，认为如果不顾客观事实蔑视这种差异，而为男女完全平等，则"不特为女子之不利，而又为国家民族全人类之不幸不利"，"殊不知人决不能集合同等而相对峙之男女以造成家庭与国家，必须由各为互异之分业之男女，共相和合，而始为完全一个，乃可以组织圆满之家庭，造成隆盛之国家"，"贤妻良母主义基于男女根本的差异，在乎使发挥其所长而为才地适宜之分配，必如是斯足以提高男女身体的能率而增进社会之幸福；反之，极端之男女同权说实一种思想之游戏，而为蔑视男女间根本的差异之空论，其结果足以来社会之不幸，招国家之衰亡，可断言也。"[②] 这种理由在今天看来简直是谬论。

在五四时期进步潮流的推动下，觉醒的知识女性为自身解放呐喊、奋斗，进步的社会舆论给予妇女解放以充分的支持，一时间各报刊掀起了广泛讨论妇女问题的热潮。但商务编译所对五四运动并未留意，认为只是一件与文化无关的政治事件，《妇女杂志》仍然以贤妻良母为主导方向。《妇女杂志》保守落后的立场遭到了时人的严厉批评。据中国现代著名妇女活动家王会吾回忆，"我从前在嘉兴女子师范里，修身一科的结晶体是'服从'和'敬顺'，又有什么'贤妻良母'，什么'三从四德'，时时总要接触这我的耳鼓。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也是脱不了这个主义。"[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罗家伦指出："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较有'理论性'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不过是构成了难以理解的思想的支柱，应予以彻底改革"，其中"妇女杂志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并将该杂志归入他所分的杂志类别"学理派"中的"脑筋混沌类"，这种杂志"名为谈学理，实在没有清楚的脑筋、适当的方法研究学理的真相；只是混混沌沌的信口开河。这种谈法，真是

---

① 梁令娴：《敬述吾家旧道德为妇女杂志祝》，《妇女杂志》1卷1期。

② 君实：《自医学观之贤妻良母主义》，《妇女杂志》5卷8期。

③ 王会吾：《中国妇女问题——套圈——解放》，《少年中国》第4期，1919年10月1日。

误人不浅，……这类杂志，若不根本改革，真无存在的余地。”[①]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妇女杂志》处于一个急待转变论调的关头。

二、《妇女杂志》的革新

“北京大学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入手。”[②]

1919 年，商务的几种杂志为追随新的思想潮流，进行了重大改组，一批年轻的新主编受命领导这些期刊。1921 年 1 月，原《东方杂志》编辑章锡琛接替王蕴章任《妇女杂志》主编。章锡琛（1889 - 1969），字雪村，浙江绍兴人，1909 年毕业于绍兴山会师范学堂，1912 年到上海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东方杂志》编辑，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1921 年章锡琛受命担任《妇女杂志》主编，他与周建人一道，从接任后的七卷一期开始大力革新内容，倡导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1925 年 1 月《妇女杂志》出版了一期“新性道德专号”，载有章锡琛写的《新性道德是什么》和周建人写的《性道德的科学标准》，受到“现代评论派”陈百年等人的攻击，加上这一时期章锡琛以“妇女文艺研究会”的名义参加“五卅运动”，商务编译所所长王云五以此为借口，审查、干涉《妇女杂志》编辑部工作，章锡琛被迫辞职以示抗议。

《妇女杂志》的改革是渐进的，1919 - 1920 年是《妇女杂志》改革的过渡时期。茅盾以“佩韦”为笔名，在《妇女杂志》5 卷 1 期上发表了题为《妇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妇女》的论文，极力赞成妇女解

---

① 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1919 年），原载《新潮》第 1 卷第 4 期，1919 年 4 月，现载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 1954 年 12 月上海初版。

②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载《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放，并主张从女子教育入手，此后，他又写作和翻译了《现在妇女要求是什么?》、《英国女子在工业上的情况》、《读少年中国号》、《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历史上的妇人》、《强迫的婚姻》等。提倡贤妻良母主义五年之久的《妇女杂志》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改变论调。《妇女杂志》六卷一期刊登告白，宣布自本卷起刷新内容，改良体例，并欢迎读者来稿。在文字上，要求新式标点符号和白话写作，文字由原来的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在内容上，出现了一些观点互相对立的争鸣文章。作者队伍开始扩大，增加了茅盾、沈泽民、周建人、邵飘萍等思想开放人士，刊发了一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观点新颖的文章。

革新后的《妇女杂志》，除了保持原有的趣味性、实用性、知识性外，言论上提倡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同时，形式上也有了改革，改用较小的铅字，编排比以前美观，还出版了一系列专号，以集中讨论妇女问题。《妇女杂志》的改革受到读者的欢迎，发行量从过去的二千余份上升到一万份以上，其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直到停刊为止。

(一)《妇女杂志》在内容上的革新

革新后的《妇女杂志》重视妇女的人格问题。“在居人类的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曾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进化，总是不具的人类；文化无论怎样在发达，总是偏枯的文化。所以，妇女问题，是世界全人类最重大的问题，不仅是一部分的人类的问题。”① 《妇女杂志》重视妇女人格，主要表现在从女子是和男子一样的“人”的角度来阐释妇女问题。

1. 关于妇女经济独立

五四时期关于“娜拉”的讨论引起了社会对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视。改革后的《妇女杂志》十分重视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并认为这是妇女运动的方向所在。它认为，男子对女子最根本的支配在于经济方面的支配，纯正的男女关系，只有在废除这种支配之后才有可能。

---

① 《妇女问题研究宣言》，《妇女杂志》8卷8期。

"女子若有了独立性的职业，便有了独立的经济；经济既能独立，虽不说公开，自然会公开，虽不说婚姻自由，自然会婚姻自由。"[①] 署名"王警涛"的作者认为，"我并非承认解决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就是解决女子全部问题；却是解决女子问题的第一步，"但同时认为在资本主义下面的劳动，并非真正的经济独立，真正的经济独立应该由男女共同携手，达到"大家能够在经济生活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办法在现存社会经济制度下，是绝对做不到的。因此，现存私有财产的制度，便有改革的必要了。"[②] 此时的《妇女杂志》已经超越单纯的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开始注意到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问题。女子经济独立直接关系女子职业问题，改革后的《妇女杂志》对于女子职业问题十分重视。当时女子职业主要集中在女工、教师与医护人员为主，后二者依然是传统女子职务的外向延伸。这主要与女子当时所受的教育有关，于是，提倡男女平等的教育便顺理成章了。

2. 关于女子教育

《妇女杂志》主张从"人"而非男子附属物的角度来进行。传统女子教育的根本谬误就是不为社会考虑，只想着为父母教成个好女儿，为丈夫培养个好妻子，而没有考虑到为社会培养个好"人"，从而指出教育的精神应该改变，学校的方法应该改变，实行男女同校，敦促女子参加社会事业。[③] 针对流行一时的贤妻良母教育，周建人认为，培养女子的教育，"不是'三从四德'和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也不是学几针刺绣，及切剁得极细巧的烹调；只是人生应有的智识，人们相互的关系，养成健全的身心，便是琢成社会上有用的材料"，[④] "今后的女子教育，必须陶冶她们对于人生有正确的了解，对于自身乃至人生，能有一种自觉和信念，怀健全的人生观、世界观，

---

① 陈问涛：《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妇女杂志》7卷8期。

② 王警涛：《女子经济独立问题》，《妇女杂志》8卷1期。

③ 佩韦：《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妇女杂志》6卷1期。

④ 《妇女杂志》7卷9期，第6页。

遇事能具有确切的判断力，使她的人生十分完美。”[①] 女子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女子的自我认识，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生观和世界观，养成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这种教育理念，为女性独立自觉精神的发扬提供了空间。

3. 关于男女社交公开

《妇女杂志》提倡改变男子心理的新道德，破除男女社交有碍礼防的观念。妇女解放的真正意义是让妇女来做个“人”，女子既然也是一个“人”，就有自己的人格，男子和女子的交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际，无所谓礼防。“男女既然同是人，便该同做人类的事。男子可以到的地方，女人当然也可以到；能这样的便是合理的状态，不能这样的便是反常的状态，……我们主张男女社交公开的人，见女人不知其为女人，只觉得伊是和我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只觉得那些服式和我们不同的姊姊妹妹们，是和我们共同撑起一个社会的，犹如一车之两轮，”同时，茅盾还提倡男女社交的新道德——男子对于女子心理的改变，这是社交公开的先路。[②] 妇女解放不仅仅是女子自身的事情，而是男女两性之间的问题，没有男子对女子观念的变革，妇女解放就不可能彻底。

4. 对男女精神特质的比较

五四时期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丹麦戏剧家易卜生的社会剧的精神内容之一即提倡女子个人的人格，对此，丹麦文学批评家布兰克思认为，易卜生的“个人和社会比较，不但个人并不比社会轻，而且个人应该占重大的地位。所以对于个人的人格，应该比社会什么都尊重。”[③]对男女精神特质的比较是《妇女杂志》提倡女子独立人格的前提。这一点在改革前后有明显不同：改革前的《妇女杂志》将女子的本质作负面评价，认为女子的道德感情弱于男子，其依附于男子，受男性社会所立的社会道德规范是理所当然的。[④] 改革后的《妇女杂志》

---

① 李光业：《今后的女子教育》，《妇女杂志》8卷2期。

② 茅盾：《男女社交公开问题之管见》，《妇女杂志》第6卷第2期。

③ 瑟庐：《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观与恋爱观》，《妇女杂志》6卷10号。

④ 天婴：《研究女性与男性之别及其适应之教育》，《妇女杂志》1卷7期。

通过比较男女精神特质突出女子特有的人格。杨贤江通过搜集心理学家的实验结果，从科学上得到一种确实证据，打破男尊女卑说的谬误，证明男女之间无智能上的差异，只有性别特征和活动式样的差异，这并不能用来判断优劣。而《永远的女性》则借用《浮士德》中有名的结句“永远的女性引导我们前往”来高度赞扬女性的优良特质，以确立两性的平等。①

五四时期对男女精神特质的比较，确立了女子独立的精神特质，打破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男女之间无智能的差别，男女应受同等的教育，得到同样的职业；妇女解放由清末以来通过模仿男子寻求解放的途径转为对自我的性别角色的认同，脱离了女性即弱者、只有模仿男子才是妇女解放途径的误区。对此，茅盾认为：“妇女解放的真正意义是叫妇女来做个‘人’，不是叫妇女样样学到男子便算解放；解放的方面可以说有种种，肉体上的束缚和精神上的束缚，都是要求解放的，还有自发的精神上的束缚，……都也该解放，”② “切莫认为妇女运动有反抗男子敌视男子凌驾男子的意味，爱伦凯（Ellen Key）说的好，妇人运动只不过想得到男子所已享有的权利，和男子一般罢了；……妇女运动只求妇女有独立的人格，和男子一般做个自由的人。”③

从女子经济独立、教育平等到对女子独立人格的赞扬，改革后的《妇女杂志》一改创刊初期死气沉沉的言论，对妇女解放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

（二）形式上的革新：众多专号的创办

专号，指期刊将一批相关问题的文章集中于某一期刊行，并另立名目，成为专号。④ 在中国近现代报刊史上，尤其是五四时期，许多综合性期刊都曾出版过与妇女问题有关的专号，如《新青年》4 卷 6 期的“易卜生专号”，《少年中国》4 卷 1 期的“妇女号”等，这些妇

① 晏始：《永远的女性》，《妇女杂志》8 卷 5 号。
② 雁冰：《读少年中国妇女号》，《妇女杂志》6 卷 1 期。
③ 雁冰：《妇女运动的意义和要求》，《妇女杂志》6 卷 8 期。
④ 刘宁元主编：《中国女性史类编》第 270 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女问题专号成为五四时期整个社会重视妇女问题的一种表现。

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办了一系列有价值的专号，如8卷4期的"离婚问题号"，8卷6期的"产儿限制号"，等等。此外还有关于娼妓问题、妇女运动、职业问题、家事研究、妇女生活、妇女与文学等专号，"在缺乏充实的妇女读物时代，能有这种专号的出现，实在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收获。"[①]

虽然五四时期讨论妇女问题的中心之一是离婚问题，但是以专号的形式，通过让读者各抒己见讨论离婚问题的行为，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妇女杂志》第一次出专号就讨论离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勇气。有读者向编辑提示，这或许会激起保守派的反对，但《妇女杂志》编辑们明确表示自己的目的在于引起社会对于妇女问题的注意，设置关于妇女问题的新议题，对于正反方面的意见一律刊登，"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抱什么成见；所以对于各家的惠稿，无论是主张自由离婚或是反对自由离婚的，无不一律登载。"[②]

《妇女杂志》"离婚问题号"里的文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同时汇集了一大批名家之作。它的"总论"栏里发表了周建人、沈雁冰等知名学者讨论离婚问题的文章；"离婚问题的两大学说"栏发表了吴觉农的《爱伦凯的自由离婚论》，瑟庐的《福斯德博士的离婚反对论》；"结婚与离婚"栏发表了庸棠的《结婚与离婚》，卢文光的《自由结婚与自由离婚》；"离婚与戏剧"栏发表了周建人的《现代戏剧上的离婚问题》，幼彤的《离婚问题的悲剧》；"离婚的法制和习惯"栏发表了乔峰（周建人的笔名）的《中国的离婚法》，周建人的《中国离婚法上的三绝》，瑟庐的《从七出上看中国妇女的地位》，陈问涛的《农民社会的离婚和再嫁》，紫瑚、高山的《欧洲各国的离婚法》，无兢的《瑙威的离婚法》以及没有署名的《劳农俄国的新离婚法》等；此外还有"欧美离婚问题的现状"栏、"关于离婚的事实及批评"栏、"关于自由离婚的主张和反对"栏、关于离婚的"名作"栏、世界各

---

① 区储：《中国女性与新闻事业》第38页，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35年，人大新闻系资料室藏。

② 《编辑余录》，《妇女杂志》8卷4期。

国离婚统计表和杂评栏等。

8卷6期的“产儿限制号”介绍了主张产儿限制的珊格尔夫人。珊格尔夫人1883年生于美国纽约，曾从事看护事业十五年。她目睹许多贫苦家庭为多子所累、妇女因堕胎而死的惨状，因而提出“产儿限制”（Birth Control）口号，并出版名为《叛逆妇人》（The Woman Rebel）的小册子以宣传产儿限制。这本以新产儿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小册子曾被联邦政府指控为猥亵印刷物并课珊格尔夫人以刑事罪。1922年7月，国际产儿限制大会在伦敦召开，珊格尔夫人在赴会途中，经日本于4月到中国，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产儿限制的什么与怎样”的演讲，宣传节制生育思想，由胡适任翻译。珊格尔夫人的演讲引起了一般中国老百姓对这个论题的兴趣。1922年4月27日，珊格尔夫人到上海，《妇女杂志》社记者采访了珊格尔夫人。

《妇女杂志》专号的出版有利于集中讨论某一问题，但因为人力资源有限、筹稿时间长，不可能在每一期上都以专号的形式集中讨论某一问题，令读者久久等待，于是《妇女杂志》在普通号中专辟讨论某一问题的栏目，使读者得到系统的专题讨论。这种做法从8卷9期开始。该期的专题是“家庭中的性教育”，发表了周建人的《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味辛的《珊格尔夫人的“我子之性教育”》，文宙的《瓦尔氏儿童性教育之三时期》，弥弼的《性教育之历史及其研究者》。8卷10期开始的专题研究是“独身问题研究”，发表了瑟庐的《文明与独身》，周建人的《中国女子的觉醒与独身》等；8卷11号的专题是“女子参政问题”和“女子劳动问题”；8卷12号的专题是“贞操问题的讨论”。

《妇女杂志》专号的出版大受读者欢迎，这令编辑颇为意外。“本志今年出版了两次专号，大受读者欢迎。离婚问题号再版出书，不到半月，即行售罄。产儿限制号，现在亦已再版，并承多数读者纷纷投函，嘱本志多出此类专号，对于一种问题为系统的研究。同人受此意外的奖誉，真是惭感交并。”[①] 邓颖超曾是《妇女杂志》专号的读者之

① 《编辑余录》，《妇女杂志》8卷8期。

一，她认为，“《妇女杂志》是中国研究妇女问题最好的刊物。在今年内出了几期特号，都是很有价值的，尤以最近所出的‘配偶选择号’为最有价值”，并打算在她和刘清扬、李峙山主持的《女星》上举行类似的征文。[1]

此外，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十分注意国内外时事。“我国的妇女问题，方在黎明时期，实际方面的讨论，固然不可少，而先进各国学说的介绍和世界妇女状况的记述，实在也很重要。”[2] 除了上面的“产儿限制号”介绍主张节育的珊格尔夫人外，《妇女杂志》还发表了一系列报道俄国大革命和妇女问题的文章，如7卷1期的《俄罗斯革命与妇女地位》，7卷3期的《俄罗斯的母亲与儿童》等，其中《俄罗斯革命与妇女地位》一文，从七个方面介绍了俄罗斯妇女地位的变化：以事实批驳那些污蔑俄罗斯的“妇女国有的谣言”、介绍“劳农政府的亲族法典”、“宗教婚主义的打破”、“自由结婚”、“婚姻障碍的撤去”、“离婚的自由”、“夫妇的平等”等七个方面。当时国内有不少因为婚姻不自由或恋爱失败而自杀的悲剧，不少报刊都曾刊载过类似的事件。如湖南《女界钟》特刊第一号有三篇文章报道女青年赵五贞抗婚自杀的事，《新青年》7卷2期刊登了陈独秀的《自杀论》，解剖现代青年自杀的原因。针对这一现象，《妇女杂志》8卷2期设立了“自杀的批评及研究”专题进行探讨。

（三）《妇女杂志》传播方法的变革

《妇女杂志》从痛斥妇女旧道德到建设妇女新道德，从指出妇女之不足到引导妇女新精神，从破到立，传播方法经历了改变。当时痛斥旧道德的文章太多了，受了刺激之后，觉醒妇女的出路何在？当时的刊物并没有给出答案，《妇女杂志》则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6卷1期的《妇女杂志》已经提到这个问题。茅盾以笔名在上面发表文章，提出“妇女解放，……从建设一面著想，这是方今第一要著。倘然只知道做文章骂旧礼法旧制

---

① 邓颖超：《读〈妇女杂志〉的“配偶选择号”》，《女星》第23期，1923年12月5日。

② 《编辑余录》，《妇女杂志》7卷1期。

度，看看原是动人，使人一快，不过究竟有什么用呀。”[①]

《妇女杂志》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的建议，主要表现在提倡具有观念革新、经济自立、身体强健、关心社会等新精神的新妇女上。觉悟的中国女子应该以经济独立养成完全的人格而不受男子的支配，所以需要工作；应该有革新的思想，所以要接受教育；应该有磊落的态度，所以要抛弃旧的传统观念；应该服务于社会，所以要从单纯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从家庭的人变为社会的人；必须有健全的体质作为从事社会工作的基础。[②]

这些建议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正确解决中国妇女问题的方法，但是为处于求索中的中国妇女提供了精神动力，为正在讨论中的妇女问题指出了发展方向，为当时探讨妇女出路的妇女刊物提供了借鉴。它所提出的主张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积极意义。

三、《妇女杂志》的读者与影响

革新前的《妇女杂志》作为一种辅助家政的读物，读者有女性也有男性。女性读者主要是女学生和女教员。它曾刊载女学校长周国真《女学生自修用书之研究》一文，该文着重推荐《妇女杂志》为学生的主要读物，“近日上海出版女报，有四五种之多，或专重文艺，或注意美术，惟《妇女杂志》趋重实用，为最合女子之心理。高等小学以上学生，倘能手此一编，日事研究，则得益殊非浅鲜也。”[③] 学校订阅的妇女报刊也以《妇女杂志》为主，这从《妇女杂志》的读者来信、来稿中可以看出。《妇女杂志》有女教员读者，1 卷 4 期的图画有“李宜时女士才镜时女士寒假旅行出发图”一桢，旁注“吉林滨江县立高初小学校各班缝纫科主教员李宜时，及吉林滨江县立高初小学校附设保姆班主任教员才镜时”，下有两女士为《妇女杂志》的题词：

---

① 佩韦：《妇女解放问题的建设方面》，《妇女杂志》6 卷 1 期。

② 参见云舫《改造时代的妇女应具有什么资格》，《妇女杂志》6 卷 6 期；彭季能：《今日中国女子应觉悟的一点——自己的责任》，《妇女杂志》6 卷 6 期；徐世衡：《今后妇女应有的精神》，《妇女杂志》6 卷 8 期。

③ 《妇女杂志》1 卷 5 期。

"闺中之最恩物，女界之良导师"。3卷7期有名为"丁小石"的投稿，自言他购买《妇女杂志》并与妻子一起阅读讨论，收益匪浅，这表明该刊还有男性读者，但关心新文化运动的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是不愿读的，罗家伦和王会吾就批评过《妇女杂志》的态度保守。

革新后的《妇女杂志》在7卷1期的广告中标榜"识字妇女，女校学生，人人欢迎"。虽然其采用了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撰写的、积极讨论妇女经济独立和婚姻自由以及社交公开等文章，引起了一些守旧学校对该杂志的抵制，[①] 但实际上主要读者仍为女学生和女教员。名为"成玉"的读者给《妇女杂志》的文章中说，"现在读本志的女子，可算做教师和师范生最多，所以希望多登教育的材料，以应读者需要。"[②] 由于在女性读者中影响巨大，《妇女杂志》甚至成为长辈馈赠女性晚辈的一种礼物。[③]

革新后的《妇女杂志》与读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妇女杂志》因读者与时代的要求积极改良，受到读者如潮的好评，被誉之为"女界之明星"；另一方面，读者对《妇女杂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卷12期的《妇女杂志》集中刊登了读者对《妇女杂志》的评价，批评其内容过于散漫，缺乏一贯的精神和独一的特征，有批评其关注对象的狭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署名"梅生"的建议，他认为，"近来妇女杂志所努力的，大都为第三阶级以上的妇女设法；但妇女解放不是为一小部分的妇女打算，妇女杂志也决不是第三阶级以上妇女的专有品，因此，我希望它在最近的将来，把论调再变换一下，主张再彻底一些，务必切实地为全社会的妇女着想才好。"

改良后的《妇女杂志》刷新体例，增加材料，降低定价，大受读者欢迎，甚至有几期的《妇女杂志》再版之后仍然供不应求。《妇女杂志》发行数由原来的2000份增至1万份以上，开我国妇女杂志界的新纪元，并被人誉为"中国妇女问题出版物里，不愧坐第一把椅

---

① 水竟：《对于学校限制阅读妇女杂志的愤慨》，《妇女杂志》9卷11号。

② 《妇女杂志》7卷12期。

③ 书奴：《我的朋友》，《妇女杂志》7卷7期。

④ 《请读民国十一年的〈妇女杂志〉》，《妇女杂志》7卷12期。

子”④。《妇女杂志》的发行机构遍布全国，除了上海市四马路棋盘街中市的总发行所以外，分发行所分布在全国 42 个大中城市，5 卷 3 期的《妇女杂志》读者小影中就有“砂拉越华侨揭阳郭陈璞贞女士”，说明该刊的影响已达国外。台湾一名学者这样评价《妇女杂志》：“在研究民初到抗战前的妇女问题，许多人都以商务出版的《妇女杂志》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原因无它，《妇女杂志》的销售量在当时一直是首屈一指的，除了五四之后面临改革的风潮致使销路下跌外，没有任何妇女报刊可以像它一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1]

《妇女杂志》以《妇女时报》的成功经营为办刊动力，并在内容与风格上与之竞争。《妇女杂志》的历史表明其运作是成功的。在它存在的 17 年间，除了初创时期言论保守外，它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也是趣味无穷、令人爱不释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进行改良后的《妇女杂志》除了汇集名家各抒己见以探讨妇女问题外，它还有大量的生活服务知识，仿佛是一本日常生活的小册子，关于衣食住行、装饰、卫生、家庭急救、文学、美术、诗歌、女界新闻等各种小知识应尽应有，融可读性与思想性于一体，成为一份在当时深受都市知识女性欢迎并有影响的妇女杂志。

第四节　中共初创与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报刊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党的早期活动分子已经十分关注妇女问题。在党的妇女组织成立前，1921 年 8 月，由中共帮助改组的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成为指导妇女工作的临时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自觉地将领导妇女解放视为已任，中国妇女运动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妇女组织亦创办妇女刊物。自此，一种新型妇女报刊——政党领导的妇女报刊产生了。

---

① 见周叙琪《1910－1920 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一书的“绪论”，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1996 年 6 月版。

一、中共初创时期的妇女报刊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对妇女问题多有指示。中共“一大”初步谈到“妇运工作”，并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①]中共“二大”产生了第一个以党的名义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决议把妇女解放和劳动解放相结合，在劳动解放中实现妇女解放，并接受第三国际第三次大会决议——“各国共产党于他们的组织之旁设立特别委员会，以宣传广大的妇女群众，并令在各国创立一妇女部，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中，亦须为妇女特辟一栏。”[②] 1923年6月，党的“三大”除决定设立妇女委员会外，“还要在全国妇女运动中树立一个精神的中心，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并批评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③]

1921年12月10日，以上海女界联合会名义出版的《妇女声》在中共的直接推动下创刊，以指导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这是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在发刊词中指出：“‘妇女解放’即是‘劳动者的解放’，……我们应当抛弃过去的消极主义，鼓起坚强的意志和热烈的精神，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④] 该刊辟有评论、译述、诗歌、通讯、杂感、谈话等栏，以白话为主，并用新式标点符号。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李达亲自领导，重要文章多经他审阅修改，主要编辑有王会梧、王剑虹等，一些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陈独秀、沈雁冰、邵力子等也为该刊撰稿。《妇女声》与其他妇女刊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公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在中共的领导下，《妇女声》实际上起到了党对妇女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妇

---

① 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二）第18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30页，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③ 同上书，第68页。

④ 《妇女声》第1期，1922年12月10日。

女运动的指导作用。1922年6月《妇女声》停刊后不久，党将妇女宣传转移到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周报》（1923年8月22日创办）。在《民国日报》经理兼编辑邵力子的支持下，主编向警予在这个阵地上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妇运主张。它具有密切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和联系实际的特点，是当时唯一能够反映全国妇女运动全貌的妇女刊物。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刊、由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则是中共领导下出版的全国性妇女刊物。

除了中国共产党所在地上海，其他地区的党团组织也办有妇女刊物。如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劳动与妇女》刊物，天津觉悟社社员邓颖超、李峙山于1923年4月组织“女星社”，并创办《女星》刊物。《女星》初期是天津《新民意报》的附刊，由“女星社”出版，一年后，改为天津《妇女日报》的副刊继续出版。《女星》揭露妇女受到的种种迫害，抨击旧的社会制度，探讨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明确提出改革旧经济制度，打破旧礼教，争取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婚姻自由等口号，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此外，还有由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妇女协会会刊、1925年6月创刊于武汉的《湖北妇女》，由中共领导的长江书店出版、1927年创刊于汉口的《赤女杂志》以及共青团长沙地委办的《青年妇女》等。

除了中共领导的妇女刊物外，当时党的其他刊物对妇女问题也有报道和论述。例如，《共产党月刊》第4期报道了劳农俄国的劳动妇女生活状况，第6期报道了“万国女共产党大会”召开的情况。《政治周报》第4期报道了广东妇女解放协会反对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派会议”的分裂行为，认为这种行动“不啻为帝国主义延长压迫我们人民的时期”，第6－7期合刊刊登了何香凝的《妇女运动报告》，第13期“时事述评”栏的《打破习惯》一文则以辛亥以后小脚女子的大量存在说明旧习惯势力之强大。《中国青年》则将妇女问题包含在青年问题内，从妇女是“人”，尤其是“社会的人”的角度来谈论妇女问题。恋爱和婚姻问题是男女青年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青年》在这方面作了大量文章。如第51期的《中国青年与恋爱问题》，第53期的《中国青年与妇女问题》，第57期的《恋爱问题》，第66期的《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第74期的《结婚呢？还是抱独身主义

呢?》，第82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恋爱问题》，以及第130期的《革命青年的家庭观》等。

上述刊物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与党领导的妇女刊物对妇女问题的论述，共同指导着当时的妇女运动。

二、中共领导的第一张妇女日报——天津《妇女日报》

1924年1月1日创刊于天津的《妇女日报》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由妇女主办、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报纸。1924年9月，该报因报道北伐消息，引起直系军阀的忌恨而被查封停刊。

《妇女日报》的主要发起人、总编辑是刘清扬。刘清扬（1894－1977），回族，天津人。11岁入严范孙先生创办的平民女子小学读书，后又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刘清扬对《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进步刊物极感兴趣。五四运动爆发，时任小学教员的刘清扬冲锋在前，成为女界中代表人物。她还是全国最早的革命团体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员之一，并在天津市各界联合会作为女界代表任常务理事；作为天津代表，她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任调查科理事。1919年6月20日，天津各界联合会反对巴黎和约签字赴京请愿代表中，刘清扬被派为女界代表前往。1920年2月，经全国学联决定，派刘清扬到南洋宣传，并组织募捐。同年11月24日，她到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巴黎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①]

1923年秋，旅法的刘清扬回到天津，有感于国内缺乏专门宣传报道妇女运动的报刊，经与邓颖超、李峙山等商议，决定刘清扬任总经理，邓颖超等任编辑，创办《妇女日报》，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旅法的郭隆真、张若名。她们得知这一消息，“喜不自禁”，认为这“可为中国妇女开一条大道，唤醒沉默麻醉的朋友。”[②]《妇女日报》每日对开4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辟有“言论”、“自由论坛”、“妇女世界”、“中外要闻”、“天津新闻”、“儿童花园”、“随便谈谈”、“各地琐

① 王金堂：《刘清扬与〈妇女日报〉》，《民族团结》1986年第12期。

② 黄志浩：《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60多年前天津妇女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6年9月编辑出版。

事”、“儿童园地”等专栏。言论主要阐明妇女运动的各种问题，大多由刘清扬和邓颖超撰写。

妇女日报的宗旨是：1. 为了将全国妇女运动者的意见和妇女运动的消息汇集起来作有系统的讨论和研究，为了发布消息和讨论的便利起见而出日报。2. 为联系同志，互通消息。3. 报纸对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问题作简要的报道，引起她们的广泛兴趣。4. 要把报纸作为妇女诉苦的机关。①

创办伊始，《妇女日报》经费紧张，而时任天津《新民意报》总经理的刘清扬的哥哥刘铁庵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该报印刷发行，并免费提供编辑场所。

《妇女日报》非常重视读者的作用。它对中国妇女命运的报道就是通过联络读者、鼓励读者来信、来稿的方式进行的。创刊不久，该报编辑部发表了一个征集有关妇女问题的社会琐闻启事，随后收到不少反映国内各地妇女实际生活的来信、来稿，并在报上连续刊登。据不完全统计，文章反映的地区有北京、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哈尔滨、安徽、上海、天津、浙江、河北、四川、江西、河南等省市，几乎半个中国。5 月 13 日，报纸又发表了一个征文启事，表示“我们欲在中国作妇女运动，解决中国妇女问题，必先对于异点及其沿革一一加以研究。”由于“同人学识浅薄，对社会实际尤为隔膜，研究这些问题非得本报读者帮助。”这个呼吁又很快得到各地读者的响应，纷纷来信来稿。

此外，《妇女日报》还非常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列宁逝世后，《妇女日报》发表了邓颖超的《悼列宁》及编辑部的文章《列宁略史》。国内方面，1924 年“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的口号已经响起，但天津依然在军阀的统治之下。《妇女日报》冒着巨大风险，刊登了国民党的许多重要文献和活动消息，如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孙中山的北伐宣言、国民党妇女部告全国妇女书等，积极传播三民主义。

《妇女日报》还积极担负起南北妇女运动和妇女团体的联络工作。

---

① 黄志浩：《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60 多年前天津妇女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5 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1986 年 9 月编辑出版。

报纸创办不久，邓颖超于1924年春节到北京与北京女权运动同盟及其他妇女团体进行联络，获得妇女界的支持。同年4月15日，刘清扬又与南方各地妇女团体取得联络。她从天津到达上海后，与向警予商讨妇女解放问题。当时向警予主张以上海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中心，这样便于各地联络，同时把《妇女日报》作为全国妇女运动的喉舌也迁往上海。虽然此事最后未能实现，但从中可以看出《妇女日报》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

报纸的发行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扩大了几倍。1924年1月报纸初创时，日发行量一千份，5月中旬报纸的发行量增至二千份，到6月底，增加到三千份①。

《妇女日报》的出版在当时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共中央委员、妇女部长向警予专门为该报纸撰写了《中国妇女宣传运动的新纪元》，指出报纸的出版是“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我很希望《妇女日报》成为全国妇女思想改造的养成所。”② 1924年1月29日，廖仲恺也特地为《妇女日报》撰写了《国际妇女日的性质》。7月下旬，上海女权运动同盟宣传股主任谈社英在上海的《中华新报》上介绍《妇女日报》说，“环顾国内女子专门日刊殊不多见，应为一般女界引为憾事。李峙山、邓颖超女士为北方女权运动之健者，有感于此，不避艰困，特刊《妇女日报》于天津南市。”同年7月，上海出版的《妇女周报》称赞《妇女日报》是“中国女子第一个自办的日报，专讨论妇女问题，报告女界消息，为中国女子说话的机关。凡是女子或关心妇女问题的男子都不可不看这个报纸。”③

---

① 上述文字，参考黄志浩《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60多年前天津妇女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6年9月编辑出版。

②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第27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③ 黄志浩：《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第一声——60多年前天津妇女日报简介》，《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5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6年9月编辑出版。

三、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报刊

（一）国共合作与妇女报刊

中共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看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才能走向胜利。代表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几经挫折之后，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中国革命必须改弦易辙。他开始同共产党人联系，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援助。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在广州召开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方法作出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三大后，党的各级组织宣传、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1923 年 10 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和政治顾问。①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选出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一大”没有做出单独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而是将何香凝提出的“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发展”的提案写入《一大宣言》。②

国共合作时期的妇女组织深受苏联妇女组织形式的影响。1918 年 11 月，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决定组织各种对于妇女宣传的委员会，并在城乡设立一种特别的机关——共产党各级党部里的妇女委员会，定期召集劳动妇女的代表会议，使劳动妇女得以与共产党接近。1919 年秋，苏共将妇女委员会改组为特立的一部，党的各地方委员会乃至中央委员会，都设立妇女部。国民党“一大”后，为了开展妇女运动，也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妇女部，曾醒任第一

---

①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 37 - 42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

② 《双清文集》（下册）第 461 页，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任部长。接着，上海、北京、汉口三个特别区执行部均设立妇女部。以后国民党各级党部均设妇女部。这样，国民党内的妇女运动领导机构，就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组织系统。

中共三届一次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1月24日在上海召开，会议指出，党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进行国民运动，而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所谓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即“在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如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处，同志们一并加入。”所谓矫正其政治观念，即是“根据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① 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知，要求各地执行这一决议，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形成。按照这一决议，一批女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各地党部妇女部开展工作。国民党各级妇女部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在改组前比较松散，在组建各级妇女部时，跨党女共产党员如向警予、杨之华、张琴秋、缪伯英等起了很大作用。

1924年10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为谋求妇女运动的发展，又设立了一个妇女运动委员会，内分宣传、调查两个部，拟出版妇女刊物，与全国女界互通声气。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周报》是国共合作早期的妇女刊物，向警予在上面发表了大量反映、指导妇女运动的文章。此后出版的进步妇女刊物有1926年9月由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委员会合办的《妇女之友》（刘清扬、郭隆真领导出版，张挹兰主编），汉口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刊物《妇女之声》，湖北的《湖北妇女》旬刊，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的《新妇女》，1924年广州妇女解放协会的《光明》杂志，1927年2月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云南妇女解放协会”会刊《女声》（1927年12月被迫停刊）等。

此外，在江苏吴江、广东梅县、广西梧州等地也出版有妇女刊物。妇女刊物的出版能延伸到这些较小的城市，与国民党妇女组织的发展和国共合作有很大关系。

---

①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30－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二）《妇女之友》的宗旨与内容

这一时期妇女期刊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以增进妇女知识、提高妇女地位，反对军阀政府的封建统治为主要宣传内容。《妇女之友》，1926 年 9 月 15 日创刊于北京，1927 年 3 月下旬终刊。该刊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妇女部主办，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妇女委员会负责编辑。该妇女委员会由 11 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 6 人，国民党员 5 人。它在《本刊启事》中指出："本刊以提高妇女文化为宗旨，凡有关于妇女各种问题的论文，妇女生活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各种报告以及新旧文艺等稿相赐者，均极欢迎。"该刊的《发刊词》进一步阐述其办刊目的："欲自救，必先寻得光明的道路。"而《妇女之友》是中国广大受压迫妇女的"良友"，"她能为你们分忧；为你们造福；为你们抵抗敌人的压迫；为你们创造新的生命，""使将来全国全世界的妇女们，都由这位'良友'的介绍而一一握手。然后用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创造花一般的锦绣乾坤；把丑的恶的势力，一起抛到地球以外去；这才是妇女运动的成功，也是本刊的最终目的。……妇女的解放运动，并不绝对是妇女专有的工作，而是时代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要和我们同样遭受悲惨境遇的困苦兄弟们联合，和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①

围绕刊物的宗旨与目的，《妇女之友》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妇女之友》"内中言论，纯为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行的方法，并附文艺诗歌及各地妇女之状况调查，半月一刊。"② 其主要内容有揭露中国妇女被奴役和压迫的情况、原因以及探讨妇女解放的道路，论述妇女解放必须组织联合战线，提倡知识妇女和工农劳动妇女结合，拥护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和支持北伐，介绍苏联妇女的生活，推崇苏联，主张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争取妇女经济独立，主张妇女有遗产继承权，改革旧的婚姻和家庭制度等。

---

① 本段内容及注释参考白润生《少数民族女报人与妇女报刊的兴起》，《第三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 33－39 页，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

② 《〈妇女之友〉已出版》，《晨报》1926 年 9 月 30 日。

在当时奉系军阀严密控制下的北京，《妇女之友》犹如“一粒光辉灿烂的星火”[1]，出现在黑暗的夜幕中，很快得到了妇女界和思想界的重视与好评。其第一期刊登的文章被北平《世界日报》的“妇女周刊”转载并加编者按。《时代妇女》载文称：《妇女之友》“规模也很大，北平各书店均有出售，每期月销五千余份。一方面宣传妇女运动，一方面积极反对政府，当时北平妇女多受其感动而参加革命。”[2]

第五节　杰出的报刊宣传活动家向警予

“我的嫂嫂向警予仍是中国革命最杰出的女领导人。我认为，她的影响甚至现在也是无人匹敌的。……她是一位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这是蔡畅在接受《中国新女性》一书的作者海伦·埃德加·斯诺采访时的话。向警予不仅是中共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报刊宣传活动家。

在向警予从事新闻工作之前，缪伯英已经开始参加新闻工作，是中共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缪伯英，1899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曾经就读于平江启民女子学校，1916 年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 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探索社会改造和妇女解放问题。1920 年初，她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等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不久发起组织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同时在《晨报》、《妇女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论述妇女解放问题。1920 年 3 月，她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1 月加入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后转为正式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劳动组合部北京分部成立后，她负责妇女工作，兼任《工人周刊》编辑，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史上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二七”惨案后，缪伯英参加《北京工人流血

---

① 《发刊词》，《妇女之友》第 1 期。

② 友梅：《北平妇女刊物的史的调查》，载于《时代妇女》创刊号（1933 年 5 月）。转自《1905－1949 北京妇女报刊考》第 234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

记》等宣传工人运动小册子的秘密编辑出版工作。1929 年 10 月在上海病逝。[①] 从整体上看，缪伯英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及向警予。在缪伯英之后，最杰出的报刊宣传活动家就是向警予。

一、向警予及其办报活动

向警予，1895 年 9 月 4 日出生于湖南溆浦一个小商人家庭，1915 年毕业于私立周南女子师范学校[②]，1916 年，20 岁的向警予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男女合校的小学“溆浦小学”（即今天湖南溆浦县的“警予小学”）。1918 年秋，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起利用法国在中国招收劳工的机会，组织一部分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和大批进步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以学习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用来指导本国的革命运动。向警予闻讯，立刻离开溆浦到长沙，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秋，向警予和蔡畅以及蔡畅母亲葛健豪等 9 人一起到法国。留法期间，向警予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1921 年向警予回到上海，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二大上，她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1925 年，她在《向导》、《前锋》、《妇女周报》以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运动的文章，以促进妇女运动的发展。向警予在中共“三大”、“四大”上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期间她还主编《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报道支持妇女运动和女工的罢工斗争，盛赞邓颖超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新纪元”。大革命失败后，她负责中共湖北地下省委工作，秘密主编党刊《长江》和通俗油印小报。1928 年 3 月被汉口法租界捕房逮捕，同年 5 月 1 日就义。

二、开创妇女运动宣传的新局面——向警予在《妇女周报》的宣传

1920 年 5 月，在巴黎学习期间，向警予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

---

① 《中国新闻史上的女性拓荒者》，《新闻世界》2004 年第 3 期。

② 该学校由湖南著名知识分子、思想开放、学识渊博的留日学生朱剑凡创办。

国》2卷2期上发表《女子解放与改造商榷》一文，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妇女问题，明确地把妇女解放和社会改造联系起来。她认为，“女子解放的根本问题，是新思潮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改造的一个根本问题”，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件是改造社会，是要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走，“我们女子的改造运动，也要能够与他并驾齐驱才好。”文章还初步批评了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中心女权运动[①]。

1923年8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创刊。这是中共领导的一份重要刊物。每周三出版，四开四版，设有《论文》、《译著》、《国内妇女问题》、《国外妇女消息》、《杂感》等栏目，理论联系实际，密切配合当时政治斗争，是当时唯一能够反映全国妇女运动全貌的妇女刊物。向警予担任主编。

在任主编期间，向警予遵循该报所确定的宣传方针——“用我们所信仰的主义来批判社会上发生的事实”，为该报撰写了大量反映和指导妇女运动的文章，同时还在《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她的文章体现了她卓尔不群的宣传思想，构成了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理论基础，开创了妇女报刊宣传的新局面。

（一）凸现劳动妇女的地位与作用

兴起于戊戌维新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到1923年时已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期间经历了废缠足、兴女学和女子参政运动，这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自身的解放，但都未从根本上触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923年，劳动妇女运动已经兴起，向警予从妇女运动群众基础的多寡和组织力、战斗力的强弱出发，分析妇女运动的三个别派。她认为：女权运动及参政运动是基于少数知识妇女的运动，参政固然重要，但仅有参政是不够的；基督教妇女运动注意用娱乐动人的方法接近群众，对于知识妇女所忽视的劳动妇女特别注意，但其终极目的不是为了劳动妇女的利益，而是外国资本的机械。只有新兴的劳动妇女运动，才能与男子一起对抗外国资本家，所以是妇女运动的主

---

① 《女子解放与改造商榷》，《少年中国》2卷2期，1926年5月26日。

力军，最终能够取得胜利，“新兴妇女劳动军，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和国民革命之前卫。”①

向警予不仅是妇女解放理论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妇女解放理论的实践者。1924 年她在上海女工中间活动，范围是纱厂、缫丝厂和烟厂等处。她经常深入工厂进行宣传鼓动，为女工的利益大声呼吁，促使女工觉醒。她号召丝厂劳苦女同胞团结起来，组织丝茧女工团，集体与资本家斗争；② 她代表女工控诉官僚、资本家狼狈为奸迫害九姑娘的罪行，③ 指出要“免除厂主的虐待和剥削，只有劳工本身团结的力量”。④

向警予很善于在女工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据刘清扬回忆，向警予的“谦虚和蔼的风度，沉着中隐藏着火样的革命热情，时时都在感染着人们”，⑤ 她是“一个最好的宣传者和鼓动者，但她绝不夸夸其谈；她是用自己的行动，用她的诚恳朴素的语言去打动人心。而且也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宣传的机会。”⑥ 对此，向警予有自己的看法，“妇运工作者应时时考虑妇女的痛苦和需要，注意实际的妇女问题，方配作妇女运动。”⑦

（二）重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运动的结合

辛亥革命时期少数知识妇女的参政运动最终以宪法上规定只有男子有选举权而告失败。20 世纪 20 年代各省自治运动的兴起，又引起了少数知识妇女的参政热潮，向警予对此进行了剖析。她指出上海女权运动应该注意三件事：1. 应注意政治；2. 应注意劳动妇女问题；

---

① 向警予：《中国最近妇女运动》，《前锋》第 1 期，1923 年 7 月 1 日。
② 向警予：《告丝厂劳苦女同胞》，《妇女周报》第 6 号，1923 年 9 月 26 日。
③ 向警予：《九姑娘犯了何罪》，《妇女周报》第 6 号，1923 年 9 月 26 日。
④ 向警予：《丝厂女工团结起来》，《妇女周报》第 14 号，1923 年 11 月 21 日。
⑤ 刘清扬：《三次会见》，《烈士向警予》，中国妇女杂志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⑥ 《关于向警予同志二三事》，《烈士向警予》，中国妇女杂志出版社 1958 年 12 月版。
⑦ 向警予：《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妇女周报》第 81 期，1925 年 4 月 13 日。

3. 应注意宣传问题。[①] 她认为，女权运动的真意义，绝不是性的战争，即女权运动不仅仅是针对男子争权而置“国权”于不顾。如果不问“国权”，不参加政治解决时局，“洋人军阀两层高压之下早把全体人民变成奴隶，还有什么女权不女权？所以，真正觉悟的中国妇女，必然是一面参加政治改革运动，一面参加妇女解放运动”，[②] 由此提出了女权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问题。

她对比英、法两国妇女有名无实的男女平权和苏联妇女在反对资本主义和取消了私有财产制度后真正得到解放的事实，总结出中国的妇女只有同劳动阶级携手推翻剥削制度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她认为，女权运动在欧美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但结果仅仅是地位比以前稍有提高，离两性平等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俄罗斯妇女于欧美女权运动的程式之外，另辟一条革命的途径。劳农政府成立，她们自然达到“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是妇女运动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而产生的硕果。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脱离政治运动，不仅是“妇女的彻底解放不可能，就是18世纪欧美妇女所悬为目标的女权也决难办到。”[③] 妇女运动与政治结合则胜，反之就败；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今后中国的妇女运动，不应拘泥于18世纪“欧美女权运动的旧程式，而应调查全局，明识机先，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先驱，以开女权之路。”[④]

基于这种认识，向警予动员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基础上，各大城市纷纷建立起新兴的妇女团体，如妇女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从此，国内出现了以工农群众为骨干的妇女组织，而向警予就是这些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

---

①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妇女周报》第12号，1923年11月3日。

② 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向警予文集》第12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

③ 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卷第10期，1924年1月1日。

④ 向警予：《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妇女杂志》第1卷第10期，1924年1月1日。

者。

向警予主张在关心劳动妇女切身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结合。她首先将知识妇女分为三派：一是堪称是“活埋”女子的坟墓与“妇女解放的桎梏”的小家庭派；二是最危险但经锻炼与培养可以成为妇女解放先锋的浪漫派；三是患得患失、易于保守、容易机械的职业派。这三派的共同点是“缺乏综合的人生观和全盘的社会意识”，因为她们一向做的是“法的运动”（即上层妇女争取女权的斗争），缺乏“社会的基础”（即下层劳动妇女的支持）。向警予回忆了民国“二英”唐群英、张汉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最肯为一般女界打抱不平，激动了不少妇女群众的事实，指出社会的基础“只能建设在一般妇女的需要上，所以应当特别注意直接关于妇女本身的利益。无论个人问题如席上珍、刘廉彬之惨死，团体问题如工厂妇女之被虐待，我们都应郑重研究实力援助的办法。”①知识妇女如果不与最广大的劳动妇女结合，就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宣传是无力的，活动是孤立的；而劳动妇女固然重要，但因其缺乏知识，所以负责宣传运动及组织之责，还必须由知识阶级妇女担任。

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在 1924 年所作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报告明显吸收了向警予的观点。该报告指出，1919 年后的中国妇女运动只是女学生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最大的弊端是与劳动妇女的隔绝和漠视。只有担负宣传与组织之责的先知先觉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结合，妇女运动的发展才有希望。

向警予是中国妇女运动进入新的发展期的理论奠基人。她主张的“两个结合”的意义在于：她总接了中国历史上妇女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在强调妇女运动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之后，首次将妇女运动的动员对象扩大到最广大的低层劳动妇女。因为有了新的理论，中国妇女运动有了最坚实的基础，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有了符合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妇女运动告别了以往的幼稚，进入稳步发展的成熟期；妇女运动从思想运动走向社会运动，政治运动。

---

① 向警予：《中国妇女运动杂评》，《向警予文集》第 142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5 月版。

三、向警予主编《大江报》①

《大江报》是1927年秋由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党报，是湖北省委对外宣传的唯一出版物。最初由谢觉哉主编，后来一度中断，谢觉哉也在这年冬到上海。1927年底，《大江报》恢复出版。1928年2月7日，向警予任主编。现存2月7日到3月16日的报纸，共12期。这正是向警予任主编时出版的。

从这12期的报纸来看，主要形式有：社论、短评、要闻、重要报告、政治消息、通信讨论以及通俗歌谣。其特点是针对性强，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对现实情况反映及时迅速，对问题分析透彻，对敌人揭露深刻，对革命热情歌颂。

就这12期的内容来看，《大江报》主要内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宣传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路线，并且通过回答读者来信的方式对当时的“左”倾错误路线表示怀疑；二是以大量事实报道、说明国民党是实行白色恐怖的党，是维持地主封建式剥削的党，是新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三是大力反映各地工农运动和红军胜利的消息。由此可见，《大江报》不愧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喉舌”。而向警予就是这张报纸的主帅，是“掀起大江革命赤潮的女主笔”。②

如果说，向警予在主编《妇女周报》的时候，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是集中在妇女解放问题上，那么到了主编《大江报》时期，她的主要精力在为当时的工农运动服务。相比之下，她的视野更开阔了，站的高度更高了。她可以说是中共党报的第一个杰出的女主编。

第六节　杰出的女报业经营者汤修慧

汤修慧（1892－1986），五四时期著名的妇女报业经营者，后期《京报》社长。她原籍江苏吴县，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浙江省立女

---

① 参见何鹄志著《向警予传》第184－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② 参见何鹄志著《向警予传》第1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子师范学校。因为母亲早逝，汤修慧自幼与父亲相依为命，靠一个小照相馆度日。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任教时，因常去照相而逐渐熟悉汤修慧。汤修慧聪明过人，邵飘萍惜她文化不高，就劝说其父，由他资助送汤修慧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1912年汤修慧与邵飘萍结婚。

与邵飘萍结婚后，汤修慧开始协助邵飘萍办报。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汤修慧负责所有内勤编辑和发稿事宜。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汤修慧负责该报的出版发行等业务，成为邵飘萍事业上的得力助手。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逮捕杀害，《京报》被迫停刊。汤修慧继承夫志，于两年后恢复《京报》出版，汤修慧任社长和总经理，潘劭昂任主笔。据《浙江新闻史》记载：“京报，此报自邵振青被害后，即行停闭；至十七年六月十二日，邵妻汤修慧女士，始复刊。次月，北平记者联合会成立，汤复被选为执行委员，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因登载电通社稿，当局认为反动，即令停刊，并将社长汤修慧编辑潘叙伦监视，近又复活。”①

1928－1937年十年间，汤修慧艰苦支撑邵飘萍的遗业，耗尽心血。她以社长兼总经理名义主持后期《京报》工作，常常亲临第一线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努力精神不亚于从前。“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停刊《京报》，并抛弃全部资财，只身逃出被敌人包围的北京，辗转于后方各省，仍然关心当地的新闻事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

汤修慧为复刊《京报》不遗余力，为主持《京报》历尽心血。在她的经营下，《京报》新闻注重时效性，社评极具针对性，注重经营，《京报》的副刊逐渐恢复并扩大，很快又成为当时有影响的大报。

汤修慧在复刊宣言中述说复刊的艰辛：“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于今二十又六月矣。此二十又六月之间，修慧盖无日不椎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使京报之工作一日不中止，则飘萍先生之志愿，亘古如新，此修慧之所以不敢辞劳避

---

① 旭文编著：《邵飘萍传略》第63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8月版。

难，而又有京报第二次复活之宣言也。”[①] 复刊后的《京报》期号续前，每日出一大一小两张，共六版，地址位于北京宣外魏染胡同35号。

从总体上看，《京报》上新闻和各类信息占绝对优势。在六个版面的容量中，一、四版是广告版，二、三版为国内外要闻版，社评位于第二版，第五版一半是文教新闻，一半是广告，第六版财经新闻及金融信息和广告各一半。1928年9月3日，第六版设立“旅行一览”。至此，该版的服务类信息有广播电台当日的放送节目、银钱行市汇兑信息、轮船火车的开驶时间表、各戏院演出信息等，十分方便市民的参考阅读。

《京报》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它的时政新闻注重对时局的报道，如密切关注国民党北伐，及时报道了战势的进展，并对张学良“东北易帜”进行多日的连续报道。它报道的社会新闻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如1928年11月1日，以特大字号报道北京冬季之严寒与贫民生计无着落的事实。文教新闻刊登北京一些高校的最新动态以及北京的文化、教育活动，并及时报道财经新闻与金融信息，还有国外汇兑行市。1929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关系紧张，各派代表纷聚太原。汤修慧前往太原采访，在那里遇见了《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并委托他为《京报》打了一个月的新闻电报。回到天津后，汤修慧请徐铸成兼任《京报》驻津记者。

《京报》社评一秉邵飘萍主持时的锐气，极具眼光，大量发表密切联系现实的言论，敢于直刺当时军阀混战局面，敢于监督国民政府，指斥时弊，如犀利之针，有很强的舆论监督作用。《追击啊!》[②]一文指出北平深受奉直鲁军阀之害，其余孽也是一群狐群狗党，决不可赦，应该急行追击的方针。《灾兵》[③] 则是一篇声讨军阀混战，灾兵伤民的檄文：“刀兵水火荒旱则有灾民，欠薪裁员减政废止机关则有

---

① 天庐：《青天白日之旧都报界》，《新闻学刊》2卷5期，中国新闻学会编1928年8月出版。

② 《京报》1928年6月15日。

③ 《京报》1928年6月22日。

灾官，受万恶军阀强迫招募，欠粮缺饷，饿着肚皮打仗，大帅事败则带着姨太太与克扣之饷项向租界一溜，撇得无数健儿破衣垢面，啼饥号寒，是曰灾兵"，在揭露军阀罪行的同时，揭示灾兵的产生原因。鉴于北洋军阀的腐化统治，《京报》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就对政府提出警告：防止腐化，并列举腐化的种种表现，"比如遇事只知摆官架，只知拉拢亲戚，只知出告示，不肯实地调查，立地实行。只知立许多机关，不念财政的困难，民生的疾苦，这都是腐化。"[1]《谁负卖国的责任》[2]一文就张学良允许日本修筑满蒙铁路一事质问国民政府，指出"堂堂国府委员，居然为安福系完成其卖国计划，此非张学良一人之罪案，而国府诸公当负其责也"，将东北外交之失败的责任归之于国民政府。在当时平津各报中，《京报》社评"极具眼光与伟识，平津各报，除了《大公报》外，当居第一把交椅也。"[3]

汤修慧主持的《京报》恢复并不断增加副刊，日益丰富内容。邵飘萍主持时的《京报》副刊于 1924 年 12 月 5 日创刊，孙伏园主编，每月合定一册，邵飘萍遇害时停刊。1930 年前，汤修慧主持的《京报》先后增加的副刊有：一是 1928 年 8 月 12 日创刊的"复活"。"复活"刊登颇具讽刺意味的小杂文和富有文化意义的社会调查，连载章回小说，介绍中西民俗。其特点在于以"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言论、记载，可以叫你们已拔的意根，将涸的心井，都复活起来，得到长久生命的安慰。"[4]二是 1928 年 9 月 17 日问世的"医光半月刊"。它分析一些常见病症的预防与治疗；三是 1928 年 10 月 12 日创刊的"影光"附刊，它刊登关于电影的各类稿件；四是 1929 年 1 月 13 日出版的《京报》图画周刊。此外，还有文学副刊"荒岛"。该刊与荒岛社合作，于 1929 年 1 月 16 日出版。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京报》先后创办了 5 种副刊，极大地丰富了《京报》的内容，使《京报》发展成为

---

① 《防止腐化》，《京报》1928 年 6 月 27 日。

② 《京报》1928 年 11 月 14 日。

③ 张一苇：《华北新闻界》，《报学月刊》1 卷 2 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1929 年 4 月出版。

④ 《复活》，《京报》1928 年 8 月 12 日。

有影响的综合性大报。

汤修慧为文清丽，文笔优美。她曾经在《妇女时报》、《妇女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被传诵一时。她在《妇女杂志》2卷2期上发表的《石交亭杂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主持《京报》后，除了繁杂的日常报务外，她还经常亲临第一线从事新闻采访活动。1929年夏，冯玉祥被阎西山软禁于五台山，阎西山和蒋介石关系又发生裂痕，山西太原一时成了全国注目之地。汤修慧亲赴太原采访，恰逢《大公报》记者徐铸成在太原采访，汤修慧就委托《大公报》记者徐铸成给《京报》发新闻电报。据徐铸成回忆，他大概为《京报》打过十几次电报，写过一两段简短的通信。[①]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汤修慧对人才的重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报》的发行。《京报》有自己的发行队伍，报社自雇骑车送报夫十余人，专送本市直接订阅之报。每天早八点前(后改到早九时)，一律送到，并公布报社发行部电话，如有迟送，一律处罚。为了鼓励学界多订阅《京报》，报社对于学者一律按八折优惠。

在近现代中国，经营报纸是危险的职业，文字之祸又足以杀身。但汤修慧主持的《京报》不仅能言而且敢言，艰苦支撑达十余年，她本人为事业不怕拘禁，不怕坐牢，[②]其毅力与勇气，令人钦佩，成为我国新闻史上不多见的女性报业经营者。

第七节　郭箴一和《上海报纸改革论》[③]

在中国新闻学的女性研究者中，郭箴一算是较早而且是受过正式新闻教育的的一位女性。她于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任

---

① 徐铸成：《邵飘萍夫妇》，《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1985年10月。

② 注：1929年9月29日，《京报》因登载电通社稿，被当局认为反动，即令《京报》停刊，并将社长汤修慧监视。

③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上海市政府职员。

1931 年 12 月，她的学士毕业论文《上海报纸改革论》由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该会于 1929 年 9 月由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马思途倡议成立。它是中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全校性新闻学术研究团体。该会还创办了复旦大学印刷所，由于学会有自己的印刷厂，学生又能自己排字，因此，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了一批学生毕业论文，郭箴一的《上海报纸改革论》（民国 20 年）就是其中之一。

该书在回忆上海新闻事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上海新闻事业改革的途径。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出现报业并购现象。报业资本家史量才于 1912 年收购了上海《申报》，1927 年收购了上海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时事新报》，1929 年初，他又要收购当时惟一能与《申报》抗衡的《新闻报》。《新闻报》闻讯，举行全馆职工大会，并发动收回股权运动。从 1 月 26 日起，一些商业团体和商店、同行工会纷纷来电来函，声援《新闻报》的收回股权运动，反对报业"托拉斯"。为了回应新闻实践界反对新闻事业"托拉斯"化的呼声，新闻学术界如《最新应用新闻学》的作者陶良鹤、《中国新闻事业》的作者黄天鹏、《上海报纸改革论》一书的序言作者樊仲云，《中国报学史》作者戈公振等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批判立场。郭箴一认为，报纸可以进行"经营"，但反对营业化。"'营业'二字，如能办好，还可经济独立，办报而能经济独立，外面之津贴，可以不拿，万恶之竹杠，可以不敲，在任何方面，可以不致被人收买，岂非洁身自好之一种好办法乎?"至于为什么不能"营业化"，她指出，"盖中国人之特质，系富于保守，自私自利又为人类所不能尽免；两种心理合并之，即患得患失，贪求无厌。商人营业之基本条件，即年利，年利之分析，即上面两种心理之代表。故商人营业，总难与其谈到公共利益，因其经商心理之出发点，以自己赚钱为惟一目的，办馆而归化于营业，即于商人地位自居，即以报纸为商标，馆中之电报新闻，以及纸张印具等等，皆为店中之货物，馆中任何部分之职员，皆为店中伙计。凡在报纸上发表一言，登载一新闻，皆须听命于店老板，或掌柜之明令。苟此老板或掌柜真正有新闻学识，真可为报界之指导者，尚有可原，但全国之大老板大掌柜，除党报外，多系经济专家，在经济

专家之大老板、大掌柜支配下之小小新闻记者，久之耳濡目染，自亦专心致志用全付精神于自己饭碗问题，还能盼其冒死为群众说公道话乎……将事实之真相，用公正之态度一一记载乎？办报而不能说公道话，不能记事之真相，此宗报纸，自无人阅，其生命纵一时还能挣扎，亦不过如垂死之病人。”因此，她认为，营业化“足以制中国报纸之死命”。[①]

郭箴一将“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不利于公正言论和公共利益等问题归因于中国人保守、自私自利的人性，由于认识问题，显得没有说服力。但是，她对经营问题进行的分析，已经体现出当时女新闻学者对于报纸如何发展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有不足之处，但这种分析，对于女性而言，以前是没有的。因此，她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新闻学界的一致好评。黄天鹏说：“郭君为女同学中之铮铮者……今出其绪余，著为斯篇，凡予十余年来业报所感所怀，君皆缕述靡遗；且有较予平日持论详尽透辟者……今得郭君新著，信也必有大造于新闻界。”[②] 樊仲云说：“《上海报纸改革论》成……翻阅一过，由开端目录而至最后结论，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凡所叙述，可说已无余蕴，不容我再赘一辞。”[③] 谢六逸说：“《上海报纸改革论》，足以代表她个人对于‘洋场’上海报纸改革的意见，有许多精辟的地方。”[④]郭步陶说：“《上海报纸改革论》……篇中所论列的，颇能从事实上着想，和泛泛的新闻学说，迥不相同。其关于改革的部分，多有和我十几年来所默默企望的，不谋而合。”[⑤]

---

① 本材料参考《中国新闻学术史》第118页、第410页的内容，李秀云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② 黄天鹏：《序》，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12月。

③ 樊仲云：《序》，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12月。

④ 谢六逸：《序》，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12月。

⑤ 郭步陶：《序》，郭箴一《上海报纸改革论》，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12月。

第八节　让世界了解中国——郑毓秀的对外宣传活动

一、中国第一个女博士——郑毓秀

郑毓秀，五四时期积极主张对外宣传的杰出女性。1891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宝安西乡屋下村（现乐群村）一个富有的官宦家庭。郑毓秀是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资产阶级女革命家和女权运动鼓吹者。她曾经留学法国，是我国第一个女博士和第一个女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期间，郑毓秀曾阻止陆征祥在卖国和约上签字，并创办通讯社，积极向西方宣传中国。

郑毓秀的祖父郑姚出身穷苦，后来发迹，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累积了数量不菲的财富，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富商，曾赈黄河水灾，受慈禧太后的封赐；其父郑文治在北京户部做官，后辞官经商，在京津地区有房产200多间。

郑毓秀自少聪明过人，其母为了使她有一技之长，常教她颂读经文。在“绮云书室”(其祖父创建，占地3600多平方米。现在是深圳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① 完成启蒙教育后，郑毓秀在北京进入新式学堂。

郑毓秀天生就有反叛精神。她9岁时拒绝“缠足”；13岁时给男方写信，拒绝了祖母为自己定下的婚姻；15岁时，由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19岁参与刺杀袁世凯和清廷大臣良弼，成为反清反封建的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两个月，郑毓秀曾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②

1907年，郑毓秀随姐姐留学日本。1914年，郑毓秀赴法国巴黎

---

① 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1998］158号）《关于公布深圳市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绮云书室条。

② 彭全民：《新安女杰郑毓秀》，http://www.szzx.gov.cn/history.

索邦大学（Sorbonne，巴黎大学的前身）攻读法学专业，并取法文名苏梅（Soumay）。1917年，郑毓秀获法学硕士学位。1924年，郑毓秀获法学博士学位，法国报界多刊登该新闻，并附她的照片。1925年郑毓秀回国，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

1928年年初，郑毓秀奉令出使法国，同年，被推为“民法起草委员会”五委员之一。在其后的两年中，她参与制定《民法》草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人民享受之权利与义务的大法，在界定妇女的权利上，郑毓秀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1942年1月，郑毓秀的丈夫魏道明在宋子文的力荐下，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协助丈夫在美国打开外交局面，将自己以往购自北京的几件珍贵宫廷珠宝，致送国务院礼宾司一负责人，由此获得热情回报，为中国抗战争取大量美援做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

1943年郑毓秀出版英文回忆录：《My Revolutionary Years——The Autobiography of Madam Wei daoming》（中文译为《我的革命生涯——魏道明夫人自传》）。1949年12月，郑毓秀、魏道明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半年之后去了巴西，不久再次移居美国。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病逝于洛杉矶，终年68岁。[①]

郑毓秀是拥有“第一”最多的一位中国女性：中国第一个法学女博士、女律师，国民政府时期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与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非官方奉派法国的女性外交特使；最早的两位女性立法委员之一；兼任“法制”与“外交”委员会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位参与起草《民法》的女性。出版了两部对中国法律界卓有贡献的著作《国际联盟概况》和《中国比较宪法论》。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一生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在民国建立初期，作为起草民法的委员之一，将妇女婚姻自主权利第一次写进了法律条文之中。[②]

郑毓秀是一个较早将西方民主、法制、博爱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

---

① 《郑毓秀年谱》，《宝安日报》http：//www. baoan. gov. cn/sites/daily/file/article/，2005年1月21日。

② http：//www. news. dayoo. com 2004年3月1日，来源：广州日报。

的“盗火者”，她担任上海法政学院校长期间，将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比较宪法论》和译著《国际联盟概况》作为学生的教科书，影响了后来无数的学生和法律研习者。对民国初期的法治建设乃至今天的法治建设，都有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①]

二、郑毓秀在巴黎的宣传活动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了和会。郑毓秀因精通英语、法语而被任命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书记和万国新闻记者团中国代表，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1919年6月27日，即巴黎和约签字前一天，郑毓秀约集300多名留法学界与华工代表赴巴黎西郊，包围了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邸，逼迫他表示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②]“凡尔赛会议开议时，女士为万国新闻团中国代表；我国解决德约签字，女士实有力焉。”[③]

郑毓秀聪明好学，为人热情，性格温和，风度优雅，能言善辩，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在法国攻读法学博士学位期间，郑毓秀非常注意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次，在法国大学院成立中法协会时，她登台演说，面对数千听众，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宣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对中国人的观感耳目一新。自后，欧洲各国文人政客，都争相来向她了解中国的真相，郑毓秀也因此名闻巴黎，成为留法学生中的一位佼佼者。

巴黎和会期间，日本的宣传机关拼命造谣，甚至侮辱中国代表。缺乏辨别力的中国记者竟然把这种电报也刊登出来。因此，郑毓秀深感组织自己的通讯社以传播自己声音的重要性。1920年，她在上海发表演说，呼吁国人迅速组织通讯社，以便传达欧美各国的重要消息，并把中国的各种消息传播到欧美各国，使中日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

---

① 《郑毓秀给我们的启示》，《宝安日报》2004年7月5日。

② 甄凯：《“五四”前后饮誉巴黎的广东新女性——郑毓秀》，《深圳特区报》第五版，1989年5月3日。

③ 《女界之明星》，《妇女杂志》7卷5期。

约，均为欧美人士所洞悉。1921 年，她接受《妇女杂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自己将来要设立通讯社进行对外宣传，以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被动局面，以期对中国外交有所帮助。“概巴黎所得东方消息，大抵自伦敦来，对于吾国情形时多贬词。所以，我人宜自设通讯社，将东方消息传巴黎，将中国之真相与要求宣播于欧洲社会。此在国民外交上，有极大之助力。”①

郑毓秀不但极力主张对外宣传，还在巴黎组织“巴黎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内容包括新闻和专论。在一篇名为《国民外交运动与中国之前途》的专论中，郑毓秀认为：积极的国民外交对于中国的前途大有帮助，“消极自了足以陷国家于危亡，而众擎易举之足以战胜险情。今后更将进而对于国民外交运动之方法上商榷，必使吾同胞共同用力，不落空虚；对内对外，皆养成坚强之信用。则此后无论何种强暴、奸宄之侵凌诡谋，即无不失败”。她还抒发自己作为一名女子，对于国际运动的热心。“余虽一弱女子，然则侧身于国际运动，未常敢稍自暇逸。”②

1926 年 4 月，郑毓秀在上海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谈话中，她再次提到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就余于欧洲各国近来外交争斗上观察之，所得有一点可使吾人特别注意者，即为宣传之力量。此点向为吾国外交上最大之缺憾”，她还指出对外宣传之不足造成欧洲各国对中国的片面了解，这不利于中国的国际交往。“欧洲头脑中常以我国比其中古时代之国家，为已过去之文明国。因之，种种不平等事发生。此殆少宣传之过耳。”有例为证：1925 年“五卅事件”发生时，欧美国家一致认为这是中国人排外的表现。“欲人了解，必须宣传。国际盟会为万国外交家与政治家之荟萃场，世界人士之所注目，尤为宣传之好机会，深望国人加以注意焉”。③

郑毓秀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在巴黎通讯社之后，她更有筹划大型国际通讯社的计划。据 1929 年 2 月 2 日《申报》报道：“郑毓秀博士，

---

① 《郑毓秀女士之谈话》，《妇女杂志》6 卷 4 期。

② 转引自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 2 册）第 502－503 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③ 转引自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 2 册）第 504 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近以世界上各民族之接触机会，日益繁复。其间苟有不能互通生气之通讯机关，则往往易生误会。决意在上海设一大规模之通讯社，定名为世界通讯协社；在日内瓦及各国都会，设立分社，国内各大埠亦设通信机关，以谋与各国互通声气。现经积极筹备，已赁定霞飞路三百五十四号为社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郑毓秀在国内外大力呼吁向世界宣传中国，并身体力行之。她认为，对外宣传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宣传力度的大小是影响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认为，正确有效的宣传足以使"公理战胜强权"，扭转中国在外交上的不利地位。这表明了她对所谓主持"公理"的国际联盟的迷信。"弱国无外交"。如果不壮大自己的国力，单靠宣传是无法扭转中国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的。但是，郑毓秀看到了对外宣传中国的重要性，并积极行动。她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积极实践向外国宣传中国的中国女性。

第九节　中国驻外女记者的产生

二次革命后，报纸上政论的篇幅逐渐减少，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与国际上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唤起时人对国际形势的关注和新闻报道的需求。为了适应读者的这种需要，国内各大报逐渐重视国际新闻。但是，当时我国还没有发国际新闻稿的通讯社，国际新闻多译自外报或外国通讯社的电稿，这远远不能满足国内报纸的要求。

为了加强国际新闻的报道，当时各大报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 派出特派员到国外采访。1918 年胡政之以天津《大公报》驻外记者的身份赴欧采访巴黎和会，成为采访该会的唯一中国记者。1920 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合资向美、英、法、德、俄等欧美 5 国一次派出 7 名特派员，其中派往法国的是女记者张若名，派往俄国的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三人成为我国采访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实际情况的第一批新闻记者。2. 在留学生中发展国外通讯员、特派员。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从 1920 年 11 月起任天

津《益世报》特约通讯员，为该报采写旅欧通讯。20 世纪 20－30 年代为天津《大公报》写“欧游杂记”的陈学昭就是留法女学生。3. 驻外官员或其亲属为国内大报写国际通讯。20 世纪 20 年代曾游历美国、后任中国驻奥地利使馆秘书的王一之曾为《申报》写“旅美观察谈”，其夫人李昭实作为驻外官员的亲属为上海《时报》写国外通讯，成为 20 年代上海《时报》的驻外女记者。

一、天津《大公报》驻法特约记者——陈学昭

陈学昭，1906 年 4 月 17 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县的一个富有民主思想和读书传统的书香人家，1927－1931 年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陈学昭原名陈淑英，笔名野渠、式微、惠、玖、陈芳尘、绿藻、夏渠等。她的祖父在清末做过丝行职务，喜爱绘画藏书，擅长昆曲，绰号“陈昆腔”，远近闻名。父亲以教书为业，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反对清朝腐败统治，反对女子缠足、穿耳，主张女子应该读书。她的父亲身边四子，到了晚年才盼来小女儿陈学昭，家中称她“九弟”。

陈家藏书丰富。陈学昭从童年时代起即开始阅读了大量的古代诗词、文、赋，《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和《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文学作品，养成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为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陈学昭是个自强不息的女性。她 7 岁读私塾，9 岁进县立女子高级小学。1920 年，15 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走出家门，只身来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在此任教的刘质平、欧阳予倩等兄长辈的照顾。半年后陈学昭转到上海爱国女学文科作插班生。1923 年夏，陈学昭毕业，参与文学团体浅草社的活动。1924 年初，陈学昭到安徽省立第四女子师范教书，1925 年去绍兴县立女子师范教书，同年夏到北京，一边在北大听课，一边从事散文创作，同时还在黎明中学、适存中学教语文以弥补生计。

1923 年冬，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学习时，应上海《时报》“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以洗练、泼辣的语言，强调妇女与男子在社会上担负同样的使命，称赞“娜拉”的出走是“新女性的行为”，是“真正的妇女解放”，文章被录取为第二名，并发表在 1924 年元旦新

年增刊上，这是陈学昭第一次以“学昭”为笔名发表文章。她因敢于立论而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奖掖与扶植，并由此结识了《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在上海、北京学习期间，她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妇女杂志》、《新女性》、《语丝》及《文学周报》上发表大量散文。这些散文后来分别结成以抒情写意为特色的《寸草心》和以描绘自然景色为特色的《烟霞伴侣》两个集子。这些作品写意抒情，自然流畅，成为五四时期妇女文学一个方面的代表。

1927年6月，在拿到《寸草心》和《烟霞伴旅》的版税，有了出国经费后，陈学昭便自费赴法国留学，1934年获克莱蒙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留法期间，陈学昭先是担任《新女性》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每月为《新女性》发稿3篇。初到巴黎，陈学昭看到有些中国官费留学生成天吃喝跳舞，打麻将逛妓院，醉生梦死。气愤之下，陈学昭写一篇通讯寄给《新女性》，以严厉的口吻抨击这些官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这里所最盛行于留学生中的，是赌风与嫖风……他们都是不懂得本国的文化和本国的好处的。结果，崇拜法国到五体投地……，国内人士对于留学生的观念，总特别优视，以为他们有希望，其实他们是最没有希望的。现在我敢说，就是拿手枪放在我面前，我也不改变这句话。”文章登出，惹怒了官僚子弟。面对流言中伤，她说，“其实要不被流言中伤是很容易的，只要肯与这群狗子为伍，受他们的捧，受他们的恭维，与他们来往，但我哪里有工夫去理会这些？……这种无赖的狗，只管无目的的吠叫！”[①]

后经戈公振向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推荐，陈学昭于1927年秋至1931年5月任《大公报》驻欧兼职特派记者。张季鸾答应每月给陈学昭120元月薪，但要求她每周给《大公报》写一篇稿子，寄给“副刊”主编何心冷，稿酬另付。

从1928年6月28日发表《妇女运动近趋的一面观》开始到1928年末，陈学昭差不多每星期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一篇通讯或文学作品，如《老秋》、《拉斐德墅之游》、《东归小志》（连载4期）、《白湖之

① 上述引文转引自李杨杨著《陈学昭》，http：//61.153.231.109/cms/books2/zg/7/14.htm.

一夜》等作品，并能按月收到月薪和稿酬。

1929年初，由于家人急于让在海外留学的陈学昭回家结婚，陈学昭的哥哥吩咐《大公报》不要给妹妹寄稿费。陈学昭由此靠借债度日。1929年9月，实在拖不下去了，陈学昭只好动身回国。她于1930年1月22日乘船到达天津，直至《大公报》馆，遇到副刊主编何心冷先生，何心冷如数给付她的稿费。陈学昭拿着刚刚领到的稿费，径直来到一家法国银行，兑换了法郎支票。随后，她到了东北，办好了出国护照，又返回了法国巴黎。此后，陈学昭仍为《大公报》写稿。①

陈学昭任天津《大公报》驻法特约记者期间，经常怀揣法国外交部的记者证参加集会，进行采访，以“野渠”、“式微”为笔名进行写作，平均每周发稿一篇。据不完全统计，1928－1930年这一段时期，陈学昭在天津《大公报》上共发表38篇文章。其中，系列通讯“欧游杂记”5篇，“西行通信”15篇。

1931年5月陈学昭脱离《大公报》后，转为邹韬奋主编的上海《生活周刊》的特约撰稿人，为该刊撰写了大量旅法、旅欧通讯和散文。1938年，她以重庆《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赴延安进行采访活动，根据自己的见闻感受和采访所得，写成一组通讯散文《延安访问记》，在《国讯旬刊》发表后，即遭国民党查禁。这是她由自发写作到自觉写作的第一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9年，陈学昭先后在13种报刊上发表201篇通讯和散文。

二、《时报》旅欧通信员——李昭实

李昭实，福建闽县人，出身文学名家，曾经在圣玛利亚学校毕业，国学造诣很深，在西方留学数年，精湛外文。她与丈夫王一之的姻缘是当时的美谈，被誉为“文字姻缘，千古佳话，以翰墨为媒而订白首之约。”王一之在《申报》上发表“旅美观察谈”，李昭实读之而心仪其人，李父爱女心切，“挽友为介而宴万叶（即王一之）为雀屏之选”，二人结婚后漫游欧美非洲，参观各报馆，兼给《时报》写国

---

① 王鹏：《民国时期的旅欧女记者陈学昭》，参见 http：//www. xinwenren. com/Article-Show2. asp? ArticleID = 4642.

际通讯，“健笔各扛，志同道合。”李昭实以“小可”为笔名，为《时报》写了大量国外通信。其中有介绍西班牙女王冯执毅女士的《女王西幸记》（《时报》1928年11月14日），有介绍法国《新欧洲》杂志女经理白努兮女士的《妇人权利下之新欧洲 国际舆论界最高之权威竟归法国白努兮女士掌握》（《时报》1929年2月17日）。而“日内瓦通信”中的《关系世界安危之小数民族问题》（《时报》1929年4月17日）则记述了国际联盟第54届行政院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小数民族问题；《百国宝书记》（《时报》1929年5月30日）则介绍了国际联盟秘书厅图书馆的藏书丰富情况，盛赞它是“研究国际政治学识的宝库”。

李昭实的文章幽清秀逸，旁征博引，中西贯通，显示出较高的学问与文学修养，“尤其是文章标题，可说没有一点陈腐气。比如写驻奥使馆祝贺国庆的记事标题为‘五云庆十记’（申报）；写瑞士日内瓦见闻录的标题为‘白山夜语’（申报）；写在意大利的弥朗（即米兰）见闻的标题为‘弥朗闻风记’（申报）或意大利的‘豹变管窥录’（时报）；写在罗马尼亚首都见闻的标题为‘卜佳留游骖记’（申报）；……选录各国报纸上登载的意义深刻的漫画并且加以详细的说明的标题为‘欧风画鉴’。”[①] 著名学者施蛰存这样评价李昭实的“欧洲通讯”：“《申报》上的李昭实和王一之的欧洲通信，真是很美丽的文字，可惜以后竟无人继起了。”[②] 据复旦新闻系周胜林教授概述，和黄远生的“状事描物，重在写实”的写实通信、徐彬彬“多讲究趣味（但不搞文字游戏，仍顾全新闻本质）”的浪漫通信相比，李昭实和王一之的古典通信，“其作品命意高雅，词句典丽，为文化较高的知识分子所喜爱”，成为民国时期新闻写作的三个流派之一。[③]

李昭实不但是个女通信员，实际上称得起女新闻学家的名号。因为在她的每篇通信中，几乎无一篇不注意到游踪所至的新闻事业，而且善作系统的、综合的叙述。李昭实是个有心人。在游历亚、欧、

---

① 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二册）第508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绕室旅行记》，载于《施蛰存70年文选》，http：//www．sinology．cn．

③ 蔡华东：《新闻写作的风格与流派》，http：//www．youth．gd．cn/．

非、南北美诸洲期间，她经过亲身采访，择优选录自己所见的大小报刊150种，汇集在一起，一报附一图，另加简洁的说明，并于1925年秋在时报上刊登。这是国内较早介绍西方报刊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早期的驻外女记者由驻外使官的女家属或者当时的女留学生担任，并不是独立记者的身份。所以，这一时期为中国驻外女记者的产生期。

第十节　其他女记者

一、冰心为北京《晨报》副刊写稿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冰心开始为北京《晨报》副刊写稿，因为她的表兄刘放园先生在《晨报》当编辑。1923年，冰心游历美国，一边在惠尔斯大学读书，一边任《晨报》特约通讯员之职。1926年回国，她的通讯稿辑成《寄小读者》一书，为全国语文体第一杰作。该书“能融合东西洋文学之精神，以轻倩流丽之笔，写纯洁高旷之心情，与时下流行之语文体，判然不同。其书遂不胫而走，转瞬将由三版而四版。书中遇海外地名，意译者尤妙绝。如 Mystic Lakes 之为玄妙湖，spy pond 为侦池，Horn pond 为角池，revere Beach 为滨岸，……，均足见女士创作精神之富。以中国式眼光评论之，女士之慧质灵根，盖得诸天授也。”[①]《寄小读者》一书，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学青少年的一本手册，因为他们当时失落在新老世界之间的模糊境界里。冰心理解这类读者的感情和心理，因此他们都喜爱她。[②]

二、石评梅、陆晶清的副刊编辑活动

石评梅，字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平定县，1928年9月29日

① 《新闻界名人传略》，载于《新闻学刊》第三期，1937年8月出版，北京新书林发行。

② 海伦·福斯特·斯诺：《中国新女性》第204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7月版。

病逝于协和医院，葬于宣武门外陶然亭畔。1923年，石评梅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体育系，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文坛上一个才华闪烁的女编辑，先后在《晨报副刊》、《京报·妇女周刊》、《世界日报·蔷薇周刊》做编辑。

陆晶清，1907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5岁在云南女子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国文，与石评梅是北京女高师同学。学习期间，陆晶清曾编辑《京报·妇女周刊》，并与石评梅合编《世界日报·蔷薇周刊》。1926年，陆晶清入中国国民党，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属下任三等秘书。大革命失败后，陆晶清回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补读大学两年，同时主编河北《民国日报》副刊。1928年12月1日，河北《民国日报》迁往北平出版，同时，在《京报》上刊登广告，告知读者报纸及副刊创刊和主编陆晶清的情况，“本报副刊，业已准备就绪，现定于十二月一日出版。副刊的目的，在阐扬革命理论，激发一般民众之革命的情绪，且欲实行文艺政策，提倡时代的文艺，内容异常丰富，并聘定实际参加革命且在文坛上负盛名之文艺作家陆晶清女士主编，自必有特殊之精彩。”① 经过半年，陆晶清编辑的副刊已经得到时人好评，“副刊最好者，则为孙祥偈即荪荃女士主持之晨报，与陆晶清女士主持之河北民国日报副刊。”②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运动健将对妇女解放理论的大力鼓吹，以及女子教育的发展，妇女报刊有所发展并处于一个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不仅数量众多、形式各异，而且议题深刻，主题鲜明。更重要的是，由于一部分进步妇女报刊工作者的努力，在进步舆论的引导下，妇女报刊的讨论范围从反封建伦理道德逐渐扩大对妇女解放途径的探讨；在马克思妇女观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妇女报刊的影响下，妇女报刊的关注对象开始从“第三阶级”（资产阶级）转移到“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政党开始正式参与创办妇女报刊，妇女报刊的创办主体开始向多

---

① 《京报》，1928年11月21日，广告版。

② 谢野：《旧都报界变迁史》（续），《社会新闻》第3卷第23号。

元化方向发展；在优秀传统的影响下，妇女报刊继续鼓励广大妇女投身于反帝爱国的斗争，力求在民族解放中寻求妇女自身的解放。

转型时期女新闻工作者的代表是向警予。她在报刊宣传中提出“两个结合”的理论，强调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指出妇女运动是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妇女运动的动员对象应该扩大到最广大的底层劳动妇女。新的理论使中国的妇女运动告别了以往的幼稚，进入稳步发展的成熟期。同时，还出现了写国外通讯的驻外女记者，这类记者虽然还不是独立的驻外女记者，只是由女留学生兼任，但这毕竟代表一种趋势——女记者的来源日渐丰富。这个开端为以后独立驻外女记者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五四时期中国妇女报刊的宣传内容开始扩大，从多方面展开了对妇女解放的探讨；众多妇女专刊、专栏、专号的设立拓展了中国妇女报刊的宣传阵地，使妇女报刊的宣传从孤“军”独战走向多“军”联合；关怀对象开始从上层发展到中、下层劳动妇女。中国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开始了转型。

第四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繁荣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影响和领导下的进步妇女刊物纷纷被查封或停刊，革命的女新闻工作者惨遭杀戮。1927年，北京《妇女之友》社被奉系军阀查封，主编张挹兰与李大钊等人于4月28日一起被敌人杀害；江苏《吴江妇女》的创办人兼主编、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妇女部长张应春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在武汉，党的地下机关刊物《大江》主编向警予也于1928年5月1日被杀害。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叛变之后，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买办封建政权，妇女运动被纳入为这个政权服务的轨道。国民党妇女政策的要旨在于肃清中国共产党以女工农妇为基本力量、团结各界妇女进行反帝反封的妇女解放纲领的影响，将妇女从民族民主运动中分离，使之成为不问政治，一心经营家政的贤妻良母，彻底归顺于国民党一党专政政策。为此，国民党政府取缔了民间妇女团体，妇女组织一律属国民党各级党部领导、管理、监督，妇女团体失去了它组织妇女群众的自主权，成为国民党控制下的御用工具，妇女运动在实质上被取消。

所以，这一时期城市妇女运动处于短暂的停滞期，妇女刊物也没有大的发展。唯一经过国民党批准出版的妇女刊物就是于1929年3月创刊于南京的《妇女共鸣》。

第一节　救亡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

一、党在城市和苏区对妇女的宣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过去妇女工作的失误。由于机会主义对妇女运动的影响，每以保障国民党的联合战线而在工作上多偏重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妇女群众，党的妇女工作缺乏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基础。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妇为主体的妇女运动在农村兴起。党在城市的工作方针采用深入基层、秘密活动的方式争取群众，包括秘密恢复进步妇女团体、派可靠同志打入反动妇女团体、与左派国民党妇女团体合作，由这些团体宣传并赞助党的政策，在这些营垒中建立革命的舆论中心，秘密影响工会中的女工。[①]这一时期党的妇女运动以女工和农妇为中心，对妇女的宣传是在“职工会以及农会的秘密报纸中设立妇女栏或者副张”，而更多的是“注意印刷传单、宣言、口号等”，尽量采取通俗的宣传形式使工农妇女易于了解，因为“这些东西对于知识很少的妇女是最相宜的”。[②]

当时无论在苏区还是在白区，关于妇女生活或斗争的刊物都是微乎其微。由于缺乏专门的妇女刊物，这一时期的妇女问题主要在党刊上讨论，党刊的部分版面或栏目暂时担负起宣传妇女问题的任务，党的刊物上经常有劳动妇女的消息。1930年11月8日，中央第九十三号通告指出，“在各种刊物上，尤其是红旗，要征求讨论苏维埃大会

---

① 《最近妇女运动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4月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1928年7月10日），《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4月版。

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和讨论，尤其要设法吸收下层群众的意见书。"①同时，在一些重要的城市，指定经常的妇女通讯员，反映城市女工运动发展的情况，有计划地进行妇女通讯。

当时刊登妇女工作和妇女运动发展情况的刊物主要是《红色中华》。该刊在第26期刊登了《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第38期刊登了时任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周月林的《江西各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联席会议之总结》，第179期刊登了当时苏区中央妇女部部长李坚珍的《"三八"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妇女工作》，第221和222期分别刊登了《博古同志致瑞金红属代表大会的信》与《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给博古同志的信》，第253期发表了当时的中央妇女部干事邓六金的社论《妇女同志到生产战线上来》，第324期上发表了《中央妇女部准备召集红属联席会》。从总体上来看，《红色中华》已经担负起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决定以及妇女干部汇报妇女工作的任务。

在宣传内容和形式上，这一时期中共对女工农妇的宣传十分注意内容的通俗易懂和形式的多样化。在对农妇的宣传上，主要是配合总任务的宣传，让妇女动员丈夫参军，为红军家属做工、带小孩等，使妇女走上革命道路。在女工运动中，除了一般的宣传口号外，还提出关系女工切身利益的口号，如要求男女工资平等，产前产后休息期间工资照发，哺乳的自由等。宣传鼓动的方法，注意文字和口头宣传相结合，各种方式综合运用，如讲新闻、壁报、画报、歌谣等方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江陵妇委还有妇女问答的小册子。

这一时期，党在城市的宣传工作是秘密的，配合进步妇女团体与国民党左派妇女团体进行；在苏区，一方面通过党刊进行，另一方面，在对农村妇女的宣传中，创造了内容通俗、形式多样、简单易行的宣传方法。

---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71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4月版。

二、救亡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界妇女愤怒声讨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各界市民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馆召开反日救国大会，党政军学农工商妇女参加者达10万人，整个会场哭声震天，哀乐齐奏。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赖琏发表演说，动员全市民众走在抗日最前线。《妇女共鸣》社主编张昭汉挥泪演说，她说与其死于日本枪炮侵略之下，不如死在疆场上，动员女界同胞效法欧战时各国女子，到前线去。[①]北平妇女会于9月24日召开紧急大会，议决提倡爱国教育，组织妇女救国十人团，互相监视，不用日货。[②] 同时，也出现了大批妇女救亡团体。10月1日，由妇女救济会、妇女共鸣社、中华妇女节制会发起，集25所女校80个团体2000余人在上海市商会成立了上海妇女救国大同盟，发表通电，宣誓对日经济绝交。[③] 1931年10月17日，北平市女界抗日救国会在女一中成立，一中代表梁琼主张在国难当头之时，除去个人意见，一致作抗日运动。1931年10月25日，南京妇女救济会在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职员曹孟君等进步力量的推动下，成立了妇女救国义勇团。该团向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众运动，组织全国妇女领导机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导致中日矛盾上升，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形势的发展直接给予妇女运动以深刻的影响。女学生、女工和上层知识妇女不顾国民党的禁令，突破了单纯追求男女平等的要求，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共同目标，纷纷投入民众运动的潮流。国民党统治下陷于沉寂的城市妇女运动出现了活跃的局面。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妇女报刊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特别是1934－1935年，由于社会经济动荡，单行本新书出版不多，而杂志因为售价较廉，易于销售，因此杂志出版较为蓬勃，有“杂志年”之称。“回溯过去，大概

---

① 北平《晨报》，1931年9月24日。

② 北平《晨报》，1931年9月25日。

③ 《申报》，1931年10月2日。

1929年到30年当口，仿佛也有这么一种‘盛况’，但到‘九·一八’的前夜，硕果仅存的文艺刊物已属寥寥无几，等到沪战发生，才完全停顿下来，出版界成为真空。1932年到1933年，才陆续有所兴起。”[①]这种情况虽然针对文艺刊物，实际上对妇女刊物也同样适用。“九·一八”事变后，以上海为中心，妇女报刊也出现了发展热潮。这一时期，报纸上出现了妇女专刊如《申报》的《妇女园地》、杂志上出现了妇女专栏如《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同时也出现了富有代表性的妇女期刊——《妇女生活》。

(一)《申报》的《妇女园地》周刊

《申报·妇女园地》于1934年2月12日创刊，从风格上看，它是《妇女生活》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的进步妇女专刊，沈兹九主编，杜君慧参与编辑。该专刊的创办是史量才任《申报》经理时《申报》业务改革的一项表现。

沈兹九（1898－1989），原名沈慕兰，浙江德清人，生于小康之家。父亲是纸店学徒出身的前清秀才，沈兹九出生时，她的父亲正在杭州伟成纺织品公司做会计，家道正日趋兴旺。在沈兹九之前，她的母亲已经生过3个女孩，不幸都夭折了。因此，沈兹九被他们视为掌上明珠。父母的宠爱，使沈兹九的个性自由发展。小学刚毕业，她便自作主张到省城读师范。于是，为了便于她读书，全家搬迁到杭州。沈兹九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师范学校教书。后到日本女子高等师范艺术系攻读油画专业，回国后在杭州教书。

经历两次不幸婚姻的沈兹九，开始寻找妇女争取自由解放的道路，她开始关注和研究妇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沈兹九到上海，她请朋友向史量才转达自己在《申报》上办一个妇女周刊的意向，很快得到允诺。史量才决定将《自由谈》星期天的版面，开辟为《妇女园地》周刊，并聘沈兹九为主编。1934年2月，《妇女园地》诞生了。沈兹九在园地里宣传妇女解放、民族解放等进步思想。

《妇女园地》在内容上独领风骚，“陈腐的竭力为之铲除，外来的

---

① 《文坛展望》，载《现代》（上海），1934年第5卷第2期。

'毒物'，一概挡驾。"[1] 沈兹九连续刊登杜君慧（广东南海人，比沈兹九小4岁，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撰写并自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妇女问题的《妇女问题讲话》，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杜君慧的介绍，沈兹九结识了许多进步人士，如后来成为妇女理论权威的罗琼，就成为《妇女生活》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沈兹九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散文、短评和时事述评，受到史量才的赞扬。但沈兹九并不满足，她认为：一个刊物的问世，要有读者的正确评价，纯正的拥护才是编者的真正安慰。[2] 因此，她以"妇女进步的良师益友"为宗旨，不只是简单地反映妇女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要求，而且组织探讨怎样把妇女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妇女园地》形式活泼，有散文、特写、故事等，文笔生动，吸引了一批追求解放的进步妇女。[3]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离开杭州休养地返回上海的途中，被军统特务枪杀于浙江海宁县翁家埠。失去了贤明的主人，《妇女园地》形势急转直下，面临被取消的危险。1935年4月20日起，《妇女园地》的版面被缩小1/3，与刚创刊时的版面大小一样。这时，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埋怨沈兹九没有"生意眼"，并告诉她延长《妇女园地》寿命的方法："你的园地上，每期来一篇'美容术'，教人眉毛怎样画，口红怎样点，指甲怎样修，用什么粉最妙，用什么胭脂最漂亮，这样化妆品的广告不断地送上门来；此外，时装的图案，也得多载，这样你的园地，就可'长命百岁，富福无疆'了"，"你总得替人家投机一点，现在是'妇女回家'运动时代，你应该讲讲菜怎样烧，丈夫怎样服侍。不然，我看你还是早些知难而退。"[4] 沈兹九没有接受上述"好意"，也没有知难而退，但已经预料到《妇女园地》寿命不长。果然，1935年10月，《妇女园地》出版至第88期后被迫停刊。

---

① 《妇女生活》1卷6期。

② 《妇女生活》1卷6期。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二）第43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④ 《妇女生活》1卷6期。

在《妇女园地》停刊之前3个月即1935年7月1日，沈兹九就接受杜君慧的建议，便开始筹办《妇女生活》，以继承《妇女园地》的任务，发扬其精神。《妇女生活》创刊初期便刊文凭吊《妇女园地》，表明自己是它的继承与发展，“她是无由在唤得转来，我们妇女是失却了女子的园地。我们的处境是更加的局促，我们的压迫是更加紧迫。姊姊！妹妹！我们要怎样努力奋斗，以继承惨亡的‘妇女园地’的精神，而开拓我们的新园地。”[①]从《妇女园地》到《妇女生活》，沈兹九表现出不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二）《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

《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是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的继续。1932年《妇女杂志》被迫停刊后，商务印书馆于同年10月12日在《东方杂志》设立“妇女与家庭”栏，以专门讨论妇女问题。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学术性较强的妇女专栏。《东方杂志》于29卷4期专辟“妇女与家庭”栏目，每月一期，由金仲华主编，1939年8月1日终刊。它结合救亡与抗战的实际，刊发了一系列讨论战时妇女儿童保育问题、妇女抗战与中国妇女的出路问题等文章，婚姻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儿童教育问题也为该栏目所关注，还有介绍妇女卫生和节育等内容的文章。同时，该栏目也刊登一些和现实有关的文章，讨论现实生活中的妇女与儿童问题。另外，《东方杂志》的“妇女与家庭”栏目创立初期有一个分栏目是“世界妇女新讯”，定期报告世界范围内妇女界的新闻，每期有6至7则新闻。这个分栏目到1933年2月1日《东方杂志》30卷3期时停止。

“妇女与家庭”栏目一方面体现了《东方杂志》“杂”的特点，内容涉及婚姻问题、儿童教育问题、妇女生理卫生、妇女装饰美容、两性问题、妇女教育、妇女职业、生育节制、娼妓问题等，雅俗共赏，兼顾多阶层妇女的需要；另一方面，该栏目还有一定的思想性和指导性，如金仲华的《中国妇女往何处去》（《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刘王立明的《中国妇女运动的新阵线》（《东方杂志》第30卷第21

---

① 兹九：《悼“妇女园地”》，《妇女生活》1卷5期。

期)，孟如的《从职业回到家庭去吗》(《东方杂志》第30卷第23期)等，是20世纪30年代普通杂志上妇女专栏的一个代表。

(三)《妇女生活》抨击"妇女回家"

1935年7月创刊的《妇女生活》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1935年底，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后，《妇女生活》遂成为该会的会刊。1937年11月后，《妇女生活》迁往武汉、重庆继续出版，1941年因"皖南事变"爆发而被迫停刊。《妇女生活》初为月刊，自1936年7月第3卷第1期起改为半月刊，共编辑出版100期。沈兹九和曹孟君先后任主编。

1.《妇女生活》的创办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逐步深入，一些封建卫道士们有的主张"妇女回家"，有的在高唱恢复"三从四德"。但是，在满目疮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大多数妇女已经无法从父从夫从子，她们不得不抛弃家庭，跑到社会上挣扎。在这种内忧外患的重重压迫下，妇女的出路何在？妇女应该做个怎样的人？每一个受压迫的妇女都带着疑问，渴望着回答。

当时妇女文化界，存在两种背道而驰的倾向：一种是提倡贤良主义，讨论美容术，研究家事知识。另一种是主张妇女执行反帝反封的革命任务，并且讨论妇女如何解放，如何认识人生及社会问题。后者虽然得到多数妇女大众的同情，但常为当道者所歧视，甚至受到无情摧残，《申报》"妇女园地"就是因此而被迫停刊。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生活》应运而生，"它将做你的知友，给你许多智慧，使你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世界，认识一切丑恶。它将做你的先导，给你许多指南，使你知道怎样脱去重压，怎样做人，怎样携手走上光明大道。"①

沈兹九主编《妇女园地》时，有《申报》做后盾。但《妇女生活》没有这样强大的后盾，它先是挂靠在上海杂志公司，没有办公地点，编辑部就设在沈兹九的家中。只有"一个半"编辑，这"一个"

① 《妇女生活》发刊词，《妇女生活》1卷1期。

先是彭子冈，后是季洪。刊物先是月刊，后来改为半月刊。《妇女生活》创刊不久，上海杂志公司不愿意继续合作，杂志就由沈兹九独自经营。后来在胡愈之的帮助下，杂志转移到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出版。

尽管艰难，《妇女生活》的内容还是异常丰富，主要栏目有：短评、通俗演讲坛、论文、社会科学讲话、生理卫生讲话、科学杂谈、世界妇女生活、文艺、电影漫画、连环图画、生存线、地方与人物、书报批评与介绍、风俗、读者园地等。它在大量栏目里论述了在民族危亡中妇女必须起来争取民族解放、担负起救国的历史使命。

2.《妇女生活》的内容特色

《妇女生活》的编辑方针是不说空话，多载国内外妇女现实生活，内容具体而充实，以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让妇女明白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并介绍现代妇运知识，以扩大妇女眼界，使读者了解妇女运动的发展趋势。此外，鉴于大多数妇女常识的缺乏、认识的不足，《妇女生活》开辟各种讲座，以补充妇女姐妹们内在知识的不足，开拓正确的思路。同时，以各种文艺形式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反对“妇女回家”。

（1）开展系列讲座，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和妇女观的角度系统介绍中国的妇女问题。

这种讲座以卢兰和秦僅主讲的“女子大学”系列讲座为代表。该讲座共11讲，涉及8个问题。这8个问题分别是：

救国与救妇女（2卷2期）：指出救亡图存，无分男女。只有男女一起去做一切救国工作，才能挽得民族的生存！才能挽得妇女的解放。

妇女被压迫的主要原因（2卷3期）：主讲人秦僅在回顾了妇女被压迫的历史后，指出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没有经济权。中国妇女在传统上处于被支配、被压迫的地位。如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时，民族的生存权岌岌可危，妇女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史以前的妇女生活（2卷4期）：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妇女经济完全独立，不受男子抚养，而且女子还担任生育任务，所以受到尊重。母系氏族时代妇女经济地位并不低于男子，到了父系氏族时代，

男子的经济地位提高，打破了男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制度。私有财产的勃兴和奴隶制度的确立，对女子产生了观念和待遇的差别。

为什么在封建时代不发生妇女解放运动（2卷5期）："封建时代的妇女离开男子的庇护而能生活的社会的经济的基础还没有成立时，妇女解放的思想是不会发生的"。

资本主义下的女权运动（2卷6期）：妇女是资本主义无限地要求驯服与低廉的劳动的供给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促进了她们人权的自觉，同时也形成了她们个人主义的要求。于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参政权为目标的女权运动不期而生。但如果不把性的从属和经济的从属根本撤消，妇女解放是不可能的。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解决相一致，妇女只有投身社会，在社会实践与斗争中取得自身解放。

中国的妇女运动（3卷1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出卖民族利益，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反帝反封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环。妇女"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蹂躏，有亡国灭种的威胁，而他方面是在封建残余势力的压迫下，在复古运动、新贤妻良母主义、男女分校和妇女回家的有毒氛围里，被迫害得透不过气来。一般的妇女大众，例如女工和农妇，在民族工业衰落和农村破产的情况下，正在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必须组织起来，各地的妇女救国会，都先后成立，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

国民大会之妇女选举问题（3卷3期）：国民大会代表不是普选，而是政府指定的代表。"中国的社会是有名无实的男女平等社会，如果妇女代表名额没有规定的话，妇女的竞选的确成问题，……与其仅仅争取选举权，不如要求政府把妇女其他的权利义务具体的规定。"

青年的恋爱问题（3卷4期）：传统的封建社会，谈不上恋爱，辛亥革命以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娜拉"的觉醒，女子教育的作用，自由恋爱观的确立等等，导致恋爱问题产生。以金钱、地位相标榜的恋爱观、主张恋爱不谈结婚的恋爱观，都是病态的恋爱。杂志倡导一种"负责任的，也非金钱的，而是合理的真正的自由恋爱，真正平等的一夫一妻的婚姻。"

妇女与"九·一八"（3卷5期）：今天的妇女已经不是不问政治的

妇女了，几次救亡运动中都可见到妇女的身影。“巾帼不让须眉，努力吧！我们二万万的女同胞，不要怀疑自己的力量不够，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敌人的枪炮谁说是冲不破的！起来吧，共赴国难，要这样才能雪去我们‘九·一八’的国耻！”

世界和平大会与妇女（3卷6期）：妇女是爱好和平的，反战的。妇女在和平运动中占重要地位。中国的妇女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积极地从事救亡工作，破坏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的一切动员。

以上八讲关于妇女问题的讲座，从当时救亡图存的现实问题出发，追溯妇女问题的历史与现状，系统讲述妇女问题的来龙去脉，指出妇女问题的出路在于从国家与民族的解放中寻找，妇女可以而且必须投身抗日救亡斗争。

（2）除发表论说之外，《妇女生活》还以诗歌与漫画等多种文艺形式动员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反对“妇女回家”。

《妇女生活》创刊伊始即大力抨击“妇女回家”滥调。《妇女回家庭去吗?》[①] 一文指出，所谓“妇女回家”是希特勒抛出“妇女回家庭去”和美国限制结婚妇女参政之后中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先生们”的一个福音，这种口号“充满了滑稽的矛盾和违背总理遗教的内容。这种主张毫无理由，毫无价值。”当时吃人的礼教正在张牙舞爪，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踏遍中国各地，“如果站在民族复兴道上的同志们，再不动员去扑灭他，则不特妇女前途将趋于黑暗，即全民族的进展，亦未可乐观。……家庭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全民族的生存责任是我们的。这问题的重心，全在乎我们是不是永远挂羊头卖狗肉和我们亲爱的女同胞们是不是愿意放弃人权！重渡那终身为男性奴隶，受男性赡养的生活。”

《妇女生活》还对“妇女回家论”其他变种形式进行辩论。“新贤良主义”是其一，对此，罗琼发表《从“贤妻良母”到“贤夫良父”》，指出《妇女共鸣》所提倡的“新贤良主义”仍然是“妇女回

① 王孝英：《妇女回家去吗?》，《妇女生活》1卷1期。

家”的投降论调。“妇女与节制主义”是其二，刘王立明在《大美晚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世界上的弱肉强食是由于人口过剩引起的。对此，《妇女生活》的编辑寄洪认为，弱肉强食完全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节制主义”的实质是主张妇女屈服于现实。

善于运用诗歌与漫画是《妇女生活》的特点之一，这在反对“妇女回家”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日中更为明显。

救亡时期著名的左联女作家关露认为，救亡时期的诗人应该和一切文学和文化工作者一样要建设国防的作品。诗歌中所反映的妇女，除去暴露那些跟着侵略者一道行动的麻木而富贵的资本妇女的丑恶外，还要积极地歌颂大批身受压迫而追求解放的声势浩荡的妇女，站在国防诗歌新的战线上歌颂爱国反帝的妇女。《妇女生活》很好地利用了诗歌作为动员、鼓舞妇女参加抗战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以它刊登的著名女音乐家、时任上海百代公司歌词部主任安娥的诗歌为代表。我们不妨录两首，体味一下其诗歌的震撼力量：

第一首是《燕赵儿女》,[①]反映濒于沦亡的华北地区的儿女发出的抗日怒吼。为了使自己的家乡免落敌手，他们丝毫不怜惜自己的血肉之躯。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体味一下他们的痛苦吧！

> “家乡，你没有水磨刀？我把血给你做涛。这样你刀落在哪里，我灵魂总围你飘。家乡，你没有枪弹？把我肉切烂，把它揉成球，把它晒成炭，这样你枪打在那里，我灵魂总随你战。
>
> “你没有看见四方的火山，冲出了千年的积烟？烟火是漫热的呀，那是燕赵儿女的心肝。
>
> “你没有听见昨夜的海边，啸开了万座的危岩？响声是惊天动地的呀，那是燕赵儿女的呼喊！”

这首充满悲壮激情的诗歌充分表现出华北儿女无畏的献身精神和

---

① 《妇女生活》2卷1期。

为挽救民族危亡所发出的慷慨激昂的呼声。

第二首是《妇女节歌》,[①] 它喊出妇女在民族解放中争取自身解放、反对“妇女回家”的最强音。

> “三月初八，三月初八。世界妇女，今天打碎铁枷。联合起来，从今不做牛马。我们要争饭吃，不听你三从四德的鬼话。我们要争解放，不牺牲在那小孩和灶下。谁抢我们的土地，我们要武装起来夺回它。谁抢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团结起来向前杀。帝国主义滚出去！封建势力从根拔！冲到前线去，永远不回家。”

《妇女生活》的战斗性诗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时歌词刚刚刊出，索要歌谱的读者来信就接踵而至。于是，该刊的编辑不得不到音乐公司催促曲作者，以飨读者。[②]

漫画也是《妇女生活》用来反对“妇女回家”的艺术形式之一。这以1卷1期上的一组漫画最具代表性。该漫画的大意是这样的：漫画1，一个挺着肥大肚子的军官神情严肃地向台下的广大妇女训话：“我国的妇女应该……”，台下的广大妇女不知他要说什么，因此没有做出反抗举动；漫画2，大肚子军官有点慷慨激昂地挥起手说，“我们需要你们回家……”，由于没有说出回家干什么，妇女仍然没有反抗举动；漫画3，“回家生孩子”，憋足了气的大肚子军官的话音刚一落地，台下的妇女早已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一起冲向前去，将大肚子推翻在地。《妇女生活》的这组漫画有力地反映了《妇女生活》对“妇女回家”论的抗拒。

《妇女生活》在抗日和反对“妇女回家”上鲜明的观点吸引了一大批进步妇女为它撰稿，这大大缓解了《妇女生活》的人手不足问题。该杂志除了主编沈兹九外，编辑先后由彭子冈和季洪担任，人手不足，工作十分紧张。但是，《妇女生活》的周围有一批进步妇女和

---

① 《妇女生活》2卷2期。

② 寄洪：《女音乐家安娥偶访》，《妇女生活》4卷5期，1937年3月16日。

社会知名人士负责主办专栏、开讲座、充当撰稿人，如由卢兰、黄碧遥、柳湜、沈起予主持的“通俗演讲坛”，由金仲华、章锡琛、杜君慧、罗琼等主持的“论文”栏目，由沈志远主持的“社会科学讲话”等等，邹韬奋、郭沫若、夏衍、茅盾、吕骥等都是它经常的作者。由于众多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办刊，《妇女生活》办得十分有生气，深受妇女群众的欢迎，杂志逐步成为团结进步妇女的一个阵地，成为救亡时期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

《妇女生活》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1935 年 8 月，中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抗日救国的浪潮汹涌而起，各种妇女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沈兹九把《妇女生活》的编辑、作者和读者邀集过来，商议成立上海妇女救国组织。1935 年 12 月 21 日，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妇女生活》对此次活动进行了详尽报道，使刊物成为妇女救亡运动的阵地。

第二节　抗战时期妇女报刊的繁荣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战争。国家兴亡，匹妇亦有责，但仅有上层妇女的觉醒是不够的。为了使妇女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动员全国妇女全身心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中去，必须以切实可行的宣传来引导和教育她们，创办妇女刊物就是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

由于广泛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需要，抗战期间我国出版的妇女刊物，包括妇女期刊和报纸上的副刊，分布地域空前广泛。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农村，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以及“孤岛”上海，都出版有妇女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出版的妇女期刊有 130 种左右。

一、数量众多　分布广泛

抗战八年，妇女报刊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代表各个党派的妇女及妇女团体纷纷创办妇女刊物，出现了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创办的妇女报刊约有130余种，其中有一半是在1938年到1940年间创办的，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报刊数量的3倍；该时期的妇女刊物遍布前线、后方、城市、乡村，分布地区广，出版形式多样。以地域分布来说，当时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办有妇女刊物，有的省份还同时存在好几种刊物，如广西省有1940年2月25日创办于桂林的《广西妇女》，1941年5月11日创刊、由桂林妇女会编辑出版的《妇女岗位》；浙江省的好几个县都有妇女刊物；江西有供干部学习的《妇工通讯》，供妇女大众阅读的《农村妇女》，还有《江西妇女》和《妇声》；八年抗战期间成都出版有9种妇女刊物，计有《妇女呼声》、《四川日报·妇女园地》、《大众壁报》、《华西晚报·女型》、《新民晚报·妇女页》、《妇女工作》、《妇女正谊》、《妇运月刊》、《女铎》等。

从刊物的内容上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公开代表共产党的妇女刊物；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妇女刊物；国民党妇女负责人主编的妇女刊物以及"孤岛"上海的妇女刊物。在国统区，公开代表共产党的刊物是《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在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一些在艰苦条件下创办的妇女报刊，最大的妇女刊物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国妇女》。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妇女刊物有著名妇女实业家董竹君和《大公报》女记者蒋逸宵于1938年4月在"孤岛"上海创办的《上海妇女》，1935年创刊于上海、由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1943年创刊于重庆、由曹孟君主编的《现代妇女》等。国民党妇女运动负责人主编的妇女刊物有1938年创刊于重庆、由重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妇女新运》月刊，三民主义青年团妇女负责人主编的《妇女共鸣》等。此外，一些汉奸报纸也辟有妇女副刊，如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日寇在广州出版、由汉奸吕春荣负责的广东《民声报》副刊《东亚妇女》。

二、不同阵地 同一声音

抗战期间，抗日救亡的一致呼声使妇女报刊的宣传主题达到空前统一，无论是国统区的妇女报刊还是解放区或者是"孤岛"上海的妇女报刊，都把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作为最终目标，并在

这个过程中争取妇女的切身权益。

(一) 国统区:《妇女共鸣》的观点转变;《广西妇女》的编辑影响

1.《妇女共鸣》的创办

在大革命失败、进步妇女刊物与女新闻工作者遭受重创之时，1929年3月25日由上海妇女共鸣社主办的《妇女共鸣》创刊，后迁到南京、重庆。初为半月刊，1932年1月改为月刊，1944年12月停刊。社长陈逸云，主编谈社英、王孝英。该刊在国民党中宣部立案，被批准为妇女界唯一之刊物。

该刊的栏目有："时事述评"栏，评论当前时事与女界新闻，主要由该刊的编辑李峙山（国民党党员）、谈社英等撰稿，内容上关注上流妇女的活动、评价知名女性的活动。如"对四届女立法委员之希望"（4卷1期，1935年1月20日）、"阮玲玉之死"（4卷3期，1935年3月20日）；"论说"栏，讨论妇女问题与育儿问题。新闻栏有"一月来妇女消息"，包括国内外的女界新闻，但自5卷1期后，新闻栏目就变得不定期了。4卷5期开始，还增加"各地通讯"栏反映中外妇女生活，以及知识性的"少女生活讲座"栏。此外，《妇女共鸣》还有文艺方面的文章，如小说、电影剧、诗歌等。

该刊以"倡导妇女运动、主张男女平等"为宗旨，以较多篇幅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性的政策、法规对于妇女的压迫。曾出《贤良问题专号》，为讨论和批判"新贤妻良母主义"提供阵地。此外，还曾联合各妇女团体组织参加国民议会、救济水灾、提倡国货、废娼运动等实际工作。

初创的《妇女共鸣》在不妨碍国民党统治及其政策范围内做文章，它把妇女解放局限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范畴并将希望寄托在国民政府和先知先觉的女性身上，很为当局重视。特别是编辑李峙山，以国民党员的身份迷信党国的法律与政治，认为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妇女的权利。这在她的一篇论说有明显的体现。李峙山发表于《妇女共鸣》4卷8期的《两位女县长》中，极力赞扬钱笑予、吴闻樨女士当选县长，认为这是女子战胜旧礼教及封建势力的胜利。但两位女士并未实授县长之职，原因是男性长官们仍然有歧视女性的心理。为此，李峙山提出自己的志愿与希望："希望钱吴二君，勇敢些，多

方与此恶势力奋斗，不达到实授县治的目的不止，我辈努力妇运的同志，誓为二君后盾，二君其勉之。”此外，对当时女界一些封建落后等不值得提倡的事情，《妇女共鸣》也大加宣扬。如《妇女共鸣》4卷3期、4期上连载了该刊记者采写的《一对旧式婚姻中的模范夫妻》，报道了张伯苓先生结婚40周年纪念会，盛赞张伯苓特开盛会大捧其夫人，并预言这一事件的影响——促使多少丈夫改变对妻子的态度。《妇女共鸣》还出版“新贤良专号”，用所谓“对家庭尽职”的理由，来宣扬“新贤妻良母”的合法性，并配合以宋美龄为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所进行的指导妇女治家、教子及摈弃不良生活习气等方面的宣传。

但是，随着日本侵华的加深，《妇女共鸣》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基本不触动国民党政策的前提下，对国民党的妇女政策和对外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反映了当时中国民众的愿望。

2.《妇女共鸣》内容的转变

(1) 抗日立场逐步明朗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深入和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继续，《妇女共鸣》在内容上逐渐向抗战立场转变，表现出一定的与时俱进立场。

杂志认为，姑息迁就的对日外交，对国民政府绝无益处。“今天敷衍某方，明天敷衍某方，每敷衍一次就失去了一部分的领土或主权。这是凌迟碎割的死法，……我们拿外交的手腕来敷衍时，似乎并不是最高明的手法。”① 同时，《妇女共鸣》指出，日本夺取东北并非只针对苏联，而是决心并吞全中国，一些盲目乐观者的想法是极其危险的。

但是，国民政府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民国二十余年来中国一直陷在半殖民地的状态；然而我们却只听到统一的声音。现在中国是更处于殖民地化了；然而我们却依旧听到统一的呼声。”在这里，《妇女共鸣》显然对所谓“统一的呼声”即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

① 玫：《察东和冀东》，《妇女共鸣》5卷1期，1936年1月20日。

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它指出，一个民族欲与世界长存，必须“在国内具备统一的政权和在国际上保持独立的主权二条件”，但当二者皆不具备而又不可能兼顾的时候，“则该民族除非自甘被他民族所奴役吞并，自应首先争取民族的独立，……要知国土有限，而敌欲无穷，在民族独立主权完全丧失的时候，民族的统一，充其极亦不过是降权的统一而已。”①在国家主权丧失的情况下，国家的统一就失去了意义。《妇女共鸣》从保持国民党政权完整的角度来说明抗战的意义，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目睹了1935年以来中国局部地区发生民族危机时国民政府的妥协态度和毫无意义的“中日邦交”谈判，1936年10月20日，《妇女共鸣》发出了“以牙还牙”以挽救中国国土沦丧局面的呼声，这种强硬的抗日态度在该杂志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指出，“豺狼和羔羊谈友谊，是笑话。同样地，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要同侵略者调整所谓邦交，想从樽俎之间收回被敌人以飞机大炮抢去的土地，也是痴人说梦。敌人的最后目标在并吞整个中国，中国一日不亡，敌人的要求和条件，便一日不能罢休，……中华民族欲求一线生机，唯有与敌人相见于沙场。”②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妇女共鸣》呼吁全体妇女参加抗日战争，成为全国总动员的一分子，“我们妇女界，虽不能做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女杰贞德，但我们愿作无名英雄，共挽救民族的危亡。”③

抗战时期，《妇女共鸣》对抗日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立场逐步坚定，表现出它以大局为重的时代特色。

（2）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更进一步

初创的《妇女共鸣》迷信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到了1936年，这种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

1936年6月15日，《时事新报》报道全国妇女国民代表大会竞选

---

① 《民族统一与民族独立》，《妇女共鸣》5卷8期，1936年8月20日。
② 《以牙还牙吧，中国!》，《妇女共鸣》5卷10期，1936年10月20日。
③ 练：《我们对华北事变的态度》，《妇女共鸣》6卷7期，1937年7月20日。

会向政府提出妇女代表名额问题。《妇女共鸣》的作者之一“石音”女士认为，代表权的争取是应该的，因为国民大会应该使全体国民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会议的机会，否则，就成了男性国民大会或者半国民大会。但是，还要认清形势，不能仅局限于争取妇女代表权，“旧皮囊装不得新酒；欲求在错误中谋补救，惟有招致更大的错误。”因为，选举代表的依据本身有问题。占多数代表名额的区域选举中有候选资格的乡、镇、坊长，在当时几乎尽为男子。在职业选举中有候选资格的各法团的职员，又尽为男子。男子既占此类地盘，试问女性候选人更从哪里产生？因此，妇女在这样“表民里官”的选举中占一定的名额，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驱走几个男性官员罢了，对广大的妇女大众无所裨益，“所以我们希望力争妇女代表名额的姊妹们，把这个运动提前一步，由真正民选的争取以求得问题之彻底的正常的解决。”① “真正民选”一词表明《妇女共鸣》已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女国民代表选举的虚伪，主张女国民代表应该民选而不是官选。

同年，上海市教育局出台了一项针对女教员的政策，禁止女教员烫发涂脂。原因是近来的国际贸易以妇女所用的脂粉输入为大宗，并讽刺小学校女教员的“发如骇浪，脸若坚墙”。这种评价未免有失“细心”，因为据海关统计，脂粉费用并不占大宗，而且消费者“多半为洋人、贵夫人和供应‘先生们’需要的娼妓，而不是月薪仅足以维持其身家衣食的女教员”。② 《妇女共鸣》有力地讽刺了当局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将矛头指向那些专说胡话的人。

在亡国灭种、国土沦丧的紧急关头，妇女作为国民，应该为国尽义务，以更有力地争取自身的权利。《妇女共鸣》为妇女指出了以下几条路子：组织救护训练班，救护受伤人士；捐钱捐物，接济前方抗战；训练交通运输人才，以为充实战斗力之后盾；宣传战时防御常识，以减少民众恐慌而维持地方之秩序；组织难民收容所；救济遗孤。

总的来说，进入全面抗战后，《妇女共鸣》对时局和对妇女问题

---

① 《争求代表名额以前》，《妇女共鸣》5卷6期，1936年6月20日。
② 《禁女教员烫发涂脂》，《妇女共鸣》5卷9期。

的看法都有一定的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但它符合整个抗战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值得肯定的。

3.《广西妇女》的编辑影响

《广西妇女》是抗战时期的大型妇女刊物。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名人云集，抗日文化运动空前高涨，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意，被誉为“文化城”。文化城的始末时间是从 1938 年 10 月武汉沦陷起，至 1944 年 9 月湘桂大撤退为止，前后达 6 年之久。这期间的文化事业云蒸霞蔚，空前繁荣。仅妇女刊物就出版两份——《广西妇女》、《妇女岗位》。

《广西妇女》（月刊）是抗战时期的大型妇女刊物。1940 年 2 月 25 日创刊于桂林，由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办，由广西妇女月刊社编辑发行，社长郭德洁，主编黄存养。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桂系党政委员郭德洁、程思远、梁寒操、黄旭初等，以及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孟超、黄超、陈残云、林曦、萨空了、绿川英子（日本人）等，中共地下党员也参与了编辑。

《广西妇女》的内容，以指导、研究妇女运动，讨论妇女问题，报道妇女工作动向、妇女工作经验和各地妇女生活动态，介绍妇科知识，发表文艺作品为主要内容。其中，在文艺专栏方面，每期都占较大篇幅，以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反映妇女的战斗生活，如无垢的小说《妇女向敌人反击》（3 卷 2—4 期连载），黄超的诗《战地的女儿》（3 期），新波的木刻《以战斗纪念战斗的五月》（3 期封面）；或翻译苏联妇女在卫国战争中斗争生活的作品，如洛林翻译的《苏联农妇在祖国的战斗中》（21 期），戈宝权翻译的《两次分别》（阿芙杰娃著，3 卷 2、3 期合刊）。

《广西妇女》创刊后，由于能对抗战时期妇女运动、妇女工作以至妇女生活、学习等妇女界较关心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答复，故深受当时妇女界的欢迎，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家庭妇女受到启发鼓舞，向该刊提出问题或倾诉个人心思、遭遇，有的毅然投入战斗。

该刊在当时对推动广西妇女参加抗战起了较大影响。日本侵略者惧怕《广西妇女》的影响，其特务机关还特意伪造了一期《广西妇女》，以假乱真，企图败坏《广西妇女》的声誉。

（二）"孤岛"上海的妇女刊物

1.《上海妇女》：不屈的呐喊

"中国最近二十年来有三种妇女刊物最负时誉。一是新女性，一是妇女生活，一是本刊上海妇女。这三个刊物，都有特点。新女性讨论恋爱问题最热烈，妇女生活讨论妇女救国工作的文字最多，上海妇女一年来确能负起指导上海和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的责任，这是有口皆碑，人人承认的。"①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的刊物如雨后春笋，随着政治的高涨而蓬勃发展于一时，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种类繁多。但是，到了11月12日，中国军队整个退出上海后，上海的刊物或停刊，或迁移，所剩寥寥，至于真正能代表妇女呼声的刊物，更是没有。因此，《大公报》（上海版）女记者蒋逸霄在许广平的支持和进步实业妇女家董竹君的资助下，于1938年4月20日在上海创办《上海妇女》，16开本，彩色封面。1939年9月，由于简单的组织已经难以应付由于刊物的销路广远而导致的人事逐渐繁复，于是杂志第一次停刊以进行改组、调整。1940年6月，由于经费短缺导致终刊，共出版4卷40期。

《上海妇女》（半月刊）是抗战爆发后上海"孤岛"前期唯一进步的妇女刊物。创办人蒋逸霄是《大公报》早期女记者之一。《大公报》天津版创刊时，她负责采访本市妇女新闻，同时编辑《妇女周刊》。

蒋逸霄热爱新闻工作。"在我开始服务于《大公报》的时候，因生活突然转变，精神也为之一振。单就访问天津职业妇女生活状况一项而说，即工作了一年多没有懈息。每日在十字街头跑来跑去，不管是拂着和煦的春风，或是晒着酷热的太阳与淋着暴烈的夏雨，或者伴着萧萧的落叶以及踏着寒冷的冰雹，我总是兴致浓厚地度着日子。我自己知道我对于一切事情本无常性，但从事于这每天都是千变万化的报人生活，却是我唯一嗜好的获得。"② 她认为，解决妇女问题的前提

---

① 张兰麟：《从小的一点祝上海妇女一周年》，《上海妇女》2卷12期，1939年4月25日。

② 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2册）第513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不应是这样那样的运动，而应首先进行调查，将问题暴露出来。知道问题的病根，才可以对症下药。1936 年 4 月 1 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后，蒋逸霄随报社部分组成人员到上海，继续任记者，负责报道“职业妇女访问记”。通过报道，她了解到妇女就业的艰难和半途辍业的情况，了解到妇女问题不是单纯的、片面的，而是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部分。

《上海妇女》读者构成是这样的：大中学生占 70%，银行或机关团体的女职员占 20%，家庭妇女占 10%。由于家庭妇女是读者构成中的小部分，因此，杂志从第五期开始，取消了“家事顾问”一栏，增加了关露的长篇创作《新旧时代》及其他文艺作品。除了刊登女青年们的文艺或学术著作之外，杂志的内容还有：讨论妇女自身的问题，刊登妇女治家处世的知识，报道当时影响妇女社会的新闻，暴露生活在黑暗中的妇女们的惨痛。在内容方面，缺乏反映内地妇女尤其是战区和沦陷区妇女社会状况的文章，这是由战争期间严厉的新闻检查和通讯的不便造成的。

《上海妇女》有一定的新闻性。“半月世界动态”栏目专门报道时事新闻；“中日妇女生活”栏目报道和对比中国和日本妇女界新闻，以及反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妇女带来的痛苦；“上海妇女动态”栏目反映上海本地妇女反日运动发展状况。每期的“半月漫谈”包括三四篇小短评；“家事顾问”栏目则是介绍一些吸引家庭妇女的知识。从 2 卷 5 期起增设读者“信箱”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该杂志自始至终发表抗日言论，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介绍各界女界实况，在抗战初期对上海的妇女起到了教育和指导作用。当时有一名为周肇基的读者这样总结《上海妇女》的内容特色：“妇女的——首先我觉得《上海妇女》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妇女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女作家写的，而且说到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离开过妇女本身。前进的——在上海妇女里，没有墨索里尼所提倡的‘精神’，也没有汪精卫所高叫的‘道德’，反之，上海妇女里充满了孙中山，蒋委员长，和列宁所发扬的反法西斯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民族的——我觉得上海妇女不但充满着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道

德，同时把握着真正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①

《上海妇女》既非官办杂志，也不是机关杂志，而是靠着一批爱好文化工作的女性编辑的热情与责任支持的。刊物的经费，由编辑们分头向亲友劝募而来，经济宽余的编辑就直接出资，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多写稿子。这是一份中国妇女不计功利，用女性编辑自身的力量来维护的刊物。这些负责任的女性编辑颇能抓住读者的心。一名为姜淑寰的读者说：“我最爱她的原因，是知道这里的作者大多数都是的的确确的女性，不像有些杂志那样以四五十岁的老头子化了娇娇滴滴的什么花呀草呀的笔名还装那扭扭捏捏十七八岁小姑娘的姿态，让我们读了总不免隔膜……”②

《上海妇女》的出版在上海起到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以致当时南京汪伪政府和重庆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要收买这份杂志。③ 但是，处于“孤岛”险恶环境中的《上海妇女》的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容忍当时“孤岛”上海成为实际上的宣传抗日中心。为了根除租界内的抗日宣传活动，日本侵略者强占了国民党中宣部设在租界内的上海新闻检查所。1937 年 12 月 13 日晚，日本侵略者以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名义迫令各报将稿件小样送检，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和法租界当局也奉行限制抗日宣传的新闻政策，以维护其在华根本利益。这直接影响到《上海妇女》的生存。

处于两难处境中的《上海妇女》的编辑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上海妇女》也无法尽情展示其宣传教育妇女抗日的风采，而只能采取比较隐蔽的办法来宣传抗日，在逆境中求生存。它在“投稿要求”中明确规定“文字华而不实或涉及政治党派者恕不登载”，这是在上海“孤岛”时期险恶环境中为生存下去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我们要格外的审慎，特别的小心，不谈政治与主义，为的是要这一棵我们希望能发育成长的刚萌芽的嫩苗，少生一点抓人的棘刺，免得意外地

① 周肇基：《只好写一点印象》，《上海妇女》2 卷 12 期，1939 年 4 月 25 日出版。
② 珂珂：《纪本社周年纪念大会》，《上海妇女》3 卷 1 期，1939 年 5 月 10 日。
③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第 305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 9 月版。

遭受到摧折的厄运。”① 一个主张抗日的妇女刊物，却只能用“抗×”代替“抗日”，企图让读者一看即明白，而又使敌人抓不到把柄，这包含了编者多少匠心与无奈呵！在这种情况下，编者和读者的交流只能用“心照不宣”来进行。1940年2月，《上海妇女》第二次复刊后，更是注意言论的技巧，在“孤岛”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进行“韧”的战斗，来尽量持久地保存刊物的生命。“我们要立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做正面急剧的撕杀，要机警技巧地凭着适当巩固的掩护，细心谨慎地瞄准射击。我们决不愿因图一时的泻愤与快意，而使本刊生命遭到意外的困厄，我们希望在长久的时日之中，收取到我们所期望获得的效果。”②

1938年8月20日的《上海妇女》1卷9期的《敬告读者》一文吐露了编者的苦闷，“在这不算很短的四个多月之中，我们精神上所感受到的苦痛，我们是不愿，而且也不必详尽告诉诸位。我们只希望读者们，记着现在是‘非常时期’，对于本刊的一切，要格外予以原谅！明人不必细言，伏维心照不宣！”

《上海妇女》是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着不屈的呐喊，被公认为是“孤岛”上为妇女呐喊的一颗明星。

2. 将《女声》为我所用：关露与日本女作家左俊芝主编的《女声》

抗战时期，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还有一份特殊的中文女性月刊《女声》。该刊于1942年5月12日创办，1945年7月终刊。发行人兼总编辑为日本著名女作家佐藤俊子（笔名左俊芝），实际主持编辑业务的则是打入其内部的中共地下女党员关露。

关露（1907—1982），原名胡寿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是满清时期的举人，一直在山西当七品芝麻官。关露幼年生活充满艰辛和曲折。8岁时，父亲去世，沉重的生活负担就压在她的母亲身上。她的母亲毕业于中国第一个女子学校——旅宁中学，不但会写古文，而且还写得一手小楷，所以经常靠刺绣和给衙门代抄公文来贴补生活。关露幼时由母亲教授古文古诗。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下，关

① 《发刊词》，《上海妇女》1卷1期，1938年4月20日。

② 蒋逸霄：《二年来的上海妇女》，《上海妇女》4卷4期，1940年6月1日。

露读了不少四书五经和古诗，并爱上了文学。16岁时，母亲去世。关露随外祖母到长沙，在表舅家中的一位家庭教师吕雨湘那里读书。后因生活无着，又跟着外祖母来到南京同姨母一起居住。

困苦的生活环境训练了关露坚强的性格。她孜孜不倦地求学，到处寻师访友，并结识了南京美术专门学校教授、著名画家梁公约先生。由于梁先生的帮助，关露免费进入该校学习。1926年，关露母亲的生前好友刘道衡（1932年入党，1969年被迫害致死）全力资助关露就读上海法科大学法律系，当时沈钧儒任教务长。1928年，关露转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后转到哲学系学习。

1931年，关露参加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负责对女工的宣传工作，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集会，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秋，组织派关露到“左联”工作。在这里，关露参加了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和著名文化人穆木天、柳倩、任钧、许幸之、杨骚、艾青、周扬、周立波、林淡秋、沙汀、艾芜等多有接触。

1933年，关露接替丁玲负责创作委员会的工作，还参加了外围组织“文学研究社”的工作。这是关露创作最旺盛的时期，诗歌、散文、小说都是她创作的对象。《太平洋上的歌声》（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集了她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诗歌，上海光明书局于1940年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关露撰写的关于散文、诗歌和杂文的探讨，发表在当时的许多报刊上，如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沈兹九主编的《妇女园地》、社联的机关刊物《现象月刊》、《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以及当时的进步英文刊物《中国的呼声》等，题材大多以当时社会问题与抗日斗争为主。

20世纪30年代，关露在上海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在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她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一次，关露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怕是来不及了，逃走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有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

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毁文件。

1937 年 11 月，上海战局突变，蒋介石下令放弃上海，除了坚守四行仓库的孤军拒绝撤退外，中国军队全部撤走。上海的中国地界被日帝占领，只剩下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市中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小块地方。根据党的关于敌占区工作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自己不能办刊物，就向敌伪的刊物或者商办的刊物投稿，楔入敌人宣传阵地，在当时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写一些有意义的文章，进行韧性的散兵战。[①] 进步文化人纷纷到后方或香港，有的则通过国民党封锁线到新四军地区或革命圣地延安。左联的成员相继秘密奔赴延安，但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命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1942 年春，关露被派到《女声》月刊做编辑。这是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妇女刊物。关露打算通过月刊社社长佐藤俊子，找到日共地下党员，收集敌人的情报。

《女声》的发行人兼总编辑是佐藤俊子。佐藤俊子，1884 年出生，在 27 - 31 岁期间，她以每年一部名篇的速度跃登日本文坛。此后，她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因信仰不和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1936 年，铃木悦突然急疾辞世，俊子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回到日本，但是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更加炽烈。当时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但是不久，多情的俊子又恋上了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小她 20 岁的窪川鹤次郎沉浸在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但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以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摆脱背叛知友的负罪感。于是，她毅然逃出日本。1938 年 12 月，佐藤俊子以日本权威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

---

① 丁言昭：《“孤岛”秘密战中的作家关露》，《新闻午报》2005 年 7 月 5 日。

者的身份到了上海。

因生活渐渐窘迫，佐藤俊子遂持友人的介绍信，于1942年初春找到了南京的草野心平，表示希望能在上海做些事儿。来自日本的诗人草野心平是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傀儡政权即伪“国民政府”的文化顾问。草野给她介绍了住在上海的摄影家名取洋之助。当时，名取洋之助在上海经营出版社和书店。俊子跟名取洋之助一起策划，打算办一份以中国女性为读者的中文女性杂志。这得到了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报道部松平忠久的支持，得到保证配给纸张的承诺和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嘱托，1942年5月15日，佐藤俊子以“左俊芝”为笔名，主编发行了第1期《女声》月刊。

当时占领上海的日本当局，表面上战功赫赫，实际上被此起彼伏的抗日游击战争搞得捉襟见肘，日本还在密谋进攻太平洋的美军以图圆它那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因此很愿意有人出面来缓和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伴随战争衍生的吹鼓手行列，已经明显遭遇到了中国人的唾弃，他们需要的是“朋友”。

应运出现的佐藤俊子就是这样一位合适的“朋友”。她准备为中国妇女创办的妇女杂志有三条办刊宗旨：1. 妇女呼声；2. 为妇女而声；3. 由妇女发声。军事当局批给《女声》杂志平价报纸，驻沪日本使馆给予相应的补贴，在上海开设多年的日资太平洋印刷公司承担印刷。《女声》具备了当时中国人很难办到的刊物问世条件，首先汪伪政权不敢批准这样一份不以颂扬为主的杂志，更要紧的是：没有平价纸，你休想印杂志。

《女声》一直贯穿着它的办刊宗旨，始终沿着家长里短为妇女而声的轨迹前进，每期都有探讨妇女问题的文章。如创刊号的《妇女职业问题的再检讨》，一卷四期的《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三卷十期的《新女性中心改进说》等。《女声》的其他栏目修养栏、卫生栏、儿童栏、家政栏、所见所闻栏等也都是围绕妇女而设。《女声》的编后记最能体现俊子的衷情。在这里，她以日本女性特有的温存，与作者、读者谈心，回答咨询，剖析妇女窘境，踏踏实实与中国女性交朋友。

为了回应军事当局和大使馆对《女声》的照顾，《女声》的“国

际新闻栏”把当时的政治动向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而不加以评说。如“东条首相访华，乃是对汪（兆铭）主席访日的礼仪性回访”等，这在众多婆婆妈妈的栏目中，是个不合旋律的浊音。①

《女声》社除了佐藤俊子外，有3个编辑即凌大荣、赵蕴华和关露。关露当即表示，自己是学文学的，不会写政论文章，只能负责编辑剧本、小说、杂谈类栏目。就这样，关露将自己扮演成一个专爱风花雪月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把握着《女声》一直沿着为妇女的轨道前进。当时她在《女声》上发表的文章，表面上都是不涉及时事的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而实际上则是以无产阶级的观点强烈地反对封建的男权思想、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强调妇女应该有独立的人格，为社会服务。另外，她还利用自己的文学优势，在刊物上大量发表影评、剧评。当时上海舞台上演的话剧，她几乎都有评价。

1942年至1945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期间，沦陷区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不能办刊物，只能向敌伪办的刊物投稿。关露利用《女声》编辑的公开身份，注意发现和采用文学青年的来稿。②

1945年4月16日，俊子因脑溢血去世，《女声》由关露接手，五六月合刊，发行了“左俊芝纪念特辑”。7月，发行了第四卷第二期（总第三十八期）后，因日本战败而停刊。

从创办直至1945年7月停刊，在那严峻的战争期间，该刊一期也没中断过。关露和俊子忙得顾不上烧饭，但读者的信任和喜爱支撑着她们在微不足道的补贴中站稳了脚跟。根据当时“日本东洋经济新闻”的调查，假如把1941年的上海物价指数定为100，1942年为206，1943年为671，1944年为707，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是7250③。《女声》坚持出刊到1945年7月，而且在整个华东、天津和北京，都有她的代销处。

---

① 上述关于关露的内容，转引自梅娘《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② 上述关于《女声》杂志的内容，参考胡秀枫著《我的姐姐关露同志》，《新文化史料》1989年第6期。

③ 转引自梅娘《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新文学史科》2001年第1期。

战局恶化，通货膨胀严重时期，俊子为印刷用纸等资料和资金而奔波，关露实际担负编辑业务。没有关露的合作，不懂汉语的俊子不可能编辑中文杂志。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关露不仅深入敌后，执行了刺探情报的危险任务，完成了党交给她的另一只眼睛的任务，而且，尽可能把《女声》办得远离政治。正如钱理群在他的《“言”与“不言”之间》里引用的东北沦陷区作家的文章，说“在‘风月’和‘政治’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作了最大的努力。[①]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关露在6月15日因潘汉年案被关押在监狱近两年之久，1957年3月27日被释放。1967年，关露第二次被投入监狱，1972年5月底被释放。1982年3月23日，关露的“汉奸”帽子被摘掉。同年12月5日，因患脑血栓已经半身瘫痪的关露孤独地离开了人世，因为“她把青春献给了革命，没来得及锁住爱情构筑家庭”。[②]

（三）中共直接领导的妇女刊物

1．《中国妇女》：报道根据地妇运状况

《中国妇女》（月刊）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最大、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妇委为指导全国妇女运动于1939年6月1日创办于陕甘宁边区，1941年3月停刊，共出22期。1941年9月28日，作为《解放日报》的半月副刊，《中国妇女》再次与读者见面，共出12期，1942年3月停刊。吴平任第一任主编，张亚苏、沙平、方紫、周俊也先后在该刊任编辑。毛泽东为创刊号题词，高度概括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中国妇女》在发刊词中宣告其创刊目的是动员和组织二万万五

---

① （日）岸阳子：为了忘却的纪念——女作家关露的传奇生涯，www. netor. com. cn.

② 梅娘：《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千万妇女大众积极为抗战建国大业尽一分绵薄的力量。为此，它及时传达中央妇委的指示，探讨妇女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总结妇女运动的经验，不断刊载来自华北各根据地和国统区、沦陷区妇女运动的通讯报道。特别是根据地著名女记者范瑾深入敌后，不时发来反映根据地妇女生活和斗争状况的最新报道。同时，丁玲等一些作家为读者描绘了根据地妇女的学习和生活，为刊物大大增色。刊物还向中国妇女介绍妇女运动史料，著名妇女领袖、妇女人物的生平传记，介绍国外妇女运动情况，尤其是苏联妇女政治、生活地位的变化和欧洲妇女反法西斯斗争的事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中国妇女》，朱德、张闻天、吴玉章等都曾为该刊撰写文章。此外，该刊还设立了专栏和信箱，积极推广妇幼保健知识，介绍边区儿童保育事业的发展。

1941 年 3 月，《中国妇女》因经济困难停刊。1941 年 9 月 16 日，《解放日报》从对开两版改为对开四版，9 月 28 日《中国妇女》专刊创刊，罗琼、季洪为该刊的编辑。该刊发表了区梦觉的文章《这样在妇女运动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吕瑛的文章《好婆姨？还是坏婆姨？》。《中国妇女》不断刊登有关根据地妇女的婚姻、生产、教育的调查报告和通讯，经常以专刊的形式集中讨论一个问题，每一期版面虽小，内容却十分丰富，言之有物。

由于《解放日报》扩版后创办了 8 大专刊，战线拉得过长，编辑力量难以支撑稿件的要求。《中国妇女》专刊虽然与中央妇委保持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编辑力量依然难以为继。不久，包括《中国妇女》在内的 3 个专刊（其他两个是《中国工人》、《青年之页》）接受读者意见停刊。

《中国妇女》月刊和半月专刊历时短暂，但它向全国人民全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报道了根据地妇女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成为国统区甚至海外人士了解根据地妇女运动情况的一扇窗口。

2. 重庆《新华日报·妇女之路》：在国统区传达党的声音

《妇女之路》（双周刊）于 1940 年 5 月 16 日作为《新华日报》的副刊出版，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主办，张晓梅、吴全衡、徐克立、石铭等 20 余人任编辑，1947 年 2 月 16 日停刊，一共出版 149 期。它的编辑方针是“应该反映出中国妇女应走的解放之路，研究和探讨妇

女运动的理论，介绍生动进展的妇女工作和经验，反映妇女大众的生活和呼声，写下妇女在抗战中英勇奋斗的事迹，回答关于妇女工作中的问题。总之，从各方面努力，使它能够成为妇女工作者的一个助手和朋友。”同时在刊首引用鲁迅的话——“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问题不在有路没有路，主要的还在自己敢走不敢走。走去了，就都是路。自己的路，应该自己去走出来”①，以鼓励妇女英勇前进。

该刊得到了中共南方局妇委委员邓颖超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党报《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比其他进步刊物更能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统区妇女运动、妇女工作的方针和指示，宣传中共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和观点。党的每个重要决定和指示发表后，《妇女之路》就以蔡畅或邓颖超的名义发表，及时宣传，或邀请刘清扬、张瑞芳、白杨等女界名流以座谈会的形式，由邓颖超主持来宣传党的政策，由《妇女之路》编辑部人员整理后发表。

针对国民党对中共军队、对解放区的虚假宣传，《妇女之路》以事实说话，尽力宣传解放区和在敌后浴血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女战士，反映解放区妇女参政、工作、生活以及参加大生产等各方面的事实。

同时，《妇女之路》遵照周恩来要求做国统区妇女的喉舌，注意刊登国统区各阶层妇女的呼声，维护国统区职业妇女的利益。抗战爆发，大批男子走上抗日前线，后方不少社会团体、机关、企业中女职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但这些女职工不能得到与男子同等的报酬，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1939 年夏，社会上出现了要妇女“回到厨房去”的反动逆流，邮政总局限制使用女职工，不招收已婚妇女为职员，交通部也规定“凡服务交通机关之女职员，一结婚即须停止职务”，②不少机关、企业群起效尤。各阶层妇女对这股逆流极为反感，她们到处奔走，寻求支援。《妇女之路》及时反映各地妇女的心声，并组织讨论，发表一系列文章，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妇女之路》指出，限制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就是从抗战阵营里撤退

① 《写在刊首》，《妇女之路》第 1 期。
② 《新华日报》1940 年 12 月 13 日。

了一个巨大力量，对抗战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对妇女解放也是个重大打击。1940年12月3日，《妇女之路》编辑室发出《编辑室启事》，鼓励广大妇女多向编辑室反映情况，写文章参加讨论。于是，广大读者纷纷投稿给《妇女之路》，揭露社会上种种歧视妇女的现象。《妇女之路》变成刊登妇女倾吐心声的园地。

《新华日报·妇女之路》成为国统区传达党的声音尤其是党关于妇女问题的理论观点、方针指示的一扇窗口，成为维护妇女切身利益、争取妇女经济权利的一方阵地。

由于全民抗战的性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除了公开为敌伪效劳的汉奸报纸的妇女副刊外，绝大多数妇女刊物始终以宣传抗日救亡、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为编辑方针。同时，妇女刊物宣传关于妇女的切身权益，维护妇女权利，争取妇女解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附录：救亡与抗战时期主要妇女报刊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女学生（月刊）	上海	1931年10月		
妇女共鸣	南京	1931年	妇女共鸣社编辑	社址位于南京市成贤街
女声（半月刊，后改双月刊）	上海	1932年10月创刊，1937年停刊	社长刘王立明，总编辑王伊蔚。	每期都有短评，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女朋友	上海	1932年11月	编辑胡考	以图画为主的妇女刊物，内容多为男女情爱以及中外影星艳史之类
女星（月刊）	上海	1932－1941	上海广学会主编	
新妇女周报	湖北	1932年停刊	汉口新妇女周报社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时代妇女	北京	1933 年 5 月	时代妇女社办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救亡运动的产物
中国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工作汇刊	北京	1933 年 11 月 10 日	中国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编辑	中国妇女救护慰劳联合会是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发起的抗日组织。本刊为会务报告。
现代妇女（月刊）	上海	1933 年 4 月	上海光华书局编	
妇人画报（半月刊）	上海	1933 年 4 月 - 1937 年 7 月	编辑邓倩文	内容有影星生活、时装、美容、编织、舞蹈、婚姻等
女子月刊	上海	1933 年 3 月创刊，1937 年 7 月停刊	主编先后为黄心勉、封禾子、高雪辉	
妇女周刊	河南	1933 年创刊	开封妇女周刊社编	
妇女月报	北京	1934 年 8 月	妇女月报社编	一份进步的妇女刊物
申报·妇女园地	上海	1934 年 2 月 8 日创刊，翌年 10 月 7 日被迫停刊	主编沈兹九。中共党员杜君慧参加编辑工作。	该刊主张抗日，猛烈抨击政府歧视妇女、提倡贤妻良母的规定、法令
现代女性（月刊）	上海	1934 年	上海今日学艺社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厦门妇女报（周刊）	福建	1934年	主笔：翁桂生	
三八特刊	南京	1935年3月	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编	
妇女周刊	北平	1935年9月		反对贤妻良母，反对妇女回家
《北平新报》“妇女”副刊/周刊	北平	1935年9月4日	张晓梅主编	妇女要从反帝民族斗争中努力争取个人和民族的解放
妇女生活	上海 武汉 重庆	1935年7月创刊	主编先后为沈兹九、曹孟君	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机关刊物
女神（图画月刊）	上海	1935年5月	主编严次平	“以趣味为中心”，图文并茂，读者大多为市民阶层和家庭妇女，销数可观
三八特刊	上海	1935年3月	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编印	
妇女月报	上海	1935年3月－1937年6月	上海妇女教育馆编	
新妇女（周刊）	天津	1935年2月	天津新妇女刊社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妇女与国货	福建	1935 年 3 月 – 1936 年 7 月	福建省妇女提倡国货委员会主编	
北平妇女（月刊）	北平	1936 年 3 月	北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	本刊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北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机关刊物
女性特写	上海	1936 年	上海中国图书杂志公司编	
伊斯兰妇女杂志	上海	1936 年	上海伊斯兰妇女杂志社	
妇女文化	上海	1936 年	上海妇女文化月刊社	
妇女园地（月刊）	天津	1936 年 11 月	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编	
妇女与儿童	杭州	1936 年停刊	妇女与儿童社编	
《江声报》副刊“前进妇女”	厦门	1936 年 11 月	共产党员洪学社、谢亿仁创办	
江西省妇女生活政进会会刊	南昌	1936 年创刊	南昌妇女生活政进会编	
华侨妇女	广东	1936 年 3 月创	广州华侨工业联合总会妇女部编	
云南妇女（月刊）	云南	1936 年创	昆明云南省妇女会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妇女知识（月刊）	北平	1937年1月-6月	北平华北大学妇女知识社编辑	私立华北大学妇女社团刊物
妇女与社会（月刊）	北平	1937年6月	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女大学生创办	主张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摆脱封建压迫，实现男女平等
女学生	上海	1937年3月	上海女学生杂志社	
妇女知识	上海	1937年	上海妇女知识社编	
主妇之友	上海	1937年4月	上海主妇之友社编	
战时妇女	上海	1937年9月-11月	上海战时妇女社编	
妇女（月刊）	江西	1937年-1941年3月	吉安江西妇声社编	
江西妇女（月刊）	江西	1939年4月-1942年12月	泰合江西省妇女指导处	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如婚姻问题专号等
战时妇女（旬刊）	湖北	1937年10月-1938年11月	汉口战时妇女社编	
妇女前哨（半月刊）	湖北	1937年11月-1938年1月	汉口上海杂志公司编	
妇女知识	广东	1937-1938年9月	广州市妇女会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妇女呼声（周刊）	四川	1937年10月	四川妇女抗敌救援会编；主编朱若华	抗战时期最活跃、最有号召力的四川妇女抗敌后援会的“喉舌”
妇女界（周刊）	四川	1937年12月	成都妇女界周刊社编	
西北妇女（半月刊）	陕西	1937年11月－1939年5月	陕西妇女慰劳会编	
妇女旬刊	甘肃	1937－1938年	兰州妇女旬刊社编	
上海妇女	上海	1938年4月－1940年6月	总编辑蒋逸霄	
妇女与家庭	上海	1938年	上海妇女与家庭社编	
妇女（半月刊）	上海	1938年	上海妇女界社编	
孤岛妇女	上海	1938年6月－1939年2月	上海孤岛妇女社编	
妇女正谊（周刊）	四川	1938年12月－1939年1月	总编辑胡楚女，主笔有范寓梅、王一苇等	国民党成都市妇女会主办；宣传组织妇女参加抗战救亡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妇女新运（月刊）	四川	1938年12月－1948年11月	重庆新生活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编	报道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概况及各地妇女生活及工作动态
妇女战线（半月刊）	浙江金华	1938年11月－1939年1月	金华妇女战线社编	
女光（月刊）	厦门	1938年创刊	福建省妇女抗敌后援队宣传队编	
妇声（月刊）	江西	1938年3月－1940年3月	南昌江西妇声社编	
新妇女	北平	1939年6月－1940年4月	新妇女社主办	亲日组织新妇女社的刊物
妇女家庭（月刊）	北平	1939年6月－1940年	王泰来主编	
《艺术与生活》"妇女栏"	北平	1939年10月		
中国妇女	上海	1939年2月－1945年10月	社长兼总编辑朱素萼、编辑濮大江	宗旨为"讨论妇女问题，促进妇女文化，启示妇女正当活动的途径"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家庭与妇女（半月刊）	上海	1939年9月	名誉编辑王培真，主编龚月雯、丁禾菲	常发表介绍编结、美容、缝纫、服装、医药等知识的文章
广东妇女	广东	1939年8月－1944年3月	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略带会刊性质
妇女世界（月刊）	广东曲江	1939年5月－1945年5月	广州协荣印书馆编	
浙江妇女（月刊）	浙江金华	1939年7月－1942年4月	浙江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编	最充实的栏目"各地通讯"真实活泼地反映各地妇运动态和各阶层妇女生活
妇运月刊	四川	1939年7月－1940年8月	国民党四川省妇女会主办	
妇女新运通讯（半月刊）	四川	1939年10月－1941年12月	重庆新生活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编	
妇女工作（月刊）	四川	1939年5月－1940年7月	主编先后为石璞、王涤新	成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会刊
中国妇女	陕西	1939年6月创	延安中国妇女社编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立煌《大别山日报》副刊《新女性》	安徽立煌	1939年5月16日	国民党“动员委员会”系统文化事业委员会办	
大地女儿	上海	1940年7月	主编王丹	宗旨是引导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直接间接地参加有利于抗战的工作
新女性（半月刊）	上海	1940年11月	上海新女性杂志社编	
妇女界（半月刊）	上海	1940年3月－1941年12月	上海五洲书报社编	
时代妇女（半月刊）	北平	1940年9月1日	新民会北京特别市妇女会主办	主办者是日伪当局为巩固其统治而创立的汉奸组织，其办刊方针为“兴国兴亚”
妇女杂志（月刊）	北平	1940年9月－1945年8月	本刊由日本驻北平派遣军报道部直接经营的武德报社出版发行	
广西妇女（月刊）	桂林	1940年2月25日	广西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办；主编黄存养，社长郭德洁	主要撰稿人有郭德洁、程思远等以及文艺界进步人士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中国女青年（月刊）	四川	1940年3月－1943年10月	主编陈庭珍	
现代妇女	河南	1940年1月	河南郑县妇女会编	
妇女月刊	南京	1941年11月－1948年6月	南京妇女月刊社编	
女青年（半月刊）	云南	1940年	昆明女青年社编	
妇女周报	上海	1941年	上海妇女周报社编	
妇婴卫生	上海	1941年11月	上海妇婴卫生编委会编辑	
妇女工作（季刊）	贵州	1941－1942年	贵州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编	
妇女月刊	重庆	1941年9月	陆翰岑、林苑文、陆晶清等任主编	除了论著、通讯、文艺外，还介绍育儿常识与家庭卫生，增进妇女知识
女声	上海	1942年5月	主编先后为日本女作家佐藤俊子、中共地下党员女作家关露	上海沦陷期间颇有影响的妇女杂志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安徽妇女	安徽	1942 年	安徽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出版	
甘肃妇女（季刊）	甘肃	1942 年 3 月创刊，1946 年 4 月停	甘肃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编辑发行	报道战时各地妇女生活工作情况，讨论战时妇女问题
现代妇女（月刊）	上海	1943 – 1947 年	欧查主编	
新光（月刊）	北京	1943 年 10 月 – 1944 年 4 月	雪芦总编	该刊为日伪统治的产物
中国妇女慰劳总会专刊（年刊）	四川	1943 – 1945 年	重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编	
妇女合作运动（双月刊）	四川	1943 年 2 月 – 1944 年 12 月	重庆各机关公务员工属生产合作推广部	
女铎（月刊）	上海	1944 年 7 月 – 1945 年 12 月	上海广学会编	
《江声日报》“妇女战线”专刊	厦门			
妇女岗位	桂林	1941 年 5 月 11 日	妇女岗位编委会编辑，桂林市妇女会发行	内容与形式和《广西妇女》差不多，但内容不如后者丰富，影响也不如后者

报刊名称/刊期	地点	创刊时间	主办或主持人	备注
云南妇女（16开活页，不定期）	昆明	1940年创刊，“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主编石亦苏（石铭）	该刊的稿源一是“云大”学生墙报上与文史系反动的“三青团”组织的论战文章；二是《云南日报》编辑、中共地下党员刘惠之的支持
女青年（月刊）	南京	1945年1月－1946年9月	南京女青年月刊社编	
妇女生活（月刊）	南京	1945年1月	妇女生活社编	
战时妇女（月刊）	陕西			报道战地妇女的消息

资料来源：王会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中国妇女运动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4月版；胡立新、杨恩溥编撰：《厦门报业》，鹭江出版社1998年12月版；《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主编：《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版；《一年来的各地妇女刊物介绍》，重庆《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第44期，1942年12月20日。

第三节　群星灿烂的女新闻工作者

抗战时期不仅是中国妇女报刊的繁荣时期，也是女新闻工作者异常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在国统区、抗日根据地还是“孤岛”上海，均有女新闻工作者忙碌的身影。

《大公报》有著名女记者彭子冈和杨刚。

《新民报》有著名女记者浦熙修与高汾。浦熙修在后面有专门介绍，此处略。高汾，1920年出生于江苏江阴，抗战前夕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中，抗战爆发后流亡到广州，1938年在广州参加郭沫若、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工作，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救亡日报》内迁到桂林出版，高汾任该报记者，撰写了大量消息、通讯。1941年初《救亡日报》被国民党查封，高汾随组织撤至香港，在茅盾领导的文艺通讯社工作。1944年高汾任重庆《新民报》记者，采写了不少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和反映人民生活困苦的报道。抗战胜利后，高汾任上海《大公报》驻南京记者。[①]

《新蜀报》有女记者张志渊。张志渊毕业于法国司塔市堡大学文学专业。回国后，她在上海江湾立达学院当过数学和法文教师，又在南昌做过妇女生活改进会总干事。抗战开始以后，她到重庆做《新蜀报》的外勤记者。

《时事新报》有女记者余梦燕、冯若斯共同负责该报的采访工作。余梦燕，湖南临湘人，南开中学毕业，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入新闻系学习。后来，她又到中央政治学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新闻学院学习，获硕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余梦燕来到《时事新报》工作，是当时重庆女记者中“所用得所学”的第一人。

《商务日报》有女记者黄冰。

《民主报》有女记者邵琼。

《中央日报》副刊有女编辑封禾子。封禾子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对戏剧很有研究，学生时代，就因为演《雷雨》和《日出》而轰动一时。她毕业后担任过上海《女子月刊》编辑。但嫌编辑不如演戏适合她的胃口，所以后来应一剧团的邀请，赴日本演《日出》，因演出卓越，在日本受到热烈欢迎。抗战爆发，封禾子由东京回到桂林，担任“国防艺术社”的戏剧指导员，后来先后到昆明、重庆，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

① 《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时事新报》有女记者熊岳兰。

《申报》有女记者谢宝珠。“她是商人的女儿，申报的待遇又好，所以她如同自己的名字般，浑身珠光宝气，不过，人倒不俗。”[①]她与陈香梅相处友善。

《文汇报》有女记者表筱梅 。

路透社重庆分社负责商业新闻的女记者赵敏淑。赵敏淑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毕业后到女青年会学生部工作。抗战爆发后，她应朋友邀请，到该社做了记者。

塔斯社的重庆分社有女记者张郁廉。张郁廉原籍山东，生长在哈尔滨。由于自幼与俄国小保姆在一起玩耍，小学和中学又请俄语女教师帮助补习，所以俄语讲得非常好。哈尔滨女中毕业后，张郁廉来到北平学英文，后考入燕京大学教育系。抗战爆发后，她投入塔斯社的工作，为该社搜集中国宣传抗战的材料，翻译成俄文，转载到苏联各大报纸，同时，她还担任口头翻译工作。有余暇，她还为《中苏文化》等刊物撰稿，是个相当忙碌的女记者。

擅长经营的女性报业经营者有《新民报》的女老板邓季惺。

《新洲日报》和《星岛日报》的重庆特约记者是华侨女记者黄薇。黄薇在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本科毕业 3 年后，由于“七七事变”爆发，黄薇被迫回国。到上海后，她又接受组织的建议，远走南洋，宣传抗战。当时在新加坡《新洲日报》当总编辑的表兄，邀她做外勤记者，因此，她就把国内抗战的实际情况传播给南洋的侨胞。由于她报道成绩突出，香港《星岛日报》也聘她做特约记者，为报纸写通讯。

重庆《新华日报》有女记者杨慧琳、吴全衡等。杨慧琳，上海正风中学毕业，毕业后从事妇女工作，组织上海妇女俱乐部，在妇女界非常活跃。抗战爆发后在汉口参加《新华日报》工作，任外勤记者，因敏捷、活泼引起大家的注意。由于身体原因，《新华日报》迁到重庆后，她就改做内勤编辑，编辑该报第四版。吴全衡，当时陪都重庆

---

① 胡辛：《艰难的选择》（11），转引自 http://book.sina.com.cn/nzt/cha/chenxiangmei/105.shtml.

女记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吴全衡从苏州女子中学毕业后，在上海生活书店服务，并在业余时间参加上海妇女救国会，还教杨树浦一带的女工认字。她到《新华日报》之初，担任内勤编辑，后改作外勤记者。

贵阳《中央日报》有女记者张明。

中央通讯社有第一女记者陈香梅。

驻外记者有《中苏文化》杂志驻苏女记者胡济邦。

解放区有著名随军女记者戈扬，任《冀中导报》社长同时兼任《中国妇女》记者的范瑾，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编辑主任的罗琼，参与创办《人民日报》的李克林，先后在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挺进报》、襄河军分区《襄河报》及《东北日报》任编辑的李野。[①]

这一时期，广播界的女新闻工作者也有很大发展。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里先后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播音员。

一、黄薇：向海外传播中国抗战的声音

1938年，20多名新闻记者组成战地记者团赴抗日前线采访，其中新加坡《星岛日报》的黄薇是记者团中唯一的女记者。黄薇，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县龙门镇赤水桥村一个世代书香人家。小学毕业后，黄薇考入厦门集美学校读师范。17岁时，黄薇毅然解除与省议会议长郑老伯次子的包办婚姻。后来，她去南洋探亲，期间走过了印尼、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1934年，在哥哥黄复康支持下，黄薇从新加坡赴日本留学，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因为对新闻专业感兴趣，她又常去新闻系听课。在日本留学期间，她还成为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学生左翼团体的领导成员之一，在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黄薇离开日本。

1938年4月，26岁的黄薇作为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参

---

① 《新闻界新闻》，《新闻战线》1卷7期，1941年11月1日出版；《消息》第9期，1946年5月。

加武汉新闻界组织的记者团到徐州前线采访。作为唯一的女记者，黄薇剪掉长发，一身戎装，参加了徐州会战实况采访。在徐州撤退时，她拒绝同长官家属们一道乘车撤出，而是和一名摄影记者及抗敌剧团几个女团员跟随军长关麟征的部队同行。他们昼伏夜走，从敌人夹缝中突围，有时发生激烈遭遇战。他们在危险、紧张、艰难的行军中仍不放弃采访、拍照，现场记录军队战果和敌人罪行。经过长途跋涉，穿越被日寇炮火毁坏的田园、满目疮痍的大地，跨过苏、皖、豫三省边境地区，终于成功脱险，回到武汉。这些突围出来的记者，集合在一起开座谈会，谈自己的经历见闻，很快出版了一本记录徐州会战史实的书——《徐州突围记》，其中有黄薇写的《从火线到后方》一文。①

1938年，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赴延安，黄薇随团前往，并随陕甘宁边区慰问参观团去晋察冀边区进行采访。由此，黄薇有机会接触到烽火弥漫的华北敌人后方。在华北敌后的3个月中，从晋西北、晋东北、冀西到冀东南，走了40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回到重庆后，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活跃在敌人后方》、《晋察冀边区访问记》等百余篇系列通讯报道。

黄薇的系列报道以《踏上征途》为开篇，描写了沿途艰苦的行旅生活、后方普遍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射技高超的八路军战士和所到之处受到的热烈欢迎、八路军官兵待遇无别以及军队坚强的抵抗力。系列报道连续在《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上发表6个月之久，主要向海外侨胞报道了以下内容：1. 描写沿途县镇村高涨的抗日热潮。如沿途无处不在的抗日标语，使黄薇感想到“八路军重视政治工作，不用命令，不用强迫，而是用教育和鼓励，用真理和正义激发他们的爱国心，提高他们的抗战情绪，使他们了解抗战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从内心自发愿为国家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②到处响彻的抗日歌声，“数百人的声音，犹如从一个口里发出的一般，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它将飞越高山大海，传到扶桑三岛去，使那些万恶的魔鬼

---

① 参见林彬、弦柱《抗日女记者黄薇》，《传记文学》1995年第9期。

② 黄薇：《经三井到五寨》，《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新华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法西斯军阀们，魂飞魄散，心胆俱裂！”① 这些通讯还报道了边区军民以及抗日组织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各种抗日活动。令黄薇一行感受到革命“魔力”的是一群少小离家、有着坚强革命精神和高度政治认识的“红小鬼”们，参加抗敌决死队的青年们，以及敌人将至时边区民众收拾行李、掩埋对敌人可能有利的物品时所反映出的沉着表情，还有民众的抗日训练以及他们对部队的无比信赖，以及抗敌剧社里十多岁的小孩子们义务为伤员表演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反映出边区上下军民一致动员、积极抗战的热情，也说明抗日战争在边区真正成为一场人民战争。2. 反映边区军民艰苦的战斗、生活和医疗条件，呼吁海外侨胞积极捐赠。《到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部》描写的一个细节是八路军脸盆的 3 个用途：“洗脸要用它，洗脚要用它；下雨的时候，它被当作雨帽；必要的时候，它还被当作便盆用。”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反映了当时军队生活条件的艰苦。《慰问负伤战士》一文反映边区伤兵医院设备简陋，医药缺乏，“没有止痛药，没有麻醉剂，甚至连碘酒也很缺少”导致“轻伤的要多受几天的痛苦，重伤的则往往因为医药不灵而牺牲”。由于没有必要的医疗条件，白求恩大夫遇到一些需要截肢的伤员时不得不用“木工的锯子和屠刀”。② 这样惨不忍睹的情景，想起来令人心颤，为此，黄薇呼吁“海外热爱祖国的侨胞们多多捐献一些医药用品来救救我们英勇抗战的将士吧！”3. 向海外侨胞传播边区党政军领导人的形象。在上百篇的通讯中，黄薇报道了闻名中外的贺龙师长，留日归来、带领全县人民抗日、平易近人的五寨县模范县长吕尊周，英勇善战的毛支队长，身经数战、有勇有谋、负责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聂荣臻司令员，杰出的文化工作者、边区唯一的铅印报纸《抗敌报》的负责人邓拓，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通过一个没有政治派别的华侨记者之手，将晋察冀边区这些领导人的形象传播到海外，比党报记者的报道力量

---

① 黄薇：《“牺盟会”在战斗中前进》，《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新华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② 黄薇：《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新华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大，也更有说服力，这有利于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有助于根据地抗战的发展。4. 歌颂了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业绩。如由中共领导的、在战斗中前进的边区“牺盟会”在动员群众、维护和改造政权、创建新军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边区政府将抗日政策与宗教政策结合，在保证和尚喇嘛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以“我们出了家，但没有出国”的口号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

1939 年 2 月至 8 月，这些通讯在《星洲日报》上连载发表，很快引起读者的关注，后来就改在发行量较大的《星洲晚报》上发表。6 个月中，黄薇发表一百多篇通讯，对海内外读者了解中国抗战真相，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38 年 12 月，黄薇结束了在华北后方的访问，来到战时“陪都”重庆，受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之邀，担任该报驻重庆特派记者，同时还担任南洋《星洲日报》特派记者和《新华日报》特约记者。由于她的特殊身份，在国民党要人的官邸里，在共产党的周公馆里，都可以看到她的踪影。宋美龄的妇女干部训练班，也请她为教官。作为一个华侨记者，黄薇针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特点，就他们关心的问题撰写了一些专访的新闻报道。为此，她经常去曾家岩 15 号和红岩村 8 号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共领导人了解抗战形势和党对宣传报道的方针、意见，同各界知名人士都有广泛的接触，同时也访问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海军上将萨镇冰等。

黄薇在重庆的采访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反动派打算暗杀她。为保存革命实力，黄薇于 1941 年由周恩来安排离开重庆到达香港，同年 9 月，她以《星岛日报》记者的身份到菲律宾创办一份地下报纸《华侨导报》，直到 1947 年 10 月该报停刊为止。之后，她离开菲律宾到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

黄薇的报道，客观而翔实地介绍了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曾激励不少海外华侨投奔抗日根据地。黄薇作为一个华侨女记者，“怀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字之心，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岁月中，有时在前线，有时在后方，有时在国统区，有时在敌占区，不怕艰难困苦，不顾生命危险，用她那支有力的笔，时而礼赞抗战的英雄，时而揭露敌人的凶

残，时而传达人民的激情与愤怒；时而展示他们的乐观与信念。她是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战斗。这种革命精神确是难能可贵。”①

同一时期向国外报道中国抗战消息的女记者有美国《时代》杂志驻中国记者李伯悌。李伯悌，1918年生于安徽安庆，1938年至1941年在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1942年起，李伯悌担任美国《时代》杂志驻中国重庆和上海记者，在此期间以其流利的英语采写了大量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政治的文章。

黄薇和李伯悌属于抗战时期向海外报道中国抗战消息的女记者。

二、杨刚与子冈：《大公报》里的“红色记者”

《大公报》里面一直有女编辑或女记者在工作。《大公报》初期有3位知名才女：一个是李镌冰——李子宽的姐姐、《大公报》天津版副刊编辑何心冷之妻，1923年，她曾经在上海国闻通讯社工作，天津版经常发表她的文艺作品；再者就是蒋逸霄，先是编《妇女周刊》，也是报社唯一的女记者；第三位是吕碧城，驻英伦特约记者。② 抗战时期，《大公报》最著名的女记者是杨刚与子冈。

（一）杨刚：杰出的副刊编辑与战地记者

杨刚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闻界卓然不凡的女记者之一。著名的文学家夏衍评价她为“浩烈之徒”，这一方面指她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对她的新闻活动的评价。的确，在杨刚为期10年的新闻活动中，处处洋溢着其“浩烈”之气。她是一位优秀的副刊编辑，一位杰出的战地旅行记者，还是一位富有远见与独到见解的驻外记者。

杨刚乳名杨季征，原名杨缤，原籍湖北沔阳，1906年1月19日生于江西。杨缤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4岁进私塾，19岁考入南昌葆灵女子高中，6年后又以优异成绩被保送至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在燕京大学时，杨缤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30年，杨缤在北平加入

---

① 见伍修权为黄薇《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一书所作的序。

② 周雨辑：《大公报轶事逸闻》，《新闻史料》（天津）总18辑（1988年第一辑），天津日报新闻研究室编，1988年11月出版。

中国共产党。次年，因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而被捕。

杨缤的母亲出身富绅之家，仁慈豪爽能干。她的父亲杨会康，早年做过江西九江知府，在辛亥革命以后动荡的政局中，杨会康寻机钻营。他同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拥护三民主义；在张勋复辟帝制丑剧中，和前清遗老遗少们一起朝拜小宣统。复辟梦破，名臭官丢。1921年，承蒙同僚推荐，杨会康奉命任江西省府建设厅长，后任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之职。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前夕，湖北督军兼省主席肖耀南弃职出逃，杨会康代理省主席。北伐军攻克武昌城之后，杨会康成为替罪羊，以贪官污吏之罪被革命军逮捕入狱。正在葆灵女子中学准备期末考试的杨缤收到了母亲让几个孩子想办法营救父亲的亲笔信，杨缤怀着矛盾而苦涩的心情离开葆灵女中，回到武昌城。杨缤为父亲写的申诉书，既历数了父亲的历史罪过，又申述了父亲并非十恶不赦的投靠帝国、残害民众的反动军阀。这种既批判又辩护的做法，初步显露了杨缤的写作水平。

1928年秋，杨缤开始用“杨刚”为笔名从事文学写作。1930年，杨刚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因与党小组长发生争执而被开除（1938年重新入党）。1933年春，杨刚在上海参加“左联”工作，后来认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并与萧乾等合作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活的中国》翻译成英文，由英国伦敦C·哈拉普公司出版。

1936年，女儿光迪出生一年左右，杨刚和丈夫郑侃一同参加顾颉刚主编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夏，她主动请求并得到主编顾颉刚的支持，乘火车到绥远去采访。在绥远，她采访了绥远各界人士，包括军人、教师、农民、牧民等，拍摄了大量照片；在包头，拍摄了日本驻绥特务机关羽山公馆的照片，了解日本特务在那里唆使蒙人独立、煽动蒙汉动干戈、破坏民族团结的一些情况。回到北平后，杨刚先后在《大众知识》上发表《绥行日简》、《从河北新村到五原拾记》等通讯和《创造的战争》和《论扩大绥远战争之必要》等时事评论。在时事评论里，杨刚论述了绥远战争的伟大意义，赞颂了傅作义将军和所属将士们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刚由北平南下，赴武汉、上海等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的爆发激发了杨刚的创作激情，她写下

了最能体现自己艺术成就和创作风格的散文集《沸腾的梦》。胡乔木给这部散文集以高度的评价："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①

1939年夏，杨刚带着女儿郑光迪从上海来到香港，接替萧乾任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从此，身为共产党员的杨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开始了她为期10年的新闻生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杨刚于1941年5月抵达桂林，主编桂林《大公报》的《文艺》副刊。1942年7月，浙赣战役全面展开后，杨刚前去战区采访，所写的战地旅行通讯在桂林、重庆《大公报》同时刊出。从浙赣战区旅行归来后，杨刚被派往《大公报》重庆总馆工作。1944年7月，杨刚去美国求学，在美国期间，杨刚担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写了大量美国通讯。1948年9月，杨刚回到香港，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参加了推动《大公报》转向人民立场。

1. 杰出的副刊编辑

中国正式出版副刊始于1897年11月上海《字林沪报》出版的随正张附送的《消闲报》。1911年《申报》出版了副刊《自由谈》。1914年《新闻报》出版了副刊《快活林》，这是出版时间较长，影响较广的副刊。此后，许多报纸都出版副刊。但是，早期的副刊格调不高，一直是文人雅士发表诗词以附庸风雅的园地。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副刊逐渐摆脱消闲的内容，发表有思想性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四大副刊③ 就是代表。同时，还有一种现象也正在酝酿，那就是副刊既依附于报纸的正张而存在，同时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一家报纸的正张是中

① 吴德才著：《金箭女神——杨刚传记》第1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②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二）第1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③ 它们是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晨报》副刊《晨报副镌》、《京报副刊》。

立的，或者是反动的，但它的副刊可能是进步的。这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新闻界所独有的一种现象。1939 年杨刚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这种情况。

新记《大公报》作为一家著名的私营报纸，1926 年 9 月 1 日该报续刊之时，便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10 年内战期间，《大公报》迅速崛起，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既有批评，也有赞许，力图保持报纸的中立态度。抗战期间，《大公报》天津版和上海版相继停刊，汉口版、重庆版、香港版和桂林版先后创刊。汉口版和重庆版比较接近当局，而桂林版和香港版则在反映民主派的呼声和揭露黑暗方面较开放大胆。

《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办于 1933 年 9 月，由杨振声、沈从文主编，先后为周二刊、周刊。《文艺》在当时很有影响，文坛大家都是它的常客，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梁思成、林徽因、周作人、叶公超、卞之琳、冰心等时常在上面发表作品。文学新人也从这个园地上崭露头角。萧乾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文艺》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从此与《大公报》结缘，并于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报》。1938 年 8 月，香港《大公报》创刊，萧乾任《文艺》副刊主编。1939 年，萧乾被《大公报》派往英国做特派员。此前，他向胡政之推荐杨刚主编《文艺》副刊。

杨刚与萧乾是燕京大学同学，一位在英语系，一位在新闻系。二人于 1929 年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认识，并成为好朋友。杨刚得以进入《大公报》，一方面是由于萧乾的推荐，另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才华出众。萧乾回忆说，当初他向胡政之推荐杨刚时，胡对这位颇为闻名的“赤色分子”不那么欣赏，另外杨刚的桀骜不驯也是出了名的。胡政之担心这会给报纸带来麻烦，主张请北方一位“稳重”的学院派作家来主编。萧乾给胡政之分析说，杨刚进步、爱国，笔头快，判断力强，如果不请杨刚而请什么学院派的作家来编副刊，所有这几年同刊物保持联系的作家，都会同《大公报》分道扬镳。[①] 萧乾给这位报纸

① 谢国明：《试论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9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

老板分析了杨刚来与不来的利弊，最终使杨刚得到胡的聘任。

杨刚一进《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就向她交代该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传统，告诫她“不许过激”。杨刚初来乍到，情况不熟，也颇守规矩。两个月后的一天，杨刚正在编稿，胡政之和《大公报》香港版经理金诚夫怒气冲冲地走来，斥责杨刚在副刊上发表过激的文章。杨刚请他们指出具体篇目，他们却说不上来。杨刚认为，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纯属无事生非，欺人太甚。于是，立即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胡政之，指责他无理训人，如果不予收回，就要辞职。胡政之看后赶紧向杨刚赔礼，并表示挽留。

这场风波过去后，杨刚索性在副刊上大量编发进步文章。她在《文艺》副刊上发表《重申＜文艺＞宗旨》一文，表示要让《文艺》“披上战袍，穿上甲胄”，将《文艺》由“绅士”改造成“战士”，成为“民族生活的一个关键环节，帅字旗下的一名小兵”，成为宣传抗战的“有着真实的乐与悲的吹鼓能手”，“一切有心滚进这个大时代的人，他既肯把耳鼓贴在地层上听见战马的蹄骤，又听见了大地的暗语，就让他把这些语言有心地写出来……凡可以称为文章的东西，在文艺的哨位上应该是一位击不倒的勇士。他可以明攻、暗袭、奇劫，各中要害。《文艺》向在抗战上没有躲避宣传，检讨也无所谓标榜。”[①]杨刚利用报纸老板为拉拢读者而给予的一点自由，在《文艺》这样一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上编发大量进步文章，如沙汀的报告文学《贺龙将军》。她还特约丁玲撰写《我是怎样来陕北的》等文章，为国统区即将奔赴延安的年轻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吴伯箫的长篇散文《沁洲行》歌颂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精神与质朴美德；庄栋的长篇通讯《记延安文协代表大会》报道了延安的新年、新春、新文化；沙汀的长篇通讯《抗战期中的“敌后”文艺》，则系统宣传了延安的文艺活动，介绍了多位著名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

杨刚不仅抛弃了副刊是“报屁股”的观念，而且把副刊办成了“实际工作与生活的前哨”。为了引导战时文艺的发展方向，她在《文

---

① 杨刚：《重申〈文艺〉意旨》，香港《大公报》1939年9月4日。

艺》上组织了文艺问题的公开讨论。1939年10月，《文艺》借鲁迅逝世3周年纪念之机，发起了“民族文学”问题的座谈会，讨论抗战期间的民族文艺问题：民族文艺要以抗战现实为内容，如何运用和创造民族形式问题，使形式和内容恰好配合，使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服务。出席者有许地山、黄鼎、刘火子、陈畸、郁风、刘思慕等23人，杨刚通过文艺座谈会，引导青年关心祖国抗战，让副刊为抗战服务。座谈会纪要在《文艺》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民族文学”成为香港文艺界的中心议题。杨刚看到讨论非常成功，便又拟了两个论题：一是“文艺之民族形式的创造问题”，一是“新文艺外来影响的估价和清算”，在《文艺》上五次用整版发表讨论文章，把问题引向深入。这场由《文艺》发起的讨论，对香港文艺向着抗日救亡方向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①

杨刚的活动得到了《大公报》主持人的默许，但是国民党海外部注意到杨刚在香港的活动，他们通过张季鸾向胡政之告状，说杨刚是共产党在香港的高级负责人，要他把杨刚赶走。这回，胡政之把杨刚请过来，将国民党海外部的控告和张季鸾的来信内容告诉了她，并表示他本人是信任杨刚的，仍希望杨刚继续为《大公报》服务。不过，他提示杨刚不要跟共产党走，免得上当。杨刚对胡政之的好意表示感谢，同时严正指出：“国民党天怒人怒，人民自然有不满的情绪。青年人流浪当然要照顾教育他们。如果这样做了就是共产党，我并不一定在《大公报》做事，你可以叫我走。”她还劝告胡政之说：“《大公报》根本就应该把自己做成人民的喉舌，不该只看上面的意旨办事。”胡政之敷衍了一下，含糊其词地过去了。②

香港沦陷后，杨刚和邹韬奋、金仲华等一批著名文化人士于1942年1月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从香港偷渡至惠州，到达东江游击区。1942年4月，杨刚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主编《大公报》文艺副

---

① 陈昌凤著：《蜂飞蝶舞——旧中国著名报纸副刊》第127－12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② 谢国明：《试论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刊，继续走香港开辟的道路。1943年初，杨刚奉命调到重庆，主编重庆和桂林两地的《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并兼任《大公报》外交记者。

在主编桂林版和重庆版《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期间，杨刚使《文艺》副刊“踏着残酷窒息与黑暗而前进”。她以《文艺》副刊为阵地，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如郭沫若、老舍、茅盾、田汉、夏衍、吴祖光、熊复西、侯外庐等人在《文艺》上刊发稿件，青年作家刘兆记、周为、曾敏之等也给《文艺》写稿，还有昆明西南联大的知名作家穆旦、杜运燮、郑敏（女）、陈敬容（女）、汪曾祺等。另一方面，杨刚在《文艺》上开辟“生活·工作·思想”、“文艺简报”、“书刊介绍”等专栏，编发《战争与和平的故事》、《我们的生活》等专辑，作为沟通读者与作者的桥梁，直接或间接影响读者。

在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杨刚主要以文艺的形式并结合时事在《文艺》上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战业绩，在吸引读者的兴趣之时，充分发挥了副刊的宣传作用。同时，杨刚的编辑活动也使《大公报》的副刊形象大为改变，使之成为引导和教育读者的一块“红色”阵地。杨刚利用《大公报》主张抗战的立场和它所特有的“小骂”特点，坚守着《文艺》副刊相对独立的阵地，反映抗战业绩，曲折迂回地和反动势力作斗争。

2. 有胆有识的战地记者

杨刚不仅是抗战时期我国新闻史上进步的报纸副刊编辑，同时还是一位勇敢的、有独到见解的战地旅行记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空军轰炸九龙启德机场，日本陆军从深圳越过边界，疯狂向九龙进攻。港英当局毫无准备，英军一触即溃。1941年12月25日，港英总督杨暮琦宣布无条件投降。杨刚不顾个人安危，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深入前线采访。

1942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浙赣战役全面展开，杨刚以《大公报》特派记者身份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同行，到浙赣前线和福建战区调查采访。她深入前线，短短两个月时间写了10多篇通讯报道，不下5万字，如实向读者报告战区由于日本侵略而造成的满目焦土、尸骨遍野的惨状；揭露国民党当局压制民众抗日的黑暗行径。桂林

《大公报》特辟《战地通讯》专栏，署名“本报特派记者杨刚”，连续发表她的战地通讯，吸引了众多读者。她的战地通讯，目光敏锐，揭露深刻，同时又满怀激情，奋力呼吁，“啊！哪年，哪月，我们的土地，人民，才能从苦难中解放?”渗透着她对战区人民无限的哀怜，表达了对敌人无比的痛恨。杨刚的《请看敌人的“新秩序”》[①] 一文，忠实地记述了所见所闻的事实，揭露敌人的“新秩序”的本质就是杀人、放火、破坏等一系列非人道的行为。杨刚以作家的文采与记者的敏锐写下了轰动一时的战地通讯。两个月后，她从浙赣战区归来，这些战地通讯就结集为《东南行》一书由桂林文苑出版社出版，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引起胡政之的重视。[②] 胡政之对《东南行》一书以高度评价，“杨刚女士，你在《东南行》通讯集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政府官员那些‘霉腐阴沉’的腐败现象是癌症，是罪恶，是致命的毒瘤，这骂得是多么痛快，多么尖刻！老百姓读了我们的《大公报》，无不拍手称快，这就是我们《大公报》的骄傲。”[③]

杨刚是个有才华的女记者和女作家。她在结婚后，不愿意做旧式的贤妻良母，更不愿意做依赖丈夫的平庸女人。孩子尚未满月，她就在家艰难地翻译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经过半年的耕耘、反复修改校正，终于第一个将《傲慢与偏见》译成中文，署名杨缤，于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至 1936 年，杨刚还先后在《国闻周报》、《榴火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短篇小说，反映中国底层妇女的生活和命运，笔锋直指摧残妇女爱的欲望和人的尊严的封建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同时讴歌底层妇女在死亡线上顽强挣扎的反抗精神。

（二）彭子冈：以人物采访见长

彭子冈（1914 - 1988），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1914 年，彭子

① 重庆《大公报》1942 年 9 月 8 日。

② 参考文章——谢国明：《试路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新闻研究资料》总第 39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9 月版；张之华：《作家·记者·文化战士——杨刚》，《新疆新闻界》1984 年第 1 期。

③ 转引自吴德才著《金箭女神——杨刚传记》第 219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

冈生于江苏苏州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年的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度过，受过良好的教育。小学时，彭子冈曾在全县的作文比赛中得过第一名，因而获得小学校长赠予的一把团扇，上面书写了“为校争光”四个字。中学时代，彭子冈开始向《中学生》等杂志投稿，最初用本名彭雪珍，后来感到“珍”字俗气，便随意拼凑出笔名“子冈”。她当时投稿最集中的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不久就引起了叶圣陶先生的注意，并由此崭露头角。1937 年《中学生》第 71 号上还有出现专门研究、分析她习作的专论——《子冈论》。20 岁时子冈只身赴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学习英语，业余向《大公报》副刊投稿。

由于常向《大公报》副刊投稿，子冈受到这个版面的主编沈从文先生的提携。1936 年，彭子冈大学毕业，开始了新闻生涯，先是参加《妇女生活》的编辑工作。在参加《妇女生活》编辑工作期间，她用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抨击丑类，观察现实，贴近社会。1936 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她与丈夫徐盈二人同被录用。1938 年，子冈和丈夫徐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以《大公报》记者身份移居重庆。解放战争时期，她和丈夫又转至《大公报》北平办事处工作。从 1949 年到 1957 年，她先后在《进步日报》、《人民日报》、《旅行家》杂志工作。她曾深入新疆等边远地区，访问过许多劳动人民，写出一大批类似《官厅少年》、《老邮工》和《雪亮的眼睛》这样富于文学气息的作品，同时先后随各种代表团出访欧、亚的七八个国家，出版了《苏匈短简》。自 1951 年起，她被接纳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57 年子冈被错划为右派，次年即随下放干部去河北安国劳动，后因腿疾回家，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劳动。摘帽后子冈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编辑，1979 年获改正，并担任了《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此后两三年内，她仍以不泯的热情和传神的笔触，写出《人之初》、《汽笛》、《塑像》、《紫禁城》等抒情小品。[①]

1. 从《妇女生活》到《大公报》

1936 年，子冈应邀到上海参加《妇女生活》编辑工作。《妇女生

---

① 《子冈小传》，《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 1984 年 4 月。

活》是中国现代著名妇女杂志，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1935年7月在上海创刊。刊物主编沈兹九恰恰是子冈中学时代的图画和手工老师，子冈就住在她的家里。她以《妇女生活》记者的身份，先后采访过当时妇女界的著名人物，为《妇女生活》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访问记，如著名女作家冰心（《冰心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卷5期），著名女律师史良（《史良律师访问记》，《妇女生活》2卷4期），还有当时从事民众教育的知名社会教育家俞庆棠女士（《俞庆棠先生访问记》，《妇女生活》2卷6期），曾任国民党妇女部长和交通部执事及立法委员、时任上海女中校长的王孝英女士（《王孝英访问记》，《妇女生活》3卷2期），文笔秀美的女作家白薇女士和绿漪女士（《记白薇》，《妇女生活》3卷4期；《绿漪偶访》，《妇女生活》3卷5期）。此外，还有反映妇女群体生活的采访，如反映苏州农妇抗租事件的评论《不断的轰雷》（《妇女生活》3卷1期），反映郑州裕丰纱厂女工生活的《在机器旁边》（《妇女生活》3卷1期），反映乡村农家生活的《山海工学团》（《妇女生活》3卷9期）等等。

子冈著名的人物访问记《史良律师访问记》不仅向读者展示了史良律师的情形，更使读者认识到这一知名女律师的情怀，“在这篇访问记里，我们更知道了她还是一个将‘一般人轻视为资本主义的所有物，特权阶级的护身符’的法律活用者，努力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人的迥异流俗的律师，从她的义务管理贫穷当事人的案件和推翻两件已宣判的案子看，她的确是给‘无产’，‘无辜’的人们恢复自由，争取生存的良友。我们需要着有更多的这样勇敢前进，为大众谋利益的良友。”[①] 子冈反映苏州农妇抗租事件的《不断的轰雷》对农妇因压迫过分而被迫反抗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她们知道奴隶的末日已经来临，挺起了身子，负起了反封建和间接反帝的任务。全世界已到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争斗的一夕，……每个角落里都有不顾死亡的大众。”在《为什么有这些悲剧》（《妇女生活》3卷1期）里，子冈分析了一个贫病交加的黄包车夫因孩子生病告贷不成而持刀刃妻

---

① 《妇女生活》2卷5期，1936年5月16日。

的举动，认为这是“‘生活’把这些人压榨得起了火，鞭打和饥寒包着他们的身子就像是涂满了洋油，一到一星半点的不如意袭来时，便要爆发炽燃了，而这些忿怒与怨恨在没有正当的解决与毁灭外，便只有出之于狂暴的叫嚣与殴打之一途了，这些便像蜡烛燃着时的火焰似的，一面烧一面蚕食了自己，在没有找到痛苦的根源时受煎熬的大众，气还是只能出在自家人的身上，他们不明白这些不如意是什么魔鬼替他们带来的，他们不晓得应该去和什么或是谁去算帐——就是偶然有醒悟过来的，但也为了环境为了孤单而忍受下去了，虽然在近年来，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他们挣扎的火花，如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些劳工会社和团结一声的呼吁和请援等……‘把这个社会制度来审判一下吧！’他应该这样向法官说。”基于一则社会新闻而进行的评论可以看出子冈的认识已经很到位和正确了，还可以看出她冷静的头脑和沉着思考的习惯。

子冈的视野非常广阔，她的访问记中的人物，并没有局限于狭小的圈子，而是关注广泛的社会阶层。她的笔所触及的人物，既有中上层妇女，也有处于苦难生活中的下层妇女。同时，她善于抓住非常细微的地方或者是别人以为是极其平凡不屑于注意的地方去作文章，这是她采访成功的原因之一。这应归结于她对生活深切而丰富的体验。

1938 年 1 月，子冈进入《大公报》当外勤记者，来到当时政治中心武汉。汉口《大公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最近来汉的四个女作家速写》，将子冈与萧红并列，称誉她活泼、善谈，能吃苦，富思想，善于写调查和访问的文章。同年，她和丈夫徐盈在武汉经胡绳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迁居重庆。整个抗战期间，她都在重庆度过。8 年中，她表面上是“中立”的第三报（既不是反动的《中央日报》，也不是革命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的记者，秘密接受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单线领导。子冈在此期间写下了不少出色的新闻、通讯，还为在桂林出版的《大公报》写了反映重庆真实情况的《重庆航讯》近百篇，后来被新闻界同人誉为“重庆百笺”。

2.“有关抗战千言少”　围绕抗战作新闻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坚持抗战立场，保持民营报纸的进步姿

态，子冈采写的出色新闻通讯，不时在《大公报》上刊出。在这样一份相对中立的报纸上，子冈以宣传抗战为唯一宗旨，从正反两面反映“陪都”要人在抗战时期的活动。作为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子冈不动声色地宣传中共的主张，同时，也体现了一名新闻记者的独到见解，为时人和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

在重庆，子冈采访的天地是波澜起伏、复杂多变的战时环境，敏感的新闻报道往往采自上层。敢言，敢闯，会巧妙提问，是子冈采访抗战时期国民党要人时惯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能起到出人意料的效果。子冈的文字极具火药味儿，广大读者非常喜欢她的文章，将她誉为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

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当局举措不当，粮油及副食品被奸商操纵，物价狂涨，老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怨声载道。于是国民政府乃设立粮食部，派徐堪出任部长。徐堪别出心裁，不去追究奸商，而是动员市民吃他发明的“营养米”、“营养面”、“营养饼干”等。其实所谓的“营养米”，不过是多留稗糠的糙米，“营养面”乃系多留麸皮的粗面，“营养饼干”则是粗面掺和玉米粉制成的粗饼干。因这些东西难以下咽，民众不惯食用，徐堪就想借助新闻界替他吹嘘推广。

一天，徐堪在川东师范校内的粮食部设宴，请陪都各大报馆记者用餐，席上鸡鸭鱼肉纷陈，他还口口声声说是战争时期，要与民众同甘共苦。轮到上“营养饭”时，徐堪亲作示范，往饭碗里浇上许多炖肘子肉汁，并热情介绍说：“我每天都吃这种饭，再喝点鸡汤，好吃得很。”

众记者一看，四碗八碟的菜肴老百姓是绝对吃不起的，更何况“营养饭”得佐以肉汁鸡汤，还说是要“共苦”，可想这些官吏平日是如何奢侈的了。

但众人慑于部长的威严，都不便发表意见。唯有彭子冈快人快语，开口直言道：“徐部长，你提倡的‘营养饭’，原来是这种吃法，真是妙不可言，难怪十分营养。”

她的话刚说完，记者们哄堂大笑，徐堪则脸红筋涨，狼狈不堪，

支支吾吾避席而去。[①]

子冈采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是成功的例子。有一天，由孔祥熙主持的节约储金运动集会在嘉陵宾馆举行，与会的有党、政、军、工商、文化界约百余人。席间，孔祥熙大谈节约储金之道，竟说："平时，你们如果买点东西存放在家里，这也是一种储蓄"，公然提倡囤积居奇。到进茶点时，他又从节约储金的角度讲当日准备的茶点只有维他饼和一杯红茶，大谈维他饼的营养价值，说不用担心中国粮食不足，只是人们吃得太多太浪费了，建议大家多吃糙米，说那是含有维他命 ABC 多种营养的食品。"总之，诸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子冈并没有被孔祥熙的话语所迷惑，她结合当时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百姓节衣缩食以争取抗战胜利的实际情况，向他发问："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唯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身之道，可否请你继续谈一下养身之道?"子冈出其不意的发问，使孔祥熙无所回答，只有连声"哈哈，哈哈，散会"，匆匆宣布散会，"哈哈孔"因此得名。短短几句话，将孔祥熙提倡节约献金的虚伪性表现无遗。

1943 年重庆物价飞涨，市场上猪肉短缺。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沈鸿烈为此特作演讲，子冈如实报道了沈的演讲情况："我活了 60 多岁，最不喜欢肉食，油类也吃得少。其实人类吃不吃油无关紧要。"子冈在报道中直书其言，并没有什么评述，同样暴露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虚伪。

抗战时期，子冈奔波在"陪都"重庆的官场与民众之间，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得以采访到当时重庆要人，她写了知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等人的访问记，为《大公报》发表了独家新闻。值得一提的是子冈初进重庆《大公报》，便奉老板之命采访宋美龄。子冈坚持新闻记者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敢说真话的原则，发挥自己观察敏锐，文笔传神的特长，力图刻画出宋美龄作为女人，与史良、冰心等名女人

---

① 杨耀健：《彭子冈嘲讽"营养饭"》，转引自 http://www. xinwenren. com.

的不同之处，从正面、客观地塑造了宋美龄的形象。她在文章开头引用了宋美龄的一段讲话：“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南面入口之前，有一块奇特的石碑，上面刻着一个拉丁字，‘Resurgam’，它的意思是：‘我将再起’……这一个碑文，那么强劲用力的一个字，对于我们，对于目睹着同胞伤亡、家残国破的我们，尤其富有特殊的感动力，它将要深深地印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鲜明地照耀在旗帜之上！”这段话无疑是漂亮的，足见宋美龄与史良、冰心等名女人的不同。子冈敢于和善于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新闻记者的脑子进行思考，写了一篇漂亮的访问记。文章发表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称许说：“颂而不谀，恰到好处”。[①]

子冈反映后方人民支持抗战的报道同样富有感染力。她的《擦鞋难童献金救国》一文从贫苦儿童的行动反映了抗战初期举国人民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的高涨，打动了千万个读者。

抗战中期，国民党新闻检查变本加厉，新闻检查所常常删改或者扣押她的新闻报道。为了那些在重庆难以发表的揭露性新闻得以问世，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通讯。桂林《大公报》是“抗战中期比较令人满意的一张读物，崭新进步的作风，敢说敢言，是桂林的文化台柱，更重要的是维系着大东南半壁的人心。”[②]子冈一年期间发表通讯近百篇，成为震动一时的“子冈通讯”。

重庆采访生涯是子冈一生的骄傲，甚至到她晚年患病住院期间，夜半冥冥中听到隔壁厕所的水箱鸣响时，她曾问“可是嘉陵江上的汽笛在叫?”[③] 子冈以其敢言、敢写和善于采访而成为抗战时期饮誉山城乃至全国的著名女记者之一。她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拥有广阔的采访领域，已经成为当时能够独当一面的女记者。

---

① 参见周雨著《大公报史》第17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② 《徐铸成回忆录》第1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4月版。

③ 徐城北：《感情更磨利了棱角——著名女记者子冈》，《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

三、《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采写新闻　出奇制胜

“抗战时期，重庆各报，女职员最多者首推《新民报》。经理、记者、会计、广告、稽核等职，都有女士担任。”[①] 女经理当然是闻名新闻史的邓季惺女士，最出名的女记者就是浦熙修了。

（一）浦熙修与《新民报》

浦熙修是抗战时期《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抗战时期，她在《新民报》的工作成绩为她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全国知名的女记者打下了基础。

浦熙修，1910年生于江苏嘉定县。父亲在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交通部当职员，全家主要靠他的薪水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有个姐姐浦洁修，妹妹浦安修，还有个弟弟浦通修。浦熙修7岁时，随母亲和姐姐来到北平。由于家庭经济不宽余和重男轻女的社会习俗，浦熙修读到高中一年级就辍学了。她17岁就自找出路，为人代课教小学，同时又在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学画，这样攒了一些钱，又于1929年考入女师大中文系，靠半工半读上完大学，1933年毕业后在中学当教员。浦熙修在大学期间同中学教员袁子英相识而结婚，1936年春，袁子英调到南京工作，浦熙修也随之南下。

为了在南京就业，浦熙修曾经四处奔波，带着两个孩子，求职更为不易。有一次，她看到报载某地产公司招收职员，应试的题目是曾经日夜焦虑的《妇女职业问题》，她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成绩虽然优秀，可是这家公司规定不招已婚女性，而这家公司的老板是《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的好友，就向他推荐了浦熙修。

1936年冬，浦熙修参加南京《新民报》工作，开始从一个狭小的家庭踏入广大的社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浦熙修先后在重庆和南京任《新民报》记者、采访部主任。解放后，浦熙修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

浦熙修多年从事新闻工作。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为宣传党坚

---

① 《新闻战线》（重庆）1卷4期，1941年6月16日。

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她针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现实，利用民间报纸的可能条件，写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丑恶面目和鼓舞人民团结抗战的新闻和特写。抗战胜利后，浦熙修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以及各界民主人士和平民主的心愿，抨击国民党当局实行独裁、发动内战的罪行。1949年，浦熙修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参加开国大典时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她满腔热情地投入新闻工作，3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还前往新疆等地去作有关抗美援朝的报告，写下了《新疆纪行》等小册子。

1957年，浦熙修被错划为右派。她身处逆境，但工作热情不减，依然努力为搜集文史资料而到处奔走，在编写文史资料工作中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期间，浦熙修因受迫害于1970年4月逝世。

《新民报》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民办报纸，1929年9月9日在南京创刊，陈铭德、吴竹似、刘正华等发起创办，得到四川实力派支持，1938年1月15日迁重庆出版。此后至1946年10月，《新民报》在全国共办有5社8版，分别是：重庆版日刊（1938年1月15日设），重庆版晚刊（1941年11月1日设），成都版晚刊（1943年6月18日设），成都版日刊（1945年2月1日设），南京版晚刊（1946年元旦设），南京版日刊（1946年10月10日设），北京版日刊（1946年4月4日设），上海版晚刊（1946年5月1日设）。

（二）浦熙修的写作特色

浦熙修认为“一个记者的条件，除了基本的知识外，需要有热情、良心、正义感，并且要有吃苦耐劳为社会服务的精神。”[①] 政协会议期间，她写了许多漂亮的人物访谈记，并被称为后方新闻界的“三剑客”之一（彭子冈、浦熙修、杨刚）和“四大名旦”之一（彭子冈、浦熙修、杨刚、戈扬）。

浦熙修初到《新民报》时，陈铭德先是将浦熙修安排在经理部当职员，做发行和广告工作。几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浦熙修崭露

---

① 浦熙修：《采访十年》，载于《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头脚。1937 年 4 月 29 日，首都女子学术研究会在中山陵音乐堂旁边的流徽榭举行周年纪念大会。《新民报》临时决定要报道，可是又派不出人来，老板陈铭德决定派浦熙修去“救场”。结果，熙修发挥出色，她写的报道《流徽榭畔一盛会——女子学术研究会周年大会别记》刊登在 5 月 2 日的《新民报》上。该文文笔洗练流畅，吸引了读者，博得了同行的赞许。这次成功，使她从广告科调到了编辑部，成为《新民报》第一位女记者。

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遭到了日军的轰炸。1937 年 11 月 27 日，《新民报》在南京出版最后一张报纸之后，就把机器设备运到重庆。1938 年 1 月 15 日，《新民报》在重庆恢复出版。1939 年 1 月，浦熙修担任《新民报》采访部主任，领导采访部工作人员，深入社会各个角落，活跃在上下阶层，常常猎获到一些重要新闻。战时“陪都”重庆，在浦熙修的麾下，有各式各样的记者，背景颇为复杂，而《新民报》的版面只有当时各大报的一半，记者们的稿子不可能都排上去，但缺了谁的，都不会对主任满意。于是，她只好鼓起勇气，每晚为编排稿件乃至权衡人事而“战斗”一番。“不是她好斗，换了谁处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如果想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大方向，那都是不能不拼足全身力气去搏斗一番的。经过一番搏斗，熙修从《新民报》编辑部所在地的七星岗步行回到犹庄，时间多过午夜。为了迅速摆脱方才一番搏斗对心境的纷扰，吃安眠药入睡便成了习惯。”①

抗战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当时的军事政治消息很难过问，即使写了，也会被检掉。所以，各报大都采用中央社的稿子。一个年头，只有国民参政会的偶然机会算是政治新闻，而关于军事、外交、财政的会议，还属于秘密会议，记者不得与闻。政治新闻采访不到，浦熙修只好跑社会新闻。

浦熙修认为，“一个记者，对于社会事件（即社会新闻 - 笔者著），坏的要暴露，好的该表扬，一切要以与人民生活有关与否为前提。”②抗战期间，陪都重庆，一边是战斗和创伤，一边是澡堂和筵席。

---

① 子冈：《熙修和我》，《文汇增刊》1980 年第 6 期。

② 浦熙修：《采访十年》，载于《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 1999 年版 。

面对这种两极反差，浦熙修热情歌颂了战斗的军民，同时也无情鞭挞了荒淫无耻的高官。

抗战期间，浦熙修巧妙地突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新闻，其中《新民报》人喜欢传诵的浦熙修的一次精彩报道就是她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采写的新闻《孔夫人爱犬飞渝》。1941 年初冬，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居留香港的许多著名文化工作者和其他人士及其眷属急于撤离，但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而被迫滞留。浦熙修和《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估计可以从重庆机场获得较为重要的新闻，一大早就前去采访。在那里，她们看到尚未出任国民党经济部长、以“在野者”身份盼望其家属归来的王云五。飞机着陆后，先后走出机舱的是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她的保姆，还有几条活蹦乱跳的洋狗，而焦急万状的王云五却没有等到他的家人，失望而归。这一切没有逃过浦熙修的眼睛，孔祥熙重狗轻人这一颇具政治意义的社会新闻便在她脑海中形成。

但是，怎样把这条消息刊发出来是个大问题。《大公报》的彭子冈写了一篇很好的特写被扣了，浦熙修在当天晚报上写了一条新闻，也被新闻检查所的官员扣压了，但她没有气馁，想尽方法在日报上发表。于是，她改用点滴“花絮”的方式，以隐蔽的手法，一条一条的先写孙夫人、孔夫人来渝的消息，又写了王云五接眷未成的情形，接着写重庆忽然多了几条喝牛奶的洋狗的消息。分着送去检查，经检查后拼起来发表，再加上编辑做的一个巧妙的标题。于是，一篇轰动全国的新闻就这样出来了。它的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1)“政治部举行《太平洋战争之展望》座谈会”；(2)“日来停候于飞机场遥望飞机自天外飞来者大有人在，昨日王云五先生亦三次往迎，三次失望”；(3)“昨日陪都洋狗又增多七八头，为真正喝牛奶之外国种”；(4)“社会局昨日午后召集商会各业商人开会，商讨平抑物价对策，市长亲自出席”；(5)“昨香港电讯仍旧可通，上海电讯已断”……。编者从中选取两条作了标题：“伫候天外飞机来（上题）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下题）”，用四栏加花边刊登在头条位置。浦熙修以“化整为零”的手法在两三条分散报道的消息中透露了“洋狗乘机”的丑闻，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显示了浦熙修善于捕捉新闻线索，并

善于在文网森严时期巧妙地把信息透露出去的本领。这一束“社会花絮”使读者平添了无限感慨和对权贵豪门的强烈憎恶，这位孔夫人经浦熙修点石成“金”，立刻成了国民党腐败透顶的象征性人物。

同时，《新民报》的其他栏目也大力配合“洋狗”新闻。赵超构配合新闻写了《洋狗飞机辩》痛加抨击，张恨水、张慧剑轮番出击，接着在各自的专栏撰文，大加讽刺，使重庆舆论为之哗然。1941年12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其中揭露国民党政治腐败的实例之一就是浦熙修采访的“飞机洋狗事件”。“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这引起了遵义的浙江大学学生和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先后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达官贵人重狗轻人的荒唐事件。①

类似的妙笔不时再现。1943年3月3日《新民报》同时刊出浦熙修采写的《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和《女公务员为米请援（正题）孔副院长予以拒绝（副题）》一文，同样令人叫绝。这是《新民报》不顾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机关的禁令而发表的“闯祸”新闻。读者对此津津乐道，说《新民报》有“种”，但却惹恼了权贵，《新民报》受到警告，且有封闭报馆之虞。经过陈铭德四处奔走，多方疏通，最后由《新民报》刊登两条官方拟订的“更正”，了结此事。但这两则新闻在社会上反映非常激烈，1944年4月20日长沙《大公报》还发表武绝翔根据这两则新闻写的文章《读孔小姐飞美结婚》，1948年8月军大总校政治部编、新华书店发行的《中国近代政治简史》也引用了这一事实。在这场“闯祸新闻”事件中，浦熙修和发稿编辑陈理源认为这是事实，理直气壮地争着承担责任，表现出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嫉恶如仇的风骨和坚持事实的勇气。

在当时“陪都”重庆，浦熙修和彭子冈经常并肩采访。做记者没有什么采访车，公共汽车既少又拥挤，但她和子冈都是徒步采访。有时警报来了，便躲进邻近的一个防空洞。那时，记者采访主要靠两条

①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第146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腿，是实实在在的"跑"新闻。浦熙修"巾帼不让须眉"，十分珍惜自己在《新民报》的职位，工作兢兢业业又随机应变。她围绕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政治与社会，采写了大量新闻，从不同角度反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她善于从小中见大，利用社会新闻与政治新闻难于分家的特点，敢于抨击"陪都"的黑暗，敢为人民鼓与呼。同时，她还敢于以新闻为武器勇敢地战斗，为人民民主甘冒矢石。这为她在抗战胜利后巧妙而勇敢地采访政治新闻，成为名记者做了铺垫。[①]

四、戈扬：躺在门板上写通讯

戈扬是抗战时期参加新四军的女记者。她原名树顺贞，1916 年生于江苏海安，在镇江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曾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并曾用笔名在《镇江日报》副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37 年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后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 3 月，随国民党第二十军团青年战地服务团赴徐州前线，曾以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战场实况写下了《徐州突围记》，她的名字开始为人们注意。1939－1940 年，戈扬在《贵州日报》当记者，后到重庆做妇女工作。1941 年"皖南事变"后改名戈扬，历尽艰险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成为既拿枪又拿笔的女战士。

在苏北敌后采访，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次，戈扬在淮北区新四军第三师第十三团采访时随团转移。当时的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戈扬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骡子，骡子背上还放着三个包，她好像坐在山尖上，两只脚都蹬不到蹬子。骡子跑起来，一下子把她摔在地上，戈扬右脚受了重伤，当场昏过去。经过简单的包扎后，重新骑上骡子，但

---

① 本目参考文章：陈铭德、邓季惺：《深切的怀念》，《新闻研究资料》1981 年第三集（总第 8 辑），新华出版社 1981 年 11 月版；曹仲英：《黎明前的求索——记 1946－1947 年的南京〈新民报〉》，载陈铭德、邓季惺编：《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陈理源：《重庆〈新民报〉史话》，载陈铭德、邓季惺编：《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张林岚：《赵超构在重庆》，《重庆日报通讯》1994 年第 2 期。

是不一会儿，鲜血就浸透了鞋子。没办法，战士们只好把她安置在洪泽湖畔一户老乡家，她伏在从老乡家借来的门板上，惦记着自己的采访任务，写下了通讯《苏南人民心中的新四军》，由延安新华总社发给各根据地并在延安《解放日报》和各根据地的报纸上发表。

戈扬在敌后做新闻工作，在战争的炮火中，以一个女记者的身份来往于各个根据地，走遍大江南北新四军五个师所在的广阔地区，写了许多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新闻和通讯，积累了丰富的采访经验，成为抗战时期根据地著名的女记者。

五、陈学昭：名动一时的《延安访问记》

抗战时期，以国统区记者身份在延安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的是《国讯》杂志特约记者陈学昭。《国讯》杂志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1931 年 12 月 23 日创刊于上海，初名《救国通讯》，1934 年 1 月改为《国讯》。初创时《国讯》以反映职业教育和宣扬职业修养为主要内容，同时报道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时期，宣传团结抗日和促进民主宪政，日益成为报道评论政治时事的刊物。

陈学昭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介绍，于 1938 年到延安采访，1939 年初夏与丈夫何穆一起带孩子离开延安。她是第一位由国统区进入延安革命根据地进行采访的女记者。此前已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到延安采访，并写出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国内新闻界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新闻封锁，则只有范长江 1937 年初赴延安采访，写了《陕北之行》通讯，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由于陈学昭以第一位到延安的国内女记者的身份到访，在延安自然受到优裕招待。大生产运动开始前的延安，物质供给十分困难，但她所住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每次特地为她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在那里，她以一个记者的自由身份，对延安革命队伍和乡土民情进行采访，然后在自己的窑洞里陆续写成文章，邮寄给远在重庆的《国讯》旬刊发表。陈学昭的采访活动由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安排。因此，她可以采访到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采访后，她独自在窑洞里写作，不受任何干扰，

文章不受审查，稿件邮寄也不受任何限制。陈学昭经常将自己在延安所见到的生活现实与过去在法国和国统区的情况相对比，在中外社会历史的空间中，对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些文章后来结集为《延安访问记》。在《延安访问记》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学昭时而惊叹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社会清明、发展进步，时而对这里的封建愚昧和贫穷落后感到不满，同时还能觉察到延安革命队伍里正在实行的社会公有制所滋生出的多种弊端，诸如养懒、浪费、等级观念，知识分子命运、所有权落空等。建国以来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的进行正逐步消除这些弊端，这从一个侧面证明陈学昭在那时能通过自己的生活观察，明确地分辨，直言不讳地表达，也证明了她是一位独立思考的记者。

在当时，能够发现并能及时指出这种弊端的报道是不多的。比如，在报道延安的娱乐活动时，陈学昭就能够反映真实情况。延安的娱乐贫乏，唯一的娱乐当属晚会。由基督教堂改造成的中共中央大礼堂里，每当有晚会的日子，总是人满为患。通常最前边几排都是预留给首长们的，"难得送给技术人员一张戏券，……却是在最后边的一排，椅子前后没高低，他看不见，又太挤，只好回去。"这在新闻记者与作家创作的所有关于延安的文字中，是颇见分量的。此前，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虽然有大量关于延安的文字报道，但毕竟有文化的阻隔，难得见到事实背后，同时由于过于新闻专业化，流于事态的表象描述和政治政策阐述，在文采和知识方面都相形见绌。

与此后赵超构的《延安一月》相比，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没有那么全面深刻，同时还缺乏严格的逻辑分析。但《延安访问记》在性情表露和风格文采上独具一格。它兼具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特色，通过知识女性对生活的细腻感触，察觉到日常人伦中的细微缝隙，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把握根据地的脉搏，从而获得独到的见解。

由于《国讯》杂志连载她所写的《延安通讯》，1939年陈学昭回到重庆后，一直受到国民党机关的注意，先是拉拢收买，接着是监视盯梢，重庆三联书店将她的这些文章结集为《延安访问记》准备出版时，又遭到国民党特务查抄。1940年，陈学昭和丈夫何穆第二次去延

安的途中，在铜川被扣。陈学昭为了避免暴露身份，只好把随身携带的所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资料，包括宝贵的博士学位证书、照片、版税折子等，统统撕成碎片，塞在床头边地下老鼠洞里。[①] 由此足见她的报道在国统区的影响。

六、陈香梅：让“飞虎”陈纳德走向大众

陈香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第一位女记者。她原籍广东南海，1925 年 6 月 29 日生于北平，在香港长大并接受教育。陈香梅身出名门，外祖父廖凤书曾参加辛亥革命，是廖仲恺的胞兄；父亲陈应龙年轻时留学国外，获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和北京英文《华北邮报》主编。母亲廖香词，留学欧美，习画于巴黎，习乐于意大利威尼斯，精通多门外语。陈香梅少年肄业于北平孔德学校，1935 年全家移居香港，陈香梅就读于圣保罗女书院及真光女中，在校期间曾担任校刊编辑。1944 年陈香梅毕业于内迁粤北的岭南大学，甫离校便受中央通讯社的聘约，19岁的她以娴熟的英语口语和出类拔萃的才干，被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聘用，成为中央社第一位女记者，主要负责深入战地一线实地采访，报道援华美军飞虎队的战况。与陈纳德结婚后，1947年7月，陈香梅辞去中央通讯社记者职务，加盟陈纳德组建的民航公司，在公共关系组担任全职。

陈香梅自幼喜欢文学，由于家教的熏陶和学校老师的教育，她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上学期间，她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引起了中央社昆明分社主任陈叔同的注意。同时，陈香梅的英文功底很好，这也是她被派往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的原因之一。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同盟国中国战区的重要后勤基地，是同盟国军人和英美各国领事相对集中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采访与军事和外交有关的新闻，必须具备良好的英语基础。

抗战爆发后，在日本空中压力下，组建强大的中国空军甚为关键和急迫。1937 年，宋美龄邀请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少将司令陈纳德

---

① 参考朱鸿召《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该文由导师方汉奇先生提供。

到中国，为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作机密视察。1937 年 4 月 1 日，退伍的陈纳德离美前往中国。他在中国考察 3 年，为中国空军的发展进言献策，1940 年 11 月他回到华府服务。1941 年陈纳德在美国组建了一支 300 多人的志愿航空队。同年 7 月，他再次离开美国，带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帮助中国抗战。“飞虎队”英勇善战，共击落敌机 2600 架，击沉或重创敌军舰 44 艘，击毙敌军 6 万多人。中国人民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协助“飞虎队”作战，为他们修建了 100 多个临时机场，许多普通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情报。正如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那样：“在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中国人拒绝对美国飞行员的帮助。”①

陈香梅到中央社昆明分社后，陈叔同本打算让她做编辑工作。但由于她的英语功底很好，非常适合在昆明从事外勤记者工作。经总社同意，陈香梅被该社主编指派去采访十四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即陈纳德少将和他的部下们。该社主编希望通过一个女记者之手，借助女性特有的细心与陈香梅良好的英语基础，通过富有人性化的写作手法，让中国人民对十四航空队和全队工作人员正在做的一切有所了解。

陈香梅的《美十四航空队 驻华两载战绩辉煌 今日基地开宴纪念成立》（《中央日报》1944 年 7 月 4 日）一文，总结了十四航空队从 1942 年 7 月 8 日至 1944 年 5 月 31 日之间的战斗业绩；《第十四航空队六月份战果丰硕 安德诺盛加赞扬》（《中央日报》1944 年 7 月 19 日）报道了安德诺对第十四航空队的赞扬。陈香梅的报道使严肃的军事新闻以人性化的面孔呈现在读者面前。

陈香梅在昆明中央通讯社工作出色。抗战胜利后，她因一向采访外事新闻而且成绩不错，同时英语很好而被调到中央社上海分社，去采访负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新闻，写了一批反映官员从中渔利倒卖黑市、无端作梗、玩忽职守的批

---

① 任毓骏：《中美老兵重相聚　共忆并肩抗战情——大型展览“历史的回忆”在华盛顿侧记》，人民网华盛顿 2002 年 10 月 18 日电。

评性报道。同时，陈香梅兼任东北《新生报》通讯员。[①]

七、抗战时期的驻外记者

（一）胡济邦：报道苏联抗德斗争

胡济邦，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1911 年出生于浙江永康，1928 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并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 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转到北京大学就读，后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胡济邦精通英、俄、法、日、匈、拉丁等外语。1935 年，她被派往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任驻苏大使颜惠庆的新闻秘书。从那时起，胡济邦就开始为上海《妇女生活》杂志发回她的系列报道“新世界巡礼”，她的投稿成为《妇女生活》的诸多国外通讯之一，被刊登在“来雁集”栏目。这些报道主要反映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1941 年起，胡济邦兼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在苏联从事采访活动十余年。

《中苏文化》创刊于南京，1937 年 11 月迁至重庆，改出抗战特刊半月刊，卷期另起。1939 年改为月刊，1940 年改为半月刊，1944 年起改为月刊，1946 年起迁南京出版。

苏德战争期间，胡济邦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采访报道了列宁格勒保卫战、莫斯科保卫战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她为《中苏文化》撰写的新闻报道主要有：《解围前的列宁城》（《中苏文化》13 卷 1－2 期合刊）、《侨苏波兰爱国志士同盟会之活动》（《中苏文化》15 卷 5 期）、《列宁格勒防卫》和《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中苏文化》13 卷 5－6 期合刊）、《列宁格勒防卫战之经过》（《中苏文化》15 卷 10－11 期合刊）、《波兰解放区内之土地改革》（《中苏文化》16 卷 6－7 期合刊）、《庆祝全民胜利中的莫斯科》（《中苏文化》16 卷 8 期）、《苏联收复区内之经济复兴》（《中苏文化》16 卷 9 期）、《苏联的铁道运输》（《中苏文化》16 卷 9－10 期合刊）等“苏联通讯”，她还采访过崔可夫、朱可夫等苏军将领，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

---

① 参考书：《一千个春天》，《陈香梅文集》第 1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陈纳德将军与中国》，《陈香梅文集》第 4 卷，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这一时期胡济邦的苏联通讯大多与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她善于将严肃、枯燥的事实与轻松、愉快的背景互相衬托，体现出苏联人民是何等爱护自己的国家从而不得不坚强地保卫和平。她总是在铺陈事件的前因后果时，不经意地穿插一些历史故事，使文章为之增色，表现出作者广博的知识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通讯中表现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对坚持抗战的中国读者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解围前的列宁城》（《中苏文化》13卷1－2期合刊）一文先是介绍了列宁城的前身彼得堡是俄国“文化最高的一个历史城”，又是“俄国北部国防的前哨。此地为海军国防首要。”它还是“俄国吸收西欧文明和沟通海外贸易的门户。这个少年俄国的摇篮——彼得堡的出现，以俄国19世纪学者伯林斯基的话来说：‘是一种必然和永久的现象。它是用俄罗斯生命中的一切活素培养起来的一棵巨大树木’。这棵树木不能被任何风浪所摧折，守护人应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是彼得的后世子孙所谨记不忘的使命。”从这简单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列宁城的人民浴血奋战保卫这座城市的自发动力了。

美丽的列宁格勒是苏联第二大工业城和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列城人在战前过着幸福、和平、宁静的生活，但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城市却遭到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的侵略。德军重重包围封锁列城，妄图使该城的人民困死饿死。但是，列城人用大无畏的精神回答敌人的封锁。封锁先在空中击破，使莫斯科方面的大量运输机向列宁格勒投送粮食。接着又在陆上冲破敌人的封锁圈。由于日丹诺夫的建议，在列宁格勒东边的拉多日冰湖开辟汽车大道，铺设铁路支线。在这种环境下，苏联终能找出供给百万军民粮食的生命线，是希特勒在梦中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列宁格勒市人民的出奇制胜挫败了希特勒的阴谋。

“列宁格勒人已度过最痛苦的一关，这种英勇牺牲、顽强抵抗和坚持到底、死里求生的精神，为世界各国的城市保卫战写下了最光辉的一页，给苏联全国人民在以后斗争中增加一课最新的教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胡济邦的苏联通讯为抗战中的中国提供了一种借鉴的榜样，通过赞美列城人民英勇的抗敌精神来鼓舞中国的抗日战争。

（二）《大公报》驻法记者“孝隐”

《大公报》派出的第一个驻英记者是萧乾，时间是1940年春。当时，希特勒正在轰炸伦敦，萧乾到了人生地疏而又硝烟弥漫的英国，一下子展开采访活动，自然是有困难的。《大公报》香港版编辑徐铸成正苦于国际新闻稿件匮乏，突然有一天收到了一封从巴黎围城中寄来的厚厚航空信，里面是四五张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字迹十分工整、秀丽，内容是描述马其顿防线被突破后，法国统治者如何惊慌失措，举棋不定以及巴黎城中各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文笔十分生动。稿件署名“孝隐”。

徐铸成看到稿件，喜出望外，就立即回信，请“孝隐”任驻法特约记者。以后，每隔半个月，必有巴黎通讯一篇。随着法国政府的播迁，稿件的出发地也不断变化，最后是从维希出发。她的稿件往往很长，需要两三天才能刊登完。但是字迹一直是非常工整，行文流畅，刻画入微，又善于恰当地运用成语典故，以描写维希那些人的狼狈相。她有一篇文章，引用中国民间的俚语，讽刺贝当和魏刚：“七十三，八十四，活受罪，老不死”。信手拈来，恰成妙喻。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贝当、霞飞、福煦都是有名的统帅，战后深受法国人民爱戴，就连上海的法租界，也把三条主要马路改用了他们的名字。魏刚是当时的民族英雄，率部坚守过凡尔登要塞。而此时贝当和魏刚却卑躬屈膝，向希特勒低头，做了纳粹的傀儡，贝当当时正好84岁，魏刚也恰是73岁。

孝隐的通讯，令《大公报》香港版编辑徐铸成心折。“老实说，从年轻时倾倒于飘萍、彬彬等通信后，孝隐之作，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孝隐和徐铸成的联系中断，以后再没有联系。[①]

上述女记者从国内和国际抗击法西斯的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大量关于抗战的报道。她们的新闻活动成为抗战时期女新闻工作者活跃

---

① 此段文字，参考徐铸成《报人六十年》第102－103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的表现之一。

八、广播界的女新闻工作者

救亡与抗战时期广播界的女性工作者也有很大发展。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代女播音员诞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用声音呼吁抗战救国。

(一)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第一代女播音员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举行开幕典礼并开始正式播音。这是国民党当局继中央通讯社（1924年4月创办于广州，1928年迁到南京）、《中央日报》（1928年2月创办于上海，次年2月在南京出版）之后，创办的第三个全国性的中央宣传机构。该台创立初期属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辖，1932年夏，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正式成立，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该台的筹建是“党国”要人陈果夫一手倡导和筹划的。1928年2月，他同戴季陶、叶楚伧等倡议筹设广播电台，并委托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广播设备。建成后的中央台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后院，并选定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开预备会之日（1928年8月1日）开始播音。当天，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等均前往致辞。该台每天下午、晚间各播音一次，共计3小时，内容有演讲节目和新闻节目，所有新闻稿件均由中央社提供。①

电台草创伊始，播音工作没有步入正规。除了一位男播音员黄天如外，几乎没有固定、合格的国语播音员，张三李四都可以去凑合一阵。于是，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那高耸云天的铁塔天线上播散四方的常常是“吴语普通话”或者“江淮普通话”，有时还夹杂着一些俚语。而当时记录新闻占的比例很大，各地收音员不仅要听，而且要记。由于方言的阻隔，他们常常为之困惑，叫苦不迭，每每写信呼吁。有一次，竟由总务科长陆以灏播音，他说的是一口地道的江苏太仓话，还夹带一些方言俚语。听众哗然，批评的信函纷至沓来。显然，这对作

---

① 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1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6月版。

为堂堂“中华民国”喉舌的中央广播电台，可谓大煞风景。因此，播音问题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南京之莺”——播音小姐刘俊英

1933年，中央广播电台总工程师冯简到北平招考播音员。一是广播在当时属新文明的产物，二是有“中央”的来头，三是明码标价的高额薪金，这在当时引起许多人的极大兴趣。消息一经见报端，平津一带的青年趋之若鹜，全国各地跋山涉水前往应试者也大有人在。设在西长安街电信局的偌大考场，竟被两三千名考生挤得水泄不通。笔试除了历史、地理、国文、数学，还加了一项颇为新颖的内容：通篇用拼音字母写一篇行文自然流畅的文章，这成了考生们难以通过的隘口。来自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的刘俊英，却轻易而举地通过了考试。她各科成绩俱佳，尤其那篇颇具文采的文章，使人拍手称妙。口试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刘俊英也顺利地通过了。口试主考人冯简，早年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康奈尔大学电机硕士，曾任东北大学教授，是位知识渊博之士。他在文、史、哲、地领域内广泛提问，刘俊英对答如流，这场口试，仿佛成为两位朋友的促膝谈心和切磋学问了。冯简很欣赏刘俊英的才华、气度和素养，刘俊英很顺利地被录取为播音员，同时被录取的还有张洁莲、吴祥祜。

刘俊英，时年25岁，河北沧县人。张洁莲，哈尔滨人，她痛恨亡国奴的生活，辗转到了北京。吴祥祜，祖籍江西，后来移居广西，毕业于北平女师大附中，她的家庭系书香门第，曾祖父是前清“探花”，但到了父辈，家道中落不得不闯关东。“九·一八”以后，目睹日寇猖獗，她和父亲又回到关内。

3个精选而来的女强手，在中央台以特有的播音韵味，使听众耳目一新。节目设置日趋丰富并逐步系列化发展，为她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她们都是多面手，能写稿，能播音，能歌咏，能演播话剧，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刘俊英于1933年10月1日来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当上播音小姐。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嗓音圆润。多年的北平生活，为她的准确发音打下基础；良好的文化素质，使她恰到好处地把握语言的抑扬分寸，特别是儿童节目，自编自播。那些趣味横生、知识丰富的节

目，通过她那娓娓动听、令人陶醉的声音表现出来，不但使少儿听众为之着迷，就是许多成年听众也深感兴趣。每逢晚饭后“黄金时间”这档节目播出之时，许多听众就静候倾听，这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

广播没有国界。刘俊英的播音不仅在国内影响日深，在东南亚华侨、华裔中，在当时的敌国日本粗通华语的国民中，也颇受欢迎。日本政府喉舌《朝日新闻》驻南京特派员宫崎于 1935 年春来中央电台专访刘俊英。有着强烈的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意识的刘俊英，不惜冒犯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吴道一反对女播音员出头露面、限制女播音员正常社交的陈旧规矩，接受了宫崎的采访。1935 年 4 月 15 日，日本东京《朝日新闻》以显著地位和醒目标题刊出《南京的夜莺访问记》，副题为《美妙动人的声音，漂亮动人的小姐，果然是金铃般的声音》，并且配发了一幅刘俊英的半身侧面照片，图片的说明文字是这样的：“南京有一位有着优美动听声音的女播音员，她的声音美得好像金银的树叶飞舞飘落，又像春之女神摆动着金铃的声音。在听取南京广播的人们中间，常有人问起：‘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是叫什么的女人？’即使能听见声音，也看不见她的样子。本文对南京的夜莺的真实面目做了采访。”此消息不胫而走，“南京之莺”的美称也就传扬开来。

南京陷落前，由于日军空袭造成市电不能正常供应，刘俊英常常在如豆的灯光下备稿，以致眼疾发作，双眼蒙上了白翳。在当时，即使中央医院的名医对于此病也束手无策。然而，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激励着她，刘俊英没有从话筒前退下来。凄厉的防空警报、盘旋轰鸣的敌机，震耳欲聋的炸弹，她全然不顾了，她要不停地为民族呐喊。紧张、激愤、悲痛，加剧了她眼疾的恶性循环，视力急剧下降，但她仍然倔强地坚持到最后那几天。南京沦陷前 20 日即 1937 年 11 月 23 日午夜时分，她吃力地辨认着稿件上的字迹，用她那为听众熟悉的声音，那饱含愤怒和悲伤的声音，完成她的“告别播音”。眼疾，无情地将刘俊英从话筒前拉扯下来，剥夺了她的艺术生命。

在当时的社会，对人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不但要有才气，而且还要有寻找后台、善于处事和运筹各种条件能耐的俗气。但刘俊英性

格娴静、内向、孤傲、倔强，她绝不逢迎拍马，往往为一篇播出稿的修改，同上司顶撞，甚至敢于坚持己见。这种品性，决定了她为那时的社会所不容。她成了播音界的红人，但在上司那儿，始终被目为难于驾驭的角色，总是被排挤在人事圈子之外，定职、定级，自然是没有她的好处。

离开重庆，刘俊英已是心力交瘁。她先去贵阳电台，而后昆明电台……起先还搞点资料工作，后来近乎双目失明，无法正常工作。昔日文采飞扬、语音叮当的播音小姐已不复存在，生活的厄运过早使她步入中年，变成了一个黯然无声的赋闲人物。

“南京之莺”这颗播音明星，在那动乱、污浊的年代，只不过是一颗流星，在黑夜里微光闪烁地划了一道弧，便消失在无际无涯的夜空里了。[①]

2.“儿童节目”主持人：刘俊英、张洁莲和吴祥祜

与刘俊英一道通过考试进入中央广播电台工作的还有张洁莲、吴祥祜。东北沦陷后，张洁莲痛恨亡国奴的生活，辗转到了北京，有幸考入中央广播电台的大门。她少年老成，虚心观察，琢磨别人的播音技巧，很快掌握了工作规律，形成了平稳、得体的播音风格。吴祥祜，祖籍江西，生于北京，毕业于女师大附中。她性格开朗活泼，爱国心很强。“一·二八”淞沪抗战、古北口抗战，还是十几岁的吴祥祜，就自告奋勇上前线参加救护队。1933年来中央广播电台时，她才20岁。

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功率改为75千瓦以后，广播时间延长，听众也增多了。此时，广播电台出现了节目改革势头，改革的表现之一就是设立了对儿童广播的《儿童节目》。该节目以谈天说地的形式，阐扬中华古老文化和辉煌历史，勉励孩子们奋发好学，自强不息，而贯穿其中的内涵，则是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负责播讲并撰写上述节目稿件的，是刘俊英、张洁莲、吴祥祜。

---

① 上述关于刘俊英的文字，转引自《“南京之莺”》，载于《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第24－30页，汪学起、是翰生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当时实行编播合一的节目主持制度。三位播音员分别扮演三个孩子的角色。刘俊英扮演一位勤学好读、博古通今的小朋友。她首先由中国历史故事入手，由尧、舜、禹，直说到民国革命和当前的国难危机，上下四千多年，洋洋大观，尽把历代的天下大事，历史名人，民族英雄等，前后串讲，作了一次历史知识大普及。张洁莲专讲地理。为此，她游览了长江南北、大河上下、长城内外、黄土高原、西南山区以及岭南诸地……，将自己的见闻知识讲给小朋友们。上海繁华、灵隐奇境、海宁观潮、天潼记胜、桂林山水、高原风光、岭南形胜，以及各地物产交通、人文地理等。她不断提醒听众：中华大地，广袤无垠，物产丰富，非常可爱。也许是女子与儿童有更多互通之处的缘故，她很了解孩子。广播的地理部分，深入浅出，娓娓动听，俨然是孩子们的一个小导游。吴祥祜生性好动，来台之初，播音并无长进，以致试用期满，上司还不予转正。经此打击后，她一下子成熟了，潜心学习，很快在《儿童节目》里获得了成功。她扮演一位随父到各地考察、游历的小朋友。一路上，她广交小朋友，回来后为排遣思念之情，于是不断地给各地小朋友广播公开信。她的谈话内容很广，既说历史，又说地理，也谈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救亡的政治局势。很多小朋友将她引为至交，纷纷给她去信，于是吴祥祜选播小朋友的来信，形成了各地小朋友交流思想的讨论会。1934年，她在节目中号召小朋友捐款为国家购买飞机。小朋友纷纷将零花钱汇到电台，果真集腋成裘，募集了不少款项。

3位扮演小朋友的女播音员还将世界各国的兴革衰败、山川形胜等天下风云与古老的中国相结合，在“日本的勃兴”中，她们动情地说：“各位小朋友们，你们瞧，一个地小民贫的岛国，只要上下一心，也能转弱为强，何况我们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国?!只要我们四万万人能精诚团结，睡狮终有怒吼的一天！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努力准备吧！准备这只睡狮怒吼吧！”

3位女播音员那趣味横生的题材，那近似稚嫩的童音，那清晰流畅的语调，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打动了众多人的心，很快引起社会注目。丰富的史地知识，使大人们也开阔了眼界。这个节目变得老少皆宜，很多成年人也成了听众。当时，每当这个节目播出时，有不

计其数的耳机收听者在街头驻足，听众的信件纷至沓来。

刘俊英、吴祥祜、张洁莲被称为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三姐妹”，在当时的播音界影响很大。吴祥祜随中央广播电台迁到大后方后，还经常收到她当年小听众的来信。例如，1939年1月20日，一位叫雁君的听众给电台来了一封信：“暄谷：看不到你给小朋友的通信快要两年了。这两年中的变化，是怎样的紧张而又严重！我想在每人的心里，一定有许多感觉和怀想……从前我在通讯里认识了您，知道您是一位多情善感而又善于启发我们思想的朋友，是时代中的冲锋号，是黑夜中的一颗星。可是，现在听不到号音了，见不到星光了。难道大时代的激荡，没有震撼着您的意绪吗？难道大时代的艰苦，已经毁坏您的精力吗……起来，在这时代中，请唤起小朋友，来发表各人的感想，联合起来，为时代的创造者。更希望您在小朋友队里继续做我们怒吼的领导者！再会。”另一封信则是深沉而更为感人的。这是1939年1月22日一位叫松龄的听众写的。他说：“暄谷：两三年前看见您的全国游记，使从未离开家乡的我，无时不心驰神往，愿为黄鹄奋翅高飞。”然而，出游不成，便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离乡情绪”。抗战爆发了，故乡遭敌蹂躏，这位松龄此刻真的离开了故乡，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但这是为形势所逼而背井离乡啊！时至今日，萌发了一股更加强烈的“思乡之情”，同当年的情感完全相反了。最后，他说：“暄谷：喊青年们起来吧，赶快夺回我们的故乡。时间已经告诉我们，故乡的一切破碎不堪了，再因循，就完了。莫徘徊，空悲切！”①

上述女播音员中，刘俊英、张洁莲在离开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之后的音信都不得而知。只有吴祥祜参加了1949年的人民广播事业，后来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厅的干部。1986年11月12日，南京“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正式对台湾广播。吴祥祜应邀作了录音讲话，在该台对台湾首次开播时播放。不过，这次不是同小朋友们谈心，而是和当年的广播界同仁，和当年的“小听众”一抒衷情，介绍

---

① 上述内容参考《“南京之莺”》，《“儿童节目”三姐妹》。两文均载于《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汪学起、是翰生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

了祖国大陆的大好形势，殷切盼望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以期在有生之年，老朋友们重新聚首。[①]

（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新闻媒介主要是报刊和通讯社。党的报刊和通讯社的宣传，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推动全国军民的抗日救亡斗争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报刊和通讯社宣传工具本身的局限性，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和干扰，使党的政策和主张以及抗战局势发展的报道不能不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例如，在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受到敌人的层层封锁，很难传递到国统区和沦陷区去，偶尔有少量的党报传过去，也只能是在极少数人的范围内秘密阅读。新华社的文字广播，虽然可以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出去，但又必须有收报设备才能抄收，再经过译电，方能阅读。除了党的秘密机关和少数新闻单位外，一般部门和群众是难以置办的。[②]

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同意在国统区出版中共的报刊。1937 年 12 月，中共在武汉创办了《群众》周刊。1938 年 1 月 11 日，中共在武汉创办了《新华日报》，自 1938 年 10 月 25 日起，《新华日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面对党报党刊在国内外读者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国民党当局深感不安。他们除了运用自己主办和控制的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进行反动宣传外，还多方采取限制、监视乃至迫害的手段对付《新华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这些事实说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形势下，党的报刊和通讯社的宣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抗战的需要。因此，建立人民的广播电台，使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人民能够直接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了解

---

① 参考《“儿童节目”三姐妹》，载于《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汪学起、是翰生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1 版。

② 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 66－67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年 6 月版。

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无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①]

为了尽快筹建人民广播电台，中共中央决定于1940年春成立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会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广播电台的台址确定在延安西北19公里处偏僻的王皮湾，这里人烟稀少，便于隐蔽，是比较理想的建台之处。

电台的机房和动力间位于延河支流西川南岸的半山腰的两孔窑洞里。两窑洞高均为3米多，一孔约27平方米，一孔约16平方米，后部有一条甬道相通，用来敷设电线，连接发电设备和广播发射机。甬道中间还开凿了一孔大约5平方米的小窑洞，准备放置器材和零件使用。另外，又在西川北岸沟口打了两孔土窑洞作为播音室，白木楂桌上放着一只旧话筒，用羊毛毡作门帘，隔音设备是用延安生产的灰毛毯，从上到下订满墙壁，播音设备极其简陋。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王皮湾村还驻守着30多名武装战士。

1940年12月30日，中共领导创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XNCR（当时按照国际有关规定，我国无线电台的呼号第一个字母为X，NCR是英文New Chinese Radio的缩写，即新中国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 1940年春到1943年夏由于技术和器材原因暂停播音。这一时期的宣传对象是敌后根据地军民和国统区人民以及日本侵略军，宣传的目的是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2. 1945年8月中旬，抗战胜利后，延安台恢复广播；1947年3月，延安台改名为陕北台，1949年3月25日迁北平，改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这一时期，广播的对象主要是国统区人民和国民党军队，宣传目的是团结全国人民，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电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广播科提供，广播科长是李伍，编辑有陈笑雨、王唯真等人。通讯员每天骑马将广播稿送到王皮湾，供播出使用。播音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

---

① 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第67－6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等等。此外，还有音乐戏曲节目，主要内容是演播抗日歌曲。

从建立起一直到1946年，延安台的播音员是清一色的女播音员。女播音员是由新华社选派的，最初的女播音员是徐瑞璋（麦风）、姚雯、肖岩、孟启予、钱家楣和韦君宜等，但不久麦风和姚雯分别调离播音岗位。

肖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最早的播音员之一。1919年生，河北丰润人，1936年在北平读书时参加学生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北平，次年辗转到延安，先后在抗大、中国女大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于1941年夏从延安中国女大高级班调到军委三局九分队做播音员。1943年春，延安台暂停播音后，她一度在解放日报社国际部工作。1947年春，肖岩随新华总社撤出延安，转战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任编辑。1949年北平解放后，在新华社新闻学校任教务科副科长、班主任，从事新闻干部培训工作。

孟启予，福建长乐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京秘密学联，1937年参加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1938年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开始从事新闻广播工作，并任播音科长。刚开始播音时，她的字音、语气和情感不能协调一致，但经过练习和学习，播音水平大有提高。她的声音尖锐泼辣，语调富于变化，最擅长播送毛泽东的幽默辛辣的文章。孟启予担任播音组长后，耐心地帮助同事克服播音中遇到的问题。延安台最早的两名男播音员王恂和齐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

钱家楣于1946年6月初被调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做播音工作。她的声音悦耳流畅，富有感情色彩。她先后播出过毛泽东的1947年《新年祝词》、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预定战略任务后主动撤出延安的消息和解放军在青化砭打胜仗的消息。

丁一岚于1945年10月参加新创建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工作，她嗓音清脆，普通话标准。在担任公审大汉奸于品卿的实况转播中，她那激奋的控诉，昂扬的宣判，使法庭内外的群众感到扬眉吐

气。1949 年 10 月 10 日，她和齐越一道参加了开国大典的现场实况播音。[①]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 年 10 月 26 日出生于北京。韦君宜的父亲魏仲衡为老同盟会会员，追随中山先生谋光复大业，奔走有年，积功署大连铁路局长。韦君宜早年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934 年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在校期间，曾任《清华周刊》编辑，积极参加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加入民族武装自卫会，1935 年投身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韦君宜辍学在湖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任襄阳特支委员、宜昌区委委员。1939 年 1 月到延安，历任中央青委干事、《中国青年》杂志编辑、新华广播电台编辑。解放战争期间，韦君宜于 1947 年 3 月随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到晋察冀解放区工作，曾任平山县温塘区委委员，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9 年初参与《中国青年》复刊筹备工作，并任编辑干事。新中国成立后，韦君宜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3 年 7 月调入中国作家协会，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9 年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60 年韦君宜调任作家出版社总编辑。1961 年 4 月该社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1 年 2 月任总编辑，1983 年 10 月任社长，直至 1985 年 12 月离休。

延安台的女播音员对待工作认真严肃，播音业务出色。据肖岩回忆，她在延安台两年播音生活中，从来没有读过错字。钱家楣的播音曾经使毛泽东赞叹不已。1947 年 4 月，她播送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的消息、评论，播到痛斥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语调严厉激烈；播到活捉国民党旅长、陕北军民召开祝捷大会的时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语调热情洋溢。毛泽东在一个暂住的农家小院里听到她的广播，赞叹不已地说：“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辞严，讲

---

① 肖岩：《延安播音生活回忆》；孟启予：《我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音的时候》；钱家楣：《陕北战争期间播音工作的片段回忆》。以上文章均载于北京广播学院编：《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

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爱憎分明，这样的好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①]延安台的女播音员们因陋就简，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用自己的声音向全国全世界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她们的播音曾经感化国民党的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飞往延安，为国统区的听众传去了解放区的声音，为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四节 《新民报》女经理邓季惺

“假如偶然走过新民报经理的门外，常常会听到一阵像打长途电话似的，用高吭而拖长的调子在谈话，内中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条斯理地用悠长的调子说着四川话，即使是生气的刹那，也依然是那么悠扬动听，似乎没有一点急躁的表现。

“这些谈话中大都是与报馆的业务有关的：不是关于借款，广告和发行的问题，就是总务上的事体。

“这是新民报的总经理邓季惺女士。”[②]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曾经出现过一批杰出的女报人。以精于报业经营管理而闻名的，五四到抗日战争那一段时间当属汤修慧，抗战时期恐怕就数邓季惺了。

邓季惺（1907－1995），原名邓友兰，祖籍四川奉节。邓季惺出生在重庆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她的祖父邓云笙在1891年创办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后因外资入川而倒闭。她的叔父是著名的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副会长，她的舅舅是同盟会会员，她的父亲邓绍云继承了先人“实业救国”的梦想，办过煤矿、布厂、养蜂厂，也当过银行行长。她的母亲吴琬，四川著名老同盟会会员吴梅修之妹，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创办了重庆第一所女子学堂。邓季惺从小性格倔强，聪颖过人。她曾经就读于重庆四川省立第二女

① 转引自杨沙林著《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第5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② 董显光：《新民报女老板——邓季惺》，《人物》杂志第二年第六期。

子师范，受业于萧楚女、张闻天、恽代英等人。当时出川读书成为进步青年要求进步、向外发展的一种风气，邓季惺女二师一毕业就报考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预科。在那里，经女师同窗好友吴淑英介绍认识了吴的弟弟、复旦大学学生吴竹似，1925 年，他们在上海结婚。

1927 年，中央通讯社的 3 位青年编辑吴竹似与陈铭德、刘正华筹办一份同人报。他们要继承孙中山办《民报》的革命传统，办《新民报》。1929 年 9 月，《新民报》在南京洪武街两间租赁的平房里创刊。陈铭德任社长，吴竹似任总编辑，刘正华任经理。吴竹似主持版面，身兼二职，日夜操劳，第二年得了肺结核，一年后就赍恨而殁，时年 24 岁。

邓季惺没有被苦难压倒，坚持学业。由于孤身在外上学，邓季惺不时得到陈铭德的照顾，1933 年与陈铭德结婚。邓季惺在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于 1933 年秋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司法部任职。1935 年她辞去司法部工作，在新民报社挂出牌子，往返于南京和镇江执行律师事务，同时与曹孟君、谭惕吾一起主编《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着重研究妇女经济和社会问题，呼吁改善各界劳动妇女的生活，在东南各省颇有影响，后来成为妇女界救国会的一个宣传阵地。邓季惺同时还在《新民报》“法律问答”专栏为读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1937 年 6 月她正式参加《新民报》，担任经理。从此，她与《新民报》的发展休戚与共，以自己的远见、果断、精明、强干为《新民报》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抗战中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声誉隆隆，最后发展成为旧中国最大的民间报系之一，拥有五社八版，[①] 一跃而能与《大公报》分庭抗礼，邓季惺功不可没。后人称赞她有“法律家的眼光，理财家的手腕，报人的见识，还有一种女人才有的坚韧持久的工作耐力和一般女人没有的遇事果断的魄力”，这是符合实际的。[②]

---

① “五社八版”为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北平、上海各设一社，南京、重庆、成都三社均出日晚两报，北平社出一日刊，上海社出一晚报。

②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第 14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版。

邓季惺学的是法律，由于法律思维的影响，她是一个喜欢依法办事的人。用她的儿子吴敬琏的话来说："我母亲比我父亲（指陈铭德）更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是指在办报中，陈铭德更多的是靠他的个人关系，而邓季惺更多的是靠规章制度。邓季惺有一套独特的报业经营管理之道。如果把目光投向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新民报》，探索它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我们会发现，当时的《新民报》女经理邓季惺一些独特的办报方法与策略是《新民报》在困境中发展、壮大，逐步走上企业化经营之路的有力保证。

第一，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道路打下基础。

《新民报》在南京洪武街创刊之初，业务收入不能自给。当时的发行数只有两千份左右，很多还是赠阅，版面几乎全是中央社稿，没有什么可看的。广告收入每月还不到二百元，全靠四川军阀刘湘的补助和国民党中宣部的津贴维持，条件是为刘湘做宣传和刊登国民党当时所出的《七项运动》。报社的门市部除了一两个工作人员负责收发、联系工作之外，根本没有注意到经营管理。"九·一八"事变后，《新民报》及时报道了日寇侵略中国的消息，刊登了爱国抗日团体的活动，支持学生的抗日请求，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激情，报纸发行量迅速上升，一度增到一万多份，到1936年春已增加到一万六千多份，广告收入占营业总额的50%以上。这时，原先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报纸的发展了。1937年夏，邓季惺正式参加报社的经营管理。

她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对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使《新民报》走上企业化经营发展之路，并促成改组为公司。以前，每天刊登的广告，大多没有登记，广告费的收取也没有严格标准。邓季惺用严格的财务制度来管理广告，派专人收集每天刊登的广告，做成表格，然后根据表格收钱。现金支付的，全部入帐；结帐广告，就记债权债务。在发行上，每天也有报表。在印刷上，邓季惺对报纸的损耗抓得很紧，每次卷筒纸装上机器后，上面破

的纸都被收集起来过秤，以便最后核实与平衡。[①]重庆《新民报》发刊不久，邓季惺就请立信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来为报社财会人员讲课，自己每一次都在下面旁听。

1943 年《新民报》出成都版，邓季惺任经理。成都《新民报》的经营管理也是值得称许的。在发行方面，开创初期的成都版在邓季惺的领导下，建立了订户卡片，一方面掌握报纸发行情况，另一方面及时向订户送续订通知，方便读者。以后改为每月中期和月末，登报通知两次，既方便读者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订户的稳定性。[②]

1937 年“南京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立股份公司的前提是有规范的财务管理机制，邓季惺对《新民报》的财务管理为《新民报》走上企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新民报》股份公司的成立，与邓季惺所做的前期规范管理工作是分不开的。另外，从 1937 年 7 月宣布成立的《新民报》公司董事会成员来看，公司的成立凝聚着邓季惺和陈铭德的无限苦心，也是在当时情况下苟全报纸性命的无奈做法。这个董事会包括了国民党集团的各个派系，有很强的“中央化”色彩。我们不妨看一下具体的成员：董事长萧同兹（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社长）；常务董事彭荣陈（国民党中宣部新闻事业处处长），梁寒操（立法院秘书长，属孙科系），王淑芳（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董事为方治（CC 系头目之一），卢作孚（代表四川资产阶级），李泮香（刘航琛之妻。刘航琛，四川财阀，曾经任四川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张廷休（与 CC 系和何应钦都有关），陈铭德（由社长改为总经理），邓季惺（经理），罗承烈（总主笔），赵纯继（总编辑）；监察人为李秉中（黄埔一期学生，作为黄埔系代表），黄仲翔（复兴社代表），沈辅彝（刘湘驻京代表），余致中（即余唯一，前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主任，《新民报》原始赞助人之一），邓健侯（立法委员，与孙

---

①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版。

② 吴亦兰、韩冼厚：《回顾成都〈新民报〉》，载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科有关)。[1]以上官员及新民报高级成员都是赠股，他们当然不会干预《新民报》内政，遇有迫害来临，多少还有些遮挡。

《新民报》是民间报纸，只有进行企业化管理，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以报养报，自给自足才能谈上言论自由。

第二，她以企业家的远见为《新民报》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作为一个企业的主管，材料和资金是必须精心的，尤其在物价不稳、金融动荡的战争时期。邓季惺深谙此道，在物资供应上，她一直保持高度敏感。抗战时期，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的销数激增，她就委派了四五个青年，专司其职，及时购进报社所需的纸张和材料。抗战时期，金融市场不稳。但即使是金融市场上的小消息或小波动，都能听到她和银行家们的电话，探询确切的消息，如果有利于她的事业，她会全力以赴。[2] 抗战时期成都附近的新津机场驻有许多美国士兵。他们常常到成都玩，用美元买东西。邓季惺马上盯住了这些人，在成都，她就购进了不少美元，也买了不少黄金公债。邓季惺总是及时地把所赚的钱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止手中的货币贬值。

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寇飞机多次对重庆市区进行轮番轰炸，一些报社的房屋、机械遭受严重损失，导致各报无法正常出版。在各报出版困难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决定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重庆十家报纸的负责人组成联合委员会，主持其事。[3] 这种做法，一方面是为了坚持出报，另一方面，也是国民党加强新闻控制的一个方法，想乘机把《新华日报》和其他异己报纸吞并。在联合版期间，各报都不愿揽印刷这个活儿，《新民报》承担了印刷业务。邓季惺是有考虑的，她借此机会向国民党当局要下了大田湾的一所陶瓷中专学校的校舍，作为《新民报》印刷厂的厂址。事后，有同业说："想不到被《新民报》捡了个大便宜!"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得到国民党政府20万官价美元外汇，

---

① 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第16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② 董显光：《〈新民报〉女老板——邓季惺》，《人物》杂志第二年第六期。

③ 这十家报纸是《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新蜀报》、《商务日报》、《西南日报》、《新民报》等。

《新民报》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1946年，邓季惺负责的南京、北平、上海三个分社的创立，全仗着抗战八年中成都、重庆两社积累起来的资金。[①]

第三，义利兼顾，以义促利，重视人才，这保证了《新民报》在困境中发展的力量。

作为一家民营报纸，《新民报》是以报养报长大的，它靠自己的新闻和言论赢得读者，从而有了较为可观的广告，广告收入占它全部营业额的40％以上，可以说它是非常注重赢利的。

邓季惺管理下的《新民报》非常关注、支持抗战。1938年，邓季惺发动报纸义卖活动，将报费、广告费全部捐献抗日救亡之用。重庆几十个救亡团体的几千爱国青年上街叫卖《新民报》，山城为之轰动。

《新民报》坚持“中间偏左，遇礁即避”的政治倾向，但在无法妥协的时候，《新民报》还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它并不以利害义，用邓季惺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怕停刊”，她更重视报纸的“名节”。

有一次，上海的《新民报》因为一篇批评文章出了岔子，国民党当局大发雷霆，一连来了好几个电话，责令报馆追究作者，同时谴责报馆，要罚令停刊。当天下午，报馆编辑部的几位编辑都感到有些棘手。正在焦急时候，邓季惺来了，有人劈头就一句“我们要停刊了”，邓季惺似乎已有所闻，依然慢条斯理地说：“停刊一天，对我们的报纸有没有影响？当然看涨！那么，增加的销数是否可以弥补我们一天的损失？”大家被她的坦然态度和精明的计算折服了。[②]

解放战争期间，《新民报》反对独裁，同情人民苦难，政治倾向明显。南京、成都两社先后于1948和1949年被查封和劫掠，不少同仁被捕、流亡，牺牲在渣滓洞的就有5人，邓季惺也曾被列入黑名单。

邓季惺有一种宁折不弯的个性，只要报纸的立场正确，她并不因国民党的威胁而退却。因为她知道，《新民报》的发展靠的正是表达民间的呼声这一立场，如果改变这一立场，《新民报》就失去了生命。

---

① 邵后：《报坛女杰邓季惺》，《新闻战线》1988年12月。

② 董显光：《〈新民报〉女老板——邓季惺》，《人物》杂志第二年第六期。

邓季惺和陈铭德非常重视人才。《新民报》南京总管理处谋求上海版复刊的同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释放一名被捕记者的要求。这一点他们应允了,但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除由他们"介绍"一名总编辑、两名记者来报社外,还要求"清除"赵超构与浦熙修。陈铭德和邓季惺接受了前一个条件,拒绝了后者。他们说:"赵、浦二位在《新民报》工作多年,从来没有不正常的活动,也决不是共产党。如果以不用此二人为条件,上海、南京两社的许多朋友都要为之心寒,不愿再在《新民报》做事了。你们如果坚持,我无法交代,报纸只好不出。"①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干练持重，在朋辈中尤以重意气重然诺著称，因此网罗了当时许多俊才。当时《新民报》五社的主要成员有：张恨水、赵超构、张慧剑、吴祖光、马彦祥、司马讦、方奈何、赵纯继、韩鸣、凤子等。而名作家如郭沫若、老舍、夏衍、曹禺、袁水拍、茅盾、巴金、叶圣陶、黄苗子、姚苏凤、柳亚子、叶浅予、廖冰兄、郁风、丁聪、陈白尘等皆为主要支持人。《新民报》的发展也是"夫妇经理三张一邓"通力合作的结果。"三张"张恨水、张友鸾以及"副刊圣手"张慧剑，邓季惺在经营管理上对《新民报》的发展、壮大功不可没，所以国民党中委王昆仑赠诗陈铭德"百战相随唯一邓，平生得意有三张"，②以此评价邓季惺在《新民报》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黄金累千，不如一贤"，邓季惺与陈铭德这一对黄金搭档，在人才问题上观点高度一致。

第四，邓季惺的踏实苦干、敏锐灵活是抗战胜利后《新民报》迅速复刊与创刊，发展成为有五社八版的民间大报的关键。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靠着抗战期间在成都、重庆两社积累起来的资金，立即恢复南京版日刊，这种速度，在当时除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外，就数《新民报》。主持这项工作的就是邓季惺。

1945 年 9 月 18 日，邓季惺独自一人从重庆飞到南京，在没有一个助手的情况下，她凭借自己的脑灵眼明和脚勤，半个月左右就收回

---

① 张林岚：《走向新中国——回忆解放前的上海〈新民报〉晚刊》，载陈铭德、邓季惺等著《〈新民报〉春秋》，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② 巴客:《新民报将出上海版——记夫妇经理与三张一邓》,《消息》第4期,1946年4月。

了报社原来的社址，置办了印刷厂和编辑部、经理部的一些必要设备；然后去北平，为新创的北平社购置了社址和印刷厂设备；最后奔赴上海，准备在上海社出版晚刊的物资。加上原来在成都和重庆出版的《新民报》，《新民报》形成了在全国五大城市出报的局面。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办了一般人办不到的事。说邓季惺是《新民报》的奠基人，并不夸张。

邓季惺为《新民报》在战后的发展立下了奇功，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光彩的一页。她本人的能力与作为在当时属凤毛麟角，这种情况在今天也不多见。多年以来，她踏踏实实，肩负重担，没有怯懦，没有衰退，这不仅在中国新闻界是少有的，在中国妇女中也是少有的人物！

虽然《新民报》一直以"超党派"、"民间"、"独立"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新闻和政治是无法割裂的。为了扩展报纸的业务，《新民报》不能孤立于政治圈外。抗战期间，邓季惺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一直在四川省参议会当议员，1947 年又当选立法委员，想以此合法身份掩护《新民报》。但她在立法院和另外几位女议员一起反对逮捕学生、反对戡乱、反对接受美援等，国民党认为她是共产党派进立法院的第五纵队，南京《新民报》终于被国民党的魔掌扼杀了。1948 年 6 月，国民党空军对被解放军攻克的开封城日夜袭击，人员死伤无数。邓季惺立即提出"开封城内，盲目轰炸，责任谁负？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的临时动议，当时签名附议的有立法委员 20 多人。第二天，《新民报》南京版日刊就刊载出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的检讨报告和立委们质询的要点，也发表了邓季惺的这一动议，一下子惹起了轩然大波。当天，立法院就以"《新民报》泄露秘密会议消息"为由召开全体会议，围攻邓季惺。很快，她就接到国民党当局的命令，以"为匪宣传"的罪名，勒令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随后，成都、重庆、北平、上海四地《新民报》也都受到迫害。有人向邓季惺透露，她已被列上了黑名单，将被移交"特刑庭"治罪，劝她在立法院休会前避开。她便匆匆化名逃亡香港，幸未遭毒手。[①]

---

① 邵后：《报坛女杰邓季惺》，《新闻战线》1988 年第 12 期。

晚年的邓季惺曾回忆自己当年参加《新民报》的情况，“我在1937年6月正式参加南京《新民报》，除几次重病请假，前后都与她休戚与共，血肉相连，她的发展也就是我的生命的发展。”[①] 邓季惺以其在《新民报》的杰出作为，成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罕见的女性报业经营者，也为现代中国女报人树立了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邓季惺负责《新民报》管理数十年，经营资产甚巨，但她一生崇尚节约。有人开玩笑说报馆里用掉几枚大头针她都晓得，这固然言过其词。但她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有钱，可一辈子不乱花钱”。她家的厨房和卫生间用的是不到八瓦的荧光灯，洗手的水积起来冲马桶……。这些都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撼。[②]

救亡与抗战时期，由于广泛动员妇女的需要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得到繁荣发展。救亡时期妇女报刊的发展，不仅有著名的妇女专版（如《申报》“妇女园地”）、妇女专栏（《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专栏），还有著名的妇女期刊（《妇女生活》），此外，观点保守的妇女刊物（如《妇女共鸣》）在时局的刺激下逐渐转向抗日立场。抗战时期的妇女报刊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在不同阵地上发出共同的抗日呼声，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争取妇女的权利。救亡与抗战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人数众多，活动范围广泛。当时，无论是报刊、广播还是通讯社，前线还是后方，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均有杰出女新闻工作者的身影。在苏德战场上，有著名女记者胡济邦为国内的读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抗德斗争的情况，有力地鼓舞了中国读者。她们的报道从不同侧面反映当时国内外抗击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这一时期著名的妇女报业经营者邓季惺为《新民报》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努力，她的报业经营思想与工作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

① 转引自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第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② 蒋丽萍：《与邓季惺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新闻实践》1998年第3期。

第五章　妇女报刊的发展与女新闻工作者的成熟

抗战胜利后，妇女报刊在分化中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妇女组织和妇女工作者在战后创办了一些妇女刊物，但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逐步溃败，其妇女组织尤其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开始分化，妇女刊物逐渐减少。另一方面，解放区的妇女刊物不断发展，全国性妇女刊物出现。同时，妇女新闻工作者逐步发展，并趋于成熟。

第一节　战后妇女报刊的发展

一、国统区妇女报刊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到1948年，国统区各妇女团体先后创办了40余种妇女刊物，其中主要有四大组成部分：

1. 中共直接领导和在其影响下创办的进步妇女刊物。它们主要分布在上海、重庆和云南。

在上海：1946年8月迁到上海出版、1949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的《现代妇女》，它高举和平、民主的旗帜，团结教育广大妇女反对内战、独裁，为争取妇女权利和妇女解放而斗争。

在重庆：1946年5月创刊、由中共地下党员杨蕴、杨天秀、伍昌娴等主办，杨蕴主编的重庆妇女联谊会的机关刊物《四川妇女》。它在《创刊：致读者》中表明自己的使命，“在战争胜利后，现有的妇女文化团体东迁，四川文化将会荒凉。针对这些就创办了这个刊物。”很明显，它要担负起《现代妇女》和《职业妇女》离开重庆后留下的任务，反映当时政治斗争和民主妇女的思想要求，仅出4期，1946年

12月31日被迫停刊。它偏重于本省妇女生活的报道，妇女问题的讨论，地方文化的发扬，工作经验的交流等等，内容充实，文章写得生动活泼，博得无数读者的爱护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该刊的筹办费用完全由妇女自己筹集。

在云南：1945年11月5日创刊于昆明的《妇女旬刊》，杨默霞主编，1946年4月被迫停刊。1946年5月3日创刊、王振华主编的《时代妇女》月刊是云南妇女联谊会的机关刊物。因揭露国民党杀害李公朴的真相而被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7月查封。这两个刊物，都是代表云南妇女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喉舌，反映了云南妇女参加民主运动的情况，支持和配合昆明各界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

2. 国民党妇女组织与妇女工作者在1945年末-1948年新创办了以下几种妇女刊物：1945年12月广东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在《中山日报》出版《时代妇女》双周刊，1946年3月创办《时代妇女》杂志，广东妇女会办有《女公民》月刊，国民党妇女工作者李曼瑰于1946年1月创办《妇女文化》，国民党立法委员会全国妇女团体选举事务所于1948年创办《职妇选务旬刊》，专门报道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妇女竞选情况。

随着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战场上的逐步溃败，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总会开始分化，其成员一部分飞往台湾，一部分去香港。地方的新运妇委会逐渐倾向进步，吸收中共党员和进步妇女参加其工作，成为进步妇女组织，国民党妇女刊物的阵地逐步缩小。

3. 基督教女青年会出版的刊物，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编的《妇女》（月刊），主编钟国华，内容多谈妇女的生存、自由、独立、进步，是比较进步的妇女刊物，能得到读者的爱护，每期销数3000份左右。

4. 抗战胜利后到1946年10月前，知识性、学术性或家庭生活指导类刊物的创办。

1946年6月创刊于重庆的《妇女与家庭》，李淑世主编。刊物内容非常充实，偏重于介绍合理、民主的治家方法，创造美满家庭，培养优秀人才，揭露妇女的痛苦和弱点，以唤起妇女本身的觉悟。它不谈男女平等，而是从最切身的实际问题来解决妇女问题。这本杂志标

榜“凡妇女皆离不开家庭”，颇受一般妇女尤其是女公务员的欢迎，每期销售数万册，打破重庆刊物销售的记录。

上海《今日妇女》，主编俞昭明曾留学美国，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比较开明。她主编的刊物主要强调妇女应有独立人格，认为中国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有职业和托儿所两个条件。刊物大多数谈论妇女要有天然美，还有女子教育、道德和事业问题，其次赞美苏联的妇女才是世界上解放得最彻底的，这方面的文章不多。其销路仅次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妇女》月刊。

上海的《家》，黄嘉音主编。《家》的主要内容是家政、家教、恋爱、婚姻、育婴、保健等问题，内容通俗，文字轻松活泼。如它曾批评意义褊狭的“爸爸节”，提倡做好爸爸，并以陶行知为例，认为他不仅是良师的典范，还是好爸爸的楷模。该刊的销路很好。

上海《伉俪》（月刊），吴好好主编，俞庆棠和唐讷厂任顾问编辑。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基督教精神促成夫妇生活之改善，家庭之和睦。该刊有一定的读者基础。

此外，上海还有一位医师杨元吉主编的《妇婴卫生》月刊。内容多谈妇婴生理卫生，为妇女介绍一般生理卫生和医药上的必要常识，文字通俗，读之不会感到厌倦枯燥。

二、解放区妇女刊物的扩展

（一）地方性妇女刊物的创办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宣传党的妇女政策，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支前，指导妇女工作，解放区妇女组织创办了一些妇女报刊。

东北有1945年9月创办的《妇女战线》，1945年创办的《女群》周刊，《现代妇女》月刊，1946年1月创办的《妇运先锋》，1947年秋创办的《妇友》旬刊等。

山东解放区于1946年3月8日创办《山东解放区妇女》，内容偏重于歌颂各部门妇女劳动英雄，介绍各生产部门的生产热潮，以及反映她们的生活，如模范抗属朱富胜的新家庭纺织组，识字组的姑娘们等。

1946年7月创办于张家口的《时代妇女》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大

型妇女刊物，李宝光主编。它对妇女运动带有指导性，内容充实，有关于各种妇女问题的专论以及各种妇女的生活报道。

《山东解放区妇女》和《时代妇女》的共同之处是内容生动、活泼、新鲜。读着这两个刊物的时候，“从纸面上看到她们一个个气昂昂雄赳赳的活跃在各个岗位上，在为她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献身。她们是被尊重，和男子们一样享受着应有的权利。看看她们，想想自己，我们是被社会漠视、玩弄、摧残，在死亡线上挣扎着。”①尽管由于重重封锁，这两份刊物不能到达千万个读者手中，还是对国统区的读者产生了深刻的对比与反思作用，它是宣传共产党的妇女政策，歌颂解放区妇女生活的一支号角。

《华北妇女》于1947年6月15日创刊，是指导华北地区妇女运动的重要刊物。

此外，《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妇女副刊，反映各地妇女工作情况，交流各地妇运经验，指导妇女运动。②

（二）全国性妇女刊物《新中国妇女》的创办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逐步胜利推进，建立全国性的人民政权已指日可待，建立全国性的妇女组织，创办全国性的妇女刊物已经提上日程。同时，妇女工作的范围也逐步从局部向全国展开，妇女工作的重心是在不忽视乡村妇女工作的条件下，以城市妇女运动为工作的重心。城市妇女运动则以女工为基础，团结其他劳动妇女，争取知识妇女、自由职业妇女和其他各阶层妇女，为肃清敌人，建设新城市而努力。③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会议代表来自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原5个解放区，国

---

① 滨洛：《介绍几种妇女刊物》，《现代妇女》8卷1期，1946年10月10日。

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主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第582－583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③ 《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中国妇女运动重要文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

统区以及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有女军人、女工、农妇、女知识分子和各个岗位上的职业妇女，有中共党员、各民主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盛会。在这次大会上，全体代表一致同意出版“全国性妇女刊物”的提案。1949 年 7 月 20 日，《新中国妇女》月刊与读者见面。它根据当前妇女工作的重心，以“帮助读者学习如何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当前的妇女问题及妇女解放的途径，从妇女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中，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艺创作等各方面来研究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帮助读者正确全面地认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途径，并循着这条大道前进，同时也将更进一步帮助各地读者了解妇女生活和妇女工作情况，交流妇女工作经验，供给妇女工作材料，指导妇女运动的发展。为此，《新中国妇女》月刊，将是一个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综合刊物。”①

《新中国妇女》吸收以前进步妇女刊物的传统，采取开门办刊的方法，充分调动编者和读者的积极性，共同努力，出主意，提意见，贯彻“大家写稿，大家办报”的方针，力图使它成为读者喜爱的刊物。

附表：战后中国主要妇女刊物一览表（不完全统计）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妇女月刊	1941 年 11 月 - 1948 年 6 月，江苏	南京妇女月刊社编
女青年(月刊)	1945 年 1 月 - 1946 年 9 月，南京	南京女青年月刊社编
妇女生活(月刊)	1945 年 1 月，江苏	妇女生活社编
现代妇女(月刊)	1943 年元旦创于重庆，1946 年迁上海	曹孟君

① 《〈新中国妇女〉创刊号》，《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妇女(月刊)	1945 年 10 月 – 1949 年 7 月，上海	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编
女青年(月刊)	1945 年 1 月 – 1946 年 10 月，重庆	重庆女青年月刊社编
妇女旬刊	1945 年 11 月 – 1946 年 4 月，云南	昆明妇女旬刊社编
今日妇女(月刊)	1946 年 4 月，上海	上海今日妇女月刊社编
青年周刊·"妇女栏"	1945 年 9 月 10 日，北平	三民主义青年团平津支团第四分团编辑发行；研究三民主义的妇女运动理论
时代妇女(半月刊)	1945 年 9 月 16 日，北平	北平时代妇女社主办
中国妇女(月刊)	1945 年 10 月 – 11 月 1 日，上海	濮大江
新妇女(月刊)	1945 年 10 月 10 日，北京	新妇女月刊社编
今日妇女(月刊)	1946 年，上海	俞昭明
家(月刊)	1946 年，上海	黄嘉音
伉俪(月刊)	1946 年，上海	吴好好
妇婴卫生	1946 年，上海	杨元吉
青年与妇女	1946 年，上海	
少女	1946 年，上海	主编诸葛夫人
新女性	1946 年 5 月，上海	上海新女性图画杂志社编
妇声半月刊	1946 年 10 月 1 日，北京	葛育华主编
妇女岗位(月刊)	1946 年，湖北	武昌妇女岗位月刊社编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今日妇女(月刊)	1946年6月－1948年1月，湖南	长沙湖南女青年协会编
妇声月刊	1946－1947年1月，西安	西安妇声社主编
新民主妇女(月刊)	1949年6月－8月，上海	
新妇女(月刊)	1947年3月－1948年12月，上海	南京中国妇女建国学会出版，李雪荔主编
妇女导报	1947年5月－1948年10月，江苏	南京妇女报社编
女铎(月刊)	1912年创，1942年停。1944年复刊，1945年迁往成都，1946年迁回上海，1950年12月终刊	上海广学会
妇女旬刊	1917年创于杭州，抗战爆发后停。1946年10月复刊	
四川妇女(双月刊)	1946年5月15日，重庆	重庆妇女联谊会主办，杨蕴主编
妇女与家庭(双月刊)	1946年7月－1947年11月，重庆	李淑世
今日妇女	1946年12月，天津	天津人民世纪杂志社编
妇女文化(月刊)	1946年1月－1948年4月，重庆	妇女文化月刊社编辑
妇运通讯	南京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
妇女文化(月刊)	南京	妇女文化月刊社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女公民(月刊)	1946年6月25日创于广州,1947年2月停	广州广东省妇女会
新妇女(月刊)	1946年5月,广州	广州新妇女社编
女青年(月刊)	1946年8月停刊,江西	南昌女青年月刊社编
香港女声(月刊)	1946年10月-1948年10月,香港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编
现代妇女(月刊)	1946年1月创刊,菲律宾	马尼拉现代妇女社编
新妇女(月刊)	1946年3月-1948年6月,新加坡	新加坡新南泽出版社编
新妇女(月刊)	1947年5月-6月,广州	广州国际文化社编辑
妇女生活(月刊)	1947年12月-1948年5月,广州	广州妇女生活月刊社编
时代妇女	广州	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
南海妇女	南海	南海妇女工作委员会
甘肃妇女	1943年2月-1946年4月,甘肃	甘肃妇女工作委员会
妇女奋斗	1947年,山西	山西省妇女工作委员会
妇女园地	1948年,陕西	陕西省妇女工作委员会
台湾妇女(周刊)	1946或1947年,台湾	台湾省妇女工作委员会
新女性(月刊)	1948年2月,汉口	
妇女旬刊	1945年11月5日,昆明	杨默霞主编
时代妇女	1945年5月3日,云南	云南妇女联谊会主办,王振华主编
时代妇女	1946年7月,张家口	李宝光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山东解放区妇女	1946年3月8日，山东	山东解放区
妇女战线	1945年9月	中共外围组织东北妇女同盟机关刊物
妇运先锋	1946年1月，黑龙江	东北妇女运动促进会主编
妇声(月刊)	1946年10月，黑龙江	东北妇女运动促进会主编
妇友	1947年秋	
妇女知识	1945年，长春(据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5月6日)	
女群(周刊)	1945年	
现代女性	1945年12月－1946年1月，长春	长春现代女性编辑部
妇女战线	1945年9月，长春	东北妇女同盟创办
新中国妇女	1949年7月20日，北平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办，主编郭楠柠
山东妇女(月刊)	1947年，山东	济南山东合作事业管理处
《石家庄日报·妇女生活》专刊	1947年11月18日创于石家庄	关内解放的大城市的第一家共产党报纸，中共石家庄市委机关报
成都《华商报》妇女副刊	1946年4月28日创于成都	中共地下党员王达非等集资创办
《民主报》重庆临时版《民主妇女》周刊	1946年2月1日创，重庆	发行人张澜，社长罗隆基
女青年(月刊)	1948年1月－1949年8月，上海	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编

刊物名称及刊期	出版时间及地点	主办(编)者
风下新妇女(月刊)	1948－1949年5月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
《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东北日报》	均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妇女副刊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春秋出版社1989年10月版；滨洛：《介绍几种妇女刊物》，《现代妇女》8卷1期，1946年10月10日；《本会图书室收到赠阅图书杂志一览》，《妇女新运》8卷1期，1948年1月；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王桧林、朱汉国：《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1997年6月版；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妇女报刊名录说明》，载于《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臧健、董乃强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

第二节　战后妇女报刊的主张

一、主张和平、民主，展望新中国

（一）妇女报刊展望时局

抗战胜利后，妇女界既是兴奋，又有点茫然。在八年抗战中，妇女报刊为宣传妇女参加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妇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又面临着和平建国与内战的两种可能性局面。妇女的出路何在？妇女报刊应该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妇女报刊应如何引导妇女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努力？妇女界对时局有什么看法？带着这些问题，《现代妇女》分别于1945年10月与1946年9月27日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探讨战后的妇女工作，追寻妇女界对时局的看法。

第一次会议由《现代妇女》编辑委员会组织，与会人员有：邵力子夫人傅学文，曾在国民党内政部和立法院工作的谭惕吾，中共南方

局妇委负责人张晓梅，女报人梁柯平，女律师史良，《现代妇女》主编曹孟君，进步妇女活动家刘清扬，长期从事女界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陆惠年，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京《妇女之友》主编、时为进步妇运工作者的韩幽桐，此外还有罗静方，胡绣枫，左诵芬，黄为之等不同战线的女界名流。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抗战胜利后，妇女并没有获得幸福和快乐，除了妇女工作本身尚有许多缺点外，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不民主。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目前中国的局势、世界的情势以及妇女切身的利害，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真正的妇女解放。在不民主的政治下，妇女没有工作机会，就业没有保障，妇女解放最根本的问题经济问题就无从解决。同时，如果没有和平，就谈不上建国，妇女的基本权益依然无法得到保障。①

1946年9月27日，由上海10个人民团体发起、由《现代妇女》组织的妇女各界座谈会进行一次时事测验，就拟订的8个问题通过这些民间团体送到被测验者手中，这是对中国妇女进行的第一次时事测验。从参与测验的2402位女性的职业组成来看，有女公务员、教员、学生、家庭妇女、工人、医务人员、商业交通文化界妇女、女佣以及失业人员等，成分广泛。这8个问题有3个是关于内战的，3个关于美军驻华的，1个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1个关于抵制美货的。从对这8个问题的回答来看，妇女界对时局的看法达到了高度的一致。90%的被测验者认为“内战是战后人民生活痛苦的主要原因”；74%的被测验者认为内战打得激烈，原因在于“美国从旁鼓动与支持”；73%的被测验者认为停止内战，解决国内局势的最好途径是“根据政协决议及整军方案处理国内问题”；63%的被测验者不满美国对华政策，“主张美国一切力量自中国撤回”；82%的被测验者认为美国在华军队的目的是“帮助中国进行内战”；87%的被测验者对美军凌辱中国人民的暴行表示“坚决抗议”；93%的被测验者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对于有人提议抵制美货作为中国人民和平爱国的行动，54%的被测验者赞成，认为“可提高国人爱国心理”，32%主张抵制美货中

---

① 《今后妇女工作应当怎样做》，《现代妇女》6卷5期，1945年10月14日。

的奢侈品。[①]

从上述调查结果来看，妇女界在反对内战，反对美军驻华并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等方面的意见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参与这次时事测验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在中国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妇女，用严肃而认真的态度对时局发表意见，充分表现了妇女对国事的关心，对政治的注意，对时局症结的认识。上海《现代妇女》对此作了详细报道，表明妇女界对时局的认识，也代表了妇女界的呼声。

（二）反内战、要民主、生产备战

1. 以《现代妇女》为代表的国统区进步妇女刊物反对内战，要求民主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形势主要表现为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中共反对篡夺的斗争。根据这一报告的精神，1946年3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三八”节社论《中国妇女今后的任务》，分别为解放区和国统区妇女指明任务：解放区妇女要积极参加民主建设和生产备战工作，国统区的妇女要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广泛发动各阶层妇女为实现政协决议与和平建国纲领而斗争。

根据这一任务指示，《现代妇女》担负起广大妇女喉舌的作用。它从妇女的切身利益出发，从最基本的家庭生活和家庭完整这一点出发，诉说内战带给妇女的种种不幸，给予反内战以有力支持。

反内战，要民主，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更是广大妇女的愿望。内战使庐舍为墟，骨肉横飞，侥幸逃命的，也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因为内战，因为兵役，壮丁或逃匿流浪，或铤而走险，留下妇女为生活所迫，或为娼，或自杀，或流亡，或饿死。所以，内战“带给中国妇女的是恐怖、绝望，是死亡！这无耻的内战，对我们妇女的打击是这样的严重，谁无父母妻子？谁忍心看见自己的儿子去当炮灰？谁忍心看见自己的父母妻儿饿死，冻死？”[②]战争不仅破坏正常的

---

① 《上海妇女时事测验揭晓》，《现代妇女》8卷2期，1946年11月10日。

② 《内战带给中国妇女的是什么?》，《现代妇女》8卷3期，1946年12月19日。

家庭生活和基本的家庭完整，还给各阶层的妇女带来无尽的灾难。“抗战胜利了，正想喘口气，现在又遍地烽火，到处充满了撕杀！丈夫兄弟子侄尚未复员，又送上了战场，田园成了焦土，妻离子散，每天死亡在内战的炮火中的是成千上万！学生不能安心读书，女工大量失业，家庭妇女每天为不断涨价的柴米，愁眉苦脸，职业妇女在可能被裁的威胁中惴惴不安，一些市民妇女怕遭美兵侮辱，夜晚不敢出门。这一切都是内战的赐予！”①

《现代妇女》揭露内战给妇女的种种危害，并不是使妇女畏惧战争，而是告知妇女解放与实现民主道路的艰苦。“没有民主就没有妇女的自由。可是，民主，民主不是呼之即来的，反民主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啊！因此妇女解放道路还非常艰苦！”在内战的威胁下，广大妇女既不能悲观失望，也不能横冲直撞，而是要“冷静的考虑问题，把握转变的方向，以新的工作姿态，布置新的工作道路，越困难，越要沉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踏稳脚步，迈过艰难的今天，创造幸福的明天！”②

不仅如此，《现代妇女》从国民政府的内政腐败和残暴征兵不顾人民死活等方面，从看似普通的社会新闻中看到社会制度即将变革，并憧憬自由、民主、和平的新中国。

《现代妇女》还借助时事新闻表达求民主的看法。1946年，著名学者、民主人士闻一多被暗杀，《现代妇女》发表著名词作家安娥悼念闻一多的诗歌《哭完人一多师》③，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摧残民主的愤怒：

> “闻师！
> 天赋给你的何厚！
> 人赋给你的何薄！
> 苦难赋给你的何多！

---

① 穆云：《纪念双十节 追忆革命先烈》，《现代妇女》8卷1期，1946年10月10日。
② 孟君：《认识新环境》，《现代妇女》8卷2期，1946年11月10日。
③ 《现代妇女》8卷4期，1947年1月1日。

唯美诗人
你是名手；
诗经，
离骚，杜诗的研究
你是大师
民主战线，
你是领导人！
你是战士！
是有良心的教授！
是真正的学者！
……
闻师！
你为寻找苦难，
遭到了灾难！
不过，
闻师，你值得的！
你的朋友们为你哭了！
正义的青年们为你流着泪，
怒骂！
他们说，他们要对得起你，不让你白死！
闻师，
你是不会白死的！”

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征兵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竟然以看免费电影的卑鄙手段把正在小学念书的学生强拉壮丁。“这样强拉来的壮丁，怎能使他们去打胜仗呢？怎样能使他们为你效命疆场呢？他们的心已碎成一块破布，再也不堪一击了！”① 从强拉壮丁这一则社会新闻中指

① 凤：《凭什么打胜仗?》，《现代妇女》8卷5期，1947年2月10日。

出，国民党违背人民的意愿打内战，是自己在战场上溃不成军的原因。

1947年4月26日，上海市警察局破获一起“人妖”案，一时轰动上海。该案主角沈俊如是一位50多岁的妇人，她常扮男装外出诱骗良家妇女进行烟、毒、淫等有伤社会风化的事情。此案的案犯还有陈行的小妾周淑贞，王晓籁的第四位姨太太丁宝恕，以及富孀吴范观痕等人。对这一畸形的社会现象，《现代妇女》没有把它看成是一宗简单的社会新闻，而是追根究底，从根源上分析“人妖”案的社会原因，“处在今天这种不合理的社会里面，这正是暴露在糜烂阶层中的一种类型而已，和其他‘人吃人’的社会现象并无二致。今天中国的社会，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到了快要总崩溃的时候，依附在这种基础上的掠夺与独占，表现在性的方面，自然是买卖与玩弄，……当然，‘人妖’无论男女我们都应该反对，可是更应该反对的，却是不断制造‘男人妖’和‘女人妖’的人吃人的不合理社会。也只有在这种社会根本改革以后，人吃人的现象根本绝灭以后，‘人妖’自然就绝迹了。”①

1947年底，《现代妇女》借民国国庆36周年纪念之机，大发感慨，认为36岁，对于一个人来说，不算大；按一个国家来说，比英美都要年轻，比起苏联，又是长6岁的老大哥。可是，这个民国处处不如人，如果把民国比作一个人，虽然仅有36岁，却未老先衰，“一切的征象，都表示了暮气沉沉，老气横秋”，与苏联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相比，民国却“一切国内外问题，都要请示一下‘爸爸妈妈’”，国家和政府日益式微，但人民的觉悟心却更加坚定了，“除了极少数气迷心窍的顽固分子外，几乎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全体都肯定地相信，中华民族是要粉碎帝国主义的桎梏，是要摆脱豪门资本的枷锁，是要扑灭熊熊燃烧的战火，而创造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我们希望明年的今天，纪念国庆时，不再是没有起码做人权利的奴隶，不再是供人宰割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而是具有呼吸自由空气，

① 林：《“人妖”和“人吃人”》，《现代妇女》8卷3期，1947年6月12日。

决定自己命运的主人，有权利挺起胸来，不人云亦云、不点头诺诺的独立民族。我们希望明年的今天，不再被魔鬼们逼作孤儿寡母，而要永庆升平，天伦欢聚。这或许不是幻想吧！"[①] 这的确不是幻想，而是《现代妇女》明智而准确的判断，只不过不是1948年的10月1日，而是1949年的10月1日。它已经为国民政府预先规划了死亡的日期，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即将到来。

2. 以《新中国妇女》为代表的解放区妇女刊物拥军参战，生产支前

《新中国妇女》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国性妇女刊物"作为自己的目标，把自己的读者对象扩大到全国妇女，包括农村妇女和城市女工。它布置关于农村妇女民主会议代表的决议，巩固和扩大农村民主政权；根据女工的数量和女工作为工人一面的特殊性以及以前对女工工作认识上的偏向，在城市单独提出女工工作，发动、教育和组织女工完成工会统一的任务，争取和维护女工的权益，把女工组织起来以便大力进行生产建设。

但是，《新中国妇女》的宣传重点在动员和组织妇女支援解放战争上，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它用轻快活泼的语言，报道和鼓励解放区妇女有组织、有计划地投入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热潮。把解放区妇女或送子，或送郎，或送夫参军的动人场面十分通俗地表达出来。用一位孙老太太的原话说，就是"俺受了一辈子穷，共产党领导咱才翻了身，今天我送孙子去参军，为的是解放江南的劳动人民，任何人想劝阻，我都不听的。"[②] 同时，解放区妇女还从人力、物力上直接或间接为渡江作战服务，有的还亲自"撑足风帆渡大军"，令"长江歌颂女英雄"。《新中国妇女》报道了渡江作战中一个个优秀勇敢的女船工和女水手，如在水上生活了30多年的梅老二，孙乃英，叶大嫂，以及17岁的海安女船公王凤英，如何在宽阔的江面上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汹涌的波涛，身轻如燕，坚毅超人，机智灵活，在渡江前夜数次抢渡的动人事迹。

---

① 文：《国庆纪念日感言》，《现代妇女》10卷1期，1947年10月1日。

② 勉之：《支援大军渡长江》，《新中国妇女》创刊号，1949年7月20日。

二、服务女界 维护妇女权益 献力于新中国建设

妇女刊物为妇女报道重大新闻、引导女性关注时事的同时，还关心女性切身问题。这是一个妇女刊物为吸引女性读者所必须做到的，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良师益友。

《现代妇女》编辑室曾经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向编者询问恋爱与婚姻问题。这些问题虽然不是青年生活中唯一重要的问题，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影响其一生的事业和幸福，《现代妇女》的编辑邀请青年们喜爱的导师孙起孟先生写了“恋爱问题例解”，针对几个典型性的例子，提供正确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议。

如果说这只是解决青年尤其是女青年的生活中一个基本问题的话，那么，反对简单的战后中国女子“复原”说，争取女子就业的机会，反对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沈崇一案，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加强女生家事学习”的命令，都表现了妇女刊物在维护女性利益的明确立场。

国民党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创办的《妇女新运》杂志，经过抗战的洗礼，对社会上一些关于战后妇女出路的错误说法一一批驳。战后“复原”一词甚为流行，亦即恢复战前的原样。有人误解妇女复原就是妇女回到家庭去，还有人认为战时有不少妇女出来参加战时工作，本来是代替了男子的工作，现在战争结束了，女子应该把位置让回给男子，自己回到原来家庭的岗位。《妇女新运》对此做了批驳，“复员不单是复原，而且还要有创新，还要前进。我们历年来是主张妇女要兼顾家庭与事业的，要负荷双重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复员的时候特别重新声明我们一贯的主张，战后的妇女要家庭，也要职业。她们对社会的责任不惟不能够减轻，还要逐渐加重。她们在各种工作上的地盘不惟不要缩小，而且要扩大。妇女工作要从此更加展开，加紧努力迈进。我们认定，把持国家的政治、教育、经济，以及一切事业，男女同样的负有重责，而创造人类的新文化，新史纪，妇女更不应该让男子偏劳。战争胜利后的复员期间，男女同胞都要寻找他们的新园地，创造他们的新事业，贡献他们的新成

绩，建立强大的新中国。”[1]

战后美军在华的暴行尤其是“沈崇事件”激起广大中国妇女的愤怒。《现代妇女》发表评论，将美军在华暴行和日军相比，将政府的妥协态度与沦陷区政府相比，并指出这件事情的深层意义是“为了剩余物资和贷款的获得，以继续作内战的赌注，好战分子已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对人民，尤其是妇女的被侮辱，本是不足道的。”[2]《现代妇女》还出版“抗暴特辑”，发表上海妇女联谊会许广平、中华妇女节制会刘王立明、中国妇女联谊会史良、中国民主同盟妇女委员会李健生、现代妇女社曹孟君、上海妇女生活互助社陈玉俊等人联合“致美国人士抗暴通电”，强烈谴责美军在华暴行，呼吁美军撤出中国，反对美国对华借款以助长中国内战。同时，还有关于“沈案”发展的后续报道，以及鞭挞美国兵在华暴行的诗歌与漫画，反对战后美国援华。

1947年8月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一个新命令，即“加强女生家事学习”。为了训练得彻底，教育部特别强调从初中就开始着手。教育部的痴心妄想被《现代妇女》一眼识破，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走投无路时的拙劣招术，它以为“维持现今的家庭秩序，家庭不紊乱，国家社会就得安定”。但是，“在今日失业遍地，经济崩溃的时代，即使对家事有着天大的兴趣的女子，也无法在家里当家理事，享‘清闲福’了。无情的，血的生活鞭子将她们赶出家庭来，我们不设法给她们以应付死亡的技能，而叫她们回返育儿、治家的圈子里去，岂不是更叫人兜圈子寻死么？”“新的家庭必须建筑在新的经济基础之上”。[3]什么是新的经济基础？那就是推倒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之后的新经济基础。《现代妇女》为国民党的统治敲响了丧钟。

---

① 瑰：《胜利复员与革新》，《妇女新运》7卷7期，1945年9月。

② 《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现代妇女》8卷4期，1947年1月1日。

③ 张志渊：《加强女生家事学习》，《现代妇女》10卷1期，1947年10月1日。

第三节　女记者的成熟

抗战时的重庆风云荟萃，不仅文化巨头集中于此，新闻界人才辈出，女记者也是声势浩大。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女记者即南北纷飞。彭子冈东下，经上海飞到北平《大公报》办事处，浦熙修到南京《新民报》，高汾到上海，也在《新民报》工作，邵琼从《商务日报》改入上海《世界晨报》，做外勤记者。这一时期的女记者中之佼佼者当属《新民报》的浦熙修，她曾经在重庆政协会议期间发表了政协委员访谈，以新颖的视角设计了近乎完美的报道方案，逐一反映了被报道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同时，还含蓄地发表了自己对各代表的评判。《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彭子冈，曾经单枪匹马越过封锁线，深入张家口进行采访，写下了富有激情的《张家口漫步》，报道了解放区军民的生活。

此外，南京和上海也有一批活跃的女记者。资历最深的，除了《新民报》的浦熙修之外，还有《申报》驻南京记者张明。二人从事新闻工作有10年之久，始终站在时事的最前沿采访。浦熙修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认真著称，张明因为采访由渝来宁的在野、在朝官员，而在当时的官府衙门之间来回穿梭，以至于有个“官场记者”的称呼。但她在采访政治新闻方面表现出来的独当一面的精神却显得难能可贵。《中国日报》女记者何健民吃苦耐劳，《新民报》的高汾对待工作非常认真，“静静的听，细细的写”。《上海联合晚报》的陆慧年、中央社的郭瑞新、正言社驻南京记者万锦襄都是女记者中的健将。《中央日报》的陈楷，黄汉璘也是少壮派的人物。同时，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的女记者陈香梅也到上海分社工作，负责采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分署和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新闻，写了一批反映官员从中渔利倒卖黑市、无端作梗、玩忽职守的批评性报道。比如，她有一篇报道写的是一批本来要运到东北的药品，但在烟台却被无理扣留。陈香梅前去采访后，十分愤慨，即在报上发了一段新闻。这则新闻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却也引来了威胁，有人要陈香梅交

出新闻的来源，陈香梅理直气壮反问："请你回答，这段新闻真实否?!"倒也叫对方无言以对。[①]

一、采写兼优的浦熙修

(一) 旧政协会议时的浦熙修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大变，但重庆暂时还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先后在这里举行和召开。政协会议的召开使新闻记者转向人人都关心的政治问题。会议辩论的主题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孰先孰后的问题，38位代表也将就此发表意见。当时，谁能不关心这个关系国家存亡的问题呢？所以，浦熙修认为读者肯定爱看记者对38位代表的访问记。

"重庆谈判"时，浦熙修以文当歌，生动报道了机场上欢迎毛泽东的热烈场景和会后欢送的场面，表现出对共产党领导人的高度赞誉；政协会议时，浦熙修聪明机敏，手法高明，拟订了有新意有规模的报道计划，取得独特的采访业绩。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谈判。浦熙修提前赶到机场，目睹了机场上欢迎毛泽东的热烈场面，写下了《走向和平建国之路 毛泽东为团结而来》，发表于8月29日的《新民报》上。"蓝灰布的制服，浓重的湖南口音，农民本色，健康得看不出已经是五十二高龄"，简短的语句描写了毛泽东质朴、健康、朴素的领袖形象，机场上赛过鲜花的热情更是表现了山城人民对中共领袖的仰望。40天后，毛泽东要告别重庆，回到延安，浦熙修又写下题为《山城昨夜绮宴开 毛泽东辞别重庆》(《新民报》1945年10月9日)，报道了张治中将军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欢送大会的情况。与会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大约五百余人，几乎都在关注那场有关中国命运的会谈结果。在程序性的主持人讲话之后，浦熙修着重写了毛泽东因"重庆天气坏 健康不如昔"，所以致词时"使用了浑身力量在高喊，表现他克服艰苦时的坚定力"，写出了毛泽东对中国和平、民主、统一所做的

---

① 《艰难的选择》(4)，http://book.sina.com.cn/nzt/cha/chenxiangmei/105.shtml.

努力与所抱的希望，表达了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热望。

在浦熙修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大书一笔的当属她对政协会议的采访报道。重庆谈判的结果之一就是召开政协会议，商定由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集会协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蒋介石核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名单》中有 38 名代表，他们是：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以上是国民党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以上是共产党代表），曾琦、陈启天、杨永竣、余家菊、常乃德（以上青年党代表），张澜、罗隆基（以上是民主同盟代表），张君劢、张东荪（以上是国家社会党代表），沈钧儒、张申府（以上是救国会代表），黄炎培（职业教育社代表），梁漱溟（村治派代表），章伯钧（第三党代表），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以上无党派代表）。

在政协会议开幕前一个月，浦熙修就开始逐一采访来自各方面的 38 位代表，除了青年党的五代表之四——杨永竣和余家菊、常乃德和陈启天是放在两篇里外，其他每人一篇访问记，共 36 篇访问记，逐日发表。

董必武先生是浦熙修采访的第一个中共代表。"……董必武先生是特地从美国赶回来的，他刚抵渝时，自称镀了金，脸庞金红，西装笔挺。但昨天记者会到他时，又恢复那严肃的老态了。"他反对孙科所说的撤退在华驻军易促成美国孤立主义之复活，他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靠军队维持的。……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新意见，他还要等延安方面的代表来后才能知道，但一般的说：必须先停止内战，但谁在打谁，只要一看真正的地区便知，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①]访周恩来时，浦熙修先这样描写了他的风度："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体代表团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傥不拘的风度，坦率有力的言辞，也确是代表团中的领袖人物，数年来谈判的名手。他对目前时局的处理，只有十六个字：'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止动

---

① 《董必武先生》，《新民报》1945 年 12 月 14 日晚刊。

手，政治解决’。”①

当年，记者采访共产党代表还是危险的。共产党机关、新华日报社、八路军办事处等附近都有特务盯梢。浦熙修不分昼夜访问中共代表，既有“红帽子”的压力，又要提防特务的袭击。②这对于一个女记者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量啊！

浦熙修很善于在采访中诱导采访对象，并用采访对象的谈话内容来揭露时局，宣传和平、民主的主张。在采访无党派人士傅斯年时，傅斯年用种种办法企图回避。浦熙修就从他关心的学校教育入手，引导他从学校谈到国内外政治，“美国人民不想打仗，苏联也受害太深，需要休息，那么我们中国人又何必要自相争吵?”傅斯年发人深省的见解“给予一些人以安慰，也给予另外一些人以正告。”③

浦熙修访问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反映出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一党专制独裁的立场。陈立夫说他对作政协代表根本不感兴趣，但他对于国事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政治民主化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不是少数挟持多数，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上。……中共既崇尚民主，应该尊重多数人民的意志，不应私拥军队，破坏交通。……至于联合政府，决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④ 陈立夫的一席话将自己的顽固、反共立场全部暴露出来。

采访民盟的沈钧儒先生，浦熙修的笔调是积极乐观的。“救国老人沈钧儒先生，个子虽小精神却矍铄，喜欢随身带把小梳子梳拢几下他那飘然的长髯。……他和蔼可亲，但坚强的意志，常常使他为国事，挺身而出。”⑤寥寥数笔使沈钧儒先生热情爱国的形象跃然纸上。而采访青年党代表曾琦时就不是这样描写了。“记者昨天见到这位青年党领袖的时候，瓜皮小帽长袍马褂，胖胖的，表面十足是旧式人

---

① 《周恩来先生》，《新民报》1945年12月18日晚刊。

② 邵嘉陵：《浦熙修政协代表访问记旁白》，《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1999年10月版。

③ 《访傅斯年先生》，《新民报》1945年11月28日晚刊。

④ 《访陈立夫先生》，《新民报》1945年12月8日晚刊。

⑤ 《沈钧儒先生》，《新民报》1945年12月20日晚刊。

物。……贫血病与气管炎是他的老病。”① 一个守旧、孱弱的青年党代表形象立时顿现。

有一篇没有点名的访问记，这就是浦熙修的《访某代表》（《新民报》1945 年 12 月 12 日晚刊）。“政治协商会议的某代表，素性谨慎，记者曾往返三次，最后一次还是等了一下午才见到。他的公事忙碌，每日常常要工作到十六小时，因之更觉其发言之重要而珍贵。这里为尊重他的意见，姑隐其名。”这个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代表对政协会议持什么态度呢？“他首先告诉记者，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之前，必须双方停止宣传，停止冲突。他认为前者还难于后者。共产党因为武力居于劣势，总喜欢以宣传来争得优势。天天嚷反内战以挑拨感情，遂其达到美国撤军之目的。……说开了，会议完全是个形式，中共需要借此转弯，政府也未尝不能转。”这位代表向浦熙修表示，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浦熙修慨然表示同意。38 位政协代表中，公开姓名的有 37 位，那么这个不点名的“某代表”自然就十分明白了，他就是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后来有人称赞浦熙修：“浦熙修真不简单，互相斗智的结果，居然使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了她这‘无冕之王’的手下败将。”②

旧政协会议期间，浦熙修一一访问了 38 位代表，写了 36 篇访问记，采写新闻稿件 30 多篇，访问记往往第二天即见报。据粗略统计，她在旧政协会议期间写的采访记和新闻稿件，约共 10 万字左右，表现了高度的工作热情。③

采访政协代表不是没有困难，会议代表们要么时间紧张，要么根本就不愿意接受采访。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就很难采访到，但浦熙修还是把他不点名地公布于世人，表现出了灵活机智的采访艺术。采访张群，浦熙修几次相约，未得答复。张群是四川省政府主席，蒋介石最

---

① 《访曾琦先生》，《新民报》1945 年 12 月 11 日晚刊。

② 转引自陈理源《敢为人民鼓与呼——回忆浦熙修在旧政协的采访》，《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③ 陈理源：《敢为人民鼓与呼——回忆浦熙修在旧政协的采访》，《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亲近的得力助手之一。浦熙修便做个“不速之客”，话题尚未展开，张群又应蒋介石的电话匆匆离开。但浦熙修坚持不懈，在张群上车前力陈对他采访之必要，终于约定当天下午采访他，表现出坚忍不拔的毅力。浦熙修采访张群结束后，正好遇到该报另一记者汪受善。浦熙修说采访张群真不容易，今天总算如愿以偿，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天，《新民报》第一版刊登了访问张群的特写。这令浦熙修备感兴奋，“不是说见到张群不容易，而是说一个新闻记者完成艰巨的采访任务的确令人羡慕和欣慰。”① 无党派代表莫德惠，不愿意回答浦熙修提问国民党在东北挑起内战一事，想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搪塞。浦熙修抓住莫德惠的东北老家有家难归一题，终于使采访对象开口说话。

此外，自然条件的困难，也在考验着浦熙修。在山城重庆进行采访，靠的就是两条腿，一双脚。重庆的大雾，举世皆知。采访代表的日子里，偏遇上阴雨天，道路泥泞。浦熙修冒着浓雾，在大雨滂沱中，以坚实的步伐，踏着泥泞的道路，穿着从南京带来的一袭褪色的雨衣，随身携带的女式皮包内装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钢笔，走访在政协代表之间。

浦熙修的访问记，力求报道及时。她闻风即动，见缝插针。采访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代表，均是在他们吃饭的时间进行的。浦熙修的访问记，言之有物。她结合政协会议所欲解决的几个问题，一一访得代表们的观点，在当时有很强的新闻性。她一般不直接表明自己对这些代表的态度，但是她的语言文字掩不住她十分含蓄的贬褒抑扬。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名记者的优秀品质和职业素养。当一篇篇访问记脱手而出时，浦熙修不仅再次饮誉山城，而且轰动全国。

（二）浦熙修在南京《新民报》

1. 报道政协会议和国共谈判

抗战胜利后，由于政协和谈的进行，国民党被迫停止了新闻检查制度。浦熙修得以集中精力采访政治新闻。当时，她除了负责政治协

---

① 《重庆报史资料》第11期，1992年7月。

商会议过程的采访及各专访党派38位政协代表外，还报道了当时国共谈判的情况。

政协会议后，又接上一年的和谈。中国复兴的关键系于此，所以关于和谈的任何消息都是头条新闻。由于有在野党参加和谈，一向守口如瓶的国民党政府对于消息的控制也无能为力。新闻采访的对象，由政府一方，扩展到各党派多方面。同是一个问题，各有所见，各执一说，“在我们做采访的人看来，头头是道，个个有理，那真是训练我们批评判断的一个好机会。场面的紧张，问题的复杂，人事的纵横，关系的微妙，在和谈的一年，是采访最繁忙的一个时期，亦或是我十年采访中最有趣味的一个时期吧！时而兴奋，时而悲观，时而喜悦，时而失望。尽管说采访应该用客观冷静的态度寻找消息，但既是国家的国民，又怎能不因消息的好坏，激动几分主观的感情呢？因为得消息较早，知道和谈的局面无从打开，在所谓‘一觉醒来，和平死了’的局面下，我们真又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了。”①

和谈从重庆迁到南京继续进行的时候，浦熙修也来到南京《新民报》社。她到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曹仲英共同研究南京版的政治态度。因为已经有了个政协文件，《新民报》上下都一致赞成政协协议，一切恪守政协决议，是报社的态度，也是采访部工作人员的态度。

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2月从重庆到达南京，至1947年3月最后一批撤离南京回到延安这一阶段，《新民报》前后担任梅园新村主要采访任务的都是浦熙修，是她把梅园新村这根红线牵到《新民报》编辑部。这时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浦熙修充分发挥自己的新闻敏感，不放过任何一条有价值的新闻。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一方面玩弄和谈伎俩，一面紧急扩大内战。中共在准备反击国民党对解放区的进攻之时，积极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浦熙修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及时报道了在南京进行的国共和谈。《中共代表下榻处 国府路上梅园村》一文及时

① 浦熙修：《采访十年》，1947年9月9日《新民报》日刊增刊。

报道了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到达南京并找妥驻地的消息。此后，她围绕当时在南京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所谓的第三方面如民盟、青年党等，先后报道了谈判在南京进行的情况。《各方代表联翩来 谈商将自宪草始》、《国共昨晚会谈 打开谈判途径》报道了国共和谈在南京开始的详情，《民盟今谒陵 祈祷保佑和平》反映了第三方面的主力——民盟对和平的期待。

1946 年 6 月 6 日，蒋介石接受马歇尔的建议，下令在东北停战 15 天。6 月 21 日谈判依然无果，蒋介石和周恩来同时宣布东北谈判再延长 8 天，到 30 日为止。为表示反内战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促使谈判成功，6 月 23 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由阎宝航、雷洁琼、包达三、盛丕华等知名人士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向有关方面呼吁和平。浦熙修及《大公报》记者高集前去下关车站迎接采访，在那里遭到了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的围攻殴打。“回想起五个月前的我自己。2 月 10 日在重庆校场口挨了打，一个星期的光景，慰问者络绎不绝。鲜花不断地送来，没有那么多的花瓶来插。广柑接到了二十几篓之多。别人发了抗战财、接收财，而我却发过‘挨打财’。事实证明：人民的心是向着另一方面的。……打了你，暂时也实在把你没可奈何，暂时也实在晓得痛或甚至有死亡的危险，然而正感谢你有这些的打，你把铁打成了钢，把泛泛的朋友都打成患难之交了。”[①]为和平民主呼吁的浦熙修受到暴徒的殴打，这没有使她屈服，反而更加坚强，这也许是计划打人的始作俑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两次挨打，提高了浦熙修的政治认识，认识了共产党坚持“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的道理，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面目。《感谢冯公给勇气 马帅从此不灰心》反映出国共和平谈判已进入极度困扰中。《商谈内情》则透露出这次和谈的结果。“这真是战争与和平的时代。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上午要听着和平的消息，下午要听战报。谈谈打打已经一年，今日又侧重打的时候了。”马歇尔元帅和司徒雷登大使作为“和平使者这个辛劳啊！前天马帅五上庐山，得出的

---

① 郭沫若：《慰问记者》，《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结论是：大局将取决于战场，而非议场，商谈不过是形式，战争才是实际。”浦熙修通过马歇尔之口将国民党进行国共和谈的真实目的表露无遗。

浦熙修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毅力，她善于化大为小，一一突破。这样，每一个重大的选题在她手里都被分成若干个分题，迎刃而解。旧政协会议时一一采访政协会议代表，浦熙修独特而有创见的采访计划使其名声大噪。1947 年国民参政会期间，浦熙修再次运用这种方法，化整为零，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浦熙修借各党派代表之口，宣传了人民的愿望、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政局的发展前途，也揭露了国民党及其帮凶的伎俩。就报道本身而言，浦熙修的系列访问记是非常成功的。这是她从事新闻工作十年中的力作。

同时，浦熙修始终怀着对人民的无限关爱去报道新闻。《孔大小姐飞美结婚》，《女公务员为米请愿 孔副院长予以拒绝》两组对比鲜明的社会新闻，反映的是浦熙修对豪门奢侈的抨击，对苦难人民的爱怜。《一个可怜的擦皮鞋童子》，《妇女辅导院门外 时有飘零人哭泣》两组新闻反映抗战时期重庆下层妇女儿童的悲惨处境。

2. 香港《文汇报》南京特派员：坐过牢房的女记者

1948 年 7 月 8 日，国民党当局以“为匪宣传、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动摇士气……”等一大串罪名，宣布给予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处分”。

但浦熙修仍然留在南京。她认为，当时正处于方生未死的大转变时期，对一个新闻记者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到解放区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留在南京可以目睹蒋家王朝的崩溃、旧中国的死亡。这时，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欣赏浦熙修的文笔和见识，要她为该报写“南京通讯”，约定每月写 4 篇，港币百元。浦熙修对写通讯还有兴趣，决定把南京蒋家王朝垂死挣扎的情况报道出去。此时浦熙修成了香港《文汇报》的南京特派员，她在短短的时间内发表了大量反映国民党南京政府即将垮台之前的战局和政局，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南京《新民报》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下被迫停刊，这时的浦

熙修已经不能再以记者的身份活动，但还有许多新闻圈内外的朋友为她提供材料。像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秘书傅泾波，立法委员于振瀛、陈建晨，郁风的丈夫、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的黄苗子，以及一些新闻界的朋友，都愿意同她交谈，提供一些信息。每星期，她先看看报纸上的消息，从其中找出一个反蒋的主题，加上采集到的信息，归纳分析，写成一篇通讯，寄给上海的钦本立，由他转寄香港。[①]

1948年9月9日至11月初，浦熙修以“青涵”为笔名发表了多篇南京通讯。9月9－10日，连续发表了浦熙修以“青涵”为笔名写的南京通讯《是王牌么？——改革币制的内幕》，27－28日又连续发表了《济南失守前的南京》，10月6日发表了《济南易手后的南京》、10月17日－18日发表了《币改的挣扎》，10月21日发表了《暮秋南京》，11月1日发表了《今日南京》，11月8日发表了《金圆券的下场》。1948年11月8日，浦熙修写下了《金元券的下场 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为国民党的统治频敲丧钟。

这些通讯，结合时局，通过详细周到的分析，连续报道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过程及结果，报道了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情况，把即将垮台的种种迹象传播到国民党的新闻控制无法触及的香港，传播到海外。

例如，《是王牌么?》一文描绘了国民政府高官对待币制改革的不同态度，分析了南京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而采取的币制改革的内幕和实质。如财政部长王云五极力赞成币制改革，俞鸿钧痛陈币制不可改革之道，主计长徐堪在讨论此案时托病避沪，四联总处秘书长徐柏园依偎在可否之间。文章认为，币制改革是南京国民政府挽救自己的统治的最后一张牌。“改革币制这张牌摊出来了。是王牌还是烂牌，目前依然是个大疑问。”作者在分析多种因素后，指出：“目前政府真是全副精力在维持这牌的价值。政府本身亦战战兢兢，俨然扑克场中‘小2’当作‘老K’打的神气。是吉是凶，是赢是输，他们亦捏着一把汗。这王牌到底是不是张烂牌，恐怕时间不久就会证明了。”

---

① 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浦熙修小传》，《书屋》2001年第6期，转引自 http: //www. xinwenren. com.

时间证明这是一张烂牌。1948年10月17－18日，浦熙修在《币改的挣扎》一文中描写了金圆券崩溃的景象："南京抢购声中最不得了的是米店里没有了米。有人走遍全城，买不着一粒米。""糖果店，蛋糕、面包也都一扫而光。主妇们几天来都不安于室。街头行不通，商场挤不进。首都如今万人空巷，真是盛况空前。""当币制改革案公布时，大家都知道这法案最多只能发生短时的效用。短时短到什么程度，当时许多人有了争论，有人估计五个月，有人估计三个月。今天距"八·一九"不到两个月，改革案已经在做最后的挣扎了。这案关系甚大。金圆券垮了，恐怕整个局面都要跟着垮。因此政府今天亦就在币制案底下作最后的挣扎了。"

在随后刊出的《金圆券的下场——随着军事挫败一起垮台》一文中，浦熙修说："金圆券在出世的那一天，它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但谁亦没有料到它失败得这样快，这样惨，更这样丑！政府本来是玩的一套空把戏。那违反了经济法则的改革币制案，完全要靠政治力量支持，但政治的威信，完全以军事的进展而定。目前军事既如秋风扫落叶般败下来，金圆券当然要跟着垮台了。"文章尖锐地指出："到了这种地步，谁亦知道这已接近大变动的边沿了。"

1948年11月7日，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淮海战役。8日，第三绥靖区副总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部在贾汪起义，战线出了个大缺口。10日，徐州剿总最大的主力黄伯韬兵团又在碾庄附近地区陷入重围。战役一开始，国民党军队就败象已现。战局紧张，南京政府要员已经开始谋划出逃，南京机场上不时有飞机起飞，声震屋瓦。

浦熙修于1948年11月16日深夜写成《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并准备寄给香港《文汇报》。这是一篇近四千言的揭露南京政府种种灭亡迹象的通讯。"在这军事山倒、经济崩溃、外援绝望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南京局面会有什么奇迹出现了。今日南京已陷入混乱、慌张、恐怖的境地，但政府仍然在作着最后的挣扎。在老百姓说来也许是黎明前的黑暗吧！"文章列举了物价飞涨、教师罢教、杜威落选、美援绝望种种叫南京政府头痛的事情。至于军事方面，文章指出："东北完蛋了，华北也所剩无几，现在是要作华中决战了。"

这篇对新局面充满着渴望和激情的文章，却没能够寄到香港《文

汇报》。初稿写成未及付印，国民党特务就以查户口为名，闯进浦熙修的小楼，把她逮捕，投入特刑厅的监狱，把她当作共产党的重要嫌疑犯对待。

此文一直没有发表，现作为浦熙修的遗墨收在《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 2001 年）一书中。我们不妨看一看这篇没有发表过的、极具杀伤力的精彩篇章（仅选最后一段）："南京政府还在作着最后的挣扎，整日飞机在上空隆隆响：有的说是在搬家，有的说是在应援前线。有钱人搬家的越来越多了，下关车站码头堆满了行李箱笼。美侨撤退了，高楼洋房空出了不少。物价在这直接的战争气氛下更是猛烈地泛滥，老百姓过着无米没柴，又缺油的苦日子，真是活不下去了。但他们也发现了另一个新希望，他们在谈论着解放后的开封，白面是一毛钱一斤，解放后的济南，三日后秩序即行恢复。他们不觉冲口而出：共产党要来就快来吧！他们确是在咬紧牙关，忍受这黎明前的黑暗。"

作为一名记者，浦熙修不仅是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场面的见证人，更是一名历史的参与者。她用人民记者的良心去摄取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而不避锋芒；她用细腻的心灵去体味人民的痛苦，而无所畏惧。无论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还是在内战阴霾的南京，她都是当时最活跃、最勇敢、最善战的新闻记者之一。

后人这样评价浦熙修："浦熙修具有一个优秀新闻记者的品德和才华。她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新闻敏感强，文笔质朴犀利；她工作勤奋，忠诚于自己的职责。"①

二、以情动人的彭子冈

抗战时期子冈与浦熙修并肩采访，被称为重庆新闻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抗战胜利后，彭子冈为重庆谈判作了精彩的报道。她的 1500 字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发表在 1945 年 8 月 29 日的《大公报》上。60 多年过去了，还可以从中看到传神的细节，仿佛在现场看

① 《卓越的新闻战士浦熙修》，《人民日报》1981 年 3 月 27 日。

到了新闻报道中的主人翁。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人们有不少接飞机的经验，然而谁也不能不说出昨天九龙坡飞机场迎毛泽东先生是一种新的体验。没有口号，没有鲜花，没有仪仗队，几百个爱好民主自由的人士却都知道这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这也许可以作为祥和之气的开始吧。机场上飞机起落无止尽，到3点37分，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才盘旋到人们的视线以内，草绿的三引擎巨型机。警卫一面维持秩序，一面也没有忘了对准了他的快镜镜头。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中国摄影记者不多，因此倒强调了国际间关心中国团结的比重。塔斯社社长普金科去年曾参加记者团赴延安，他也在为“老朋友”毛泽东先生留像。昨日下午6时有重庆对莫斯科广播的节目。普金科看看表，欣慰地笑了。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延安来了9个人。毛泽东先生，52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9年前经过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了。这里有邵力子、雷震两先生，这里有周至柔将军，这里有张澜先生，这里有沈钧儒先生，这里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旧，他都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纸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的，这是他的新装。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吧”，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张部长

在汽车旁力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2819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2823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50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记者像追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他和郭先生仔细谈着苏联之行，记者问他对于中苏盟约的感想时，他说："昨天还只看到要点，全文来不及看呢。"我以为他下飞机时发表的中英文书面谈话甚为原则，因此问他："你这谈话里没有提到党派会议与联合政府，这次洽谈是否仍打算在这两件事上谈起呢？"他指着中文书面谈话说："这一切包括在民主政治里了。还要看蒋先生的意见怎么样。"对于留渝日期，他说不能预料。他翻看重庆报纸时说："我们在延安也能读到一些。他盼望有更多的记者可以到延安等地去。"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8时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事休息后再赴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个胜利与和平的握手。（全文载于1945年8月29日《大公报》）

这篇新闻特写报道了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以及现场的奇特气氛，赢得了读者和同行的赞赏，并通过对毛泽东的衣着、举止的细微描述，给读者留下了毛泽东的谦虚朴实、平易近人的印象，也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宣传把中共领导人描绘成蛮横粗野的做法。新闻中还特地写到毛泽东在张治中办公室客厅的拘谨行动，甚至打碎了一只茶碗盖等细节，传神地刻画了毛泽东的内心和性格，让大家看到毛泽东也是一个来自民间的书生。

1945年9月，子冈与丈夫徐盈一起到北平《大公报》办事处工

作。她继续以新闻报道为武器，揭露美蒋阴谋和故都人民生活的煎迫。当时国民党当局正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封锁了解放区。为了报道解放区尤其是中共领导下的张家口军民的生活，子冈与法国《巴黎日报》记者费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穆拉德、芝加哥日报记者费勒一起，搭乘军调处执行小组的美国飞机来到张家口，在那里进行了为期 4 天的采访，写下了闻名一时的新闻通讯《张家口漫步》，发表于 1946 年 2 月 12 日、13 日的《大公报》上。她满怀喜悦之情向读者交代了张家口解放后的变化，为此，她用了"漫步"一词。"漫"是没有限制，无拘无束的意思。"漫步"表明子冈是带着欣赏的态度，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在张家口进行采访的。

"当记者搭了执行小组的美国飞机向张垣起飞的时候，正感觉到中国大局进展的迅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吧！几个月以来的冲突给胜利以后的人民浇了满头冷水。在'奸匪'、'国特'的宣传战以后，居然开成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的中外记者至少每周有一次以'奸匪'活动为中心的官方招待会以后，外国记者们居然一批又一批去张垣采访执行小组的新闻了。"

飞机尚未飞临张家口，子冈就向读者交代了该市的近况，其中掩饰不住她对中共领导下的张家口所感到的诱惑与新奇："这个以皮毛著名的城市成了一个神秘的都市。中共很迅速地把地方变成教育中心，政治中心仍在延安。延安的许多文化工作者徒步行军了二千五百里路程，走破了棉鞋，蹭破了棉裤腿，没有孩子的女同志也不例外，只有母亲与孩子坐在骡轿里（父亲就得当马车夫)。就这样，有上百的文化干部抵达了张垣，加上晋察冀边区原有的文化教育干部，张家口的书卷气息浓厚起来了。"发生了变化的张家口在子冈的眼里是"一个新的传奇，新的诱惑，就像延安在抗战初期一样"。

在那里，子冈采访了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参加了聂荣臻、罗瑞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记录了张家口的新气象：洋车寥落，汽车公营，夜间路灯通亮，妓院关门，人民生活已不成问题。

子冈的采访面很广。回到北平后，她将目光转向几十万失业人口中的三千个国剧（即京剧）界人，为他们的生活出路与国剧的前途担忧，因为"平剧之存在是构成这座古老的文化城的因素之一"。"三千

人背后连妻儿们有一万五千人左右。他们改行的改行，摆摊的摆摊，出宣武门到珠市口逶迤几里路的道上随时可以找到这些半路出家的商贩，他们每个人脑子里全都有那么多喜怒哀乐的戏，但现实生活却逼迫他们一直要演最残酷的戏。”[①]

子冈善于用客观手法让事实说话。她记录张家口发生的变化，和浦熙修描写的国统区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起到了给垂死的国民党统治敲丧钟的作用。军调部国民党方面代表蔡文治苦笑着对她说：“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国民党当局以此为借口，警告《大公报》“徐彭文章不妥”。[②]此外，在观察社会、掌握事实的基础上，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子冈笔之所至即情之所至，将文学手法融入了新闻写作之中。

子冈被人称为《大公报》的“两刚”之一（另一“刚”是杨刚)。她刚勇正直，胸无宿物，以新闻报道和特写脍炙人口。抗战时期，子冈在大后方采写的报道、特写，从新闻报道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历史的部分真实面貌。从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出抗战时期各阶层人民共赴国难的热情。曾经打动过无数读者的《擦鞋童献金救国》一文从贫苦儿童的行动反映了当时抗日民族精神的高涨。报道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一文，以特有的角度，细致的描写为读者刻画了毛泽东的举止与气魄，表达了国统区人民对和平民主的渴望和对毛泽东的热情。

1984年1月，子冈脑疾严重，已经不能执笔写作，仍通过口述由她的儿子徐城北总结了她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这就是《记者六题》。其中之一就是“在新闻作品中学会使用文学手法，热衷于写情”。[③]“如果说别人是以血肉作战，我是在以感情作战；在以一个爱国者的澎湃的情绪在笔底战斗!”[④]

---

① 子冈：《救救北平国剧界》，《大公报》1946年7月8日。

② 徐城北：《感情更磨利了棱角——著名女记者子冈》，《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

③ 于友：《名记者的脚印》第1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④ 苏镇淮：《子冈的〈采访生涯杂忆录〉》，《江苏报业史志》1993年第3期。

第四节　驻外女记者的进一步发展

抗战时期，著名的驻外女记者有《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胡济邦，《大公报》（香港版）驻法特约记者孝隐。由于二战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国内各大报纸都加强了国际新闻报道，驻外记者有了较大发展，其中有不少著名的女记者。如《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南京《中央日报》驻英特派员徐钟珮等。围绕战后英美等国之间的各种矛盾和美英的反苏反共等问题，杨刚和徐钟珮从国外发回了不少见解深刻的报道，全面展示了战后美英苏等国的局势与他们之间的纠纷，尤其是杨刚的“美国通讯”，撷取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进行深入分析，为国内提供了及时而可靠的参考，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

一、杨刚：见解深刻的“美国通讯”

《大公报》非常重视对国际新闻的报道。1926 年 9 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办新记《大公报》后，该报逐渐发展了许多驰名的驻外记者，驻英记者先后有萧乾、马廷栋、黎秀石，驻日记者高临度，驻美记者先后有杨刚、朱启平、严仁颖、章丹枫，驻新加坡和印尼记者郭史翼，驻缅记者吕德润等等。庞大的国际采访网络，风靡一时的域外通讯，都曾为《大公报》增色不少。

1944 年 6 月，在重庆九龙坡机场一架即将起飞的美国军用飞机上，坐着一名中国女记者，她就是奉命去美国的《大公报》特派记者杨刚。她将刚过 10 岁的女儿郑光迪交给《新华日报》的朋友照顾，自己乘坐从孟买到纽约的海轮，前往美国。

1944 年 7 月到 1948 年秋，杨刚在美国留学，就读于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女子学院，一边求学深造，一边兼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从事新闻采访工作。在美 4 年，她大量阅读外国报刊，广泛接触各色人物，深入观察社会实际，撰写国外新闻专电、通讯评论，纵论世界风云，为《大公报》写下了见解深刻的美国通讯，成为优秀的驻

外女记者。据不完全统计，从 1945 年 2 月 17 日至 1948 年 10 月 26 日，她先后在《大公报》的“美国通信”栏目上发表国际通讯 48 篇，内容涉及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如关于美国种族歧视问题、美国对日对欧对华政策，劳工问题，工人运动，城乡生活，农业工商业，总统选举，思想控制、侨民问题以及美国的社会问题等。文章内容充实，分析深刻，文字生动有力，使“美国通信”成为《大公报》的名重一时的专栏，吸引了无数读者，大有洛阳纸贵之势。1951 年，这些通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结集为《美国札记》通讯集出版。

杨刚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美国通讯主要有[①]：

篇　　名	发表时间
《明暗交流(上)——记美国人海中的星沫》	1945 年 2 月 17 日
《明暗交流(下)——记美国人海中的星沫》	1945 年 2 月 18 日
《争自由的浪潮——美国国务院提名案》	1945 年 5 月 27 日
《怎样处置日本？美国舆论分三派》	1945 年 9 月 12 日
《英美财政经济商谈》	1945 年 9 月 14 日
《批评麦帅对日政策 美国舆论引起激变》	1945 年 9 月 20 日
《美劳资纠纷仍严重》	1945 年 10 月 6 日
《美国的经济复员》(上、下)	1945 年 10 月 30 - 31 日
《力的歧途》	1945 年 11 月 8 日
《纽约的选举》(上、下)	1946 年 1 月 2 - 3 日
《年初谈美国总统》	1946 年 2 月 18 日
《大西洋的浪潮——记世界最大的工会选举》(上、下)	1946 年 4 月 27 - 28 日
《记美国的小城》	1946 年 7 月 2 日

① 资料来源：《大公报》1945 年 - 1948 年。

篇　　名	发表时间
《美国农村生活又一角——在明尼梭达》	1946 年 7 月 11 日
《寒夏深秋——论美国选举》	1946 年 11 月 30 日
《美国对华政策何去何从?》	1947 年 1 月 30 日
《上坡与下坡——本年美国工商农业展望》	1947 年 2 月 27 日
《云兮冥兮欲雨——美国对华政策现阶段》	1947 年 6 月 26 日
《魏德迈锦囊》	1947 年 8 月 4 日
《走索上的马歇尔方案》(上一、二)	1947 年 10 月 1－2 日
《走索上的马歇尔方案》(中一、二、三、四)	1947 年 10 月 20－24 日
《走索上的马歇尔方案》(下一、二、三)	1947 年 10 月 28－30 日
《美国第三党——和平、进步、繁荣》(上、中、下)	1948 年 1 月 17－19 日
《美国粮价下坡——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1948 年 3 月 1 日
《美国援华政策新动向——从世界政策看对华问题》(上、下)	1948 年 4 月 9－10 日
《和雾荡漾——记美国政海中的一波》	1948 年 6 月 4 日
《从美国共和党大会说起——杜威和华伦上台》(上、下)	1948 年 7 月 12、15 日
《在马尼拉港》	1948 年 9 月 15 日
《我们到了珍珠港》	1948 年 9 月 16 日
《蓓蒂——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上、下)	1948 年 9 月 30－10 月 1 日
《在美国的侨民——天堂里弱小民族问题的一面》(上、下)	1949 年 10 月 7－8 日
《美国工人运动的低潮》	1949 年 10 月 11 日
《在钱的自由下面——美国的思想控制》	1949 年 10 月 26 日

杨刚有关美国情况的消息、专电、通讯、评论等新闻报道，用大量事实、深刻透彻的分析和生动的文笔报道抗战胜利后美国的社会问题和对外政策。她的通讯《蓓蒂——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真实而又生动地记述她从美国南方回到纽约后，和一个美国女青年共同的艰苦生活。当时《大公报》给她的薪金不多，远远不够她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她不得不打零工以弥补其不足。蓓蒂受过高等教育，有硕士学位，可是她没有固定工作，到处找零工而又不断失业，苦恼得有点发疯。杨刚认为，蓓蒂生活中所反映的问题，正是整个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她在通讯里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进行了极有说服力的剖析，具有散文和政治评论之美。

最典型例子当属对《走索上的马歇尔方案》一题的详细报道。这组题材经连续报道，形成了气势磅礴的系列国际新闻述评。从 1947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杨刚在美国发回了 9 篇关于“马歇尔计划”的国际报道，这就是她的《走索上的马歇尔计划》系列报道，包括《论巴黎十六国会议》2 篇，《美英法德冲击图》4 篇，《心犹豫而狐疑兮——美国》3 篇。这些报道有述有评，先后报道了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美国国内各方以及欧洲有关各国对该计划的意见，将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上的打算与心态分析得相当深刻、透彻。

战后的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处于实力的顶峰，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而经过战争考验的苏联逐步强大，在战后国际事务等重大问题上坚持不对美国让步；而欧洲却因为战争导致经济衰退。为了扶持欧洲经济复兴以遏制共产主义，并实现自己在全球的霸权，美国统治集团制定了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马歇尔计划”。这是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与苏联在欧洲角逐的成败关键之所在。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杨刚关于美国助蒋内战的对华政策报道。《美国对华政策何去何从?》一文向读者报道了美国国内人士对美国援华方案的态度：“拥之者三心二意，抗之者大放厥词，单纯的认为是反动文件，隐在漂亮的废话里面。……率直的说，这是最伪善的文件，对于蒋主席是一个‘尽管进行内战’的信号。”那么，杨刚对此持什么态度呢？“记者对于这种官方文件，一向以中国人传统的怀疑主义

对待之，……不愿对这种对华的洋文件过于认真。因为，无论从理论上，从事实上，今天中国人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把它当作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不把自己塞在两个大国中间，把自己当作别人的杠杆看待，于中取利，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何况自己虽把自己当作杠杆，而别人却把这条献奉上来的杠杆当成朽木。"①

她的国际新闻述评还报道和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如《美国对华政策何去何从?》（1947 年 1 月 31 日），《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从世界政策看对华问题（上、下）》（1948 年 4 月 9 日 - 10 日），《云冥冥兮欲雨——美国对华政策现阶段》等。这组文章分析了战后美国世界政策的新发展即马歇尔计划的出台，马歇尔本人和美国总统对该计划在看法上的分歧，马歇尔计划与以前的杜鲁门主义的区别，以及在马歇尔计划出台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华政策。杨刚通过分析认为，1947 年美国奉行模糊的对华政策，不敢公开反共，只好在反共与复兴西欧之间来回切换，中国问题一直躲在幕后。这时的对华政策是暗塞而不明要。1948 年，由于舆论与上层意志的统一，对华政策要与马歇尔计划绑在一起，公开反共。这就是杨刚分析的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

美国想控制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一个据点，蒋介石想利用美援打败中共。但是，国内人民并不听从他们的安排，中国的学生在北平发出了吼声。"中国若能坚决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保持自尊，自主的刚正态度，美国无意也无须使中国成为她的附庸，但中国既以反共为第一，而以人民利益为第二，且指望美国为泰山来进行这一套工作，则现在所谓的美军治外法权，所谓的互惠平等商约，以及其他种种，当然趁虚而入。"②杨刚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错误对华政策是中国内战不休和中国主权不完整的原因之一。

杨刚还从不同角度分析美国对华错误政策出台的原因。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对华政策是其全球范围内反共的一种逻辑发展，而且这种政策将以军事干预为主，经济援助为辅。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是因

① 天津《大公报》1947 年 1 月 30 日。
② 天津《大公报》1947 年 1 月 30 日。

为美国统治阶层认为“共产主义威胁民主的存在”，还由于美国国内第三党的威胁和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用“战争威胁加紧军事工业使恐慌不来”。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与马歇尔合龙”，表现在“国会要提出军事援华案，并且要把对华贷款归并到欧洲贷款一案办理”，使美国在全世界的反共政策中取得更多的合法性、公开性，使之不仅在事实上，同时在立法上成为全面反共反苏的一环，使美国对华的军事干预更加放肆。

但是，战后中国内战混乱，蒋介石发动内战深深伤害了渴盼和平的人民的心，动摇了蒋军的士气与人心。美国可以尽一切力量援助国民党政府，但不能给国民党政府以士气和民心。美国政府没能够像1948年3月22日的《纽约论坛报》所说的那样——“以大宗款项，帮助政府区的人民实际改良他们的生活像共产党那边的一样，那么这些美援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是军事经济并行的，都会有更大更多的诱惑性”。[①]但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一样，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都想挽救蒋介石的命运，却都不顾人心所向，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任《大公报》驻美特派记者期间，杨刚还写了大量反映美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通讯。从她的通讯文集《美国札记》里可以看出，有反映美国工人运动的《美国工人运动的低潮》，反映在美侨民生活的《在美国的侨民》，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蓓蒂——美国社会问题的缩影》等。这些文章揭露了美国社会“自由”和“民主”的真相以及该社会的弊病，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困苦和烦恼，以及中国侨民在那里受到的屈辱。《争自由的浪潮》（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27日）一文报道了1944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提出的国务院新人选名单所引起的风波。由于新人选的政治面目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大局有距离，所以名单一公开就引起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国会不得不举行听证会，总统罗斯福也不得不出面解释，最后才勉强通过。杨刚报道了美国人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精密专诚，大胆

---

① 天津《大公报》1947年1月30日。

无畏”的原因是“科学使他们如此，民主使他们如此”。这篇客观关于美国政治机构运转情况的报道为当时国统区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提供了政治材料。尽管这篇通讯在编辑部压了3个多月，发表之后，还是引起了强烈反响。[①]

杨刚的美国通讯多用上、中、下连载，资料充分，内容充实，分析深刻，观察敏锐，文笔多姿多彩，文字生动有力，对读者有极强的感染力，成为《大公报》上传诵一时的专栏，受到众多读者的重视和好评。中共著名新闻工作者、曾经担任过中国记协名誉主席的吴冷西在抗战期间只爱读杨刚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美国通讯》，欣赏她的文章立论精辟，文章流畅而且有中国气派。[②]

杨刚的“美国通讯”，放眼世界，注目中国。在关注美国对外政策的同时，着力分析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指出这种错误政策必然走向穷途末路。杨刚的“美国通讯”，表现出她知识广博，眼界开阔以及对国际问题的远见卓识；运用多因素分析、纵横对比等方法，使得这些通讯显得分析透彻，逻辑性强，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显示出一个国际问题评论家和驻外女记者的卓越才华。

杨刚的“美国通讯”，对当代著名女记者金凤的影响很大。杨刚任驻美特派记者时，金凤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在江南一个小县城里读中学。“那些‘美国通讯’，使我看到五光十色的美国社会，看到了在那繁荣背后潜伏的危机，看到了友好的美国人民，也看到对中国人民抱着敌意的美国一部分当政的要人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卑鄙行动……那笔锋的雄健，分析的精辟使我钦佩不已。看笔名，我以为是一位男记者写的。后来，听说是一位女记者，就更加倾慕了。也许从此开始，我心底就萌发了想当一名女记者的愿望。”[③]

建国后，杨刚曾任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主管国际评论的副总编辑。她积多年在国外进行宣传报道的经验、知识

---

① 谢国明：《试论杨刚新闻活动的风格》，《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② 吴冷西：《纪念杨刚 学习杨刚》，《新闻战线》1997年第11期。

③ 金凤著：《命运——金凤自述》第150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年5月版。

与眼界，对国际问题具有远见卓识，非常敏感，写出的文章分析透彻，逻辑分明，论证有力，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这不能不说与她做驻外记者时的锻炼与影响有关。

二、徐钟珮：独具一格的“伦敦通讯”

徐钟珮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特约驻英特派记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报在收复区接收了大量“敌伪”财产。南京《中央日报》接受了伪《中报》、伪《中央日报》、伪新中印刷公司、日本总领事馆和日本千代洋行南京支店等单位的房屋、印刷材料、家具、图书、交通工具、照相器材等共计1074310421元法币的资产。这使南京《中央日报》积累了雄厚的物资基础，很快在9月10日复刊。[①] 面对战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基础雄厚的南京《中央日报》加大了国内报道和国际报道的力度，国内特派记者和驻外记者数量大增。除了特约记者郑裕清之外，国内特派记者主要有派往东北的刘竹舟，派往华北的张剑梅，派往上海的储裕生，派往长江、武汉一带的邵慎之，派往西北的古方，派往大西南的承纪云。驻外记者主要有：驻法记者陈琪，驻印记者雪岩，太平洋战区特派记者张仁仲，驻东南亚记者姜军，驻美记者赵铭，驻英特派记者徐钟珮。

徐钟珮，1917年生于江苏常熟，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曾就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新闻处。1945年9月，徐钟珮从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经印度到达英国，任《中央日报》驻英特派员，曾采访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国际文教会议、对意和会等重要会议，所写通讯在该报连载。1947年徐钟珮回国，1949年赴台湾，1956年移居海外。她先后去过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巴西、韩国等国，著有《英伦归来》、《英伦闲话》、《多少英伦旧事》、《我在台北》、《余音》、《追忆西班牙》等书。

徐钟珮深谙做一个记者，应该十八般武艺样样皆精，因为自己曾

---

① 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第266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9月版。

经有过一次非常窘迫的采访经历。那是在法国卢浮宫，面对琳琅满目的稀世珍宝，自己却由于知识的缺乏而无法欣赏，从拉斐尔到毕加索都不了解。所以，初到英国的一个月，她订了英国所有的报章杂志，足不出户，只读不访。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她“似乎忽然走出黑弄堂，豁然开朗，至少稍摸了约翰牛的轮廓。那时节，我可以听到自己智慧成长的声音。”[①] 多天的闭门苦读，使她写起通讯来得心应手，更使她能每周不间断地写她的“英伦闲话”。

徐钟珮文笔优美，将文学手法融入国际报道，所以她的通讯趣味盎然。她以《中央日报》驻英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45年10月21日的旅行记录《寓宇新航》。这是她从重庆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沿途所见所闻。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白云世界”描写了飞机升空后空中的白云世界以及自己的感受。第二部分“加城近景”从多角度描写了战争胜利后印度加尔各答的经济情况，并把它与战后重庆相比。

“白云世界”明显而又恰切地运用了文学的表现手法包括通感来描写飞机升空后的美丽景色：

> 飞机愈飞愈高，天空变成了云的世界，四围都是白皑皑的一片，像冰山，像雪景，有时白云铺满天空，俯视失去了大地，才恍然宇宙间原不止天地两层，中层还有浮云。有时大云漫天遍野而来，拥塞得喘不过气来。大云过处豁然开朗清清楚楚的青天大地。有时云疏处，漏洞中忽见原野，这一漏洞好像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斧痕。
>
> 极目远眺，云外有云，晴空处，也常有几片浮云无声的行来，我回顾机后，是无底的白云，恍惚是我来自白云深处，现在也正向白云深处驶去，我的目的似乎不是加尔各答，而是那白云深浅相间处，依稀绰约的琼楼玉宇。
>
> 渐渐地，飞机上浮，白云下沉，脚底下向上直窜的冷空

---

① 徐钟珮：《我，也做了四年记者》，《报学杂志》试刊号，1948年8月16日。

气把我从幻想中跌回现实，我披上外衣，裹上毯子，斜视窗外，模糊间不见一物，只看到玻璃上横流的水蒸气，我意识到自己已在高空，很想倚窗外眺，但忽然的一阵疲倦，大概是氧气不足，竟昏昏睡去，醒来时，又见到一片白云世界，我睡眼惺忪，旅伴告诉我，已过驼峰，现在在向下飞了。谢谢天，我带着一只空无一物的呕吐袋到达汀江。

她的描述仿佛把我们带到当时的飞机上，好像自己也是当时一名乘客，随她一道飞越驼峰。

"加城近景"则从多角度描写战后加尔各答的经济情况：操着自己杜撰的英语文法、向即将返国的盟国军人兜售生意的加城商人；从事战后善后工作的加城工人；加城市场上生活用品的短缺；由于经济衰退工人失业导致加城的劳动力过剩。这些描写生动、细腻，充分反映了战后加城经济的疲惫。

还有一种写法是在描写中渗透作者的个人观点，并透露着一丝幽默。例如她形容二战后法国地位的失落时，就是这样：

法国巴黎，重做和平之宫，但抚今追昔，情况已截然不同，老虎总理的威风，已成过去光荣，现在的法国，虽忝为主人，然而在许多外长会议席上，它无法参与。

她的文章，表现手法多样，意境优美，董显光读过她的"伦敦归来"后，就称赞她有一支轻松活泼的笔。①

徐钟珮的伦敦通讯内容涉及以下几方面：战后英国经济复员的艰难，如《英国的复员工作　物资缺乏、经济窘迫、人民都怨声载道!》(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1月26日)、对外政策的矛盾，如《邱吉尔在富尔敦演说后》(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2日)、英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如《英国议会的反贝文潮》(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

① 《编者的话》，《报学杂志》试刊号，1948年8月16日。

12月6日）。此外还有一些国际会议报道，如《总统夫人从不缺席　码头工人善于辩论——联合国大会英美代表素描》（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2月8日），《和会报告第一号　和会里的风波——大小国之争》（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8月20日）等。

徐钟珮善于在生活化的记述中报道新闻。《英国的复员工作　物资缺乏、经济窘迫、人民都怨声载道!》报道了战后英国人民的心声。战后英国人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仍受控制。由于衣物受控，所以受人非议的、粗制滥造的“平价衣服风行伦敦，简直少见有娉娉婷婷的女人。”战后的英国物价上涨，人们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幸福与满足。工人罢工，要生活的自由；战时在重工业里服务的妇女要完成未竟学业的自由，人民哀叹，何处栖身，何以生存？在首相艾德礼的手里，外交内政，都有无数分外棘手的事情要处理。

徐钟珮善于用白描手法勾勒人物。《总统夫人从不缺席　码头工人善于辩论——联合国大会英美代表素描》[①] 一文以白描手法勾勒出与会主要代表的形象，勾勒的过程简洁明快，勾勒的结果形象生动。美国首席代表贝尔纳斯“为人轻快，小小的眼睛，半开半闭的。他是速记的高手，他似乎不擅长演讲，但却知道怎样用食指加强演讲中的要点。”美国共和党主要发言人范登堡“身长六尺多，说话声音很动人，吸雪茄烟。在会场上的辩论紧张到白热化的时候，他常常抽雪茄。”英国代表贝文“说到重要之处也曾表现得神经过度紧张，坐在靠近贝文的人说贝文思想着的时候左颊立刻抽动，兴奋的时候右颊就会抽肌。”英国首席代表、首相艾德礼“谦恭斯文，头上已经秃顶，英国既是联合国大会的所在地，艾德礼当然得忙着表示一点地主之谊。”

徐钟珮具有强烈的新闻敏感和敏锐的判断力。《邱吉尔在富尔敦演说后》[②] 一文报道了战后下台的英国前首相邱吉尔以他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所发表的演讲在国内引起的震动。她从邱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中预感到英国联合美国以对抗苏联之必然。虽然邱吉尔在富尔敦的

① 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2月8日。

② 南京《中央日报》1946年4月2日。

“铁幕演说”所反映的立场并不代表执政的工党政府，但历史的发展证明战后虚弱的英国只有与美国联手，才能够使自己的“恐苏症”稍得缓解。同时，他们共有的反共特点也使得他们暂时联合。徐钟珮认为，邱吉尔的演说澄清了世界局势，无论亲他反他的人，都很重视他的演说。事实正是这样，邱吉尔的“富尔敦演说”迎合了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二者均以苏联为假想敌人，仇视共产主义。这导致战后持续多年的“冷战”局面的形成。

徐钟珮的新闻报道具有深刻的见解，她能从纷乱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梳理出明确的观点，这从《英国议会的反贝文潮》中可以看出。这篇报道反映英国工党内阁里的部分“叛徒”反对外相贝文太过的亲美政策，要求建立一个英国独立的外交政策。这个独立的外交政策是既不亲美也不反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叛徒”们认为，贝文的罪过在于“太过的亲了美国，太过的不亲苏联，最大的罪状是失去了自己。”他们主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一种中间路线，欲展示给世界一种对付共产主义的更好的主义。而首相艾德礼回答反对派的是“战后和美国合作，势所必然，整个欧洲都在闹饥荒，谁能援助欧洲?”其实，内阁里的“叛徒”与首相艾德礼的较量反映了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表示了英美亲善中的一个离心力”。徐钟珮的判断十分有见地。同样，在美国也存在反对与英亲善的势力。美国外长在法国开会期间，华莱士就怒吼要和帝国主义的英国绝缘。徐钟珮以其深刻的见解，一针见血地为读者指出英国反贝派的实质。

徐钟珮具备较高的文学修养和丰富的国际知识，而且能把它们近乎完美的结合起来。徐钟珮用通俗幽默的语言反映国际问题，不温不火，娓娓道来，能给读者营造一种轻松的阅读氛围。

此外，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胡济邦继续在苏联任《中苏文化》驻苏记者，报道了战后苏联的经济复兴与发展情况。如《苏联收复区内之经济复兴》(《中苏文化》16卷8期)，《苏联的铁道运输》(16卷9-10期)等。

杨刚的“美国通讯”和徐钟珮的“伦敦通讯”以及胡济邦的“莫斯科通讯”，围绕战后美英如何在国际格局中获得最大利益，苏联如

何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现了战后几个大国的内外政策。这些通讯报道，共同的特点是文笔优美，见解深刻，表现出女性驻外记者的特色。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妇女刊物均得到发展。妇女报刊在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以及动员妇女支援解放战争的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维护妇女权利方面也做出了重大努力。这一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人才辈出，声势浩大。浦熙修采写兼优，彭子冈的作品以情动人，杨刚的“美国通讯”见解深刻，徐钟珮的“伦敦通讯”独具一格，可读性强，胡济邦在苏联为我们发回了关于战后苏联经济复兴的报道。她们在当时乃至解放后，都是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

第六章　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

“每个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① 同样，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发展也可以衡量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水平。

中国近现代妇女报刊与女新闻工作者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在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们表现了出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也反映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节　中国妇女报刊发展的特点

一、与政治形势发展息息相关

（一）中国妇女报刊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产物

18、19世纪，由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巨大浪潮的推动，以争取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女权运动兴起，妇女报刊应运而生。诞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妇女报刊为妇女自身的权利而呼吁和斗争。

中国的妇女报刊产生于戊戌维新时期。由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妇女解放思想的提倡，使上层妇女尤其是与维新派有直接关系的妇女率先觉醒，提出了自身解放的要求。1897年夏秋，一些

① 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7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2月第1版。

具有维新思想的妇女在上海创立了中国女学会，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康广仁的夫人黄谨娱等人为倡办董事。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1898 年 7 月 24 日，中国第一张以妇女为对象、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的报纸《女学报》创办。该报存在时间不长，参与者主要为当时少数知识女性，在社会上影响不大，但它开中国妇女报刊之先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女性觉醒和解放。

（二）中国妇女报刊与中国革命互动发展

中国妇女报刊在维新时期产生之后，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救亡与抗战以及解放战争等阶段，逐步呈现出发展壮大的势头。

辛亥革命与妇女报刊互动发展 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妇女报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另一方面，妇女报刊也有力推动了辛亥革命。

辛亥时期妇女报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活动的高涨而蓬勃发展。1905 年同盟会成立前，妇女报刊发展缓慢。之后，妇女报刊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1905 年仅在国内就有 5 种，1907 年多达 12 种，其中有 3 种是在东京创办的。民国成立后，随着 1912 年女子参政运动的出现，1912－1913 年又出现了 6 种鼓吹妇女参政的报刊。袁世凯上台后，极力压制妇女运动，鼓吹妇女解放的妇女报刊受到挫折，只有一些知识性的家庭妇女杂志得到发展。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想进一步深入，开始触及妇女的政治权利。被尊称为“女界之卢梭”的“爱自由者金一”金天翮（1874－1947）在《女界钟》里专辟章节讨论女子政治权利问题。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报刊的发展培养了读者群体。同时，女留学生如秋瑾、唐群英等在日本创办一系列妇女刊物，在海外宣传革命思想。最关键的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孙中山十分重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动员妇女积极参加革命，一些归国的女留学生成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妇女解放与革命运动的先驱，如秋瑾、陈撷芬、唐群英、尹锐志尹维峻姐妹、燕斌、张昭汉等，她们勇敢地冲破束缚妇女的封建枷锁，创办妇女报刊，传播民主革命与妇女解放思想，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发展。

新文化运动促使妇女报刊发展并转型 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思想

文化运动，也是一次批判摧残与压迫妇女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的妇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悲愤于封建余孽鼓吹封建节烈，更悲愤于多数中国妇女的不觉醒而甘当封建牺牲品。没有新的思想武器去唤醒妇女，新文化运动将无法深入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把妇女问题纳入反封建压迫、求民主科学，反奴隶羁绊、求独立自由的主题范围内，集中批判"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对妇女的压制与摧残，在全社会掀起研究、探讨妇女解放方法的热潮。这一时期的妇女报刊数量众多，形式各异，议题深刻，主题鲜明。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妇女报刊的内容在诸多思想的交锋中开始转型，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看待妇女问题的刊物开始出现，妇女刊物的关注对象也从资产阶级中上层扩大到广大劳动妇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问题第一次成为政党纲领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随着妇女组织的普及，妇女报刊第一次在政党的领导下，开始从大中城市向小城市发展。

救亡与抗战的至高主题使妇女报刊的发展空前活跃　"九·一八"事变导致中日矛盾上升，救亡图存，民众奋起。形势的发展给予妇女运动以深刻的影响，广大妇女的民族正义感深受刺激，女学生、女工人和上层知识妇女不顾国民党的禁令，突破了单纯追求男女平等的要求，以挽救祖国危亡为共同目标，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潮流。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妇女报刊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妇女报刊发展热潮，《妇女生活》是这一时期最典型、最优秀的妇女刊物。同时，报纸上的妇女专刊、杂志上的妇女专栏也大有发展。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战争，战争的爆发使全国各政治派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团结起来。为了使妇女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严重性，广泛动员妇女投入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中去，各党各派的妇女及妇女团体纷纷创办妇女刊物，出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妇女报刊最活跃的局面。抗战期间我国出版的妇女刊物，包括妇女期刊和报纸上的妇女副刊，分布地域空前广泛。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大中小城镇还是农村，国统区还是抗日根据地，都出版有妇女刊物。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国各地出版的妇女期刊有 130 种。

抗战胜利后妇女报刊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发展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在其影响和领导下的妇女刊物尤其是解放区妇女刊物逐步增加，国民党领导的妇女刊物的阵地逐步萎缩。

（三）在刊物内容方面，将妇女解放与政治变革相结合

将妇女自身解放与政治变革相结合是中国妇女报刊发展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

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在《知新报》做日文翻译时，就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她在《女学利弊说》这篇文章里考察了古今中外对待女子教育的态度，将变法维新与兴女学的主张结合起来，从国家和个人相结合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问题，开妇女解放与政治变革相结合的先河。秋瑾看到中国前途之危，女界命运之惨，便在《中国女报》发刊词里阐明了她在革命活动中谋求妇女解放的办报目的，"然则曷一念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予念及此，予悄然悲，予怃然起，予乃奔走呼号于我同胞姐妹，于是而有《中国女报》之设。"①新文化运动时期妇女报刊的宣传内容以民主、科学为基本精神，全面探讨了妇女解放问题。

妇女报刊的这一特点在救亡和抗战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将除汉奸妇女报刊之外不同政治观点的妇女报刊统一起来。多种类型的妇女报刊背景不同，但都以宣传救亡、动员妇女参加抗战为编辑方针，在坚持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妇女生活》在发刊词里阐明其创刊背景，"外则帝国主义的凶狠魔手，软硬兼施地一天天在加紧侵略；内则封建残余以及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地在施威"。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侵略，一方面是封建卫道士主张"妇女回家"，高唱恢复"三从四德"。创刊后的《妇女生活》以多种方式报道国内外妇女界动态，动员妇女参加救亡运动，"我们两万万女同胞，不要怀疑自己的力量不够，只要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敌人的

---

①《中国女报发刊词》，《秋瑾集》，中华书局1960年7月版。

枪炮谁说是冲不破的!"[①]同时对"妇女回家"、"三从四德"甚至"新贤良主义"等逆流予以抨击，并与提倡这种观点的个别妇女刊物进行论战。原来观点相对保守的《妇女共鸣》在这一时期也发生改变。初创的《妇女共鸣》在不妨碍国民党统治及其政策范围内做文章，它把妇女解放局限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范畴并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和先知先觉的女性身上。但随着日本侵华的加深，《妇女共鸣》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对国民党的妇女政策和内外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批评，主张抗日的立场逐渐明朗，对妇女问题的认识更进一步，表现了妇女刊物的时代特色。中共领导的《中国妇女》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参加生产和抗敌斗争的情况，将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妇女抗敌、生产的事迹传播到全国，而《新华日报·妇女之路》注意维护国统区妇女权益、揭露国统区妇女生活的悲惨境遇，并传达中共关于妇女解放的声音。

妇女报刊是妇女运动的产物。中国的妇女运动从开始就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当时最迫切的政治任务维新变法结合在一起。妇女运动在负载着女性解放使命的发展历程中，与时代主题相结合成为她最突出的特点。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妇女不仅是女人，还是受压迫的穷人，所以妇女运动不仅是自身的解放，还是她所在阶级的解放。陈望道将妇女运动分为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和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并分析这两类运动的目标和宗旨，从中可以看到妇女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关系。"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②]作为反映和指导妇女运动发展的妇女报刊，将妇女解放和政治解放结合起来，是其天然的任务。

二、男性特色由强到弱

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肇始一样，初创的中国妇女报刊具有浓厚

---

① 秦仅：《妇女与"九·一八"》，《妇女生活》3卷5期，1936年9月16日。
② 陈望道：《我想》（三），《新妇女》4卷4期，1920年11月15日。

的男性特色，但这种男性特色随着妇女报刊的发展逐渐淡化。妇女报刊的男性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 妇女报刊在男性维新派的影响下出现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将妇女长期束缚于家庭，使之缺乏受教育的机会，知识面与眼光都受到局限，很少能关注国家与社会问题，也很难意识到自身的解放。近代以来初步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影响了开明的上层人士，他们抛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狭隘偏见，让女子接受教育，培养女性的才能。由于当时尚未有正式的女子教育，因此早期的女子教育主要是通过家教或私塾的方式进行。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几乎全部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受教育机会的。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受其父的影响，自幼不缠足，不穿耳，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勤学强记，精通国学和英语、日语。她 15 岁时即根据《二十四史》编纂《风俗制度考》，后翻译大量日文书籍，协助其父编纂《日本政变考》和《日本书目志》，1897 年参与澳门《知新报》的译报工作，1898 年参与《女学报》的编辑工作。

中国的妇女报刊从倡女学开始，这与梁启超的倡议不无关系。在男性维新派的影响下，少数上层妇女开始觉醒，提出自身解放的要求，并创办《女学报》作为自身解放的喉舌。这与梁启超的妇女解放思想有密切关系。梁启超在继承康有为男女平等思想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妇女问题，提出了兴女学主张。他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其国民人人有职业，能生利，这个国家才能达到“大治”。中国之弱就在于分利的无业之人多于生利的有业之人。中国女子由于没有受教育权，缺乏从业的本领，因此二万万妇女全是依附于男子的分利者。中国积弱之本，起于妇人不学。所以，欲强国，必自兴女学始。1897 年 11 月、12 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倡设女学堂启》，认为兴女学“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倡，千室良善”，首倡以“贤妻良母”为目标的女子教育。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女子世界》男记者陈以益后来主编《神州女报》；《女子世界》的主要撰稿人有柳亚子等男性知识分子，从而使中国妇女报刊的发展呈现出一定的“男性特色”。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化男性知识分子成为妇女报刊的“议题设置”者

五四时期的妇女报刊有众多男性参与，使该时期的中国妇女报刊呈现出一定的“男性特色”。

清末“新政”措施之一是举办新式教育，兴学堂、奖励游学。之后，中国迅速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这是中国第一代近代知识分子群体。这批近代化的男性知识分子受维新变法失败的刺激而很快转向革命，对妇女解放持同情和赞助态度，如陈独秀、鲁迅、周建人、茅盾、胡适、陈望道等。五四时期，他们不仅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妇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妇女报刊的撰稿人。

妇女运动经过短暂的回落之后迎来了转型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型知识分子主持的《新青年》起了推动作用。它从译介关于国外妇女问题的文章到直面中国的妇女问题，从抨击封建伦理道德到探讨妇女解放道路，从调查妇女生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看待妇女问题，男性知识分子为妇女解放而努力呐喊。如陈独秀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中大力抨击孔教，认为它不符合现代生活，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和胡适的《贞操问题》是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片面贞操观的有力抨击，而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揭露了“表彰节烈”可以挽救人心的谬论，指出这种强加在妇女头上的畸形道德必须推翻。五四时期妇女刊物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男女平等，都离不开《新青年》的男性作者对妇女问题的讨论所做的大量铺垫。“中国妇女能有独立的人格，其成就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①]

五四时期男性知识分子关注妇女问题，并在妇女报刊上发表大量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陈望道就是一例，1918年起，他与叶楚伧、邵力子等人一起创办《民国日报》，并主编该报的副刊《妇女评论》。他用女性的笔名在上面发表了不少倡导妇女解放的文章，很多读者还以为他是女性呢！[②]当时女性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也

---

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306页，上海1928年版。

② 周俊元：《我的老师陈望道》，《重庆报史资料》第8辑。

不高。《妇女杂志》前期主要撰稿人几乎全部是男性，主要有王蕴章、刘盛、恽代英、胡愈之、张季鸾、沈泽民、蒋维乔等。对此，包天笑认为："女学方有萌芽，女权急思解放，但是真能提笔来写一篇文章的人，却是难得的。只有几位能写写诗填填词的名门闺秀，已算是凤毛麟角了。"① "现在国内虽有几处鼓吹妇女运动的出版物，然而主持者都是同情于妇女运动的男子，女子不过随时供给著作，以致有些论述不甚中肯。"②其实，这是一种客观情况。五四时期女学虽然大有发展，但是女性还没有达到完全觉醒的地步，妇女本身普遍缺乏高度自觉。即使一些妇女受了教育，她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摆脱传统社会要求于妇女的家庭事务。妇女抛弃相夫教子的陈腐观念，走出家庭，迈向社会不是说到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虽然这一时期妇女的声音比以前多，但是男性主导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男性知识分子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为当时的妇女刊物起了"议题设置"的作用。

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参与妇女解放，为妇女解放献计献策，使妇女运动呈现出一定的"男性特色"。但是，这种特色随着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妇女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化，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男女教育平等所造成的大学男女同校和部分中学男女同校，使女子教育逐渐带有现代化的痕迹。女子职业范围的推广使妇女逐步树立了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意识，妇女的自觉性逐步增强，知道女子应该和男子站在同等的地位，传统妇女逐渐向现代妇女转变。五四爱国运动使男女青年突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在爱国反帝的目标下联合起来，男女社交公开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女子与男子有同等的能力，对中国只限于男子的选举法日益不满，开始起而争取自己的权利。"真正的民主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

---

① 包天笑：《回忆毕依虹》（一），《钏影楼回忆录》，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辑第48号，沈云龙主编，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② 峻冒：《女子与新闻事业——为介绍妇女日报而作》，《女星》第25期，1923年12月25日。

的政治，这里所谓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① 1921年至1923年，以知识妇女为主的女权主义者又掀起了女子参政运动。与辛亥时期的女权运动一样，这样的运动最终对广大的妇女没有帮助，同时也不会有大的发展。但五四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比辛亥时期显得有理性，有组织，并且受到中共的引导，是女子在经过思想启蒙，观念发生变化后的一次争取参政的运动。民国初年的女子参政运动是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思想日益高涨的产物。五四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是男女平等、女子独立人格等思想发展的结果。

（三）20世纪30年代日报妇女栏的编辑男性居多

20世纪30年代日报妇女栏的编辑男性居多，究其原因，“则当以女子职业的不普遍为最大不同。中国妇女尚在半解放期中，能为智识界之领导者，为数甚少，所以妇女页的编辑之职为男性所侵略。”② 20世纪40年代的妇女报刊仍然可以看到男性为女性呼吁的文章，但是由男子为妇女解放代言的局面已经逐步得到改变。

妇女解放必须由妇女自身的觉醒来实现。“自己的痛苦和要求，别人决不能知道得比自己还清楚而真切啊！今欲发展妇女运动，非女子亲身加入新闻界中活动不可。”③ 新文化运动和女子教育的发展为妇女的觉醒提供了条件，以妇女自身的感受，从妇女自身的立场出发来提出妇女的要求和权利逐渐成为现实和可能。这样，妇女报刊上反映女性呼声和要求的文章逐渐由女性来完成，因为女性“站在妇女的立场上替妇女说话是比较彻底些，而且女子对于其本身的兴趣和需要是较局外的男子明了些。”④ 妇女运动发展得逐渐由妇女来提出自身解放的主张。妇女报刊男性色彩的逐渐淡化并不是没有男性的声音，而是这种声音不再以男性为主，妇女解放的呼吁、妇女权利的维护不再以

---

① 李大钊：《妇女解放与Democracy》，《少年中国》1卷4期，1919年10月。

② 方纪：《中文日报妇女页的研究》第24页，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36年6月。

③ 峻霄：《女子与新闻事业——为介绍妇女日报而作》，《女星》第25期，1923年12月25日。

④ 方纪：《中文日报妇女页的研究》第24页，燕京大学文学院新闻学系学士毕业论文，1936年6月。

男性为旗手，妇女逐渐成为自身解放的主宰者。

三、办报（刊）阻力相对较大

和其他进步报刊一样，中国的妇女报刊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困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与其他报刊一样要过登记关，稿件检查关和纸张印刷垄断关，发行关和物价关也是少不了的。除此之外，妇女刊物还有它特有的阻力：

（一）经费问题

经费紧张一直是困扰妇女报刊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第一份女报《女学报》中就存在这种情况。该报的编辑潘璇说，“这《女学报》有好几件难事，……第二件是印销的难。从来每有极好的人，起来救世，人家受他的恩惠，后来便中止的。不为人手不齐，即为银钱不继，虽有了这偌大耐久的心，也就冷下了。现在这报，开创的资款，也不很大，出报的张数，亦不是很多。”①经费问题曾使秋瑾大伤脑筋。为了唤醒广大妇女，她创办《中国女报》，预定集股一万元，购置印刷机件，准备印报编书，同时并进。无如尽量征求，入股的仅仅四五人，股款只筹到数百元，同预期目标相去甚远。最后由徐双韵姐妹俩勉力捐助一千五百元，才在北四川路厚德里开始编印。但最后也因经费短缺出二期后被迫停刊。秋瑾无可奈何地说：“敝报独立经营，财力万分支绌，……近日因经费无着，报馆暂行中止，惟三期之报，仍拟续出。”②

辛亥时期出现了商办妇女刊物《妇女时报》，随后又有《妇女杂志》。这些刊物以指导家庭生活为主，很少涉及国内政治，刊内广告较多，寿命较长，经济情况较好。但是以宣传为主的妇女刊物仍然受经费的局限，辛亥革命后，由长沙女界名人唐群英、丁佩兰创办的《女权日报》以鼓吹男女平权为主要内容，但女子阅报的风气未开，营业不振，所以对编辑人员只供膳宿，不给薪水。如果开饭时间已过，即使想吃一碗蛋炒饭，也必须付费两角。办报人员的薪水可以临

---

① 《论〈女学报〉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女学报》第3期。

②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第105页，齐鲁书社1983年9月第1版。

时凑合，但是印刷费用就没有人照顾了。不久，该报因拿不出印刷费用而停刊。[①]总的来说，辛亥时期的女子报刊，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创办十分不易，而维持更为艰难。从租借房屋、购置机器，到印刷发行，都困难重重，尤其是经费，更难筹集，有的报刊只办了几期就被迫停刊，有的创刊号就成了终刊号。

天津《女星》杂志每期都有大量的小额捐款鸣谢，这表明该刊的经济拮据。天津《妇女日报》在创办之初，经费困难，报纸的印刷、出版，以及办公室都得到了刘清扬的三哥、天津《新民意报》经理刘铁庵的大力支持。《妇女日报》在新民意报内借一个房间作为编辑部，且不付房租，《妇女日报》的工作人员一律不拿薪水。

经营与内容兼得而且二者关系处理得较好的是3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在沈兹九的主持下，它容纳了大批进步妇女界名流为它写稿，《妇女生活》内容充实，同时背靠生活书店，有发达的发行网络，广告很多，发行量很大。这只是个别情况。在“孤岛”上海出版的《上海妇女》杂志，面临最大的困难也是经济问题和发行困难。自从创刊以来，油墨纸张价格一路看涨，几乎涨高了一倍，而刊物的销售区域在日渐缩小。刚出版的时候，福州、厦门、广州、南昌、汉口等许多大城市，都可以按期邮寄。尽管邮费很高，但销售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到第三期，由于这些地方的沦陷，销数锐减，该刊的外埠销路，只剩了一小部分，同时，邮费还在上涨。这样，《上海妇女》的经济收入逐渐减少，渐成亏本，稿费不能按月结清拨付。由于拖欠作者的稿费，稿源就成了问题。在发行上，《上海妇女》的本外埠发行代理是中国图书杂志公司，每月按实售的数量向对方收账一次，卖不掉的退还给《上海妇女》杂志社。代理方从中取佣金四成。杂志的编辑们花费很大精力，每本的收入是不够成本的区区六分大洋。《上海妇女》的长期订户，在1卷10期以前由邮局寄递。由于检查严厉，常常耽误时日，有时还从中抽去几本。第10期的《上海妇女》更是被全部扣押，一本也没有送出。杂志社深恐这样会

①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8页，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

失去读者的信任，于是从第11期起改由邮电失业工人设立的自行车服务社投送。但该社是个新创的机关，经验缺乏，人手又不够，经常把《上海妇女》稽押一二天后才开始送出。蒋逸霄希望有一天，杂志的长期订户增多到相当数量，在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的情况下，可以自己雇佣报差递送，这样可以免去遗漏或延迟的弊病。①

经济匮乏导致由于大部分妇女刊物发行网不能广泛展开，广大读者无法直接接触杂志。“目前因条件困难，文化事业不能发展，书店只能在大城市中存在，而且也少得寥寥可数，我们的刊物只能局限在城市而不能深入到较小的县镇和乡村去。因此，辛辛苦苦的工作，结果只是每期销售一千份的代价。……销售数量少，印刷成本一天比一天高，从读者那里收回来的书款，绝对不能维持所需的经常开支。因此，怎样才能继续出版下去，也是我们日夜焦虑的问题。”②经费紧张问题，连影响很大的《现代妇女》也不例外。该刊编辑不时发出请求读者订阅和推广《现代妇女》的诚恳呼吁，以解决杂志的经济问题。

1940年创刊的《云南妇女》是由当时云南大学女学生石铭编辑的，费用也由她一人筹办。当时，她白天念书，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在一个名为“驼运所”的交通部门当抄写员。《云南妇女》最初只印千余份，印费二十多元，都是由她一人承担的。为解决杂志印刷费用，她往往出去白吃朋友、老师家的饭，在驼运公司当抄写员所挣的每月五十元法币，保证了刊物的印刷费。在驼运公司当抄写员期间，她因一篇反映国民党腐败的文章而被开除，《云南妇女》的经费也因此没有着落。随后，她又被聘为《时论》月刊的工作人员，用每月的工资继续维持《云南妇女》。随着《云南妇女》印数的增多，罗叔章出钱解决了经费问题。③

报纸上的妇女副刊也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它们往往是报纸

---

① 蒋逸霄：《本刊出版一周年》，《上海妇女》2卷12期，1939年4月25日，

② 路笳：《今天的妇女刊物——一个编者的苦闷》，《新华日报·妇女之路》第103期，1945年3月8日。

③ 石铭：《云南妇女》，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革命出版史料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77页。

上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时刻有被取消的可能。对于商业报刊来说，尤其是这样。沈兹九主编的《申报》“妇女园地”被广告所挤占而不得不紧缩直至停刊，真实的原因是“客观的不见于世而无利可图以及主观的报老板的怕多事。商人惟利是图，中国人最要的是命，妇女问题的讨论既不能如香艳肉感的影星照片那么吸引读者，而解放斗争一类字句，又往往容易刺大人先生们的贵眼，因而不取消则已，一取消，必先及妇女。”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问题，重视对妇女的宣传。但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办报条件恶劣，所以妇女刊物也不时存在经费困难问题。土地革命时期，江苏省妇委曾指示建立妇女通讯网，令通讯员每月向妇委的刊物《生活月刊》投稿一篇，以反映各地妇女及农村生活。但是，这个刊物一直面临经济困难和人员不济的问题，以致于有一个时期停顿了两期，到 1932 年 3 月完全停止。②

“一个刊物要想维持永久，……必须还有独立的经济，现在全中国四五十种妇女刊物，其经济来源能合乎这个条件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经济权既操在他人手中，则生命的予取予夺，自在意料之中。”③ 经费紧张是制约妇女刊物发展的一个瓶颈。

（二）人才缺乏问题

办报（刊）首先有两个必备条件，那就是人力和财力。中国的妇女报刊不仅财力支绌，而且人力紧张。

第一份女报《女学报》所有的主笔都属于当时的大家闺秀，自幼所受的传统家教使她们可能在这份报纸上一显身手。尽管它在告白里面恳请海内外文人闺秀各抒己见，惠寄文章，但由于女子教育尚未正式发端，妇女界还没有多少人能胜任这个工作，甚至没有多少人对它感兴趣，她们大多还处于觉醒前的懵懂状态，所以这份报纸缺乏一定的作者群。没有作者群，自然就没有新鲜而且内容广泛的稿件。“这

---

① 石音：《妇女刊物的如此消长》，《妇女共鸣》4 卷 11 期，1935 年 11 月 20 日。

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第 274 页，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

③ 石音：《妇女刊物的如此消长》，《妇女共鸣》4 卷 11 期，1935 年 11 月 20 日。

《女学报》，有好几件难事，……第一件是著述的难。不知两万万女子中间，能当主笔的，有一两百人么？那绅宦家闺秀，不少通才，惟既属绅宦，则门深如海，本报不易得著作；那商贾家闺秀，云泥之隔，虽没有很远，然而要她讲新学，论格物，则非其所学。男子且不能，况女人么？至西书院出身，能则能矣，恐怕风气初开，看的人不对脾胃。现在这《女学报》，开在上海，是人才荟萃之区，呼应天下，生气易通，谅必征文不少。不然一张纸上，几千万字，若要蝉联不断，虽是你才储八斗，亦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女学报》著述的难。"①

即使以知识女性为读者对象的《妇女杂志》，也经常面临女性作者匮乏的困境。有知识的女性能写几首诗填几首词者还有一些，但能写出有思想、有见地的文章的就不多了。因此，在阐述妇女解放思想时，男性作者在版面上占据绝对地位。一位姓容的女性读者说，"我看了许多新出版物，其中讲妇女解放的文字亦很多，惟是所讨论的人多是男子，女子一方面出来以文字讨论的人很少，如吴弱男和邓春兰两位女士肯竭力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实在很少。因这个缘故，我就发生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为什么我们女子不去讨论这个切身的大问题，单让他们男子去讨论呢？"②容女士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不是女子不关心自己的切身问题，而是还没有能力去从深层和广泛意义上去讨论自身切身问题。

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和妇女报刊工作者向警予在考察上海妇女运动之后认为，宣传问题是上海女权运动所存在的三大问题之一，而人才的缺乏又是宣传问题中的问题。"年载未久的《妇女杂志》，妇女应征投稿的也很少。足见妇女宣传运动的前途荒凉寂寞到了那步田地呵……。我常调查妇女团体所以缺乏宣传物的缘故，有等人说是金钱困难；这当然也是原因一个，然而最大的还是缺乏人才。如果真是金钱困难，那么，一个周刊每月印刷费至多也不过四千余元，何况出

---

① 潘璇：《论〈女学报〉难处和中外女子相助的理法》，《女学报》第3期，1898年8月15日。

② 郑容孟齐：《妇女经济独立问题》，《妇女杂志》6卷4期。

版物原是可以卖钱的呢？现在各地妇女团体最大的毛病，就是伊们的领袖——出风头的在外，没有一个能以全副精神对付这样件事。对于许多重要的妇女问题，不但没有明确的判断，而且简直连想的工夫也没有，无怪其所行为都不免是捕风捉影，没有什么能力和精神来办有声有色足以鼓动全国妇女思潮的出版物。”①这种情况到了救亡时期依然存在。“妇女问题是妇女界切身的问题，凡属妇女，应予以多方面的注意和研究。但是实际上妇女刊物就很少女性读者，女性作者则更寥若晨星。”②

人才的缺乏不是立刻就能解决的，同时，仅靠编辑人员的文章很难解决问题，即使能解决问题，有限的几个人，也决不能把刊物办的精彩。初创时期的中国妇女报刊，往往只有几个作者，如《女学报》的文章主要由18位女主笔承担，秋瑾的《中国女报》上主要作者有秋瑾、黄公、会稽挽澜女士、徐寄尘女士、徐蕴华女士、吕碧城，以及炼石女士燕斌等。所以，采取开门办刊的方法，经常邀请社外人员参与刊物的出版是解决刊物人员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这一方面，《妇女生活》最具代表性。除了主编沈兹九和编辑子冈、季洪外，该刊还得到“左联”和中共党员、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它的“短评”栏由沈兹九主持，“通俗演讲坛”由卢兰、黄碧遥、柳湜、沈起予主持，“论文”主要由金仲华、章锡琛、黄碧遥、杜君慧、罗琼、卢兰等主持，“社会科学”栏目由沈志远主持，“科学杂谈”由沈学源、高士奇主持。这些人物中，有妇女运动领导人如罗琼，有妇女问题方面的学者如章锡琛，有医学方面的如陈方之。由于有这么多刊外的社会人员参与办刊，《妇女生活》办得有声有色。

但《妇女生活》的办刊特色不易“克隆”，《妇女生活》迁出上海后，上海“孤岛”时期的著名刊物《上海妇女》就经常出现稿荒。虽然也有一些社外来稿，但主要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包办。这不是刊物主编蒋逸霄的初衷，而是刊外投稿不能使用。“在读者看来，这几位

① 向警予：《上海女权运动今后应注意的三件事》，《妇女周报》第12号，1923年11月8日。

② 石音：《妇女刊物的如此消长》，《妇女共鸣》4卷11期，1935年11月20日。

作家，好似在包办；殊不知这决不是我们的本愿。我们也希望能尽量多登外稿，无奈外面投来的稿子，十分之八九，不是写作的技巧拙劣，便是内容的取材不合所定的标准。大部分投稿人犯了一共同的缺陷：不肯稍费心力刻意经营写内容充实的作品，而喜欢随笔杂感或纯文艺的小说戏剧。这类文字，没有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巧，以及锐利的观察，便易于流于空虚浮泛。本社一年来积累了几大堆稿子，大多是这一类作品，所以宁可割爱不登。"①

在大多数女性作者的来稿尚未达到主编要求的情况下，邀请社外知名人士参与撰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一种较好的办刊思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妇女刊物的人才缺乏和稿源不足问题。

（三）发行网络的落后

妇女报刊出版以后，如果没有发达的发行网络，是很难将报刊送到读者手中的，读者和编辑就无法沟通。当时妇女报刊的发行，主要靠书店门市或妇女组织做中介，转到读者手中。但是，旧中国文化事业落后，少量的书店也只存在于大城市里，妇女组织的普及程度也比较差。妇女刊物的最大发行范围也无法突破广大的县镇和乡村。除个别刊物外，大部分妇女刊物的发行工作相当差。它们大多仅限于在出版的地区销售，这严重限制了妇女刊物的发展。因为一个完善的刊物，必须有完备的发行工作来支持、推广、销售，这样刊物才能实现其对妇女运动的影响与作用。

尽管有诸多不利于妇女刊物发展的制约因素，但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妇女报刊在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同时，以倡导妇女解放，维护妇女权利，反映妇女呼声，指导妇女运动，介绍妇女知识，调查妇女状况为主要内容，在丰富中国新闻事业的内容，促进妇女解放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① 逸霄：《本刊出版一周年》，《上海妇女》2卷12期，1939年4月25日。

第二节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

1949年以前的中国新闻史上，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女新闻工作者，有的名垂中国新闻史，有的默默无闻。1949年以前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精确数字已无从考察。但据《中国新闻年鉴》1983－2000年所列出的近现代新闻界名人中男性与女性之比，可以看出女新闻工作者在整体中所占的大概比例。

《中国新闻年鉴》辑录新闻界人物的标准是："第一，毕生从事新闻事业的名人；第二，虽然不是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但亲自创办过新闻报刊的名人；第三，虽然不具备上述两点，但曾经在新闻界担任过主要职务，并在新闻界有一定影响的名人；第四，某些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外国人。"①

按照这一标准，1983－2000年的《中国新闻年鉴》上共辑录了2417位中国新闻界名人，其中中国女新闻工作者157人，占总人数的6.5%，平均15位新闻工作者中有1位女性。撷取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各时期有影响的女新闻工作者若干位，对之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特色与传统，可以看出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成长历程。

一、对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成才原因分析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是同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她们之所以能在当时胜出其他女性，有赖于客观生活环境和个人主观努力。包括家庭环境和地域环境在内的客观环境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自身的主观努力则促成她们成为有影响的女记者。根据对中国新闻史上影响较大的50位女新闻工作者综合情况的列举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客观、主观条件对她们的影响。

---

① 《中国新闻年鉴》(1983年) 第5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一）客观环境的因素

1. 地域环境的影响

统计表格显示（见本章附录："中国近现代女新闻工作者情况"一览表）：在50位女新闻工作者中，广东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湖南和江苏两省的女新闻工作者最多，分别为8人和9人，占所统计总人数的32%。再次是浙江7人，占14%；福建6人，占12%。其次是北京3人，广东、四川、山西各2人，其余省份各1人。

统计显示：江浙、福建和湖南是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集中产生地。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这些地方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传统的封建观念中不利于女性成长的因素最先在这里受到冲击。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和"片帆不准下海"的海禁政策，全国只有广州一地为通商口岸，同时，福建和江浙等地是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得较为充分的地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是相对立的，前者的发展势必会削弱后者的力量。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地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这些通商口岸向中国倾销廉价商品，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而且在这里开设报馆、书店、学校以及印刷等企业，输入西方文化，其中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民主主义思想猛烈冲击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和理论也输入中国，促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高了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同时，女子无学无业而分利的情况加重了男性的经济负担，社会上的开明人士也逐步不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然，开始重视对女子的教育。从家庭教育到私塾教育再到教会学校和正规学校教育，中国女性中有知识者逐渐增多，构成了中国早期女新闻工作者的人才基础。

广东是维新变法的发源地，广东籍的康有为、梁启超成为维新派领袖。湖南是19世纪维新派最为活跃的省份，是维新运动开展得比较好的省份和地区，也是女学开展得比较好的地区。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后任徐仁铸等人支持下，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积极鼓吹变法，使维新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妇女

解放进行得也相对靠前。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湘报》主笔唐才常曾向妇女免费赠送《不缠足歌》和“云头方式鞋”以鼓励放足，《湘报》陆续刊出不缠足会题名录和捐资发起者名单。不缠足运动对夫权的否定，促进了妇女的觉醒。

开放的环境和维新变法的开风气作用，使江浙、福建和湖南等地方对妇女的封建束缚相对较弱，为妇女成长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有利于妇女接受开放、维新和革命思想，有利于妇女为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奋斗。

2. 家庭环境的影响

从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有出身资料的女新闻工作者中，归纳其相同的家庭出身，占前二位的是：知识分子和官僚，其次是商人，军人，地主，小职员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官僚、商人家庭环境为这些女新闻工作者在经济和思想氛围上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生活、生长环境。相对于其他较为贫穷家庭的女子而言，她们的生活环境比较有利于她们的发展。

近代知识分子身居斗室，心忧天下，关怀国家和社会的入世精神使他们在思考国家社会的命运时，能够超越传统思想中消极的因素。表现在妇女问题上，就是能够超越传统社会歧视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让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学而优则仕”，一些从知识分子发展而来、继承了儒家思想精华的官僚（包括军事将领），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宁可丢官舍家或舍命去保卫国家。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的父亲康有为青年时代多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以救国救民；林宗素的叔叔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扬威舰管带林履中；秋瑾的祖父是不甘外国侵略分子欺侮而弃官回家的秋嘉禾；张昭汉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和南社社员张伯纯；陈学昭的父亲是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教师。商人长期受商品经济的濡染，有一定的平等自由思想，头脑里的封建思想相对较少，对女子的封建束缚相对较弱，女子读书的机会相对较多，出生于这样家庭环境中的女子自幼就有较为宽松的生长条件。女子读书使女子有了人格独立的可能。

3. 教育的影响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直接受益于近代以来兴起的女子教育。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增长，教会女学从通商口岸向内陆发展。据统计，到 1876 年，教会在华所办女日校 82 所，女生 1307 人，女寄宿学校 39 所，学生 794 人。教学内容方面，以贝满女校为例，除了“圣经”外，还有《四书》、《女儿经》和算术、地理、历史、科学初步、生物、生理学等。[①]但是，教会女子学校这种教育方式始终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维新时期，女子教育的改革被提上日程。维新人士如郑观应、陈炽、梁启超、严复、经元善等均发表言论，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97 年，女学会成立于上海。1898 年 4 月，由候选知府、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上书提议、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的“经正女学”成立，开设的课程有中文、西文、算学、医学、法学、女红 6 门课程。但是，该学校开设不到两年，就被慈禧太后勒令停止。1900 年庚子事变以后，尽管清政府不予开禁，女子学校依然在苏州、天津、上海等地兴起。面对这样的事实，为了加强管理，清政府于 1907 年 3 月 8 日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以法制形式局部承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存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生长。据清廷学部统计，1907 年全国有女子学堂 428 所，女学生 15496 人。从课程上看，近代女学中，具有近代科学教育内容的算学、格致、地理每周 27 课时，大约占总课时的 20%；传统女红、闺训及礼教内容的修身、家事、裁缝、手艺为 46 课时，大约占总课时的 34%，其余文史、教育、音乐、体操、图画等专业辅课为 63 学时，大约占总课时的 46%。传统女性规范教育和近代科学知识和专业课程的教育并存，这是女子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

民国初年，上层建筑和国家政体的民主变革，为教育领域的男女平等提供了法制保证。1912 年 1 月 19 日，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

①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第 711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孙中山特意为上海女子法政学校拨款 5000 元，鼓励女子走向社会，走向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青年追求“男女同校”、“妇女解放”。1919 年初，教育部颁令高等小学和部分中学允许男女同校。1920 年 2 月，北京大学第一次录取 9 名女生旁听，开创了中国大学中男女同校的首例。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女子教育权利平等的观念及相应的法制在全国的普及，不同层次的女子教育，包括留学教育都发展较快。①

从受教育的途径上来看，戊戌时期的女新闻工作者大多因有开明的家长而能够接受家庭教育。从辛亥时期起，由于女子留学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实行，广大女子接受教育的途径开始增多，受教育的女子人数大幅度增长。从受教育程度来看，绝大部分女新闻工作者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其中一半左右受过大学教育，也有一部分海外留学的女性。

向警予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她的父亲向瑞龄为了发展商业经营，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不惜一切送孩子读书。“世俗以猎官为荣，以多金相炫，此风尤甚。而先君（指向瑞龄）独能捐巨资命子女远道求学，律身治家，克勤克俭，半缕半薪，必珍必惜。惟子女教育费则倾囊不稍吝，有破产不惜之概也。”② 5 岁时，父兄教向警予认字，7 岁时开始读《三字经》、《孝经》、《幼学》等启蒙读物；8 岁时向警予成为溆浦县立小学堂的第一名女生；1907 年，她来到常德西路师范学堂自修，在那里她阅读了《民报》、《新民丛报》等报章杂志。1909 年，向警予入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堂学习；1912 年，向警予凭借情文并茂的《男女平权论》一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4 年，因不满支持袁世凯复辟的顽固校长冬烘，向警予离开第一女师，来到由思想开放、学识渊博的湖南知识分子朱剑凡创办的周南女学。

女记者杨刚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旧官僚家庭，但父亲还是比较

---

① 上述内容，参见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女子教育”章，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② 何鹄志著：《向警予传》第 5－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

重视孩子的教育。杨刚先是在家庭私塾中随老秀才学习，19岁时考入江西南昌葆灵女中高中文科班学习。杨刚熟悉英语，酷爱文学，自幼攻读中国古典文学，遍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1927年，杨刚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并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立志成为一名革命的女作家。

与当时女子从事教师、医生和律师等职业一样，妇女从事新闻工作也需要较高的知识含量。教育程度的提高为女子从事新闻业提供了条件。在女子教育不断发展、女性知识分子群体不断壮大的背景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女性新闻工作者投身新闻事业。

据著名新闻学者、《天庐谈报》的作者黄天鹏总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妇女参与新闻事业的途径有三："妇女投身报界的途径，近由新闻学科卒业的外，大概有数种：（一）撰述文字寄至报馆，得获主笔的赏识，久而知其才足以业报，由这种进身的最多；（二）先在乡村充任城市访员，或撰写文学小品，进而兼充城市大报的通信员，积渐而达其志望；（三）初以撰著小说诗歌及儿童故事，卖给报馆，成名后报馆每每慕名延聘的。"[①] 从中可以看出，受过教育，具备基本的知识是她们从事新闻事业的基础。

（二）个人主观因素

与客观外部环境相配合，富于反抗封建传统精神，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等个人主观因素是女新闻工作者成才的另一必要条件。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绝大多数有反抗封建传统的精神，这在她们的婚姻问题上有明显的体现，她们敢于冲破家庭包办婚姻，追求自己的幸福。秋瑾20岁时"以父命，非本愿"与湘潭富户子弟王廷钧结婚。她那热情豪放的性格、迥于流俗的理想和追求与王廷钧格格不入。1903年，秋瑾随王廷钧进京，在那里接触到新书报，思想日趋先进，两人之间的距离更大，不时发生冲突。1904年，秋瑾辞别家庭去日本留学，从此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鼓吹妇女解放的斗争。20世纪30年代知名的《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也是旧式婚姻的不幸者，更是

---

①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24－25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旧式婚姻的反抗者。她从小就由父母定下婚姻，17 岁出嫁，21 岁守寡。沈兹九温文尔雅，秀丽端庄，才貌双全。年轻守寡，社会和家庭对她的一颦一笑，言谈举止，都多有指责。夫家为她建了一座精致幽静的房子，除日常生活以外，还提出每年给她一千块银元做零花，条件只有一个，让她带着女儿住在那里不出门，长年居住在里面，静心参禅，闭门诵佛，过尼姑一般寂寞的生活。但受过新思想熏染的沈兹九无视这种强加在她身上的无理冷酷残忍的枷锁，反而更促成了她反抗逃脱的决心。她带着私蓄的金钱和所有的首饰，毅然离开将要吞噬她生命的牢狱，再加上父亲的暗中资助，她只身留学日本。

杨刚富有强烈的反封建传统精神，是个勇敢的叛逆者。她坚决反对父母之命式的旧婚姻制度，并果断结束与李府不学无术的二少爷的婚约；她坚决反对自己所在的封建家庭的奴婢制度，为家里的使女们谋生活出路，使父亲霸占使女的企图无法得逞，并因此与父亲彻底决裂。我们也可以从杨刚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女儿》中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反封建传统精神。1948 年 9 月，杨刚完成了用英文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女儿》，内容以 1927 年大革命前后为时代背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观察写成，小说集中反映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告别封建富豪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

爱国民主的进步思想是促使女性投身新闻事业的因素之一。我国最早的新闻系女毕业生之一、北京平民大学学生徐芳女士是我国 20 年代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徐芳女士祖籍无锡，1904 年生于上海。她的曾祖父徐寿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化学家。五四运动时，她正在天津女师求学，就曾和邓颖超一道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周恩来曾到天津女师提倡语体文，在这里求学的徐女士尝试着用白话与新式标点符号办了一份名为《群众》的小册子。由此，对新闻事业产生浓厚兴趣，产生了念新闻专业的念头。1924 年，徐女士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大学毕业后，她曾在天津《商报》编“杂货店”副刊，兼做外勤记者。离开《商报》后，还不时为《大公报》、《益世报》写稿。据徐芳女士回忆，她对新闻事业产生兴趣，选择新闻专业，从事新闻工作的原因在于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她本人

所具有的爱国民主思想是她从事新闻工作的内在原因。[①]

近现代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中坚大多出身于中等以上人家，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她们生活无忧，有受教育的机会，娇贵的习气不曾染到，劳动的本能没有丧失。有思想，有道德，有勇气去做事，有胆去耐苦。出身贫穷家庭的女性在解放区女记者中占有一定比例，这表明在解放区，“第四阶级”（无产阶级）的女性有了翻身的机会。[②]

附录：中国近现代女新闻工作者情况一览表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康同薇	1879 年，广东南海	父康有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思想家	自幼受家教，精通国学和英语、日语	1897 年参加澳门《知新报》的翻译工作	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
裘毓芳	1871 年，江苏无锡	父裘蕴山，官居四品黄堂	受叔裘廷梁的培育，有深厚的文史与国学根底，精通英文	1898 年 5 月参与编辑《无锡白话报》，7 月任《女学报》主笔	中国最早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
李蕙仙	祖籍贵州，1869 年生于北京	清代礼部尚书李端棻堂妹，梁启超夫人	家庭教育	1898 年《女学报》主笔之一	中国第一份女报主笔之一
陈撷芬	原籍湖南衡山，1883 年生于江苏阳湖	父陈范曾为江西铅山县知县，落职后任《苏报》馆主	曾留学日本	1899 年创办《女报》，任主笔	“我国近代报刊草创时踏实工作的女英雄”[③]

---

① 2001 年访徐芳女士。

② 本目参考杨小红、高美雁《传统文化与近代女杰——对 1840－1949 年间 50 位杰出女性的统计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 年第 3 期。

③ 徐铸成：《报人六十年》第 98 页，学林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林宗素	1878年，福建闽侯	胞叔林履中是甲午海战中牺牲的扬威舰管带	曾留学日本	先后为《中国白话报》写稿，《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编辑，为《妇女日报》等报刊撰稿	辛亥时期为数不多的女新闻工作者之一
秋瑾	1877年，浙江绍兴	生于官僚小地主家庭	幼年读家塾，1904年到日本留学	1904年在日本创办《白话》杂志，1907年创办《中国女报》	中国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女新闻工作者
唐群英	1871年，湖南衡山	生于湘军将领家庭	自幼读私塾，1904年到日本留学	1906年为《洞庭波》撰稿，1912年创办《女子白话报》，1913年创办《女权日报》	辛亥时期杰出的女新闻工作者
张汉英	1872年，湖南醴陵		早年肄业于长沙女校，1905年赴日留学	1913年2月参与在长沙创办《女权日报》	民初最有影响的女报人之一
张昭汉	1883年，湖南湘乡	父张伯纯曾宦江南，后为同盟会会员	父通名典，母通经史。学得于家庭	曾任苏州《大汉报》主笔	
李昭实	福建人		圣玛利亚学校毕业	20年代任《时报》驻欧通讯员	
陈超	湖南			辛亥《女学报》记者	
徐自华	浙江石门			民初入报界，历任《神州女报》、《妇女杂志》、《女子杂志》等主撰	
刘青霞	河南安阳	开明的官宦家庭	深谙历史，敬慕贤达	1907年资助《河南》、《中国新女界》出版	巨富大仁，为革命办报散尽千金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曾兰	四川华阳	新文化运动健将、反封斗士吴虞的夫人		1912年任《女界报》主笔	
徐芀	祖籍无锡，1904年生于上海	科学世家，重视教育	先后在天津女师和北京平民大学学习	20世纪20年代天津《商报》编辑、记者	我国最早接受正规大学新闻教育的女性之一
杨之华	浙江萧山	破落地主家庭		20年代任《星期评论》、《妇女周报》撰稿人	中共早期妇女报刊编辑兼撰稿人
向警予	1895年，湖南溆浦	父为商人	曾留学法国	1922年后任《前锋》、《响导》、《妇女周报》撰稿人	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党的女报人
刘清扬	天津人		毕业于省女一师	《女星》杂志总经理，《妇女日报》总编辑	中国第一张妇女日报的总编辑
缪伯英	1899年，湖南长沙		1919年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1922入党并参加编辑《工人周刊》	共产党第一个女编辑
王会悟	1899年			曾任《妇女声》编辑	
李培之	1904年	王若飞夫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土地革命时期任洪湖苏区《红旗日报》主编	
谢冰心	福建人	父谢宝璋为海军次长	1919年在燕京大学学习，1923年游美	先为《晨报》撰稿，后为《晨报》特约通讯员	
石评梅	1902年，山西平定		1923年，北京女师大体育系毕业	《京报·妇女周刊》、《世界日报·蔷薇》主编	五四著名妇女副刊编辑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汤修慧	1890 年，江苏吴县	父为小商人	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1906 年开始新闻活动，1928 - 1937 年任《京报》社长	现代女性报业经营者
胡木兰		胡汉民之女		1936 年 7 月任《中兴报》社长	
沈兹九	1898 年，浙江德清	小康之家	浙江女子师范毕业，后考入东京高等师范艺术科	《妇女生活》主编，40 年代在新加坡创办《新妇女》并任主编	救亡时期杰出的妇女刊物编辑
彭子冈	1914 年，江苏苏州	父为留日博物学家	1936 年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	上海《妇女生活》编辑，汉口《妇女前哨》主编，《大公报》记者	现代史上著名的女记者
蒋逸霄			南开大学第一期毕业生	《大公报》天津版记者兼编《妇女》周刊，《上海妇女》发行人	
莫耶	1917 年，福建安溪		正规学校教育	1933 年任《女子月刊》编辑、主编，1944 年任晋绥《战斗报》记者	
陈学昭	1906 年，浙江海宁	祖辈经商，父以教书为生	先后就读于南通女子师范、上海爱国女校文科	1928 - 1931 年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	著名的驻外女记者之一
戈扬	1916 年，江苏海安		镇江师范学校毕业	先后为《贵州日报》、新华社记者	抗战时期解放区女记者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黄薇	1912年，福建龙岩	世代书香之家	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日本留学	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香港《星岛日报》重庆特派员	著名华侨女记者
林海音	原籍台湾苗栗，1918年生于日本大阪	父曾东渡日本经商	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毕业	《世界日报》记者	为当时从事外勤采访的为数不多的女记者之一
杨刚	1905年，湖北沔阳	旧官僚家庭出身	1928年免试进入燕京大学英文系	《大公报·文艺》编辑和驻美记者	现代史上著名的女记者
浦熙修	1910年，江苏嘉定	小职员家庭	北师大中文系毕业	1936起《新民报》先后任记者，采访部主任	现代史上著名的女记者
高汾	1920年，江苏江阴		抗战前毕业于江阴南菁中学高中	先后在《救亡日报》、《新民报》任记者	
邓季惺	1907年，四川奉节	出身民族资产阶级家庭	1933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	1937年起参加《新民报》工作，任经理	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女报业经营者
余梦燕	1916年，湖南临湘		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转入新闻系	成都《新民报》记者	
胡济邦	1911年，浙江永康		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	1941年起任《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	二战时期中国唯一的驻苏记者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陈香梅	原籍广东，1925年生于北京	父陈应龙曾任北大教务长和北京英文《华北邮报》主编	1944年毕业于岭南大学	1944年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中央社第一个女记者
徐钟珮	1917年，江苏常熟		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	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记者，战后任该报驻英特派员	中国新闻史上少数驻外女记者之一
范瑾	1919年，浙江绍兴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之妹	1936年入中央大学地质系	1937年12月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后任《冀中导报》社长，《晋察冀日报》采访部主任	
罗琼	1911年，江苏江阴		193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先后任《妇女生活》撰稿人，延安《中国妇女》编辑主任	
郑德芳	1917年，浙江杭州		1934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中，1937年到陕北公学学习	先后任《新华日报》苏联专电翻译，新华社英语播音部编辑	
石铭	1920年，河北冀县	农民家庭	1934年入冀县师范，1938年入云南大学	1939年办《云南妇女》1942年编《新华日报·妇女之路》	

姓名	籍贯	出身情况	受教育情况	参加新闻工作的时间	特色与地位
陆慧年	原籍江苏太仓，1915年生于北京		1935年考入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	1946年起，先后任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记者和《联合晚报》驻南京办事处主持人	
李伯悌	1918年，安徽安庆		先后在武汉大学、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并入党	1942年起，先后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和上海记者	
侯波	1924年，山西夏县			1946年开始从事摄影工作	著名女摄影记者
孟启予	1919年，福建长乐			1945年10月开始从事新闻广播工作	著名女播音员
丁一岚	1921年，福建福州		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起先后在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工作	著名女播音员
龚澎	1914年，安徽合肥		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	1940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记者	

资料来源：《华夏妇女名人辞典》，华夏出版社1988年3月版；《中国新闻年鉴》1984－1999年；方汉奇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江苏报业史志》1991年（1）；徐铸成：《报人六十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新闻界名人传略》，《新闻学刊》创刊号，北京新闻学会编，1927年10月版；江小鱼主编：《20世纪中国十大传奇女性》，海天出版社2000年4月版；肖黎、马宝林、吕延清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女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二、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与传统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是众多女性中的佼佼者，与同业中的男性相比，她们有鲜明的特色与传统。由于她们的参与，中国新闻事业才更加绚烂多彩，广大妇女的声音才有被正确表达的可能，知识妇女的价

值有了体现。

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特色和传统表现在：艰苦办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事业为主兼顾家庭的职业精神，以及她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色彩。

（一）艰苦办报、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

作为维新变法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中国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在这一时期产生。相对于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近代新闻事业来说，这些都是新生事物，是新闻事业大家族中的新成员。新生的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不仅受到经费和人才不足的制约，还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但这些都没有吓倒女新闻工作者，而是体现出一股女性素有的百折不回的韧性。

经费紧张一直是制约妇女报刊发展的重要因素，但这并没有使妇女报刊的发展停滞，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女新闻工作者的奋斗精神。《中国女报》就是这样，秋瑾有强烈的为女子呼吁解放的愿望，尽管她极力争取女子赞助这份报纸，但《中国女报》资金依然严重不济。即使这样，这份报纸还勉强出了两期，第三期实在无法支撑下去，只好停刊。

面对反动当局的压制和迫害，中国女新闻工作者有为妇女解放、社会进步不怕牺牲的勇敢坚毅精神。秋瑾为办《中国女报》呕心沥血，最后献出生命。1926年，在段琪瑞政府造成的“三·一八”惨案白色恐怖气氛中，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党部妇女部决定于1926年9月15日出版《妇女之友》，揭露中国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情况，探讨中国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和妇女解放的道路，论述妇女解放必须组织联合战线的道理，提倡知识妇女和劳动妇女的结合，以打破“三·一八”惨案以来北京妇女界的沉寂气氛。该刊的出版，在当时奉系军阀严密控制的北京，犹如一粒光辉灿烂的星火，划破反动统治者统治下黑暗的夜空，得到了妇女界的注意和赞扬，也引起了奉系军阀的仇视。1927年3月20日，奉系军阀开始在北京大肆搜捕进步学生，查封进步刊物，《妇女之友》也被军阀政府警厅列为被取缔和惩处之列。当日上午，该刊主编、北京大学教育系学生、国民党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张挹兰在家中被捕，后与李大钊等20

位国共两党的革命者同时被绞杀。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浙江籍女记者、中共党员应唯鲁在1940年冬季的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年仅22岁。《新华日报》从武汉撤退时，女报人项泰在湖北嘉鱼被日寇的飞机炸死在“新升隆”轮船上，年仅23岁。《新华日报》的女新闻工作者胡南于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949年12月27日遇难，年仅30岁。[①]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进步新闻工作者的控制与迫害。1946年6月10日，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给上海市长的密呈中就列举了一批报人的黑名单，包括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准备随时逮捕他们，其中包括《新华日报》的女报人，她们是：住在马斯南路107号新华报馆职工宿舍的女记者张剑虹（时年25岁，湖北人）、女翻译许真（时年19岁，云南人）、女校对林红荫（时年24岁，四川人）。1947－1948年间，浦熙修在上海《观察》、《展望》周刊和香港《文汇报》连续发表署名通讯，为南京政府频频恫吓，但她并没有畏惧。1948年11月16日深夜，浦熙修刚刚为香港《文汇报》写完题为《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的通讯，尚未及邮寄，国民党特务前来将她投入监狱。

8年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妇女刊物常常因此而面临停刊的危险，但这些刊物编者并没有气馁，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转移阵地，延续刊物的生命。由中共浙江省委文委委员葛琴指导保育会秘书贵畹兰和陈怀白筹办的《浙江妇女》于1939年7月15日在金华出版。1940年下半年，浙东形势紧张，日机连续几个月天天轰炸金华，编辑人员只好在逃警报中办公。“警报一响，我们就提着一大包稿件，跑到城外找个僻静的凹地坐下，随即就在膝盖上办公。”[②]1941年4月中旬，《浙江妇女》随着保育会撤出金华，先后到过武义、宣平、松阳、丽水、江山等县，到处找印刷厂。沿途没有交

---

① 杨挺执笔：《新华女战士》，载于《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石西民、范剑涯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② 林琼、秦秋谷：《〈浙江妇女〉出版始末》，《新闻研究资料》总第3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

通工具，别的文件箱雇了民工挑，但《浙江妇女》的稿件都由刊物编辑背着稿件，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翻山越岭，步行好几个县。保育会暂时留在松阳，因为这里没有印刷厂，主编秦秋谷一人带着稿子去丽水。在丽水，不容易找到印刷厂，没想到稿子刚刚排出初样，5月21日印刷厂就被炸毁了。所幸原稿和初样在编辑手中，秦秋谷又带着稿子到江山，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到7月底终于把第四卷出齐。几位女同志，总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双肩挑着刊物稿件，到处转移，直到1942年4月金华、丽水先后被日军占领而被迫停刊。从《浙江妇女》出版的始末中可以看出女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坚持办报的奋斗精神。

《上海妇女》主编蒋逸霄在办刊过程中，不顾困难，毅然前行。她总结自己的心理感受说："我这个人，对于办理本刊，素来抱着这样的态度：尽着我们最大的努力向前走。万一被乱石碎砖，或荆棘野草绊住了脚而不幸摔倒了，要爬起来更勇敢地向前走。假如实在被障碍得走不通，那么只有放弃旧道路再寻新途径"，"我们没有忘掉，在这一个时代，这一个地方，我们应当尽一点怎样的责任，即使四周的空气，在逐渐发成沉重而污浊，使我们的呼吸不得自由，我们也要奋斗到最后的一刻。"①

华侨女记者黄薇在菲律宾主编抗日报纸《华侨导报》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旧金山、新德里和重庆等地的广播②，用铁笔、蜡纸、钢板、油印机办起了反法西斯报纸。在黄薇主持报务最危险的几年间，报社四易其家，先是在马尼拉郊区的一栋小楼上，当发现附近有伪警察后，第二次搬迁至市区一条大街铁路交点附近一栋简陋的平房，报社机关编成一个"家庭"，每个工作人员都在这个家庭里扮演一个角色。在前屋开一个杂货店做掩护，在后屋低矮的阁楼上，席地而坐，出报纸。第三回迁到市郊的一所木制小楼，因报纸的发行站遭破坏而不得不及时撤出。第四次是临近抗战胜利，日本人疯

---

① 逸霄：《本刊出版一周年》，《上海妇女》2卷12期，1939年4月25日。

② 日寇占领菲律宾后，严密封锁消息，严禁收听反法西斯国家阵营的广播，下令改装民间一切短波收音机，凡收听美、英广播的，一律处以死刑。

狂垂死挣扎，黄薇通过一个可信赖的群众的关系，迁至郊外一个汉奸的大别墅里。由于这个汉奸恐惧华侨抗日游击队在马尼拉展开的肃奸运动，逃到外地躲避。这就将报社置于天然保护伞下。“在那黑暗的沦陷时期，住在马尼拉的人，夜里听到日本宪兵的军靴声就已经心颤胆跳，遑论跟他们打交道。但偏偏有那么一群不怕死的海外中华儿女，竟敢向野蛮的日本法西斯挑战。”①

（二）自强不息，吃苦耐劳，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兼顾家庭，献身事业的职业精神

女新闻工作者有工作上的任务，一旦结婚就有家庭，有家庭就有家庭的琐碎家务。同时，家庭中一有了孩子，常使她们身上的负担加重。虽然女新闻工作者受传统的束缚相对较少，但她们不可能完全挣脱家庭事务，所以，家庭事务还要占用她们部分时间和精力。同时，社会上对女记者的偏见也是她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她们要想做出和男性同业者一样的成绩，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做出一定的牺牲。“一个女记者常常比一个男记者，更为他人所注意，她们的信仰是庄重，庄重，第三个还是庄重。她们在工作上，并没有比男记者逊色，而家庭，儿女和健康，对于一个女记者的发展，阻碍是太大了。”②

秋瑾在主持《中国女报》时，完全抛弃了家庭的拖累，将孩子放在湖南夫家，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和办报活动。《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一边料理家庭琐事，还要主持整个刊物的所有事宜。除了与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周旋，与上海滩的地痞流氓斡旋外，她还要“拉稿、改稿、发稿、会客、开会、接电话，加上省不了的家常琐务：柴米油盐酱醋糖……。每天一撑开眼睛，就像爬上了旋转不停的车轮，被它们带转得头晕眼花。”③在这样的情况下，沈兹九还是将刊物办得有声有色，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根据地女记者戈扬在敌后做新闻工作时，写了许多鼓舞士气打击敌人的新闻和通讯，并总结自己的采

---

① 林彬、弦柱：《抗日女记者黄薇》，载于《传记文学》1995年第9期。

② 祝修麟：《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③ 沈兹九：《两封信》，载于《中国之一日》，茅盾主编，生活书店1936年9月版。

访经验，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笔写《新闻采访与写作》，耳边还响着枪炮声。抗战时期《新蜀报》女记者张志渊带着两个孩子，家庭事务很繁重，可是她尽量克服困难。除了担任该报外勤记者外，还经常为外刊撰稿，同时也参加"陪都"的各种妇女工作，还曾经领导过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为抗属服务。抗战时期，《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曾将自己的两个小孩交与婆婆照看，而自己则专为工作而努力。

女记者在从业之初，采访范围主要在女界新闻，这在西方也有一段历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女记者大都是报告妇女俱乐部及时装美容等女界消息。美国女记者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采访经历，"妇女的兴趣，在都市主笔的眼中看来，总是关于儿童，关于妇女（暗杀除外）的每件琐事，以及关于男子的一半事情——那便是家庭健康、道德、宗教、艺术、音乐、教育、施惠以及改良。无论哪一个男性演说者，从州长最近的奖金竞赛者或国际闻名的外科医生，如果他是在对一个妇女的团体演说，就是女记者的大好材料了。"[①] 日本的报纸，也多辟家庭一栏，或在报馆中设立一个"妇女部"，每日都辟一定的版面来刊登女记者的评论和记事，内容大多是关于家庭和妇女的，如家庭的教育、卫生、结婚、离婚、生产、娱乐等问题，差不多成为家庭和女界的指导者。

妇女刊物的女记者最初以采访妇女新闻为专职。《大公报》资深女记者蒋逸霄在天津时，一边采访妇女问题，一边编辑《妇女》周刊。彭子冈任《妇女生活》记者时，采访对象大多为女性，如《冰心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卷5期），《一个话剧女演员的自白》（《妇女生活》1卷6期），《史良律师访问记》（《妇女生活》2卷4期），《王孝英[②] 访问记》（《妇女生活》3卷2期）等。子冈没有受过新闻教育，但她的新闻作品融合了散文和小说的写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

① Emma Bugbee著，胡青译：《美国妇女在新闻界》，《妇女共鸣》5卷9期，1936年9月20日。

② 北京女高师毕业，毕业后曾教过书，1925－1926年到国民党部，做了两年的妇女部长，后到南京交通部任职，还做了两年立法委员。30年代后，在上海自创中国女中，任校长。

“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妇女生活》派她去采访史良。她以史良的表妹身份采访了这位女律师，让史良慷慨陈词，痛斥反动当局。《史良访问记》在读者中激起了很大反响。《她们在巨变里》（《妇女生活》4卷7期，1937年4月16日）则是写江西农村妇女在红军到来后发生的生活巨变。

从最初采访妇女新闻发展到和男记者一样大的采访圈子，女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范围不断扩大，这以彭子冈、浦熙修和杨刚最为突出。当时有报道这样评价女记者们采访范围的变化：“开头她们一天到晚只是在东家太太门里穿进，西家夫人公馆里穿出，打听一些开会、慰劳、服装、保育的消息，她们的采访范围始终没有跳出娘儿、小姐、夫人、孩子的圈子。这种传统的遗毒，虽然到现在还没有绝对消失，但是由于现代女记者们本身的努力和修养，已渐渐为许多人所认识，一位女记者的采访圈子是广大的，她们的能力是挺强的，并没有比男记者逊色。因此，在目前，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门的女记者，活跃极了，甚至她们在工作所表现的，有时比男记者们更合适。”①

抗战爆发后，子冈到了武汉，汉口《大公报》称誉她是“一位现阶段中典型的女性：活泼、善谈、能吃苦，富思想。……她善于写调查和访问的文字，是一名很好的女记者。”② 1938年，子冈成为汉口《大公报》外勤记者。在重庆，她的采访范围是“陪都”广阔的天地，上至宋氏三姐妹及上层社会活动，下至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她再次用那富有感情色彩的新闻写作手法，做了有声有色的报道。

浦熙修从1937年参加《新民报》的采访工作到1946年，“十年间，无间冬夏，每日都在马路上呼吸尘土，每日都在追寻新闻线索，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是采访的对象，尤其在重庆的几年时光，坡上坡下的跑，喘息未定，就要坐下来写，外勤的辛苦，可以

---

① 祝修麟：《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② 《最近来汉的四位女作家速写》，《大公报》（汉口），1937年11月2日。

不言而喻。"[①] 在此期间，浦熙修"以监督社会走向进步"[②] 为己任，发表了大量颇具特色的新闻报道。

杨刚在从事新闻活动的过程中，在处理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时，总是把事业放在首位。1936年，她撇下刚刚1岁的女儿郑光迪，前往绥远采访。绥远之行收获颇丰，但也使杨刚和丈夫郑侃的感情裂痕进一步扩大，并最终导致二人分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刚把女儿寄养在燕京大学美籍女教授包贵思女士处，自己奔赴武汉、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夏，杨刚携女儿从上海到香港接替萧乾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在香港期间，杨刚整天忙于抗战宣传工作，经常外出采访开会，总是把四五岁的女儿关在自己居住的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一幢高楼的小房间里。为了工作，总是牺牲很多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解放前有不少新闻学者从单纯的体质论出发，认为女记者由于体力所限，所以在新闻工作的许多方面不如男记者，在外勤记者方面尤其不便涉足，唯一适合女子从事的就是坐在室内当编辑。《新闻学大纲》的作者伍超认为"苟令妇女冒风雪于深宵，作险阻之踽行，以从事百般社会之访问，就其体质论之，甚不适当。即勉强为之，非惟不能与男记者竞争，且恐易于丧失妇女之尊严，是乃女记者不及男记者之处。此系天然之缺陷，非人力所能补救者也。"他还以"欧美不少成功女记者，然其中以从事于文学类之作品者尤多。若为新闻之采访员，则未见有若何出人头地之人"为理由，规劝"妇女而抱定欲为新闻记者之志愿者，与其恃体力以尽瘁事务之活动，不如利用其天然之文艺性与想象力为得策也。关于女记者之服务，与其在社会上活动，远不如充社会中之编辑，较为得宜。"[③]不独中国的学者这样认为，就是新闻事业比较发达，女记者比较活跃的美国，仍然有人持类似观点，认为女记者"不要和男子在政治和社会新闻上竞争。因为硬性的

① 浦熙修：《采访十年》，载于《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浦熙修：《采访十年》，载于《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
③ 伍超：《新闻学大纲》第69页，商务印书馆发行，1925年1月初版。

政治，和深宵跋涉的社会采访，于女性是很不适宜的。”①

上述观点似乎没有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女角色观。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从新闻事业的发展来看，仅有女编辑而无女访员，则“新闻稿件，仍不免枯偏”。从实际上看，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女子教育的进步，特别是新闻事业的发展，女性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相应地，由于现代女记者本身的努力和修养，她们的采访能力渐渐被许多人所认可，采访范围逐渐扩大，而且丝毫不比男记者逊色。跑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各门的女记者都很活跃。同时，面对工作上的困难、压力甚至危险，都表现出不亚于男性同业者的职业精神与勇气。

《大公报》女记者蒋逸霄从1928年参加新闻工作。从业后的七八年时间内，她“白日里栉风沐雨地去取资料，晚上还要埋头在编辑室中整理稿件，每天总要到一两点钟才能入睡。但因为复杂的社会内层具备着五花八门的新奇玩意，所以我总不会感到厌倦和疲劳。”② 1942年7月，《大公报》特派战地记者杨刚在浙赣前线和福建前线采访。这次采访充分表现出她勇闯虎穴，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去浙赣前线，时值三伏天气，她每天清晨4点钟就赶早起身，有时骑马，有时步行，跋涉在满是丘壑的土路上。白天骄阳似火，缺水少食，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吃不上就喝糖开水，吃生梨，就这样半饥半饱地走着，还要时时提防敌伪便衣散兵游匪的袭击。1946年，在南京跑外勤的女记者有十位左右。《新民报》的浦熙修和《申报》驻南京记者张明都是已经有十余年新闻工作历史的女记者。浦熙修的采访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穷追不舍的认真态度。十年间，她采访了各阶层的人，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张明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独当一面的工作精神。在采访官场新闻的日子里，“冬天，我们几乎把整个半个夜间的时间餐风吹露地伺候在某些公馆的门首，夏天，我们顶着烈日，成日追逐在灰尘飞腾的街衢，对公馆的司阍陪着小心，向要

①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23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② 任白涛：《综合新闻学》（第2册）第515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员的接电话的家人讨好。”我在“挖掘新闻才是生命真谛”的原则下苦苦耕耘。[①]此外，《上海联合报》驻南京记者陆慧年也专跑政治新闻，她对一件事的发展常常看得很彻底。《中国日报》女记者何健民吃苦耐劳，在女记者中，也是不多见的。“她常常凭她两条健而有力的腿，追捕着变化莫测的政治消息，而且总不落后人。”[②]用部分女记者自己的话来讲，“以一个女性来担任采访工作，并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并且，有时由于女性特有的敏锐感觉，忍耐细心，比男记者更容易获得成功。虽然，女记者们亦受生理的限制，对于工作不无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小得像大海中的一粒沙子。”[③]

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直接受益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她们大部分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亲身实践者。面对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总是不顾一切地挣脱。同样，1949年前的中国，由于不断的战争和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女新闻工作者面对时代的召唤，义无反顾地钟情于自己深爱的新闻事业。当繁忙的新闻工作和家庭产生冲突的时候，她们往往选择前者。正因为这样，她们大多要在感情上付出沉重的代价。向警予就是一例。当她因与蔡和森分手而难过时，还这样写到：“只为革命死，决不为爱情死！”“一点泪一滴血都应为我们红旗流，为什么为爱情而流呢？可耻！”[④]杨刚因为长期在外采访，无法兼顾孩子与家庭，同时又不愿意因为家庭而放弃事业，导致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逐渐加深，最后不得不分手。

但是，由于世人对女记者还是有些偏见，所以她们在进行采访活动的时候，自己的身份经常被别人误解。这也算是工作中的一点小插曲吧！抗战期间，在重庆，徐钟珮采访一位党国要人时，这位要人不在办公厅，也不在他的公馆。正当她步出公馆大门时，一位男仆四顾无人之后，才鬼鬼祟祟地告诉她，她要采访的人在昆明，并告诉在昆

---

① 张明：《我是“官场记者”》，《报学杂志》1卷3期，1948年10月1日。
② 祝修麟：《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③ 祝修麟：《南京的女记者》，《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9月19日。
④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传》，《向警予文集》第1－4页。转引自《向警予传》，何鹄志著，第1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4月版。

明的具体地址。原来，男仆把她当成是她要采访的人的女朋友。有一次，门房一口咬定她是要采访的人的太太，徐钟珮极力分辨，门房还她一句："你不是他太太，你来看他干什么?"弄得徐钟珮哭笑不得。门房也罢，官长也罢，他们都不以她的名片判断女记者的身份，而是透过他们偏见的眼镜来估计她的身份，而且自以为估计得非常正确。

（三）女新闻工作者的女性色彩

所谓女性色彩，当然是与男性相比而言的。解放前新闻学者伍超在谈到女记者与男记者相比所长之处，认为"妇女之所长者，究在何处？余今且据个人之私意，答之曰：妇女之家政，美术，音乐等之评论，纪事及文学类之作品，则男记者往往不及女记者成绩之优良，以其笔致纤丽，观察明细故也。"① 伍超对女记者工作特点的总结则有一定道理。著名报人黄天鹏认为，女记者"笔致的纤丽和缠绵，观察的细心和精密，都不是男子所能及的。"② 《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女士认为，女记者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女性色彩主要有：容易接近被采访者，达到采访目的；文笔细腻，注意细节描写；关注弱势群体的性别意识等。③当代著名女记者樊云芳在她的《我就是我》（1981－1986年新闻作品选）里说，她一直"追求在新闻作品中能奉献给读者那么一点点只属于我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文采、独特的构思、独特的新意"。④这里的"独特"，特别是"独特的感受"，就包含有女性色彩。这些女性色彩在中国近现代女记者身上也有鲜明体现。

女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容易接近被采访者，达到采访目的。"美国女记者对'名人访问'曾开一个新方向，当时有很多名人不大喜欢见人，男记者穷于晋见之术，无意中有个女记者却把这名人见着了，且访问了他的夫人及家庭的情况。于是大家才刮目相看。以后知道名人不大忍拒见女记者。"⑤ 著名足球女记者李响认为，女记者有男记者不

---

① 伍超：《新闻学大纲》第69页，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初版。
②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23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③ 2002年4月19日上午访卢小飞女士。
④ 樊云芳：《我就是我》（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⑤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22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可小视的优势，那就是容易沟通。“足球腕级人物对于女性的采访，他不好拒绝。刚开始时我的这种对比非常强烈。他可能不会对你说很多，但他会跟你说。女孩子让他觉得不会有伤害性。”[①]近现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女记者在采访中也有这种优势，特别是在采访名人政要的时候，这种优势更加明显。据一名为“菊英”的女记者回忆，1934 年秋，她到广州一报社做外勤记者，职务是专访要人和富人的家庭，因为女记者在这方面可以得到男记者们采访不到的重要新闻。这些要人们不愿接见记者，有时勉强接见，说话是极谨慎的，而女记者采访要人的政见是极轻便的，“因为我被他们认为是女性，而且名义上的专采访他们的家庭生活的琐碎事，所以，他们对我没有那种拘束，而且往访必见，同时他们的眷属当然对我也是很接近的。许多要人的政闻，多半是从她们的谈话中间接得到的。每上一次要人的门，都有相当收获。因此颇受报馆的经理兼主笔的赞许；同事们对我也打破了男女的成见。”[②]

除了上述之外，女记者文笔细腻，观察的细心和精密，都不是男记者所能及之处。20 世纪 20 年代《时报》驻欧通信员李昭实的文章幽清秀逸，没有一点陈腐气。20 世纪 20－30 年代天津《大公报》驻法女记者陈学昭本身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女性文学家。她的文章写意抒情，自然流畅。女记者彭子冈笔之所至情之所至，同时还善于抓细节。一次，宋美龄自美国专机飞重庆，孔二小姐同行。子冈在这则消息后面加了一段细节描写：“她们的行李极多，自然有许多重要文件，两卡车装得满满的。有人走近一打（十二只）四四方方的盒子，受到了叮嘱：‘小心点，别走近来，这里面是手表。’”似乎是轻描淡写的几句细节描写，把国民党权贵们的走私丑行揭露了出来。浦熙修在采访旧政协会议代表时，就大量采用细节描写，或抑或扬，自然得体。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是“奴隶的奴隶”。妇女界洞悉民间疾苦，感受最深，而唯有女记者能详尽报道；同时，儿童教育与禁娼妓等问题，与妇女的关系最为密切。妇女、儿

---

① 沈文愉：《李响响了以后》，《北京晚报》2001 年 11 月 3 日第 2 版。

② 菊英：《三个月的女记者生活》，《上海妇女》3 卷 7 期，1939 年 8 月 15 日。

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女记者最易关注弱势群体。这也表现了女记者的女性色彩。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对女性的歧视，女记者们在新闻工作中有过诸多不便。“在男性中心社会里，女性从事新闻事业，只有办个以‘女’或‘妇女’这种字眼做冠词的什么刊物，要想办一般性的刊物——特别是注重国际宣传——的日刊报纸，这算是对于男性的僭越，是很少有成功希望的。”①这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著名留法女博士郑毓秀筹办世界新闻协社的计划失败而言的，但这也是当时女性从事新闻工作中所遇困难的一个缩影。更有个别不良报社的经营者，不尊重女记者的人格，企图利用女记者别辟敲诈蹊径的。这令初入新闻界的女记者大失所望，“我怀着无限光明的希望，来干这样辛苦的事业，竟得到这样无聊的教训。当时要不是保持庄重的话，我一定会哭起来的。”②

尽管如此，中国女新闻工作者还是与其他同业者一道，在从事新闻活动的同时，以其新闻作品，“帮助困苦者征集款项，教授保健和成功的法则，传播世上一切人众和事物的消息，辅助建立基本国的历史，甚至就是伊笔下最小的点滴，也将有其地位而色染伊的时代的图画。”③

美国的一名女记者依据自己的从业经验，作了一篇女新闻家须知。这种经验之谈随着时间的发展变化，部分已经显得过时。但其中有些经验，历久弥新，在今天还是值得一提的。“入报馆后更事渐多，才知道经验重过学问，各事皆由心习而来的，并没有人为之指导。”④正所谓，“阅历最可宝贵，我即我的老师”。“凡事应有定力，无论如何困难，应该坚持到底。而心思和才力，尤为记者所应兼备的；报业是公众的事业，报酬应得的才可取，不要受外物的引诱，自堕人格和

---

① 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二册）第505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菊英：《三个月的女记者生活》，《上海妇女》3卷7期，1939年8月15日。

③ Emma Bugbee著，胡青译：《美国妇女在新闻界》，《妇女共鸣》5卷6期，1936年9月20日。

④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27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报格，有这样的品学才算是个完全的新闻家。”①

从 1897 年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诞生到 1949 年中国女新闻工作者队伍的规模性发展，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培养了她们的专业能力，塑造了她们的职业精神，磨练了她们的奋斗意志，展示了她们的优良传统。

女性参加新闻事业最基本的意义何在？“女性记者的又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女性须知做这种职务不是单纯的个人生活问题，乃是全部的妇女问题。若是怀着这种观念去服务，那就一点痛苦就也没有了；而且怀着这种观念去服务，是万万不会失败的。——女性如果能够勇往直前地参加新闻事业，至少那任意侮辱女性的新闻报道是不会发生的。”②

妇女报刊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 1897 年以前，报纸上没有女性的声音，中国新闻事业里也没有妇女报刊的位置。随着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妇女报刊的数量增多，分布范围扩大，宣传内容逐步深入。

妇女报刊的产生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因为占社会一半人口的妇女结束了没有自己舆论阵地的局面，沉默者开始说话，无言者学习立言。没有妇女报刊，妇女就不会从深闺中走向社会，更不会有参与社会活动、争取自身解放的意识。从 1898 年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产生到 1949 年妇女刊物遍及全国，妇女报刊在研究、讨论妇女问题，反映、指导妇女生活，在促进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

① 黄天鹏：《天庐谈报》第 28 页，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 年 11 月出版。

② 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二册）第 534 页，商务印书馆发行。

参考文献

一、综合著作文献类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2 月第 1 版。
2. 李静之、张心绪、丁娟著：《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3.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4.《孙中山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5. 孙晓梅：《国际妇女运动概况》，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0 年版。
6.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7. 李平：《世界妇女史》，海南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
8. 刘宁元：《中国女性史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9.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
10. 林吉玲著：《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11. 肖黎、马宝珠、吕延涛主编：《影响中国历史的 100 个女人》，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版。
12. [美] 坦娜希尔：《历史中的性》，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
13.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1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
15.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4 月版。
16.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17.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45－194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2月版。
18.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
19.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3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三联书店1979年版。
20. 丁洪章、古梦云编：《共和国领导的夫人》，北京华龄出版社1994年5月版。
2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22.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23.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4. 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妇女共鸣社1936年9月版。
25.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1月初版。
26.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27. 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二、专业学术著作、网站

1. 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
2. 任白涛著：《综合新闻学》(第2册)，商务印书馆发行。
3. 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发行，1925年1月初版。
4. 黄天鹏：《天庐谈报》，上海光华书局印刷发行，1930年11月出版。
5. 许晚成：《全国报馆刊社调查录》，上海龙文书局发行，1936年6月版。
6. 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1月第1版。
7. 《中国报界交通录》，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印，1933年。
8. 徐铸成：《报人六十年》，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
9. 朱传誉著：《报人·报史·报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10. 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 方汉奇著：《报史与报人》，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1996年5月版。
1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4. 曹正文、张国瀛著：《漫谈上海近代妇女报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5. 臧健、董乃强主编：《近百年中国妇女论著总目》，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6. 蔡铭泽著：《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
17. 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8. 姚福申、史和、叶翠娣：《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
19. 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
20. 陈一生选注、方政军主编：《百年记者风》，新华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版。
21. 《华夏妇女名人辞典》，华夏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
22. 王会林、朱汉国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书海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版。
23. 《中国新闻年鉴（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 11 月版。
24. 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25. 《新闻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
26. 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27.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 1983 年 6 月版。
28. 赵玉明著：《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29.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30. 石西民、范剑涯编：《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2 月版。
31. 李秀云著：《中国新闻学术史》，新华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32. 北京市妇女联合会编：《北京妇女报刊考》（1905－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0 年版。
33. 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
35. 宋应离主编：《中国期刊发展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36.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出版社 1983 年 5 月版。
37. 汪学起、是翰生编：《第四战线——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掇实》，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38. 中国女记者编委会编：《中国女记者》（1－2），新华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38. 王艾生主编：《中国当代名记者小传》（1－2），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2 月版。
39. 《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
40. 夏林根主编：《近代中国名记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
41. 杨沙林著：《用生命播音的人——忆齐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42. 《邵飘萍传略》，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
43. 《秋瑾集》，中华书局 1960 年 7 月版。
44. 《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2 月版。
45. 郭延礼著：《秋瑾年谱》，齐鲁书社 1983 年 9 月版。
46. 陈向恭编著：《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中华书局 1983 年 7 月版。
47. 《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 4 月版。
48. 黄薇著：《从海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新华出版社 1987 年 8 月版。
49. 《浦熙修记者生涯寻踪》，文汇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50. 《忆浦熙修》，文汇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51. 《陈香梅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52. 蒋丽萍、林伟平著：《民间的回声——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版。
53. 周叙琪著：《1910－1920 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出版，1996 年 6 月初版。
54. 何鹄志著：《向警予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 4 月版。
55. 吴德才著：《金箭女神——杨刚传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
56. 《江苏报业史志》1993 年第 3 期。
57. http://www.xinwenren.com.

三、报刊类

1. 《知新报》1－52 册，1897－1898 年。
2. 《无锡白话报》第 1 册，1898 年。
3. 《妇女杂志》1－8 卷，1915－1922 年。
4. 《妇女时报》1－20 期，1911－1916 年。

5.《女星》1－26期，1923－1924年。
6.《妇女周报》1923－1924年。
7.《京报》1928－1930年。
8.《时报》1928－1929年。
9.《妇女生活》1935－1937年。
10.《妇女共鸣》5－6卷，1936－1937年。
11.《中国妇女》1939－1941年。
12.南京《中央日报》1945－1946年。
13.《中苏文化》13、15、16卷，1943－1945年。
14.天津《大公报》1947－1948年。
15.《现代妇女》1945年。
16.《上海妇女》1938－1940年。
17.《新青年》1915－1918年。

后　记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从2002年5月31日论文答辩那天到现在，这些文字已经在我的手中把玩了将近四年之久。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本人对它进行了数次补充和修改，可是到现在，想到它将交由出版社出版，并拿到读者面前，由读者来评判，心中还是不免惴惴不安。

新闻史著作讲究史料的客观纯正、论述的逻辑严谨、结论的真实可信。面对这些横亘在我面前的学术标准，我尽最大努力去靠近它，去实践它。但是，不容否认，由于精力和能力的限制，书中还有大量的不足之处有待补充和修改。尽管我一直想让本书携带我最少的遗憾去面对读者，尽管我把出版一本近乎完美的著作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目标，可现在看来，这也只能是目标而已，只能是自己不断努力的方向而已。

在该书即将面世之际，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方汉奇先生。先生胸怀开阔，为人达观，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每次与先生见面，向他汇报学习心得，与他讨论疑难问题。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流中，我在知识水平和心灵上均受益匪浅。在写作过程中，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从论文选题的确定到结构的调整，从观点的修正到资料的搜集，乃至到最后的修改，他都给予最大的支持。他那循循善诱的长者风度以及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更令我永志难忘。师母黄晓芙女士总是嘘寒问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总能让学子感到家的温暖。

本书的写作吸收了成美教授、程曼丽教授、陈业劭教授、谷长岭教授的宝贵意见。在论文写作阶段，我有幸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和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卢小飞女士的支持和指点。对于她（他）们的支持，在此深致谢意！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领导和季端基金捐助者邱季端先生。

他们的支持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陈友军先生，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辛劳。史学著作，引文注释繁多，编辑任务极其繁重。陈先生不厌其烦，细心推敲，润色词句，指点弊误。他所表现的优秀职业道德，令人起敬。

中国女性媒介的发展，从 1898 年中国第一份妇女期刊《女学报》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从 1897 年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康同薇在《知新报》担任日文翻译到现在，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无论是女性媒介、女性新闻传播工作者，还是社会对女性媒介和女性新闻工作者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若以学术的目光来审视这些变化，我们发现，无论是传播内容、传播方法，前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当代女性传媒的发展，更呈现出多样化的势头，突出表现的就是女性传媒不再是单纯的以宣传为生存目的，而是大量的走向市场，在市场中展现女性媒介的风采。

1999 年，中国第一家女性频道——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开播。这是媒介市场细分化的结果，是女性受众和电视强势媒体结合的开始。2002 年 1 月 25 日，我国第一家期刊集团——家庭期刊集团在广州正式挂牌成立。继报业、图书出版、广电走向集团化运营后，我国期刊业规模化发展的序幕由妇女期刊拉开。家庭期刊集团准备将实用型的社会生活类期刊的出版范围，扩大到时装、家居、休闲、保健、投资、理财等领域；充分发掘、利用《家庭》现有品牌和信息资源，创办《家庭》网站；以联合投资或独家投资的方式，与电视台合作或独家在电视台中创办《家庭》杂志节目或固定栏目。[①] 以该杂志社为核心组建的跨媒体的家庭期刊集团，将以资本扩张为主要手段，通过自身发展和资本渗透，几乎是全方位地拓展其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领域。

女性电视频道的开播和《家庭》期刊集团的成立，代表着中国妇

---

① www. BG. net. cn（文艺频道），2002 年 1 月 28 日。

女传媒的发展实力和方向。女性传媒在竞争激烈的媒介市场上如何谋求生存发展之道？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就与女性媒介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我对此仍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一直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希望在条件具备时再出研究成果，以供读者评判。

宋素红

于2006年3月2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女性媒介　历史与传统
作者=宋素红著
页数=337
SS号=11751848
DX号=
出版日期=2006年8月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